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英】乔纳森·休斯 著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铁省林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英】乔纳森·休斯 著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铁省林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英)休斯(Hughes,J.)著;  
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2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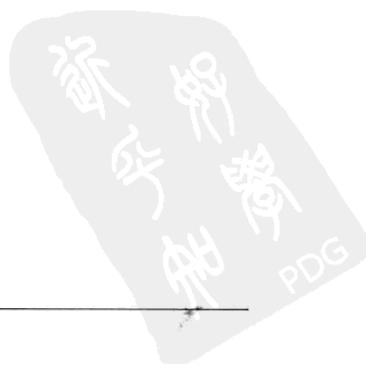
ISBN 978-7-214-06627-5

I. ①生… II. ①休… ②张… ③侯… III. ①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 IV. ①Q14②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992号

- 书 名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著 者 [英]乔纳森·休斯  
译 者 张晓琼·侯晓滨  
责任编辑 张春坦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10.875 插页 2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27-5  
定 价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 21 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国际性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6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厚度，以及对中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 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 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 鸣 谢

本书是从由诺曼·盖勒斯(Norman Geras)和希勒尔·施泰纳(Hillel Steiner)指导,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麦克·埃文斯(Mike Evans)评阅的博士论文演变而来。我非常感谢他们和所有对本书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进行评论的匿名审阅人。特别感谢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他对倒数第二稿广泛而深入的评论使本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也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书中存在的问题。出席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召开的两次英国政治研究协会马克思主义专家组(the PSA Marxism Specialist Group)会议代表以及在曼彻斯特政治思想中心(the Manchester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举行的研讨会,都为本书的部分论点提供了有益的建议。第五章的早期版本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Studies in Marxism* 2 [1995])上。我还要大声感谢海伦·拜斯特(Helen Best),正是她鼓励我开始这个项目的研究,她的不断鼓励、支持和耐心都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关键。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女儿——凯蒂(Katie)和劳拉(Laura)。

# 目 录

鸣谢 .....	001
导言 .....	001
第一章 生态问题:定义和评价 .....	00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 .....	04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方法 .....	091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中定位社会 .....	123
第五章 生产力的发展 .....	175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需要的满足 .....	228
结语 .....	287
参考文献 .....	297
索引 .....	317
译后记 .....	335

## 导 言

1

本书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论题(这些论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环保主义者对其进行的公开指责,同时表明得到恰当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针对威胁和危害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发展对策提供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因此本书可能被认为卷入到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和环保主义之间的对峙之中。但是如同任何概要一样,本书的论述需要一定的限定条件。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个单一的理论来谈论是过于简单化的。对有关马克思及其合作者恩格斯著作的广泛解释进行评论是不必要的。这种合作的性质也已成为诸多争端的来源,从而导致对他们合作成果中统一立场的否认。人们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之间辨识出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区别。由此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究竟哪种马克思主义与环保主义对抗呢?因此,研究何种阐释是有效的以及从这种对抗中会产生哪些积极方面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保护主义也有许多不同的思潮。源于奈斯(Næss)1973年的文章术语“深”(deep)和“浅”(shallow),常常被



2 用作区分激进与否的思潮的一个简便方法。但是，正如约翰·巴里 (John Barry) 最近所主张的那样，该二分法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图像。<sup>①</sup> 深/浅分类是评估术语中最常用作定义的方式，那种把内在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被称为“深生态学”(Deep Ecology)，而那些把单一的工具性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被称为“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分类术语也更多的被用于形而上学的而非评价性思考的方式中。而且正如巴里所指出的，也可根据其经济、体制和政治等视角来区分不同的环保主义思潮，从而也就可以跨越深/浅的鸿沟了。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些环保思想内的分歧，而更关心马克思主义内的相似分歧；我的目标不是在各种环境理论家中选择谁的著作，而是利用他们的论点作为提出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环境问题挑战的方式而已。

因此，这种对抗是不对称的。我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以下几点：其一，环境问题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其二，如果环境问题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意义的话，马克思主义能够给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贡献什么；其三，我借鉴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文献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面对广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之死”的情势之下，以这几个方面表达的这个方案看起来可能会有违常理。可能会有人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是“生态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只是因为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是如此广泛地被宣布。这不仅仅是有违常理；重要的是，学术风尚应该被

---

<sup>①</sup> 见 Barry 1994。

质疑而不是简单的被追随,那些目前已不再受欢迎的想法也不应该被忘却或忽视。即使那些宣称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运动崩溃之后,马克思在未来已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虔诚地解读,那么,为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长处、弱点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展开适当的争论,马克思的思想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继续研究,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理由很重要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不仅致力于研究观念史,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一系列特定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显然,我在做这样一种假定:至少乍看起来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应仅仅被视为具有通常意义的研究价值,而且还可以作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一种有用框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认为环境保护主义也会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有一天也会风光不再。或许可以这么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耸人听闻的案例已经证明其子虚乌有,环保主义者对环境问题的正当关注已经被纳入到政治主流中。但是尽管关于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表达确实渗透进了主流政治之中,因而削弱了3  
了对绿党的支持,同时环境激进主义也确实把焦点从政党转移到了那些自认为已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权势集团中的压力集团,但他们仍普遍感觉做得还不够,并且正如绿党所敦促的那样,在政策制定中环境问题需要得到更多地关注。政府和企业对环境的关注表现为服从于所提出的政治或经济承诺,如果不是单纯的粉饰,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外围的修修补补。这个看法已被证实,因为许多人宁愿相信压力集团的科学观点而不是由政府、企业和新出现的更具对抗性的竞选团体所雇佣的专家们的观点。

另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问题关系的一个原因是它或许能帮助我们判断绿色政治的弱点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主流回应的不足。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就批评那些企图超越阶级差别并呼吁全人类平等的生态学家们。当然,生态问题的存在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威胁,但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紧迫性。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可以购买保护或逃生通道。<sup>①</sup>与此相关的是,以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由于在宣扬建立并推进更美好社会的模型时没有对使之实现的机制和机构给予充分的重视,大量的绿色政治话语因而被称为乌托邦式的。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可以解释生态主义弱点的利益的相同结构,也可以解释主流回应的不足。因此,或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能够重塑生态政治的激进锋芒。然而,环保主义者和其他人将会争辩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担当这个任务。凭借引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数据,这些争论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他们争论道,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政治的批评是多么有力,主流政治中对生态问题是多么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适合于做这种替代,因为这个理论本身的含义——尤为显著的是那些产生于马克思关于一个丰裕未来设想和对

---

<sup>①</sup> 例如,见 Hall 1972b。另见下文第 22 页注<sup>②</sup>引述的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所作的评论。一些绿党们(如 Porritt 1985, p. 116)确实承认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对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影响,但通常这些阶级的差别得不到重视,而且没有转化为相关的动力或策略思想。正如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描述:“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60. )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 页。]

生产力发展承诺的含义——这些含义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相冲突。因此,本书的一项中心任务将是考察这些争论,同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中的思想事实上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种方式既承认环境的制约,也提供了深入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前景。

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我最初的论述所表述的进一步限制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对抗不是完全敌对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他关于人类社会依赖自然并被自然条件所塑造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比商品的市场价值更为广泛的价值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和观点也反映了许多绿色理论家的忧虑,由此也提供了我们之所以合理地希望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影响的研究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实践的另一理由。

当然,我的研究不限于这些问题。以下各章将讨论其他许多问题,呈现解释的异同之处。然而,我们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在不同层面上的对抗(如果可以用“对抗”这个词的话),这是本书值得进一步了解的地方。本书的研究更多地定位于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解决的是价值的哲学问题和解释形式,以及人类本性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普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作为使研究形式更具体更实用的基础,例如发表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自然》(*Nature*)、《社会主义》(*Socialism*)等刊物上对特定经济与政治安排、政治运动等的详细研究。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对规范性和解释性问题的关注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这种阐释与科恩(G. A. Cohen)、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约翰·罗默(John Roemer)和



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理论家们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它旨在澄清马克思的成问题的概念和主张并以一种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方式解释或重建他的理论,那么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们都热切渴望的。在一个更实质性的层面上,目前的工作表示了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至少是埃尔斯特所支持的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某些保留,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常被说成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过我们应该看到,5 在这一理论的性质和意义方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埃尔斯特与科恩之间)。一般来说,目前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性努力,特别是归功于科恩,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阐释形成了我本人论述的出发点。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奠定了基础,或更确切地说,通过考虑应该如何把握生态或者环境问题,确定了后面的内容的范围和研究方式。我讨论了这些问题可以从社会所面对的其他问题区分出来的方式,同时我也考虑了它们被判定为问题的规范标准,从而抛弃了与深生态学相联系的“生态中心”观点,并提出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虽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比文献中常遇到的要更广泛,也更微妙。

在第二章中,我考察了绿色政治和一般环境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然限制”的概念,尤其是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制。这个概念源于马尔萨斯的学说;有时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Malthus)的批判导致了他们拒绝接受环境限制存在的观点。但是我

反对这种观点,并凭借他们的批判表明需要一种更全面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一方法不仅认识到环境的限制并非纯粹自然的限制,而且承认社会和科技因素在这些限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其余章节的任务则是思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如此理解的环境限制的认知是否相一致。第三章通过审查引领马克思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准则为完成上述任务做准备。这种准则被批评为不适用于研究生态现象,但是事实上这些方法准则在环保主义者自身的方法论思索中却被大量应用。第四章阐述了人类对自然依赖的认知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因此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接受环境限制的现实,并允许其包含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与马克思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第五章作为本书的核心章节,针对上述论点提出了挑战,并诠释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它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即这一理论的内涵并不是对环境限制的违<sup>6</sup>背,而是把避免或改善生态问题作为该种发展的一项标准。由于根据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意识结构,实际形成技术发展的因素各不相同,因此,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这一理想可作为现存社会生态批判和变革动力的基础。马克思信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发展对于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必须的,而马克思认为这种需要满足又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第六章中,我将继续(我希望)通过考察马克思的人类需要学说及其生态蕴含来结束这场讨论。

## 第一章 生态问题:定义和评价

为了能够研究马克思主义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预测受到这种问题存在的影响程度以及用于解释和回复它们的潜在理论,我们需要考虑这些生态问题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将无法认识到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或评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态问题思想。因此,在第一章我将考虑以下两个定义生态问题的核心问题:

- (1) 在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哪些可视为生态问题?
- (2) 导致这些现象被视为问题的价值观念或道德准则是什么?

在把它置于理论背景之前很难定义一种现象,因为理论的部分功用就是为我们提供一套阐释理论所探讨的现象之特征的术语。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只是加以初步的解释,未免有失哲学的本色,结果所得恐不过只是一套无凭的假说,主观的肯定,形式的推理,换言之,不过是些偶然的武断而已。与此种片面的武断相对立的反面,亦未尝不可以

同样有理。”<sup>①</sup>关键是，只有在理论的背景下尝试理解一个问题，我们才能确定一种构建或界定该问题的特定方法是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黑格尔认为，若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我们也就没有充分理由选择这一个定义而舍弃另一个定义，也因此容易受到独断论的支配。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确定研究的范围，某种形式的初步定义仍是需要的，否则就会使自己受到独断论的支配，因为产生于一个特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内的生态问题定义将不可避免地排除考虑任何该理论框架无法容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考虑一些特殊的主张，这些主张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某些方面视而不见。然而，目前的任务是初步考虑这些问题是什么。为了避免独断论的支配，尤其是指责我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排除了使马克思主义遭遇尴尬处境的生态问题方面，我将借鉴一系列环境文献并通过考虑所有参与者在辩论中而不仅仅是由某一特定观点的附和者们所广泛应用的直觉和论据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虽然我有时会把这一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我不会提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具体解释。

## 一、什么是生态问题？

“生态”一词通常用于指生物学的的一个分支，旨在处理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当它与环保运动、绿色团体等相联系时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贬义词。这种观念导致一些作者在涉及到该种运动时就避免使

---

<sup>①</sup> Hegel 1975, p. 14. (中译文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9 页。)



用“生态问题”一词,而用“环境问题”来取代。其他人如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倒是使用了“生态问题”的表达,但他把这个词仅限定在其松散或扩展的用法上。<sup>①</sup> 还有一些人也使用“生态”一词,以显示其在看待人类与环境关系问题上比纯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具有“更深入”、更激进或更根本的见解。<sup>②</sup>

诚然,“生态”一词对人类的应用已超出了生物学的专有领域,因为(我们将看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被超出其科学范围研究的社会和技术因素所中介。而且,“生态”和“环境”这两个词语也确有不同的联系,前者更加注重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或系统方面。但9 这些事实无法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超出了生态学领域,或者是“生态”和“环境”应用于人类问题的核心含义上有什么不同。因此,我将交互使用“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表述来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即既然人类是生物体,那么他们与环境的关系则属于上面所说的生态学的合理范围。这种用法越来越多的反映在理论生态学的实践中,根据一位研究人员的说法,它“从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成长为把生物科学、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科学”。<sup>③</sup> 由此可见,“生态”一词在“生态问题”方面的应用所经历的任何贬低,不是产生于它应用于人类和超越纯生物学,而是来自于人类与环

---

① Passmore 1974, p. 43.

② 例如,在所谓的深生态学运动的名称中,以及在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和“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区分中(1990, p. 13),这是很显然的。

③ Odum 1975, p. 4.

境关系的特定内容。

生态或环境问题不完全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这一事实突显了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试图界定这些问题的困难之处。或许从上述生态内容的阐释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定义通常一方面取决于人类或社会的区分,另一方面取决于环境或自然的区分。比如帕斯莫尔说:“如果一个问题作为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际后果而产生,那么该问题就是‘生态问题’。”<sup>①</sup>但这一区分缺乏明确清晰的含义。在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应对生态问题上,如果依赖于未经审查的“自然”概念则很可能使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因人类的活动而转变或“人化”。<sup>②</sup>一般说来,“自然”概念的含糊不清对生态问题的界定构成了严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通常(虽然不一定)出现在环境已经被人类活动改变的情况下。

人们有时会利用生态问题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通过否认生态问题的新颖性以及主张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生态问题和各类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来淡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的挑战。例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认为,20世纪的环保运动所表明的问题本身与19世纪工业化的影响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后者“使得整个城镇和农村地区根本无法居住”并危及到工厂和

① Passmore 1974, p. 43. 罗宾·阿特弗尔德(Robin Attfield 1991, p. 1)和雷纳·格雷德曼(Reiner Grundmann 1991b, p. 23)也采用了帕斯莫尔的定义。

② 例如,自然的部分:《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第67、136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2、48页。自然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2页;《资本论》第一卷,第283—284页;《自然辩证法》,第172页。



矿井中人们的生命：

来自地狱般的噪音；人们呼吸的空气被爆炸性和有毒气体以及受到细菌高度污染的致癌物质颗粒所污染。这种难闻的气味是无法想象的。在劳动过程中，人们接触各种有毒物质。饮食状况极其恶劣。食物被掺了假。安全措施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早就被人们忽视了。工人阶级的住房拥挤不堪。供水和排水系统极其糟糕。在废物处理方面通常也没有井然有序的方法。<sup>①</sup>

恩岑斯贝格认为，如今所不同的和导致环保运动出现的，不是这些问题的内在本质，而是这些问题的普遍化：它们影响着中产阶级利益这一事实。恩岑斯贝格的观点因而与众多绿党的观点相悖，后者认为环境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社会问题，因为环境问题引发了特有的提议改组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sup>②</sup>沿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古斯·霍尔（Gus Hall），承认环境危机“不仅仅是另一个问题，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他要求“一种彻底全新的方法”；然而尽管如此，像恩岑斯贝格一样，他把环境问题与他称之为“最古老和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比较，即“100多年来持续在工厂和矿井中”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造成的死亡。<sup>③</sup>

---

① Enzensberger 1974, pp. 9 - 10.

② Dobson 1990, p. 3.

③ Hall 1972a, pp. 68, 34.

恩岑斯贝格所描述的很多问题似乎都可归入生态或环境问题。但其他学者似乎把这一范围划得更为广泛。如乔·韦斯顿(Joe Weston)把包括街头暴力、异化劳动、贫困和住房拥挤、城市内的衰败和污染、失业、失去群体认同和服务以及危险路况等在内的一切都视为环境问题。<sup>①</sup> 这个名单中的第四项或许还有第三项被看作环境问题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但尽管其他项目或许也和环境问题有着因果联系,但若把它们本身都视为环境问题,像韦斯顿那样的话,就是以剥夺其概念特殊性的方式摒弃了它的正常用法。 11

倘若需要有一种比韦斯顿的范围更小的界定,那么问题就在于应该如何划分这个范围。每个个体都存在于一系列互相重叠交织的巢套环境中——家庭、工作场所、街道、城镇、国家等等——每一场所(环境)都有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产生于和这些环境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根据韦斯顿的观点)列为环境问题。然而,我们深为关注的是“环境问题”等同于(对应于)“生态问题”的这种意义,(从上面这种“等同”的讨论中)显而易见的是,生态学关注的是生物个体与其自然环境的的关系。此外,如奥德姆(Odum)指出的那样,生态学主要关注单个生物个体之外的各级组织,即种群(population)和(生物)群落(community)。<sup>②</sup> 因此,也许我们不应着眼于个体的他或她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该环境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将包括组

---

① 引自 Pepper 1993, p. 437。

② Odum 1975, p. 4. 在生态方面,“种群”指单一生物种类的个体团体,而“群落”(或“生物群落”)指某一特定区域的所有种群(同上)。



成人类及其活动的社会环境,而应当把那些涉及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与其环境——非人类世界或“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界定为生态问题。这使我们回到了帕斯莫尔的观点,他认为生态问题可以界定为那些产生于人类处理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论它有什么缺点,这一界定的确给人这样一种直觉,即像街头犯罪和群体解体这种问题本身不属于生态问题,而恩岑斯贝格所提及的工作场所状况及其他问题则落入了生态问题概念范围边缘的灰色地带。工作场所属于人类遭遇和使用从非人类的自然界汲取的物质原料的领域,但不是产生于这一遭遇中的所有问题都恰好符合生态问题的概念:如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从直观上看比那些无安全保障的机器所导致的危险更符合生态问题的概念。但这种差异似乎与帕斯莫尔的界定是一致的,因为污染问题从本质上以无安全保障的机器的危险所不具有的方式涉及到自然环境(空气、水或任何其他被污染的东西)的方方面面。

12 如上所述,帕斯莫尔的生态问题定义中也存在着问题,即其“自然”一词的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性。倘若我们把它理解为“原始自然”,不包括那些已被人类活动改造的对象,那么我们会把许多通常视为生态问题的问题给排除在外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因为“只有该死的所剩无几的‘自然’了,就像日耳曼民族移居到德国时候那样。地球的表面状况、气候、植被、动物群体和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一切都归因于人类活动……”。<sup>①</sup>“原始自然”的消失也成为最近讨论的主题,最显著的是由麦吉本(McKibben)所著的《自然的死亡》

---

<sup>①</sup> *Dialectics of Nature*, p. 172.

(*The Death of Nature*)一书。但许多环保主义者承认,他们寻求保护的  
环境是由人类干预造成的不同程度的产物,如果我们允许自然也包  
括已由人类改变的那些因素的话,环保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则可能符合  
帕斯莫尔的生态问题定义了。不过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涵盖太多的危  
险,因为至少在那些起源于自然并受其规律支配的组成物质方面,一  
切都是“自然”的。因此,如果我们把“自然”的概念延伸太广的话,我们  
将无法从生态问题领域中排除社会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一位学者无意  
中阐述了这一解释的荒谬性,他认为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  
类”的作品(当然包括氢弹和毒气室)就和那些花亭鸟和海狸的作品一  
样是自然的了。<sup>①</sup> 我认为对自然的这种解释是荒谬的,因为正像韦斯  
顿所罗列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一样,它涵盖的如此广泛以致祛除了这一  
概念的任何特定含义。然而,它表明了与自然与非自然之间并没有明  
确的界线。“自然”似乎是一个程度问题,如果以“自然”的观点来定义  
生态问题的话,它就会相应地变得含糊不清了。

从广义上讲,作为人们对“环境问题”这一词语一般理解的一种特  
征,帕斯莫尔的定义是很有帮助的。没有人会质疑,环境问题可以理解  
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前面段落所述中必须强调和说明  
的是,这一定义并没有在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其他各种问题之间  
提出严格的区分。环境问题的具体特征及其政治理论内涵,不能从环  
境问题的形式定义或“人类”与“自然”概念之间的抽象区分来解释,而  
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以及人造环境之间实际关系的理论阐释之上。

---

<sup>①</sup> Watson 1983, p. 252.



13 为了给这一解释提供一个框架,并为其研究范围提供进一步说明,下一节我将从不同角度、通过考察不同学者提出的,把现象种类作为构成环境或生态问题的更广泛类别这样一种方式来表征生态问题。

## 二、环境问题的分类

尽管针对构成环境问题的因素缺乏一个严格的解析性定义,但仍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同的对该环境问题种类的公平的衡量方法。莱内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根据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布伦特兰报告)(The Brundtland Report)以及帕斯莫尔的理论,编制了一个环境“现象”的表单。<sup>①</sup> 表单的前面部分有:

- (1) 污染(空气,水);
- (2) 地下水的枯竭;
- (3) 有毒化学物质的扩散;
- (4) 危险废物的扩散;
- (5) 侵蚀;
- (6) 荒漠化;
- (7) 酸化;
- (8) 新的化学品;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13;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p. 10; Passmore 1974, p. 43.

后面部分有：

- (9) 污染；
- (10) 自然资源的枯竭；
- (11) 物种灭绝；
- (12) 自然环境的破坏；
- (13) 人口的增长。

格伦德曼认为所列出的这些现象可归为三类：污染、资源的枯竭（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人口增长。其中最后一种是最有争议的，所以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条。

格伦德曼认为人口增长可从两个意义上视为生态问题：

首先，它可以被看作是导致生态问题如污染或资源枯竭的因素，<sup>14</sup>因为人口不断增长，可能需要更大力度地开采资源或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发展生产，而这一过程就产生了污染的副作用。第二，它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生态问题，即在某一特定地点数量的增长可能危害人类的福祉。第一层意义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第二层意义是生态问题的一个实例。<sup>①</sup>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表明格伦德曼的意图。人口增长是生态问题**原因**之一的**主张**并不是人口增长**是**生态问题的必要条件。有趣的是，格伦

---

① Grundmann 1991b, p. 14.



德曼并不把其他人所声称的导致环境问题的原因,如经济增长、技术发展等罗列在他的表单中。其次,如果人口增长不利于人类福祉的话,这将表明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本身不会表明为一个环境或生态问题。甚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生存的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这两部著作都通常被描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因为它们预设了人口的指数增长,严重警告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并把人口增长视为环境问题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实例。<sup>①</sup>

格伦德曼对环境问题种类的三种划分中所采取的其他步骤是什么呢?格伦德曼正确地将第 1、3、4、7 和 8 条归入污染的范畴中。他把第 11 和 12 条(可能还有第 2 条,虽然没有说明这一点)归入到资源枯竭的范畴中。食物供应问题(是否如《增长的极限》中所表述的那样,产生于人口增长或其他原因)或许也可列入到这一类。更具有争议性的是,格伦德曼把第 5 条——侵蚀和第 6 条——荒漠化从环境问题的表单中祛除了,其理由是:这些都是自然过程并且“只有当它们是由人类干预的因素引起时才会成为我们此处关注的对象”。<sup>②</sup>他认为,只要人类进行了干预,就可把它们归入到自然资源枯竭一类中。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格伦德曼为什么认为只有当资源枯竭是由人类干预引发时才应被视为环境问题。<sup>③</sup>如果资源是指有助于人类实现目的的材料工具<sup>④</sup>,那么为了作为资源枯竭的一个例子,该现象必须,至少潜在地,对人类活

---

① Meadows et al. 1974, p. 23; Goldsmith et al. 1972, p. 3.

② Grundmann 1991b, p. 14.

③ 同样也不清楚为什么格伦德曼认为第 2 条和第 11 条不可能自然地发生。

④ 在本章的结论部分会对这个定义进行限定。

动造成影响,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其原因。我们正把资源枯竭问题视为 15  
这种生态问题,因此引起生态问题的原因必须至少包含部分自然或非人  
类因素,而我们却找不到认为它们不是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理由。

如果我们拒绝把人口增长归类于环境问题,那么我们就只剩下两  
类了,即(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枯竭和污染。我们还应考虑一种  
进一步的分类。这是由罗宾·阿特菲尔德(Robin Attfield)提出的“地  
球的生命支持系统濒危”,并在《生存的蓝图》中描述为“生态系统的破  
坏”。<sup>①</sup> 引入这一类别则反映了什么是通常所称的生态问题的系统性  
或综合性,即不同环境因素和问题的相互联系。

有人认为最后一类是不必要的观点似乎也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当  
生态系统的破坏涉及到污染和/或资源的枯竭问题时,它才符合构成生  
态问题的标准。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可能成为污染或资源枯  
竭问题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像人口增长问题一样,只是生态问  
题的一个原因,而本身不是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资源”在广义上  
被定义为满足人类或其他生物利益需求并实现其目的的物质,则自然  
生态系统的破坏就成为仅仅是资源枯竭的一个子范畴,那么自然生态  
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被视为资源枯竭问题的实例。但我认为有理由对  
这种归类进行抵制。一方面,这种归类有损于常规用法:由温室效应引  
起的全球变暖问题是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实例,而不仅仅是

---

<sup>①</sup> Attfield 1991, p. 1. 阿特菲尔德的生态问题清单是:污染、自然资源减少、人口  
增加、野生动植物遭受破坏、由于侵蚀和沙漠化导致耕地的减少、地球的生命支  
持系统遭遇危害。《蓝图》引语引自 Goldsmith *et al.* 1972, p. 3。



生态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全球气候系统视为一种资源,所以全球变暖问题只能人为地归入资源枯竭的范畴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归类模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之间真正重要的区别:即一个特定数量物质的储备(如石油、水或鱼类)的减少与一个相互关联系统(如海洋生态系统或全球气候系统)的崩溃。因此,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还是可取的。

### 16 三、价值观和环境

在以上两节中,我讨论了生态问题概念所涵盖的范围以及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从社会面临的其他问题中区分出来。在本节中,我将考虑这些现象被视为问题所依据的价值观或伦理观。

环境伦理学是伴随着环保运动的成长,近年来发展起来以便探讨这种问题的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就像一本论文集的编者所说的那样:“使我们哲学家从根本上产生兴趣的是下列问题: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环境?支撑这一义务的道德准则是什么?”<sup>①</sup>环境伦理学的大部分争论涉及到两种广泛接受的评价框架的对立: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因其自身才具有道德价值,我们应该保护环境只是因为这是人类的栖息地;另一方面,拥有“生物中心”、“生态中心”、甚至“宇宙中心”等多种不同名称的立场,把道德价值归因于部分或全部非人类的自然。<sup>②</sup>正如术语的多样性所表明的,我们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以自然

<sup>①</sup> Dower 1989, p. vi.

<sup>②</sup> “宇宙中心主义”(cosmocentrism)一词来自 Bures 1991。

为中心的伦理学，它们因其主张不同的非人类道德价值实体而相互区别。然而，争论最激烈的区别在于：一方面是人类中心的观点，另一方面是非人类中心的观点，后者把道德价值归因于至少某些非人类的实体。<sup>①</sup> 环境伦理学家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正是在当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它们的生态危机负有责任，因此转向非人类中心的伦理准则是解决问题的必然出路。<sup>②</sup>

---

① 人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在这里对特定评价视角而言是一个不恰当的名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道德学说都不可避免地以人类为中心。这种意义指它们都是人类的视角，并且他们关于事物因其自身而有价值的判断必须从我们对事物对我们具有什么价值的理解和经验开始，不管这个范围最终被划定得多么广阔。据说，只有人类具有内在价值的实质性的学说，只有用“物种歧视”、“人类沙文主义”或“人类种族主义”等术语才能得到更好的表达。见 Hayward 1997, Eckersley 1992, pp. 55 - 56 和 Eckersley 1998。我对此的回应是：其一，我只是规定，我在这里遵循着使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词的惯例，用这两个词指上文所述的实质性的道德学说，而不是断言这些学说的视角性质；其二，我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蕴含着有利于我们自己物种的**无根据的**歧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中心”的视角是否是正当的。（如果我们坚持要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替代词的话，那么“人类的排他性”[human exclusiveness]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候补词汇。）

② 事实上，有些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定义环境伦理学，即只有以非人类为中心的伦理才符合资格。例如，埃利奥特(Elliot)和加雷(Gare)把环境伦理定义为一种系统的伦理，该伦理“认为我们的后代、非人类的动物和无知觉的自然都应该得到道德上的考虑”(1983, p. x)。但在我看来，无论这两个视角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都无助于在这些方面**界定**环境伦理学。最好把“环境伦理学”看作这样一个学科的名称，它探讨关于非人类自然的价值和维护它的理由的问题，我们可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同的答案。否则，就会有一种危险存在，即有关对环境伦理的最满意方式的辩论将通过语言规定的方式来决定，从而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产生了表面上的胜利并遗留下了如何最好的理解非人类自然的价值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厌恶道德和说教,所以他本人对这种观点或是更普遍意义上的争论都没有什么耐心。马克思在这一领域的观点已成为广泛争论的主题,在这里就不作充分阐释了。<sup>①</sup>但我认为他对道德话语的敌视态度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必定对环境伦理学有害。

空想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关于资本主义不公正和社会主义道德优越性的道德论证来说服统治阶级。马克思对道德说教的厌恶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空想企图。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种社会主义者“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并且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一部分的道德意识在维护现状中以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取决于其经济基础,他们对说教的鄙视也就源于他们的这种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的敌视或许可以解释为不是拒斥道德批判本身,而是断言道德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的效用有限性。因此,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观察到,既然剥削产生于等价购买劳动力之中,“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sup>③</sup>既不能把马

---

① 例如,见 Lukes 1985 和 McLellan and Sayers 1990 中的回应。Geras 1989 深入地考察了这一争论。

②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6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 - 304 页。)

③ *Capital*, vol. I, p. 301.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9 页。)

克思的这句话解释为对资本主义正义性的直接接受,也不能解释为对一种道德批判可能性的拒斥,而应当解释为这样一种断定:根据资本主义孕育并使之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正义观,资本主义不是非正义的。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正义观(作为流通领域的平等交换)在资产阶级社会将趋于主导地位,并有时对可能引用其他正义观来影响资本主义剥削过程表示不屑一顾,但他的确默许甚至也使用了这些替代概念。这从他的从生产的视角坚持认为劳动关系的不平等中得到了证实,由此工人们获得的是比他们所创造的更少的价值,因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工人是“无酬劳动”的供应者以及“抢劫”、“盗窃”、“贪污”和“敲诈”的受害者。<sup>①</sup>此外,尽管马克思认为直到孕育它们的社会改造的物质条件出现之前,资产阶级的正义性原则就一直不能被取代,但他认为它们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道,可以通过比较“较高一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来判断和评判。<sup>②</sup>

在最后一章我将再返回去考虑需要原则上的生态影响问题。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解释为否认对批判资本主义的评价性陈述的真理性或客观性;他的要旨在于,即使它们是真实的,同样也不会被普遍接受,因此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它们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无效的。故而对马克思而言,一个致力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家的根本任务,不是倡导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

---

<sup>①</sup> 见 Geras 1989, pp. 223, 225。

<sup>②</sup>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 320; cf. Geras 1989, pp. 227 - 228。



析它们背后的各种利益及社会结构,从而可以识别并促进变化的潜在动力。

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马克思的道德怀疑论就可视为这样一种警告:不能简单地把生态问题看作一套错误价值观念的结果,似乎可以通过颁布一项新的无需考虑那些价值观背后的利益和结构的伦理准则来矫正生态问题。这也应告诫我们,不要寄望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一个现成的环境伦理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略评价问题了。首先,马克思夸大了道德论点的无效性。即使关于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真理不被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所接受(这本身就是一种夸张),但这种真理仍然可能对这种不公正的受害者产生重要的动机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似乎是这样的:仅仅他们的利益就足以调动起他们的积

19 极性,但这种信念却忽视了一个人的动机应该被所信仰的目标加强到何种程度。他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关乎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他权利范围内的事情,甚至是他有责任追求的东西。其次,在解决评价问题之前我们不能继续前行,因为评价视角的选择将影响到我们应把哪些问题视为环境问题以及哪些应作为解决该方法。例如,全球变暖以及由此造成的海平面上升问题,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研发耐旱作物、海水淡化植物以及海岸防御以对付对人类利益的威胁来解决。而在那些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学者们看来,只要它们影响到和我们共享环境的其他生物、威胁到物种灭绝或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他们就会继续把这些现象视为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为了评估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迎接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解决主张以非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问题。

按照上述界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道德价值延伸到人类之外的一种观点。但重要的是,要限定在这一观点上,就涉及到像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里根(Tom Regan)所提出的“动物解放”的理论。“动物解放”理论主张,“高等”动物(它们享有人类的特征,如知觉或具有痛苦的能力)的道德价值往往被视为居于人类中心论这一端,或者被看作是某种程度上不完全的非人类中心的。按照这种观点,不管这一术语的本意如何,“非人类中心说”将更准确地体现为将道德关怀超越个体感知生物的利益。<sup>①</sup> 无论该定义的优点如何,但毋庸置疑的是,将道德关怀延伸至感知生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其实际影响上,都是比将其延伸至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等更不激进、更少争议的对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背离。接下来我将由此假设,在道德关怀的对象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可以延伸至包括不只限于人类的感知生物,并将焦点集中在道德关怀是否应该延伸至自然中的非感知生物部分这样的问题上。<sup>20</sup>

我将进一步假定,承担这个争议证明重担的是那些想把道德价值的范围延伸至感知生物之外的人。有人可能会批评这是一种方法论的

---

① 人们经常引用的与动物解放相抵牾的论断和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源于卡利考特(Callicott)的《动物解放:一个三角事件》(‘Animal Liberation: A Triangular Affair’, in Callicott 1989)。卡利考特已修正了他的观点,正如他在Elliot 1995重印他的文章的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和其他参考资料见 Jamieson 1998; Attfield 1991, pp. 179 - 181; Eckersley 1992, pp. 44 - 45。不把动物解放主义看作一种完全的非人类中心伦理的主要论点是:其一,其方法(通过类比方式从人类到其他物种向外论证)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其二,在实践中它致力于与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议程不相容的政策。然而,严格来说,这些都没有表明它在上述界定的意义上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人类中心主义,但在在我看来我们别无选择。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应予以保护,这不只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或其他享有并依赖于它们的其他感知生物,还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人们对这一观点争议很大,因此需要有人为其正确性提出辩护。因此我的研究将采取的形式是,对支持这种道德关怀延伸的最常见、最合理的论点进行考察和批判。但我们开始可能会在马克思学术的背景中设定论点,通过考虑莱内尔·格伦德曼提出的**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论点作为捍卫马克思(以及他认为马克思所代表的启蒙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反对来自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生态批判。

### (一) 繁荣与道德价值

格伦德曼的人类中心学说的论点基于这样的假定基础之上,即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必须能够区分“正常的”、从而要得到保护的自然状态与“病态的”、从而要加以避免的自然状态。针对这一点,格伦德曼反对“很难了解什么是‘正常’的自然”的观点,他更强烈反对那些认为不涉及人类利益就无法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观点。<sup>①</sup>按照格伦德曼的观点,若以“平衡”或“多样性”为依据的话,生态正常性的标准解释只有和人类利益相联系才会有意义。格伦德曼的论点中可能会受到质疑的就是他把“正常性”看作非人类中心学说的焦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整个论点。生态中心论者必须确定某些自然状态内在地优于其他的自然状态,他们通常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荣程度来作出这种区分;通常认为格伦德曼对其作出的回应是,除非依据该系统服务的人类利益,否则我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24.

们无法确定何谓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荣。

然而一个重要的环境伦理学分支理论否认了这一说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我们能够了解决定非感知实体(non-sentient entities)繁荣的因素,因此我们能够独立于人类利益辨别对它们有利的那些状态和条件。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工厂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运行得很好”,或是这些条件“对它有利”,而没有明显做任何有关我们是否希望它繁荣的假设。我们甚至可以理解非感知实体与人类利益相冲突的好的(有利、善)的观念:我们可以说拥挤的公共汽车为流感病毒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温和的冬季为桃蚜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因此对园艺工人不利。<sup>①</sup>无论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一个对象的繁荣,它都对该对象是有利的;无论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其繁荣,它都内在地对其也是有利的。因此,可以说,任何繁荣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在善或内在价值,与人类的评价无关。这些事物可能会成为一个理论直接道德关怀的指定对象,而该理论旨在促进或保存这类善。<sup>②</sup>

在这一广泛的框架内,人们对据称拥有自己善的事物的种类意见不一。“生物中心”或生命中心伦理的拥护者们,如罗宾·阿特菲尔德(Robin Attfield)和保罗·泰勒(Paul W. Taylor)把它们自己的善归因

① 这个例子来自 O'Neill 1993, p. 22。

② 对象拥有自己道德上值得考虑的善(goods)的观念,也被一些理论家用利益(interests)来表达,因此自身拥有善的对象具有实现这类善的利益,从而在道德准则上也考虑其他对象的利益。例如,见 Attfield 1991, pp. 144 - 145。然而,其他人(如 Taylor 1986, pp. 60 - 71)在“拥有利益”和“拥有自己的善”之间进行了区分,将前者限制在一个生物拥有自己意识到和极力追求的善这种情况下,而认为后者具有足够的道德意义。



于个体的活的生物体,而“生态中心主义者”,如贝尔德·卡利考特(Baird Callicott)、劳伦斯·约翰逊(Lawrence Johnson)和霍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则把它们归因于集体的或“系统的”实体,比如物种、生态系统,甚至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圈。<sup>①</sup>可以说,如果我们确实把它们自身拥有的善归于个体的非感知生物体,那么我们也应该把它们归于像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事物,因为我们似乎确实能从直观上把握这类事物拥有自己善的想法。例如,一位生态学家或许会说,只有当一个物种的数量大且稳定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下,它才会得以较好地生存发展;或者说,不管一个生态系统在广阔的环境中怎样变化,当它能够保持其稳定性时,它才能繁荣。因此,阿特菲尔德和泰勒似乎站在一个不牢靠的中立地带上:一方是格伦德曼,他否认我们能够认清任何非感知生物得以繁荣的因素,除非参照我们自身利益或偏好;而另一方则是成熟的生态中心主义。<sup>②</sup> 但尽管阿特菲尔德和泰勒就这一观

---

① 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他本身并不是一位深生态学家而是许多深生态学家灵感的源泉)的生物圈以超个体生物圈为著名特征,并以希腊大地女神盖亚(Gaia)之名命名。他小心地避免把知觉归咎于这个超个体生物圈(或至少——或许这里有蓄意的含糊——他谨慎地避免假设我们知道它是有知觉的),但仍假设我们能够了解盖亚繁荣与否的观念——她的繁荣与人类的繁荣可能是不相一致的。(Lovelock 1995, p. ix.)在上述作者中,约翰逊(1993, pp. 265 - 266)把生物圈作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系统,不同于那些组成它的子系统。罗尔斯顿(1994, pp. 25 - 28)有着类似的把地球作为自然系统来考虑的观点。

② 参见埃克斯利(Eckersley)(1992, p. 47)的观察,即生物中心主义不是环境主义的主流,因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家倾向于一方面朝向动物解放,另一方面朝向更深层的生态中心学说。

点争论不休,<sup>①</sup>但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决定孰是孰非,因为即使我们接受了广泛的非感知实体拥有“自己的善”的观点,要想建立它们的道德价值体系也还是不够充分的。

## (二) 反对及回应

非人类中心伦理学因为它们令人憎恶或不可实行的道德结论——这一结论要求为了非感知实体的利益而需要牺牲人类的重大利益——常常遭到批评。<sup>②</sup> 整体论伦理学似乎特别体现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倾向。整体论伦理学把生态系统或“生物群落”看作主要的价值储存处,并把它的组成部分(人类个体等等)视为宝贵的东西,仅仅因为它们有助于整体的繁荣。这种观点已被汤姆·里根贴上了“环境法西斯主义”(environmental fascism)标签。<sup>③</sup> 然而,

① 他们认为如物种这类集体实体的利益或善,只要它们存在,就可归纳为它们现在或现在和将来成员的那些形式。见 Attfield 1991, pp. 150 - 151; Attfield 1995, pp. 24 - 25; Taylor 1986, pp. 69 - 70; 反驳方面的文献,见 Johnson 1993, p. 183。阿特菲尔德进一步建议(1995, p. 26)如物种这类集体的增长模式只能看成个体增长模式的类似物,因此为繁荣和利益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如果能够为决定个体能力的基因找到一些对应物的话——但这些能力和模式肯定取决于它们的组成成员的基因结构,然而无论如何我不清楚为什么决定模式应被视为重要的。

② 例如,见 Grundmann 1991b, p. 24。另见布克钦(Bookchin)对深层生态厌世者的批判,引自 Low and Gleeson 1998, p. 144。

③ Regan 1988, pp. 361 - 362。里根的主要目标是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著名的“土地伦理”(在他的《沙那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中提出)。他的观点影响了诸如卡利考特和罗尔斯顿这些作者,并认为当他们为“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出贡献时,其行动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但是请注意,尽管这一引用倾向于支持里根所攻击的整体论观点,但他的其他一些表达则意味着一种延伸而不是摒弃认同人类和其他生物个体道德意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对于这个问题以及环境法西斯主义指责的讨论,见 Johnson 1993, pp. 175 - 178 and Attfield 1991, pp. 157 - 159。



正像阿特菲尔德所承认的那样,整体论者不仅容易受到这种论点的攻击,而且:

23           这种反对意见……或许可以表达如下。如果植物(或细菌)有什么大于微不足道的道德意义的话,那么就数量而言,它们的利益有时肯定超过人类个体或其他感知生物的利益。但这种观点既违背我们反思性的道德评价,也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应当加以拒绝。<sup>①</sup>

阿特菲尔德作出的回应是,和感知生物相比,非感知实体的道德意义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只有当和感知生物利益相关的考虑非常细致,甚至完美、均衡时,才使得行动的选择有所不同。<sup>②</sup> 这种回应反击了反对意见的主要攻击,从而消除了非人类中心伦理直观上的可憎后果,但同时也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者遗留下来两个问题。

首先,以这种方式平衡感知生物之善和非感知实体之善的理论,在其实际规定中与限制对人类和其他感知生物道德价值的理论将差别不大,因此它对已确立的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引起的挑战将比许

---

① Attfield 1991, p. 154.

② 同上。阿特菲尔德在有关程度问题的道德意义(moral significance)与无关程度问题的道德地位(moral standing)之间进行了对比。根据阿特菲尔德的说法,所有具有其自身善的实体都拥有道德地位,并指出该实体的善蕴含着某种道德分量。一种实体的道德意义是其善与其他种类实体的善相比较所拥有的道德分量的数量。

多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计划得要小。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这是一个许多人将会拒绝的解决方案。<sup>①</sup>其次,在这种考虑之下,我们认为道德上的不一致,并不是单纯意味着非感知事物能够胜过人类利益,而是意味着它们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人类利益不只是胜过艾滋病病毒的“利益”,相反,某种事物有利于病毒这一事实是完全没有理由,甚至没有一种临时的或表面的理由来促进该事物。<sup>②</sup>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论点,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即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所假定的那样,某些事物拥有自身的善是道德考虑的一个充分条件。

刚刚描述的直觉突显出,在声称某物拥有自己的善和声称它值得给予道德考虑或具有道德地位之间有一个逻辑断裂。前者是一个事实断言,即谈及的对象有一种趋向于达到某种“目的”的自然潜能或趋势,可以说这和繁荣与否相关。<sup>③</sup>另一方面,后者是一个规范性断言,即道德主体应该或不应该以特定方式对待它。正如泰勒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承认一个动物或植物拥有自身的善,然而,与此承认的同时,又一贯地否认道德主体有责任促进或保护其善,乃至避免伤害它。”<sup>④</sup>奥尼尔(O'Neill)也同样指出:“Y是X的一种善并不意味着Y应该得到实

① 例如,见 Taylor 1986, pp. 269 - 270。

② 这个观点类似于以下对功利主义的反对意见。功利主义者会说,虐待狂似的折磨是错误的,因为虐待者所获得的快乐远远超过了其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但应该指出的是,虐待者的乐趣完全不是支持施加酷刑的理由。阿特菲尔德和功利主义者双方(他们对酷刑案例的分析在 Attfield 1995, pp. 34 - 35 中得到了捍卫)达到了直觉上是正确的答案,但却给出了错误的理由。

③ 至少,这就是该断言应用于非感知事物时的意思(或类似的意思)。

④ Taylor 1986, p. 72.



现,除非我们有先验的理由相信,X 是其善应该被促进的一类事物。”<sup>①</sup>换言之,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仅必须表明谈论拥有“善”或“利益”的非感知事物是有意义的,还必须表明这些“利益”在道义上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加以促进。

这一事物应如何来论证? 如果认为我们无法从事实(非规范)的前提中直接推导出规范性的结论,那么显而易见,任何这样的论点都必须祈求共享的道德信念。一种策略就是寻求那些认可道德考量的事物与那些道德价值处于争端中的事物之间的类比。这是辛格所采用的论证感知动物道德价值的方法:它们跟我们一样具有利益——起码是避免痛苦,始终要求我们对待这些动物的利益和对待人类的类似利益一样认真。但辛格拒绝对道德思考进行任何进一步地扩展,而是坚持公认的直观观点,即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无法体验任何事物的生物构成影响,那么它就不能对我们施加给它的行为产生道德上的效果,除非当它影响到感知生物的利益。<sup>②</sup>

然而,尽管这种对道德考虑范围的限制对许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他人却不同意。例如,阿特菲尔德看到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一个类比(尽管是赋予有限道德意义的一个弱类比),即其履行构成非感知实体繁荣的能力是与我们共享的那些能力——如生长,呼吸,自我保护和繁殖等。<sup>③</sup>当泰勒捍卫生物中心伦理,并把它作为唯一一个符合

---

① O'Neill 1993, p. 23.

② 例如,见 Singer 1993, p. 277.

③ Attfield 1991, pp. 153 - 154, 205.

“生物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时，他似乎也使用了一种类比形式的论证。“生物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了我們和其他生物体所共有的属性与关系，包括我們为了生存对生物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依赖，以及这样一种事实，即我們拥有自己的善和实现它们的能力、我們共同的进化起源、我們对生物圈健康运作的依赖。然而，这种论证包含的问题在于，对于任何提议的道德群体的扩展而言——无论是对动物、生物体或是自我调节系统来说，我們都会发现人类与更广大的群体之间的异同。<sup>①</sup> 问题是：哪些是与道德考虑有关的问题？辛格在这里的回答再次看上去是合乎情理的：与道德相关的“利益”或善就是那些从该实体的视角来看息息相关的“利益”或善。因此感知或持有一种视角仍然是道德考虑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这一点，其他的类比也将失去意义。

泰勒试图通过把一种视角归因于任何有其自身善的事物的方式来克服这一障碍。他把活的生物体的特征描述为“生命的目的论中心”，每个个体都“努力保存自己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其善”。他还写到，对这样的生物体来说，人们可以达到“对其视角的真正理解”，并因而能够“想象自己处于生物体的情形中，从它的立场来看世界”。<sup>②</sup> 然而，“努力”(striving)和“视角”(points of view)的语言是比喻性的，在声称该事物拥有自己的善上没有增加任何实质内容。例如，一棵树不会尝试实现其潜力，虽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理解其遗传上程序化的倾向和潜力为特色，但实际上不能以它的角度来看世

---

<sup>①</sup> Attfield 1991, pp. 154 - 155.

<sup>②</sup> Taylor 1986, pp. 120 - 121.



界,这是因为看世界,或更普遍地说,感知世界,并不在其(树)能力范围之内。<sup>①</sup>

26 对非感知事物道德考虑的另一种论证借鉴了我们对特定的虚构情景的直观反应。这些“最后的人”或“最后一个人”的论证展现了这样一幅景象:在这个景象中,只有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最后的感知生物)在某种灾难后幸存下来,要求我们判断(例如)该人无缘无故地砍倒一棵树,或消灭一个物种,或释放将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库的行为是否是错误的。期望中的回答是,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棵树或物种等等有其价值或道德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依赖于它服务于人类或其他感知生物的利益。<sup>②</sup> 但这些论证呈现了很多困难。首先,得出的直观反应可能不像论证的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一致地支持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事例。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些不熟悉情景的直观反应可能高度地依赖理论,因此它反映的是我们的道德理论背景,而不是提供用于裁决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中立数据。第三,要把正在考虑的情境从一个人自己对它的沉思中分离出来,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我的直觉——无论好坏——表明,加进这种情境的价值源自这样一种满足,即一种感知生物可能从我们所谈及的自然实体中吸取生存或繁荣。为了凭直观获得这种价值,不必错误地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观

① 参见 Singer 1993, p. 277:“没有什么东西符合于像一棵树因其根部浸泡在水里那样死亡”(着重为引者加)。

② Attfield 1995, pp. 21 - 22. 这种论证的风格源于理查德·劳特利(Richard Routley)。

察者,尽管这种错误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一想到某物的存在或繁荣(如一个人的曾孙)就可能产生满足感,即使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体验到这种现实。因此,这类论证难以证明讨论中的对象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具有道德价值。

在拥有自己的善和具有道德价值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另一种论证是由约翰·奥尼尔提出的,它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主题:

人类像其他实体一样有构成他们繁荣的善,相应地也有有助于他们繁荣的其他善。我们应该促进其他许多生灵的繁荣,因为它们的繁荣也构成了我们自己的繁荣。这种学说或许是令人沮丧地常见的一种。它看上去似乎我们经过漫长旅途到达的客观价值的终点,不过是回到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不过这也许是错误的。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相一致,这就是,我们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珍视自然世界中的事物,而非仅仅把它们作为实现我们自己的满足的外部手段。<sup>①</sup>

同该领域中的其他学者一样,奥尼尔在此是将把**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归之于非人类自然的观点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基石。正如奥尼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存有疑问的,因为“内在价值”一词可在一系列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意义包括非工具性意义、

---

<sup>①</sup> O'Neill 1993, p. 24.



- 27 非关系性意义和客观价值。<sup>①</sup> 但奥尼尔认为,正是**非工具性价值**这一属性,决定了一个伦理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一种环境伦理,就是主张非人类存在物首先具有**内在价值**:就是主张非人类存在物不是单纯地作为人类目的的手段的价值。”<sup>②</sup>

上述引文中提出的主张是,尽管我们保护非人类实体的原因是基于它们对我们福祉的贡献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纯粹工具性的。我们的确从工具性方面重视诸如植物和生态系统的作用,因为它们和我们的幸福有着因果联系,但我们也可以从非工具性作用的角度来重视它们,因为它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对此的关心是使我们过上富足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③</sup> 不过在我看来,奥尼尔(O'Neill)错误的

---

① 面对这些差异,一种回应就是主张一种比其他用法在语义上更准确、或更有利于哲学清晰度的用法。因此,卡伦·格林(Karen Green, 1996)在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 1983)之后认为,应当把与“外在价值”相对照的“内在价值”恰当地理解为非关系价值(或根据摩尔[G. E. Moore]的说法,即仅取决于相关事物的内在性质而不是与其他任何事物的关系的价值),并认为这一用法保留当内在价值等同于非工具性价值时所丧失了的重要区别。然而,虽然我很赞同这一说法,但在我看来,鉴于其他用法的普遍性,最好不是通过规定“内在价值”的特殊意义,而是通过替代诸如“非工具的”、“非关系的”和“客观的”这些词语,或者至少通过限定“内在价值”在这些或其他术语中的用法,来澄清这个术语的意义。

② O'Neill 1993, pp. 9 - 10. 请注意,奥尼尔在这里所使用的是前面第 21 页注释所批判的以非人类为中心所定义的狭义上的“环境伦理”。

③ 这一论述掩盖了奥尼尔的需要澄清的说法中的某些方面。例如,这种说法可解释为:(i) 不论我对它的态度如何,X 的繁荣本身就是由我自身的繁荣构成的;(ii) 如果我偶然关注 X,那么其繁荣才是由我自身繁荣构成的;(iii) 如果我关注 X,并关注由人类繁荣构成的类似于 X 的事物,那么 X 的繁荣就是由我自身繁荣构成的。上述引文的第二句似乎暗示了(i),尽管在最后一句中所提及的人类对自然项目的评价似乎暗示了(ii)或(iii)。

把这一观点描述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他似乎合理地归因于自然界中非感知部分的非工具性价值仍然源于人类的利益。<sup>①</sup>因此,如果要问**为什么**我们应该保留某一特殊的种类或景观,那么回答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将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充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人类的繁荣通过对待非人类自然的方式将得到最好的服务,似乎它本身具有道德价值,但最终采取该立场的原因仍是完全以人类为中心。

因此奥尼尔的理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但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描述为“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与单纯把工具性价值归于非人类自然的“狭义的”形式截然相反。当我们考虑人类对自然统治的观念时,这种区别将表现出重大意义。然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把所谓的“深生态学”运动与对评价框架的当前讨论联系起来。

### (三) 深生态学

28

“深生态学”一词往往与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把内在价值归于生态整体(如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各种形式的生态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sup>②</sup>这一特性的困难之一便是:根据其主要的阐释者的看法,深生态学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观点,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有关伦理的,或是哲学的。因此,由阿恩·奈斯(Arne Naess)和乔治·塞

① 在 Raz 1986, p. 177 中讨论了(不同情况下)非工具性价值和非派生价值的区分。非工具性价值是一种事物所具有的不同于其结果、或可能有的结果、或可用于产生结果的价值。然而,如果一种事物的价值是来自它所构成的整体的价值,那么该事物的价值就是派生的。(有时这被称为“贡献的价值”。)非派生的价值(或用拉兹[Raz]的话说是“终极价值”)既不从事物结果的价值中派生也不从它所构成的整体的价值中派生。

② 例如,见 Brennan 1988, p. 141; Singer 1993, p. 280。



欣斯(George Sessions)架构的深生态学“平台”(platform)作为该运动原则的概括,就包括人口的过度规模、人类对非人类世界干预的影响以及不同结构变化的需求等主张,同时还包括对繁荣和内在价值的主张。<sup>①</sup>然而,在此基础以及其他核心主题基础之上,它可能振振有词地声称,非人类中心的伦理是深生态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平台”的第一项原则规定:“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活的幸福和繁荣有其本身的价值(别名: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效性。”<sup>②</sup>奈斯在他于1973年发表的一篇被广泛视为深生态学运动奠基文献的文章中,提出了“生态圈平等主义”(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原则。这个原则表述如下:

生态领域的工作者对生命的途径和形式表达了深层次的尊重,甚至崇拜。他是从内部获得对生命的理解的,其他人把这种理解只针对他的同胞以及生命的途径和形式的有限部分。对生态领域的工作者来说,平等生存和成长的权利是一种直观上清晰和显而易见的价值公理。<sup>③</sup>

虽然很难弄清楚人们应该做什么来尊重如一个人、一棵树和一叶草的平等权利,但清楚的是,奈斯把道德考虑归于这些和生命的其他形

---

① 见 Devall and Sessions 1985, p. 70; Sylvan and Bennett 1994, pp. 95 - 96。

② 同上。

③ Naess 1973, pp. 95 - 6. 另见 Naess and Rothenberg 1989, p. 28。

式中。在这样的尊重中，他的立场似乎成为类似于泰勒的生物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正如奈斯后来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生物”前缀和“生命形式”一词，应该理解为指的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生命，而且也是诸如河流、景观和生态系统这些非生命的东西，此外还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圈”以及每一个自然物体<sup>①</sup>，因此它似乎是一个生态中心伦理。

然而，如奈斯的奠基性文章所表达的那样，这必须在深生态学的第 29 第二个方面的语境中来理解。这是一个整体论的形而上学，它指的是“相联系的、全景的图像”。以下段落在某种程度上以印象派的方式概括了其观点：

反对人在环境中的图像，支持相联系的、全景的图像 (the relational, total-field image)。生物体在内在联系的生物圈网或领地中作为网结存在。事物 A 和 B 之间内在地联系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联系，A 和 B 便不再是同样的事物。全景模型消除的不仅是人类在环境中的概念，而且还有每一个结合起来的事物在环境中的概念——除非在随意交流的谈话中可以使用这种概念。<sup>②</sup>

在这里，奈斯使用“内在关系”(intrinsic relations)来讨论通常所谓的“内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该关系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同一性。

---

① Naess and Sessions, 引自 Sylvan and Bennett 1994, pp. 99 - 100。

② Naess 1973, p. 95。



因此,奈斯声称,每个人的同一性就是他们与所处环境构成的关系部分。虽然这种观点需要更详细的阐释。<sup>①</sup>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这一观点的提出否认了自我与其环境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别。<sup>②</sup>因此,本体论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成为了深生态学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自我与自身环境为一体的话,那么评价自身环境就是评价自我的一部分;在因其自身和因其自我的福祉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评价标准没有明确的区分。<sup>③</sup>

但是从字面上看,否认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区别是难以置信的。无论一个人最关心什么样的环境特性,在其被破坏之后想象一个人的自我继续维持下去(不论处于怎样悲惨的状况下)当然也是可能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奈斯本人和其他深生态学家对解释深生态学的整体方面

30 采用了其他方式,即关注自我实现条件而不是个人的同一性条件。例

---

① 尤其有必要确定环境的具体方面以及我和它们之间对维持我的同一性可能所必需的一种关系。可能它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本应由我的同一性所构成的它的一些更具体的构造,因为很难令人怀疑前者的继续存在。由我的同一性构成的所宣称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存在”于一种如此构成的环境中)或者是一种有意识的关系(“关注”或“意识到”如此构成的环境)。

② 这种观点也隐含在弗雷亚·马修斯(Freya Mathews)(1995, p. 143)的论断中,即“[宇宙的]自我决定我的自我,我的自我决定它的自我”;该观点还隐含在沃威克·福克斯(Warwick Fox)的说法中,他把深生态学的中心直觉的描绘成“在存在的领域中没有严格的本体论分歧的观念”(引自 Sylvan and Bennett 1994, p. 103)。但是请注意,这不同于下面所描述的福克斯后来的观点。

③ 当奈斯作出以下论述时,他事实上可能心里想的就是这一点:奈斯论述生命圈平等主义时说,对人的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的限制“是一种损害人类生活质量的人类中心主义”(1973, p. 96)。

如,沃威克·福克斯(Warwick Fox)把培养扩展的或“超个人”的自我感看作是深生态学(他因而重新命名为“超个人的生态学”[Transpersonal Ecology])的中心问题。然而,他是从心理学方面而不是从形而上学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因此这不是争论中的自我同一性问题,而是与其他自然物同一的能力问题。<sup>①</sup> 因为在该语境中“同一性”似乎意味着人们以寻求自我繁荣或“自我实现”作为自身一部分的方式来关怀他者,这就把同一“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类别中的福克斯的深生态学归到奥尼尔的理论上去,从而认定人类保护自然实体的非工具性理由,不是构成它们(人类与自然实体)的同一性而是构成它们共同的福祉。<sup>②</sup>

因此,似乎深生态学不是以单一的、独特的评价视角为特征。相反,深生态学只是在伦理领域中通过否认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的工具主义形式而统一起来的;这一否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它消除,有时试图瓦解,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因为我已经考

---

① 强调个人与其更广阔的环境(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同一性的另一种深生态学学说,见 Mathews 1991; Mathews 1995。然而,马修斯(Mathews)的确似乎把我的环境是由我的同一性构成或我的同一性是由我的环境构成这种形而上学的说法作为其论证的必要条件。(1995, p. 150)。

② 当然,有可能把像福克斯的人类自我实现的视角与以非人类为中心的伦理结合在一起,如果人们断言为了促进具有道德价值的存在物的保存,我们**应该**培养更广泛的自我感(更广泛的同一性)的话。然而,福克斯却避开了这样一个理由,而把他的自我实现的视角作为一种“体验邀请”(experiential invitation),并以此替代了由环境伦理所提出的道德视角。(见 Fox 1990, p. 247; Eckersley 1992, pp. 61 - 63。)不过,他的视角的确包含了一种评价的视角,该视角在缺乏更根本的伦理的情况下,为一种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辩护的理由。



察并发现了支持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论证的缺陷,现在我将联系格伦德曼对马克思的捍卫,进一步考察一种广泛的、非工具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

#### (四) 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统治

格伦德曼不仅捍卫了他正确地将之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且(更加容易引起争议的是)捍卫了人类统治自然的观念。虽然许多人(甚至那些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人)都想摆脱统治自然31 的观念,但格伦德曼认为,作为在他看来以马克思代表的启蒙传统的一部分,两者不分彼此。

格伦德曼以对环境问题为主导的上述问题的出现远非过时和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对自然的统治是“一个我们借此可以弄清问题和保证给予解决的合理路径”。<sup>①</sup>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依据人类利益和需要正确地理解“统治”,因此一个因自然的变化而带来生态问题的社会,“从根本上很难说是统治了自然”。格伦德曼借助国王迈达斯(Midas)的寓言说明了这一点,“他把一切接触到的东西都变成了黄金,但这很难说他就‘统治’了他的人民,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他的权力是自取灭亡的,因为他不再能够养活自己。”<sup>②</sup>因此,格伦德曼不是把生态问题看作是对自然统治的结果,而是对自然缺乏统治的证据。

在我看来,这一论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格伦德曼对“统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15.

<sup>②</sup> 同上, p. 60.

治”(domination)的理解。格伦德曼使用这一术语时,意味着统治自然就得没有道德约束,并以为人类利益提供服务的方式利用它。但是在通常的用法中,“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统治者利益的实际促进。例如,统治其员工的经理可能会失败,仅仅因为他要从员工们那里获得最好的工作成果。在此语境下,“统治”似乎是指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某个人身上,而无需考虑该人的利益或自主权。这一定义不能轻易转用到人类对自然统治的事例中,这一事实说明这一用法带有成问题的比喻性质。格伦德曼可以通过一项(相关)规定对这个异议作出回复——在某种意义上,他想捍卫以及同启蒙传统联系在一起“统治”,应从它包含着对人类利益成功追求的方面来理解。他确实通过使用与“控制”(mastery)同义的“统治”来含蓄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个词往往意味着一个人成功地处理他所掌控的事情。

然而,格伦德曼的论证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其再次明确表达为一种对人类控制自然的捍卫之后仍旧存在着。这一问题在于该论证点依赖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先验假设。根据格伦德曼的观点,统治或控制自然是一个适当的目标,因为它意味着成功地利用自然来促进人类的利益,而这又意味着找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然而,这个假  
32  
设意味着生态问题是在人类利益的语境下得以理解,并且正是这一假设遭到了许多统治模型的反对者的挑战。因此,格伦德曼的论点表明最多的就是,如果自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那么对自然的统治可以被正确理解为是一个适当的目标。现在这个假设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上文已经做出了论述,即虽然格伦德曼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捍卫没有考虑到其主要反对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最终未能



为真正的非人类中心伦理提供足够的支持。然而，我将论证从这些意见中显现出来的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不能和统治的比喻和谐共存的。

正如我所定义的那样，“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非感知自然(non-sentient nature)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作贡献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同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单单从工具性方面看待这种贡献。为了解释非人类中心理论背后的动机，格伦德曼援引了一个类似的区分。他认为，生态学家拒绝非人类中心观点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错误地把它等同于狭隘的经济上短期的利己主义视角，而事实上，隐藏在自然评价背后的人类利益可能具有更加全面、长期和审美的特征。<sup>①</sup>在我看来，格伦德曼正确地指出，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充分地说明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的价值，并由此破坏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动机。然而，由于格伦德曼坚持认为自然的所有价值包括审美价值都是工具性的，因此他自己丧失了塑造“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手段，并降低了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在这一方面，尽管奥尼尔的理论带有引人误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但它为我主张的广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样本。然而，我要补充的是，由这一理论所认可的对人类福祉作出非工具性贡献的一系列事物，不必局限于具有自己的善的事物的繁荣。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统治的比喻是有缺陷的了，即使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看也如此。格伦德曼的论点是，对自然的统治(或控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25.

制)应当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即只有那些成功地促进人类利益的自然利用才能算作统治。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同意他的这一解释,但统治的比喻所强调的与自然相关联的某些方面,从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要对自然采取耗尽其可能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的方式。格伦德曼自己所认可的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的审美评价。这种评价采取了一种典型地被动赞赏的形式,因而令人不快地适合统治的概念,而统治概念意味着更加积极的、完全的人类控制角色。此外,审美评价通常被引用作这样一种方式的例子——一个对象可以从这种方式从中派生出非工具性的价值:审美对象,无论是艺术或自然,都不单纯是产生某一特定感觉的手段,而是生活由此得以丰富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①</sup> 我已经指出,对这种价值的承认就是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分出了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但统治的语言至少暗示了一种手段和目的关系。因此,格伦德曼对统治比喻意义的依恋,与他坚持认为所有价值都作为工具性的手段来源于人类利益密不可分。

当然,审美评价并不必总是被动的,也可以说,把审美价值看作非

---

<sup>①</sup> 更充分地说,这个观点是:一种生活最好包括对美的欣赏,这种欣赏存在于观看者和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只偶然地(即临时地)与对象相关联而不能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感觉中。参见 Raz 1984, pp. 188 - 189; Sober 1995, p. 245。



34 工具性价值是错误的。<sup>①</sup>然而,这种观点未能挽救统治的比喻意义,因为该批评只要求这样一些自然中价值,它们具有这些特征中的某一方面,因此有可能被以统治为导向的观点所忽视。人们通常认为,我们之所以珍视自然,是因为它的“他性”(otherness)或对于人类的独立性;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栖居和活动的(相对)固定的背景或环境。<sup>②</sup>无论是否把它视为审美价值的一种形式,但它无疑是一种一个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能够认可的价值形式,并且和自然有关的被动性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确,可以说,以这种形式归于自然的价值恰

---

① 例如,一个古典功利主义者会认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仅在于其能够使一个观察者处于有价值的快乐状态。由于这个原因,观察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由有价值的状态构成的,因为由其他任何方式所引发的类似的快乐同样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这个观点却有违于我们认为**真实性**对我们的审美经验(无论艺术的审美经验还是自然的审美经验)来说是重要的倾向。我们认为一幅原作比一幅复制品或赝品具有更高的价值,就是因为前者要比后者更直接地体现了艺术家的意图和行动。同样,正如古丁(Goodin)所指出的那样(见下面的注释),如果我们赋予价值的自然中的一种事物是其在非人类过程中所创造的(而不仅仅主观地认为它会如此产生),那么我们将不会把再创造的或“伪造的”自然看作它的价值上的等价物,无论它有多么大的说服力。如果我们判断一种伪造艺术或自然的体验,甚至是当时能让我们信服的那种体验,仍然不如对真实事物的体验更宝贵,因此我们也不会将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感觉的纯粹原因,而是作为构成我们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价值状态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来重视对象的工具性体验。

② 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 Goodin 1992,这里论证了自然对象的价值在于“其创造的历史和进程”,特别是“它们拥有一个由自然过程而不是由人工过程创造的历史”,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范围”,“在我们自身之外”的范围,我们的计划和方案置于其中。古丁把他的理论描绘为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但在这里给出的框架内,这只能算作是一个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在不同背景下提出的相关看法,见 Norman 1996。

恰依靠我们所讨论的尚未被人类主体统治或控制的自然。以这种方式评价大自然将给予我们至少保护某些相对荒凉的区域的理由,例如,通过在指定的保护区内限制人为干预。然而,这与统治自然的指令是难以调和的,除非从迄今为止的通常用法中规定一种“统治”意义,以使其丧失任何有用功能的比喻。

#### 四、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对什么是生态问题以及我们应如何评价生态问题进行初步阐释。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自然/社会对比的模糊性,在生态和其他社会问题之间就难以做出明显的区分。模糊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构成人类社会及其产品的要素仍以重要的方式保留着自然特性时,我们所称的自然的许多方面都已经被人类的活动改变了。这种自然和人类或者社会的相互渗透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将在第四章进一步阐述这一点。就生态问题的确定而言,我已作出了论证,即在实践中我们基本上能够同意哪些可视为生态问题,这反映在对生态问题某些类别——即污染,资源枯竭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的普遍认同。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生态问题应该从一个广义和延伸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评价。这一视角把所有价值看作是从人类或其他生命个体的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但这一视角也意识到这样产生的价值不35一定是工具性的。这一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求把生态问题分类为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破坏的方法既是有限制的同时也是延伸性的。“资源”一词往往被理解为经济方面的经济财富来源,但即使是解释得



比这个更加广泛,仍存在着对该词的自然理解(在第二节我临时采用过这种理解),这种理解将限制它应用于对人类具有**工具性**效用的对象。因此,采用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要求我们要么引入更进一步的环境问题的分类来涵盖那些其价值是非工具性的自然实体的破坏,要么规定在包括这些价值观的更广泛意义上来理解“资源”。然而,后者往往会巩固这样一种观点:即像荒野和美景这类事物只具有制造快乐的工具性价值,并掩盖了适用于普通资源使用的像效率和替代这类概念可能不适用于这些非工具性善的这样一种事实。因此,最好把这类善的丧失看作是环境问题的一种独特的类别。然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其他环境问题的结果。景观或者荒野的丧失往往是由于其被作为一种资源利用而造成的(例如,当山坡被开采,森林被砍伐用作木材或因农业被清除);随着替代资源越来越少,获取资源的压力增加了。或许这种丧失也可能是由污染(例如因酸雨造成的森林破坏)或自然系统的崩溃(由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景观变化)造成的。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按照资源枯竭的方式来理解生态问题,我将考察一个特别的资源枯竭解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近期环保思想的影响。该章将通过指明所谓的“自然限制”事实上是如何产生于自然、社会和技术因素的相互结合,来运用上文所讨论的自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观点。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 36

在上一章,我批驳了许多环保主义思想家的“生态中心”视角,根据这个视角,我们一系列道德上容许的行为受到了自然界价值的限制或约束,而这些价值是独立于人类和其他感知生物的利益。在这一章里,我将探讨这样一个观点,即自然以另一种方式限制着我们的行为:通过向我们展示一系列为了我们自己的福祉,我们必须加以承认和适应的非道德的事实真相。作为对人类行为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物质约束,自然限制这一观点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及这些行动的后果,部分依赖于超出我们控制力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然而,我将指出,即使从这个事实层面来理解自然限制,它们仍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人类的评价、利益和活动,而不是如环境理论所一贯承认的那样。

社会必须适应增长的确限制这一主张已成为环保思想发展中的核心部分,并且也是环保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从这一主张得出的令人震惊的结论(尽管后来受到质疑)在将环境问题带到公众面前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同样的论点



成为绿党拥有一个独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张的基础。的确,尽管对“零增长”的口号有一些保留,但许多环保主义者视增长问题为最根本的政治分歧。正如乔纳森·波里特(Jonathon porritt)所说,与此相比较,“资本主义拥护者和共产主义拥护者之间的辩论大概就像‘难以区分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一样令人开心”。<sup>①</sup>

37 “增长限制”这一主题拥有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特性,尽管它的支持者只是部分地承认这一点。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将展示一下最近的环保思想是如何以各种方式利用那些酷似一个多世纪前由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观点。然后,我将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以便指明他们的批判远不像有时所宣称的那样,本质上表现了反生态的倾向。相反,他们的批判中包含着许多元素,这些元素或许今天可以被作为一种对在环保思想中常常遇见但相当粗糙僵硬的自然限制概念的有效和必要的修正。

## 一、人口与资源:马尔萨斯的数学模型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大体概要众所周知,但是在这里仍值得重申,因为这对本章后续部分提及这一理论是很有必要的。马尔萨斯的中心论题所关注的是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

人口如不加限制,就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一组简单的数据就会说明与生活资料相比,人口增

---

<sup>①</sup> Porritt 1985, p. 44.

长的巨大力量。<sup>①</sup>

但是,他继续说,因为食物对生命是必需的,所以他提出,“这意味着,基于生存的困难,对人口增长要有一个强硬、持续并具可操作性的控制(手段)。这种生存的困难很可能出现在某个地方并且一定会被大多数人感觉到”。

关于生活资料仅仅是以算术级别增长的断言以可利用土地的有限区域和增加其产量的有限潜力作为假设。依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正是这样的状况阻止了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经历与人类特有的同样的呈几何级别的增长。他并非意指食物供应呈算术级别增长是不可避免的;的确,他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去具体阐述一个“算术的”模型;他只是认为,甚至对最热心的投机商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在几个世纪内将会使每一寸土地都像花园一样肥沃。<sup>②</sup>

基于生活资料的短缺,马尔萨斯将施于人口增长的限制分为两类:<sup>38</sup> “预防性限制”,即抑制婚姻,从而降低出生率;“积极限制”,即因营养不良,疾病,战争和马尔萨斯所认为的随着人口过剩产生的其他问题而导致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由于这些限制,假定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自然趋势只会是一些异常的情况下和有限的时期内发生。马尔萨斯通

① Malthus 1986b, p. 9. 当代的评论家们倾向于用“指数的”和“线性的”代替马尔萨斯所使用的“几何级数的”和“算术级数的”的用词。在后面内容,我将根据上下语境,交替运用这两组词汇。

② 同上,p. 12。



过论述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比如位于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对人口增长采取“非限制”措施的情况,来支持他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仍然存在的主张。<sup>①</sup>然而,他试图通过主张“两性之爱是必要的,并且这种状态仍将会持续下去”,来证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这一趋势的普遍性。这表明他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模型不只是来源于他的实证案例研究,而同样来源于先验的推理。的确,假定死亡率保持不变,出生率高于更替水平,在连续几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固定的出生率将会导致人口呈一个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如果出生率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数量将会保持稳定甚至下降。正如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他对北美的研究可能揭示了人口出生率高于更替水平,但是要想使出生率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保持不变的假设成为一个公理,就需要加以证明。即使撇开马尔萨斯主张的经验的有效性,根据他自己的理论,事实是人口数量得到了坚定且持续的限制,那么他为什么要赋予一个相当武断的算术模型和一个充其量只是抽象的理想化的几何模型一个普遍法则的地位并且还要为其大加宣扬呢?

马尔萨斯采用这些模型是为了阐明和增加其信念的份量。他认为人类因生活资料的短缺而造成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提高生产或者食物再分配以减轻贫困和饥饿的努力是徒然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他认为增加对粮食的供应最多只是对饥饿的暂时缓解,因为人口增长很快会超过粮食供应的增加。尽管马尔萨斯对入道主义改良者的目标

---

<sup>①</sup> Malthus 1986b, p. 8.

表示同情,但他认为,人口力量和食物供应的不平等提供了一个反对“人口众多的完美性”的不容置疑的结论。<sup>①</sup> 马尔萨斯甚至也反对比较温和的试图改善穷人状况的措施,比如英国济贫法下的教区援助条款。他认为,这样的措施只会使穷人面临的问题更加恶化,也使消除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其中一个限制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直到它再次超过食物供应,这样会使比以前更多的人陷入贫困。相反,他提倡劳动济贫所制度,他坚持认为劳动济贫所的管理体制应该足够严酷,以形成一个对那些没有信心继续维持家庭生计的人们的威胁力。<sup>②</sup> 39

在《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第一版中,马尔萨斯没有提供避免他的“规律”的后果的方法。通过“预防性限制”进行的人口增长限制也没有提供其他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限制措施只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生活资料的短缺时才会出现。此外,他认为导致“人口数量增长的持续的努力”是如此强势以至于预防性措施会成为一种“即使不完全是这样,也几乎是必然的”“罪行”,因此这些措施无法减轻下层社会的困苦。<sup>③</sup> 后面的观点需要解释一下,因为人们可能认为马尔萨斯的观点是这样的,因节制婚姻造成的罪恶将会使非婚生婴儿数量不断上升,从而削弱了控制人口数量意图的效力。实际上,马尔萨斯接受节制婚姻是因为这或许会使出生率降低,即便它会伴随着滥交的增加;的确,

---

① Malthus 1986b, p. 10.

② 同上, pp. 29 - 38; 参见 Malthus 1986d, pp. 238 - 239.

③ 同上, p. 14.



他认为滥交本身可能会通过破坏女人的生育能力来降低出生率。<sup>①</sup>相反,对罪恶的谈及似乎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道德前提而发挥着作用,而目的是想要表明对人口增长施加预防性限制的结果(因为罪恶本身会导致社会下层民众的“痛苦”,而实施预防性措施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改善社会下层的困苦状态)和积极限制的结果一样不得人心。然而不论怎样,马尔萨斯主张的结论都是,痛苦总是不可避免的由下层民众承担。

在后面的规划中,马尔萨斯赋予“道德限制”这一术语更大的重要性,把它界定为“出于谨慎的考虑,无论是一时还是永久性的节制婚姻,应给予这一期间发生的性行为严格的道德谴责”。他把这一点描述为“保持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与美德和幸福完美地保持一致”。他甚至还认为,道德限制应通过一项适宜的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来加以培育。<sup>②</sup>如果马尔萨斯在此承认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出生率,那么这将进一步削弱他所阐释的人口增长的普遍规律。尽管如此,他仍然对道德限制的潜力持悲观态度,并且他不认为道德限制有足够的力量去削弱他对再分配措施的反对。

## 二、环境保护论者对马尔萨斯的盗用

### (一) 全球范围内的马尔萨斯主义

为了追踪环保思想中的马尔萨斯主义主题的轨迹,我将首先提及

---

<sup>①</sup> 见 Malthus 1986c, pp. 15, 20 - 21; Malthus 1986d, p. 203.

<sup>②</sup> Malthus 1986d, pp. 203 - 206. See also Malthus 1986c, pp. 465 - 473.

两位作者,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的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以对他所认为的“问题”的描述开始,并把这个“问题”界定在三个发人深省的标题之下。首先,“过多的人”。在这个标题下,他对呈指数速率(或者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进行了探讨和猜测性的推断。其次,“过少的食物”。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矛盾描述得非常明确:“每年,在不发达国家,粮食生产都会远远的落后于迅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以至人们睡觉时都带着些许的饥饿。尽管这种状态暂时或局部性的发生了改变,但现在看起来仍不可避免地将继续其合乎逻辑的结论:普遍饥饿。”<sup>①</sup>只是在第三部分“一个垂死的星球”,埃尔利希引入了新的元素。环境因素作为一个对通过增加粮食供应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能力的额外约束被添加到马尔萨斯公式中。他说:

如果我们只需要考虑粮食和人口之间的平衡,我们的问题将会简单得多。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不断恶化的环境可能比任何可想象得到的粮食与人口差距带来更多的死亡和苦难。然而环境恶化这一因素几乎被大多数关注缩小粮食差距的人所忽略。<sup>②</sup>

常被引用的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论文《公地的悲剧》

---

① Ehrlich 1968, p. 17.

② 同上, p. 46.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与《人口爆炸》在同一年出版。它的论点很明显的位于马尔萨斯的“规律”的框架之内：“如马尔萨斯所说，人口自然地呈‘几何级数’增长，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呈指数速率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世界物品的人均占有量很可能稳步下降。”<sup>①</sup>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萨斯把他对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生存的限制的推断建立在他所认为的人类性欲的几近不可遏止的基础之上。其隐含的前提，即是性不可避免的导致生育。这在生育得到广泛控制的年代已不再可信。但是，哈丁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人口增长的机制。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不可避免的超过资源，除非推行强制措施。这个机制建立在“公地”内的行为逻辑之上。这是一种所有制制度，这一制度确定有限的资源都是共有财产。哈丁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个体从他对共有资源的使用上获得了全部的利益，但是使用的成本却由集体共同承担。因此，这必然会导致每个人不加限制的增加他对共有财产的使用量。但是，当这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按此方式行事时，结果便是公地的毁灭：“毁灭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在一个信仰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地里的自由把毁灭带给每一个人。”<sup>②</sup>哈丁坚持认为，公地的逻辑可以应用于不同的问题，包括各种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但是，他相信最关键的是它在导致人口增长方面的影响。这是因为人口数量水平提高了，污染和资源的减少达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因此，他认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

① Hardin 1980, p. 10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8).

② 同上, p. 104.

是放弃允许人们生育而无需承担任何费用的“生育中的公地”。<sup>①</sup>

因此,埃尔利希和哈丁都采用了一个人类贫困和环境恶化的马尔萨斯式的解释,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呈指数速率增长,呈指数速率增长的人口不可避免的超过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将迅速耗尽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生活资料的可能的增长量。如同马尔萨斯一样,他们设想的生活资料主要是粮食供应。他们对马尔萨斯式解释的采用使他们得到了一个马尔萨斯式的“解决方法”:因为人口增长将会抵消粮食供应的增长,所以唯一的希望是限制人口的增长,并且像马尔萨斯一样,他们相信缓解贫苦大众的状况,将会对这个目标造成不利的影 响,至少在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例如,哈丁在一段回忆马尔萨斯对济贫法的批判的文章中,针对人口增长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指责:

**如果**每个家庭只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如果**不节俭父母的**孩子**被饿死,因此,**如果**过度生育把它的惩罚带到种系,**那么**控制家庭生育就没有什么公共利益。但是,我们的社会深信福利制度,<sup>42</sup>由此我们面临着公地悲剧的另一方面。<sup>②</sup>

然而,尽管马尔萨斯主要关注的是个别国家里粮食供应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但到了 20 世纪末许多环境问题在特征上呈现出全球性,相应地,埃尔利希和哈丁把他们的马尔萨斯主义原则延伸到国际舞

---

<sup>①</sup> Hardin 1980, pp. 106, 11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8).

<sup>②</sup> 同上, p. 107.



台。他们都试图通过引人注目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比喻来描绘环境危机,但这种比喻与真实情形的一致性理所当然的会受到质疑。<sup>①</sup> 哈丁把发达国家比作救生船。如果发达国家这艘救生船去援助那些其船已经超载或者正在海里挣扎的人(第三世界的居民),那么它就有沉没的危险。他总结到:

如果贫穷国家接受不到外来的粮食援助,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将会因粮食欠收和饥荒而得到周期性的限制。但是如果它们在需要时总能从一个世界粮食银行获得粮食,那么它们的人口会继续没有限制的增长。短期来看,一个世界粮食银行或许会减少那种需要,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实际上是没有限制地增加了那种需要。<sup>②</sup>

初看时,埃尔利希“地球飞船”(Spaceship Earth)的类似比喻不如哈丁的救生船比喻更有排斥性,因为它更多的强调了所有“乘客”的共同利益。然而,在详尽描述这幅图画时,他很清楚的表示,防止飞船超载时的首要事,就是可能需要忽略三等舱乘客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埃尔利希提倡头等舱的乘客(发达国家居民)控制他们自己的人口,如有必要可采取强制措施,并且运用他们的权力把这样的计划强加给其他人。<sup>③</sup> 在别的地方,他描述了一幅情景,世界上 1/5 的人口将因取消

---

① 对马尔萨斯主义的贫困学说和他们运用比喻的一个有价值的批判,见 O'Neill 1986,特别是 pp. 17 - 18 and 58 - 59。

② Hardin, 引自 O'Neill 1986, p. 58。

③ Ehrlich and Harriman 1971。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供应而饿死,这比任何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措施“更具感染力”。<sup>①</sup>

## (二) 被扩展的马尔萨斯:“增长的极限”

把马尔萨斯的观点应用于环境问题的第二个阶段可以在罗马俱乐部非常有影响的第一篇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找到。<sup>②</sup>这篇报告在1972年首次发表,比《生态学家》(*Ecologist*)杂志的编辑准备的报告《生存的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晚几个月<sup>③</sup>。《生存的蓝图》这篇报告就像这个题目所显示的,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相比,它更关注人们针对环境问题所提的解决措施。不过,它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是作了阐述,这些阐述本质上与《增长的极限》的观点相一致。<sup>④</sup>这些阐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不再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唯一一个或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而是认为人口增长是诸多原因之一。这一特点看起来使其似乎与马尔萨斯的思想形式产生了差距。但实际上,他们通过把即将发生的由无限制的呈指数速率增长的需要和满足这个需要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的马尔萨斯的同样逻辑应用到每一个所谓的原因里,从而扩展了马尔萨斯的影响。所以《蓝图》这样宣称:

---

① Ehrlich 1968, p. 80.

② Meadows *et al.* 1974.

③ Goldsmith *et al.* 1972.

④ 这并不奇怪,因为《生存的蓝图》的作者们利用了《增长的极限》团队的研究结果。见 O'Riordan 1976, p. 52.



显然,这个世界无法承受生态需求上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无论哪种形式的**无限**增长,**有限**的资源都难以承受。这是环境困境的实质。现在仍然不大可能去维持无限的呈**指数速率**的增长。但不幸的是,生态需求的增长正在呈指数速率增长……<sup>①</sup>

《增长的极限》全面评述了被认为是环境危机起因的五种因素:“所有五种因素是这篇报告的研究基础——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它们都在增长。它们每年的增长量遵循着数学家们素所称之为的**指数速率模式**增长。”<sup>②</sup>这篇报告的作者们像马尔萨斯一样认为,呈指数速率增长的需求和有限资源的结合,正削弱着人类需求满足的可能性。但是,鉴于马尔萨斯只考虑了由粮食供应所施加的“限制”,《增长的极限》还在它的模式设计中包括了工业生产所需求的某些非再生资源的有限供应以及地球吸取垃圾物质的自然系统能力的限制:“如果当前世界的人口,污染,粮食供应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那么在未来的100年以内的某个时间里,这个星球将会达到增长的极限。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在人口和工业潜力方面的一个突然并且不可控制的下降。”<sup>③</sup>

① Goldsmith *et al.* 1972, p. 17.

② Meadows *et al.* 1974, p. 25. 严格地讲,粮食生产呈指数增长的论点同马尔萨斯的假设即粮食生产充其量只能线性的增长相矛盾。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论点仍然紧随马尔萨斯的论点:尽管对食物供应的要求会**继续**呈指数增长,但是,生产的实际增长将迟早会被自然限制——主要是未开垦土地的限制性——所“约束”。见 pp. 46 - 54.

③ 同上, p. 23.

对《增长的极限》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没有对这一事实给予足够的重视：技术进步可能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许多资源可以被提取和利用来生产新的材料做为替代品，并可以控制污染。<sup>①</sup> 它对技术的态度，折射出马尔萨斯对用以增长穷人可得食物数量的措施的反应。就是说，除非需求的增长得到控制，否则这样的措施一定会失败，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供应方面的增长都会很快被需求的无控制增长所迅速吸收和赶上：“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在缓解由增长带来的压力上有短期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对防止需求超过供应以及随后这个系统的崩溃毫无作用。”<sup>②</sup> 并且，就像马尔萨斯所相信的，济贫法条款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阻碍了对控制人口这一需要的认可。因此，《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看到了技术能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只是缓解了问题的症状”的危险：“相信技术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办法因此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有限系统中的增长问题——转移开来，从而阻止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它。”<sup>③</sup>

如同马尔萨斯一样，《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们看到问题——对有限资源的不断膨胀的需求——的解决方法不是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而是限制需求的增长。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粮食供应的限制还有工业所用资源的限制，并且这样的资源不像粮食，它们的人均消耗量没有自然的上限。因此，对这些资源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的限制，被视

---

① 例如，Cole *et al.* 1973。

② Meadows *et al.* 1974, p. 157.

③ 同上，p. 154。



为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必要的废止。并且,为了延长所谓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的时间,报告进一步提倡削减对资源的消耗。在制定这些建议的过程中,《增长的极限》相对于马尔萨斯关于抑制需求增长的可能性上显示出更加乐观的态度。然而,报告对这样的一个管理体制如何贯彻实施(这些建议)所言甚少,因此,它的建议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的。

### 45 (三) 温和的马尔萨斯:解放的环保主义

新近的环保思想主要发源于绿色运动,表现为对增长采用较不僵化的因此也就较少具有马尔萨斯特色的观点。然而,在研究方面,人们会看到马尔萨斯“规律”的基本阐述结构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个明显态度更加灵活的观点的一个早期的例子,就是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处在转折点的人类》(*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它的作者们理由充分地指责了那些支持或反对增长的不合格论点的幼稚。他们写道:“直到增长的定位、意义和主题以及增长的进程得到定义,否则增长或者不增长既不是一个得到很好规定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sup>①</sup>为了提供所需要的定义,作者们利用了一个未分化的增长(*undifferentiated growth*)和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借鉴于对生物增长进程的描述。未分化的增长仅仅是整体的一个量化的和统一的增加;而在有机增长或分化的增长模式中,增长的数量和方式因不同的部分或器官而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系的需求与各部

---

<sup>①</sup> Mesarovic and Pestel 1975, p. 3.

分的增长是相协调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们把这个类比应用到“世界系统”，使他们提倡对某些地区某些方式的增长进行抑制，而另一些地方另一些方式的增长需要提高：

虽然未分化的增长假定在世界的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着邪恶的性质，但是，在其他地方，一些人的生存每天都因缺乏增长——例如某些地区的粮食生产——而受到威胁。人类所面临的正是处在最紧迫的问题中心的这个不平衡的和未分化的增长模式——这是通向有机增长的一条路径。<sup>①</sup>

这里坚持的用定性的而不是用定量的方式看待增长，对后面评价马克思对增长的贡献将会具有重要作用；这个增长就是人类需求和生产力的增长。

一个相类似的观点是由乔纳森·波里特提出的。他非常希望绿色运动能够从对它的武断的反对经济增长的谴责中摆脱出来：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以过去的增长的速率继续增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一直以这一评价标准作为社会进步的最

---

① Mesarovic and Pestel 1975, p. 7. 对这个描述的一个可能的反对观点是，增长的现存模式在整体的一致增加的意义并不是“未分化的”。速率和增长的种类确实因世界的不同地区（无论是地理区域还是工业部门）而不同。因此这个观点需重新描述为：问题不是增长确实是未分化的，而是增长不适当地分化，并且这种分化和人类（或其他物种）的需求不一致。



好的仲裁者。由于我们对这种明显的荒唐观点的反对,生态学家一直被视为“无增长党派”、“零增长者”。虽然这一观点明显地和“无限增长者”的观点一样荒谬。我们的观点是将会继续有**某些**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即使整体经济基础不会再膨胀,但是在经济的某些领域仍将会有有限的增长;在第三世界,将不得不有一段时间的大的经济增长,即使人们对那种增长的本质和特征带有显著的歧视眼光。未来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必须是可持续的,就是说,必须是在地球有限的限度范围内而不是在超出这个限度的范围内实现的增长。<sup>①</sup>

波里特的观点看起来和环保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环保经济学家批评把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种发展的衡量手段,因为GDP没能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负面效应进行恰当的阐述。的确,波里特支持他们对经济增长量化方式的改变的要求。<sup>②</sup>然而,对于“增长”意味着什么,什么类型的增长是可接受的或是不可接受的具体说明的失败,破坏了刚才引用的文字含意。波里特间接提到的和突然担心环境可靠性的政府大为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样遭到环保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认为这个目标太多歧义,以至于不能对抗其他关于增长的阐

---

<sup>①</sup> Porritt 1985, p. 120.

<sup>②</sup> 例如,在 Pearce *et al.* 1990 中讨论过 GNP。参见 Porritt 1991, p. 15.

述,因此容易被作为“一成不变”的一个烟幕。<sup>①</sup>然而,很明显,对波里特来说,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较少**的经济增长,而不单纯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增长。与《增长的极限》相比,对他轻微的指责不是来自于他的根本不同的理论框架,而是来自于他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资源的有限供给的差距正在缩小的速率的不太悲观的判断。<sup>②</sup>在北半球和正在追赶发展的南半球,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调整经济,但是它并没有消除马尔萨斯式的短缺的威胁。对波里特来说,马尔萨斯主义的原则,即短缺必须通过限制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解决,仍然是环保政治的明确特征:“如果你想要一个绿色政治和传统政治的简单的区别,那就是,我们认为量化的需求必须**缩减**而不是膨胀。”<sup>③</sup> 47

新近的环保思想中的另一个与马尔萨斯相去甚远的明显观点,是不再过分强调人口增长的问题。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绿色运动进入选举

---

① 例如,见 Ekins 1991, p. 29; Jacobs 1997, pp. 3-5。一般把“可持续发展”这个词汇的创造归功于布伦特兰报告(the Brundtland Report)(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7)。自从我写作本章的初稿以来,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府热衷于这一言辞的进一步证据;然而,在里约热内卢制定的把可持续发展付诸实施的承诺计划,同关贸总协定为实现自由贸易所表现出的热情不相上下(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被发起的,但是它没有相应地关注如何定位这种增长),但并未因此减轻人们对其真实性的怀疑。

② Porritt 1985, p. 26.

③ 同上,p. 136。



和压力集团政治的背景下,人口限制被认为不得人心。<sup>①</sup>然而,这个问题上的保留并不意味着政策的一个根本改变。波里特表达了许多环保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即他们拒绝对人口增长的强制性限制,认为这种限制是“一个对人权的不可接受的和道德上不得人心的侵犯”。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政府拖延而不是采取行动的代价是让人惊悚的,这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生存或者毁灭的区别”。<sup>②</sup>政府政策最有效的达到限制人口增长这一目标的时候,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对强制措施更为强劲的反。然而,并不是所有绿色政治的倡导者都像波里特采取这样一个温和的马尔萨斯主义。例如,欧文(Irvine)和庞顿(Ponton)就对马尔萨斯和埃尔利希在解决“人口过剩危机”上所表现出来的坦率表示赞扬,并提倡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去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像埃尔利希和哈丁一样,他们准备在世界范围内用马尔萨斯式的政策作为一个操纵杆去实施人口控制:“就外国援助而言,残酷的事实是,给予接受国的有益于人口政策的援助是适得其反的,应该停止。它们是生命的真正的敌人,不值得支持。”虽然这样的政策好像太残酷,但是他们写

---

① 人们可能反对这种观点: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限制可能会受到西方选民的欢迎。然而,绿党仍然有理由去降低人口问题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一项人口限制的政策被采用,依情况而可能把西方人口排除在外。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可能会更低,但是在许多情况中人口密度更高,因此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趋势中任何上升的变化都将把它们带进继续执行人口限制政策的范围内。其次,针对发展中国家采用限制政策的政党将在政治上更易受到这样的指控(不管公正与否):——这表现出得寸进尺的开端,并且这样的政党为追求环境目标准备消除人们的自由。再次,绿党完全可以使最具潜力的呼吁散布在可能反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限制政策的全体选民之间。

② Porritt 1985, p. 193. 参见 Dobson 1990, p. 95.

道：“与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而待后果严重再需采取行动相比，这是温和的。”<sup>①</sup>

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有一种远离严酷的马尔萨斯式的政策趋势和倾向，但是基于马尔萨斯关于短缺是来源于需求上的无限制（和呈指数速率的）增长和地球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存在绝对的限制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观点，对增长的限制仍然是环保思想的一个中心支柱。短缺的概念从马尔萨斯所关心的人口数量导致的对食物需求的增长，拓宽为一个更为普遍的人类需求得以满足需要的各种资源的短缺以及对资源需求的增长由人均消费量和人口数量决定的观点。第二个改变是采取了一个对有限制的继续增长（被种类和地区以及数量所限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更加灵活的态度。但是建立在对于资源的短缺不太悲观的基础上的这个灵活性，没有导致对暗含其中的逻辑的放弃。这一观点是由多布森（Dobson）提出的。当时他指出对《增长的极限》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它对资源耗尽的悲观预测被证明极不准确，但是他回应这种批评说，环保主义者“已经学会了去接受这些批评的细节，同时继续赞同增长极限论题的一般原则”。<sup>②</sup>

###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马尔萨斯

本章的剩余篇幅将用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将对我所展现的马尔萨斯式的环保思想特色的论点给予特别的关注。

<sup>①</sup> Irvine and Ponton 1988, p. 23.

<sup>②</sup> Dobson 1990, p. 80.



我对“批判”这一词用单数形式，是因为我所考察的所有材料中没有只字片语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态度在任何重要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 K. J. 沃克(K. J. Walker)两位作者在这个主题上对当代环保主义的马尔萨斯式特色提出了质疑，他们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马尔萨斯的论点有其合理性。但是，他们认为现代环保主义的内容和背景与马尔萨斯理论的内容和背景是非常不同的，以至于“对马尔萨斯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将不能服务于我们今天的目标”。<sup>①</sup> 本顿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反应过激，他们否认所有自然限制的存在或低估所有自然限制的重要性。因此，本顿认为为了创造一个绿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沃克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承认自然限制的，但是他们的继承者忽视了他们思想的这个方面；为了把环境问题简单的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后果，他们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并不表明他们对环境限制的否认，而且这个批判是与当代环境问题是有关联的，洞察到了我前面所考察的各种主张的不足之处。<sup>②</sup>

---

① Benton 1991, p. 247. 参见 Walker 1979, pp. 29 - 31。

② 在 Grundmann 1991a, p. 51 中，本顿和沃克因集中在“两个主要的生态问题中的一个”，即各种资源的短缺，而“几乎完全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污染”而受到批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污染和资源消耗可以被放在自然限制的概念框架里考虑，而且本顿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中提到过污染，如他在回复格伦德曼时提到的(Benton 1992, pp. 56 - 57)。

### （一）马尔萨斯的意识形态意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最明显同时最少建设性的一点是，他们对他们认为伴随马尔萨斯理论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意图的抨击。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些著作中，包括恩格斯的《1844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们批判马尔萨斯为济贫所辩护、掩饰贫困的真正的原因并把贫困当做“人类永恒的命运”。<sup>①</sup> 马克思在他的后期的著作中，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描写成旧政权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提倡的进步观念的一部分。<sup>②</sup>

在这里可以觉察出一些明显的论断。一个就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带有保守的政治意蕴，就像它所暗示的，缓解贫困的意图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失败。如马克思所说，马尔萨斯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将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sup>③</sup> 第二个论断是，马尔萨斯的保守主义不只是他科学观点的结果，相反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为他关于人口看起来科学实则缺乏科学合理性的观点提供了动机。这样，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描述为一篇“幽默讽刺文章”，“辩解书”和“赞美书”，并宣称马尔萨斯只是“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

①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 570. 另见马克思的‘Critical Marginal Notes’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② *Capital*, vol. I, p. 766.

③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 324.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0 页。)



心意的’(有用的)结论”<sup>①</sup>。马克思还引用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保守的  
50 观点去解释它被英国统治阶级所广泛接受的原因。他和恩格斯还进一步以对其剽窃行为频繁谴责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马尔萨斯科学资格的嗤之以鼻。<sup>②</sup>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马尔萨斯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解放政治的不相容性或许可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敌意,(再则,这种不相容性或许也可以解释经常被当代的政治左派对环保主义及其马尔萨斯主义的同盟存有猜疑的缘由<sup>③</sup>。)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反对他的理论,将会卷入到这样一种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动机中。剩下的观点,就是关于马尔萨斯以及他的拥护者的动机和行为,即使是正确的,也只是构成了反对这个理论本身的间接证据。为消解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一般进步政治的挑战,所需要的不是对马尔萨斯的动机的抨击,而是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对资源的需求不可避免的遭到自然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出现短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批判。

##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可以找到对马尔萨斯的两个中心论点——人口往往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供应由于肥沃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页。

②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 pp. 117 - 19 and part III, p. 61. 另见 part II, pp. 114 - 117 and 120.

③ 例如,见 Enzensberger 1974 最后一章的讨论;另见 Benton 1989, p. 52 and Benton 1991, p. 252.

地的有限而充其量只能呈线性增长——的挑战。恩格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不可避免的遵从一个几何模式增长,而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适当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可能会受到有意识的控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尔萨斯在他的理论的后来版本中,一定程度上勉强承认了这一点。他承认,“道德约束”可能会有一些功效并可能会被恰当的政策所促进。但是,马尔萨斯低估了政府在推进道德约束中的作用,只把政府的作用主要限制在对私有财产和公民自由的保护方面。<sup>①</sup> 而恩格斯利用马尔萨斯的妥协来论证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即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sup>51</sup>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sup>②</sup>

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的“几何”模式也不被马克思所接受。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类人口增长是社会的、历史的和自然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拒绝接受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

① Malthus 1986d, pp. 205 - 206.

②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3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20 - 621 页。)



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sup>①</sup>,并且马克思引用了数据显示人口并不总是增长至生活资料的极限,有时也会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甚至当生产增长时人口数量反而会下降。<sup>②</sup>

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的几何模式的

---

① *Grundrisse*, p. 60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虽然马克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他主张人类人口增长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并且由于严重的短缺或短缺的威胁之外的原因,人口增长可能不会遵循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进程,但是应该指出,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政治敌意和他对整齐的辩证倒置的爱好导致他过份夸大了自己的理由。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马尔萨斯通过把人口增长表现为一个只易受外部限制的几何级数增长进程,而粮食和其他植物的生长有它们内在固有的限制,而颠倒了事实。为反驳后面的观点,马克思写道,没有外部限制,“蕨类植物蔓延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繁殖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同上, p. 60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马尔萨斯的确断言(除了“道德约束”部分以外)对人口的限制是外部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制于内部的或内在的限制。正如我早期对他的算术模型阐释所清晰表明的,这个模式是一个想要表达生活资料的增长连同土地短缺施加的限制趋势的最终结果的稍微有点武断的意图。这并不是说,就植物、动物或者人类而言,人口增长的内在趋势是不同的。马尔萨斯为生活资料而不是人类把增长趋势和外部限制结合为一个算术模型的原因是,在前者那里,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最终结果(也就是,可用来消费的食物数量),而就人类而言,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对无限制的增长趋势和假定其与生活资料的净增长不相匹配。

② ‘The War Question.—British Population and Trade Returns.—Doings of Parliament’, p. 247;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p. 493. 然而,请注意,因为马克思的数据包括了移民的影响,所以他们没有反驳任何马尔萨斯有关**全球**人口增长模式的观点。

理由是多么有力,他们的结论的大体要义在今天看起来相对没有争议。正如本顿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人口增长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比马尔萨斯的“准自然主义”的模式更接近于当代人口统计学家的传统智慧。<sup>①</sup>特别是,通过确定一旦达到某一特定的富裕程度,出生率就会下降这一趋势,人口变迁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从《增长的极限》出版时起,环保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就是人口并非**不可避免地**增长,直到它耗尽生活资源,而是它能并且必须被社会控制住。环境争论的要点,与其说是改变人口增长模式的**可能性**,不如说是改变人口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各种政策。这一点——就像一般的自然资源的需求问题以及其他所谓的决定因素,如经济增长——取决于我们对马尔萨斯式短缺的第二个假定所采取的态度:对人类需求供给的限制。

### (三) 对马尔萨斯的生活资料观点的批判

在本章的开始部分,引自波里特的段落说明了在环保主义者之间的普遍的看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所假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既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生产力发展不同,又与对环境限制的尊重不一致。本顿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反对马尔萨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声称,他们“以较早的人类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和他们的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经验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概念,导致他们(不是那么明确地)不仅拒绝接受由马尔萨斯给

---

<sup>①</sup> Benton 1991, p. 257.



出的关于自然限制的谬误的思想,而且也不接受所有的自然限制。<sup>①</sup>他认为,由于他们思想中的这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因素”,由于与今天的环境问题相联系的自然限制比作为马尔萨斯理论基础的自然资源限制更为紧密,因而也就更具有政治上的紧迫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变得不适用于当代环保运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了。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的否认自然资源限制对人口增长和资源配置设置了任何约束,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与他们声称提供的唯物主义理论相冲突——这种唯物主义将人类看作是拥有物质需求的肉身存在物。然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马尔萨斯的第二个假设——生活资料的有限性——的评论,并不能让这样一个解释变的恰如其分。

53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对农业生产效率限制的描述是错误的。本顿和沃克让人注意到恩格斯所用的言辞,这些言辞好像表露出恩格斯对农业生产量增长潜力的一个过分乐观的估计。恩格斯断言科学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并且,正如人口的增长(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恩格斯反问道:“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通过使人注意到地球和人类的生产力,他宣称,马尔萨斯让我们

---

<sup>①</sup> Benton 1991, p. 259.

“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sup>①</sup>

针对恩格斯高估了科学的潜力这一说法，我们可以有两个回应。第一，当把它与对科学技术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的许多环保主义者的悲观主义相比较时，支持恩格斯的科学观点过于乐观的论据并不像它可能呈现的那样清晰。正如沃克所说，恩格斯的主张即科学的进步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可以说是缺乏依据的，这只能被认为是华而不实言词的不可量化的陈述。<sup>②</sup> 本顿和沃克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被他们的“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经验：这是马尔萨斯本人所不能理解的”所引导而过高估计了科学的力量。<sup>③</sup> 然而，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直令人惊叹，可能超出了他们能够想象的程度，因而格伦德曼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动力观比本顿的技术动力观更为接近现实。”<sup>④</sup>

然而，重要的并不只是技术创新的速率，而是技术创新的效果。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马尔萨斯的绿色继承者的技术怀疑主义的矛头，针对的不是技术创新本身的可能性，而是它解决环境问题而非只用一个问题取代

①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439 - 44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20、621 页。)

② 这个结论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强化，即恩格斯用来与科学的进步相比较的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主义模型是他本人所反对的。我想说的是，恩格斯做这个比较的意图是要表明，关于科学发展的乐观观点并不比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增长的悲观主义缺乏道理。

③ Benton 1991, p. 259. 参见沃克 Walker 1979, p. 34. 一个类似的观点由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 (Michael Redclift, 1989, p. 177) 提出，当时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受 19 世纪末期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所熏陶”。

④ Grundmann 1991b, p. 52. 格伦德曼特别引用了电子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的例子。



54 另一个问题(或者自然限制)的潜力。<sup>①</sup>因此,恩格斯关于技术动力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虽然他为了克服马尔萨斯主义的短缺论,通过低估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而高估它的潜力,但是这里同样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恩格斯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他很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的无意识后果的危害。但是在后期的著作中,他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灵敏的觉察意识。他描述了一些因为人类征服自然而导致的灾难后果,并警告说,每一次针对自然的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sup>②</sup>

① 例如,埃尔利希在上面所引用段落中的一段(本书第55页注)认为,正是增长的农业生产率产生的环境影响会最终带来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增长的极限》(Meadows et al. 1974, pp. 129 - 133)考虑了技术创新能够克服资源短缺这样一个方案,其结论是增长被停止将不是因为资源的短缺,而是因为技术手段还不足以完全控制的污染。格伦德曼部分的承认了技术发展本身并不足以克服生态问题,但是他通过假设技术创新可能不得人心的效果只影响社会克服自然限制是否可取的或正确的评价问题,而不影响人们是否有可能这样做的事实问题,混淆了该问题。这个差别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技术的负面效应可能把限制强加于生产,而这些限制并不比技术可能要克服的限制少,还因为(这将在后面讨论)“自然限制”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它们的具体阐述涉及到一个决定继续增长的代价超过其利益的临界点的评价因素。

②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pp. 361 - 36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甚至在这里恩格斯可能也被指责过度乐观,因为他假定自然规律知识的不断增长将会使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并且他宣称“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然而,恩格斯并没有声称单单科学就能把生产活动从它的有害的负面影响中解放出来。确实,他明确地拒绝了这样的观点,主张这些影响的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p. 363.)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1页。)

针对技术过度乐观主义指责更为重要的第二个回应是,即使恩格斯的评论确实暗示一种对科学和技术潜力的过分乐观的观点,但这个观点相对于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的主要框架是可有可无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不可避免的增长直到受到食物短缺的限制的观点,但他们并不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依赖生产的无限扩展。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批判的关键在于马尔萨斯提到的生产的限制远没有达到:

当“密士失必河流域尚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sup>①</sup>

根据这个描述,在短期内克服短缺并不依赖尚未取得的科学的进步,而是依赖于已经获得的技术和资源的理性运用。恩格斯的论点并不是说靠地球肥沃的土地供养的人口可以没有限制,而是说这些限制还没有达到,因此不能认为这些限制对贫穷和饥饿的存在负有责任。在这幅图景中,未来科学进步的作用不是完全消除自然限制而是推迟这些限制的到来,扩大满足人类需求的潜在能力。恩格斯承认这

---

<sup>①</sup>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4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622页。)



个过程本身就有所限制这一事实，他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对此有所表露。在信中，他认为在未来存在着人口不得不有意识的加以控制的可能性：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sup>①</sup>

对农业满足人类需求能力的自然限制还没有被人口所超越(在19世纪)这一观点也含蓄的出现在马克思对他所认为的贫困和饥饿真实原因的解釋中，而马尔萨斯误以为这一原因是人口数量过多。根据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些现象的现今原因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

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

---

① 引自 Walker 1979, p. 28(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1页)。恩格斯把这个描写为一个抽象的可能性的原因，可能是他期望在这个点达到之前人口增长将会因其他原因而变得稳定起来。

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sup>①</sup>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资本的膨胀需要一个人口数量和就业机会的不平衡——“失业的(至少是相对失业的)那部分人口”——为了保证可利用的所需劳动力把剩余资本投入到工作中。<sup>②</sup> 相对剩余人口因此成为一种资本的法则，虽然它不是一个社会的超历史的法则。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错误之一，是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sup>③</sup> 人口过剩的数量和其表现形式在每种生产方式中是不同的。人口过剩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sup>④</sup> 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了为了消除由现存的财产关系施加给生产和分配的限制以及实现农业潜力的最大化而进行农业改革的必要性。马克思写道：“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sup>⑤</sup>

因此，概括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包括：(1) 对他

① *Grundrisse*, p. 60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08 页。)

② 同上, p. 61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11 页。)

③ 同上, p. 60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06 页。)

④ 同上, p. 60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06 页。)

⑤ ‘Marx to Engels in Manchester. London, 14 August 1851’, p. 42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31 页。)



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动机的抨击，(2) 对由人口数量增长导致的人类需求将不可避免的增长直到受到资源短缺的限制这一主张的否定，(3) 对马尔萨斯的人类缺乏满足其需求的现有手段是对生活资料的直接和绝对的自然限制的后果这一信念的拒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的第三部分包括以下几点：① 自然限制(在写作时)是相对遥远的；② 这个限制不单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限制只是在抽象中才是绝对的，而在实践中它们相对于人类知识和社会组织，因为人类知识和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限制或促成自然潜力的实现；③ 人类需求也是由社会造成的，因为它产生于分配和利用的失败以及生产的不足。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点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讨论。我已经指出，因为马克思拒绝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描述，所以他对解决人类需求的满足并不需要生产上的无限制(呈指数速率的)的增长。但是环保主义者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作为环境影响的另一决定因素的攻击又作何解释？为了判定它的重要性，比这一章更详细的考察马克思本人关于“增长”的概念将是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上面的“分化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并且这一问题被马克思在论及生产力和人类需要这两者时如何应用诸如增长、进步和发展等概念的争论，而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在第五章第六章我将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但是在我们能判定环境限制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或者阻挠马克思所预期的发展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些限制的性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考察了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主义环境限制概念的回应。现在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是否适用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 四、马克思、马尔萨斯和当代环境问题

在经验研究中,人们已经雄辩地证明,即使在今天,上百万的人遭受饥饿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对已经达到的食物生产的绝对限制。供养每个人的充足食物已被或可以被生产出来。人们遭受饥饿,因为他们买不起食物;因此(正如上面所引用的马克思之言)<sup>①</sup>，“可获得的谷物的数量完全与这些人无关”。因为穷人买不起,能够生产食物的土地已不被用来耕种,已生产的食物被丢弃或者贮存至腐烂。富人的购买力创造着许多激励因素使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货币价值,而不是数量和营养质量增加到最大限度。<sup>②</sup> 如果这样的描述是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就人口和食物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仍保持着它的效力。

然而,今天的环境问题比食物生产涉及更广范围的需求和资源。沃克提醒人们注意“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把他们的结论建立在如同马尔萨斯可得到的同样贫乏的证据之上”的危险性。因此,他认为:“像‘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描述生态限制是不得人心的。”<sup>③</sup>虽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相信环境限制的存在证明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标

---

① 见以上本书第 77 页注。

② George 1977. 另见 Sen 1982, 特别是他在第十章的结论和 O'Neill 1986。

③ Walker 1979, p. 29.



签,而是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在其描述粮食生产时所使用的限制概念的批判,对通常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是否有效。

58 人们早些时候就注意到,新近的环保主义不得不承认对环境限制的早期阐述的过于悲观的特征。由于替代资源的出现以及矿产的更加有效地利用,先前的矿产储备量即将枯竭的警告已使人们感到厌烦。这样的情况,至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限制相对遥远的观点以及他们所认为的短缺的存在至少部分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观点相一致。<sup>①</sup>一个确实被继续普遍意识到的一个紧迫的威胁,是自然系统吸收污染同时又不中断它们支撑人类生存的能力。<sup>②</sup>在声名狼藉的“温室效应”的程度上,科学家们的观点产生了分歧。但是,无论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事实仍然是推迟矿产储量限制的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这一现象。就矿产资源储备而言,关乎人类社会的限制不是地壳矿产储备的有形数量,而是用那些矿产制造产品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一些影响因素诸如利用原料过程中的损耗程度,决定当前可利用的有形原料成比例的开采技术,以及替代资源。同样的,温室效应直接决定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限制(这仅指温室效应决定的“可接受”层面的影响)。(例如)对能源的利用和生产的任何限制也取决于诸如当前生产技术的效率,替代资源的出现(例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以及废物处理技术这样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对削弱自然限制所起的作用,

---

① 例如,考虑一下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机。有些人把它看作一个时代资源耗尽的第一个指标。Hall 1974 讨论了这一问题。

② 我不想暗示这是被看作一个直接威胁的**唯一**“自然限制”;我之所以把它选出来作为一个例子,是因为它是最突出的。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马尔萨斯的回应中所强调的那些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粮食生产而不是土地决定一个区域的最大人口量(或“承载能力”)；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在一定区域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成为可能，并且更多的土地被用来耕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指出“自然”限制的相对特性的唯一作者。马修斯(W. H. Matthews)提出了一个更加系统的学说，这个学说明确地为解决 20 世纪末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马修斯首先观察到，存在着他所称的“外部限制”的两个基本决定因素。人们普遍忽视了第二个决定因素，因为人们把这类限制“看作非常确定的限制——是由自然坚固的设置以及人为的理论决定的。<sup>①</sup> 这两个决定因素是：

- (1) “现存资源的数量和自然法则”；
- (2) “人们在这样的自然处境中的活动方式”。

就可再生资源来说，虽然一个既定资源的有形数量是固定的，但是“开采潜在资源的实际限制正是人类活动的功能所在”，相关的因素如科学知识、技术能力和经济因素，它们都相应的取决于社会的和政治的选择以及优先权。

可再生资源和产生可再生资源的环境系统，不是在总体数量上受到限制，而是在与这些资源的持续再生产相一致的开发速率上受到限制。马修斯用了一个类比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演进对开采速率和资源分布的影响。针对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在去世之前，能爬多少级阶梯呢

---

<sup>①</sup> Matthews 1976b, pp. 15 - 17.



(到达他的‘外部限制’)……?”，他回答说：

一个人爬阶梯的“外部限制”不仅是他身体状态的一种功能，也是他如何爬阶梯的一种功能。如果他尽可能快地爬阶梯直至死亡，他可能并不比以非常慢的速度往上走越过的阶梯数量多。并且，如果他以我们大多数人爬阶梯的方法去爬——即无论何时，在日常生活中他必须按这种方式——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是无关的，因为尽管他可能在一生中爬了大量的阶梯，但是他不可能死在一段楼梯上，或者成为所有那些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sup>①</sup>

自然限制是可以用来控制这一事实，使社会选择和优先权决定着这样的限制存在于何处。扩展一个限制的过程将需要成本，必须根据减少资源利用或超过这一限制的成本来权衡是否有此必要。马修斯观察到任何外部限制或许只在一个给定的参照框架或“背景”之内才能得到规定，因此他从这一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定义。马修斯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可能有些不完备，但或许可从以下阐述得到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即这个给定的背景包含两个因素：考虑中的资源基础和被认为非常重要的成本范围。马修斯认为，某些成本的重要性，或许直接来源于正在考虑中的资源基础。<sup>②</sup> 在其他情况下，考虑到的成本可能在概念上独立于资源系统。马修斯指出，违背一种资源的某些限制

---

① Matthews 1976b, p. 18.

② 同上, p. 25.

情况将会对一个国家的独立产生影响；另一个例子发生在限制被设置在不同程度的污染物上，以便把相关疾病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自然限制看起来可能会有不同的重要性。有一些自然限制涉及到对人类生存十分重要的自然系统的持续完整性，它们对一般的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而另一些自然限制则可能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说是必要的。<sup>①</sup> 背景的选择将关系到主体的利益和需求结构。正如马修斯观察到的一个例子表明的，一个国家很可能更优先考虑影响到它的独立性的国家限制，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国家认为非常重要的某种全球限制。<sup>②</sup>

一些作者认为，尽管存在社会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意味着绝对的自然限制是存在的。第二定律表明所有的物理过程都导致能量从有序状态(低熵)向更分散状态(高熵)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人们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处于低熵的可利用的能量和天然原料的储备量将不可避免和不可挽回的被消耗掉；我们所

---

① 后者的一个例子由 Gorz 1980, p. 55 提出：他认为，在莱茵河谷的空气和水污染的程度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即再生产“先前被认为自然一部分因此是免费的资源”的成本，正威胁到“用最少的货币成本生产最大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目标。

② 如果定义限制的背景全部耗尽了某种物质资源，那么谈论违背全球性的外部限制只会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从全球范围的重要成本而不是资源的物质消耗方面定义限制，那么违反限制的行为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这样的两个例子：少数国家坚持核试验，从而释放了超过对人类健康安全水平的放射性物质；另一些国家拒绝为防止破坏气候变化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样的例子也时常发生在关于鱼、鲸等等的世界贮量上，个别国家超过了广泛同意的可持续利用的限制。



能做的一切就是通过降低消耗来减缓这个进程，完美的回收利用是不可能的。

从形式上来看，第二定律作为现代物理学公认的核心，这样的论点是不可辩驳的。另外，第二定律在解释生态进程方面的重要性也是无可争议的。然而，支持绝对自然限制的以熵为基础的这个论点与当代环境问题的研究甚少关联。核科学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已经表明：行星物质所包含的能量的数量和理论上可应用的能量的数量是巨大的。所有的物质所包含的低熵能量聚集起来，要高于传统发电站从矿物燃料中所提取的能量的许多倍；在原则上，核聚变提供了一种从地球海水中提取这种能量的技术。正如一个作者写道：“自然，运动中的物质，仅仅是能量而已。”<sup>①</sup>当然实际上可以被人类利用的能量远少于此，但是这个限制不是由热力学定律简单施加给我们的准则，而是由与能量开发（提取）相关的困难的复杂性导致的。此外，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此，熵理论的拥护者们能够提倡以太阳能的利用“作为解决人类熵问题的最有可能的突破”，因为利用太阳能的进程“消耗的仍是低熵，而不是来自我们地球的快速可耗尽的贮备”。<sup>②</sup>源自第二定律的绝对自然限制，因此只涉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中低熵能量的消耗。<sup>③</sup>这种现象，即被恩格斯所熟知的通常所说“热寂说”。他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描述到：

---

① Hall 1974, p. 196.

② Georgescu-Roegen 1980, p. 59. 另见 Rifkin and Howard 1980.

③ 如果我们忽视了科幻小说中借助星际航行来逃避自然限制的提议，或者至少在太阳系中是这样。

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到这样的命运,无数其他的宇宙岛的星系都是如此,还有这样一些星系,它们发出的光在地球上还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时将不会达到地球,甚至连这样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sup>①</sup>

这确实是一个绝对的自然限制,但是恩格斯在这里用适当的、有远见的视角将其描绘了出来。

## 五、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生态限制的概念必须用占据太多生态话语的马尔萨斯主义言论所不承认的方式具体说明。一个适当的描述必须

62

---

<sup>①</sup> *Dialectics of Nature*, p. 2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承认,由非人类的自然施加给人类的限制仅仅取决于一定的目标或价值背景,并与技术状况相关,而且这些限制相应地可能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

这样的一种解释,部分地使生态限制和施于人类生产活动上的其他限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毕竟,生产过程自身可以被描述为(就像马克思所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互动,人类利用技术将他们的影响施加于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活动都直接受制于自然:人类活动必然借助于自然法则并且在自然法则之下展开。那么,我们如何能在这些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限制(例如,对我们实现工厂生产全部自动化能力的限制)或者社会性的限制(例如,马克思置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上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概念)与那些我们称之为生态性的限制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生态限制可以被理解为产生于这样的结果,即自然储备量或容量的(实际或日益逼近的)耗尽对人类活动后果的有害影响。一旦我们用这个方式表述生态限制,我们就能看到,作为一个大致的描述,把生态限制想象成不可消除的障碍是不合适的。<sup>①</sup>一般来说,生态限制更多地遵循一个收益不断减少的法则。根据这个法则,相似的渐增性的产量的增长开始需要相应的更大的投入,这产生于在利用稀缺资源时生产节约效能物品的不断增加的成本,或找寻替代资源代替稀缺资源以

---

<sup>①</sup> 如马修斯(1976b, p. 17)所说:“在所有的例子中——甚至在大多数例子中,这些限制都不是明确的、可预知的、不相关联的临界值。不管如何达到这些临界值,如果超过它们,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心里想象的,不应该是一个人站在一个悬崖的边缘,多余的一步就会坠落身亡。”

及抵消我们的活动带给我们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的危害。限制本身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要点,即在这一点上增大产量的成本开始超过受益,因为自然和成本的大小将依赖于可利用的技术和成本开始超过收益,而且成本开始超过收益这个点的定位将取决于各种各样成本和收益的相对权重。不应把这样一个模式看作排除了近似于马尔萨斯模式的极端情况。在这种模式中,生产技术的变革不会为改变限制提供一点帮助——或者因为我们知识的欠缺,或者因为成本阻止技术的应用。<sup>①</sup> 63

然而,把这些情形看作是最初形态的,并且采用一个迫使所有生态限制都陷入到这个模式里的笼统概念,将是错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承认了技术和社会组织在决定环境限制存在于何处以及它们以什么样的速率逼近我们时所起的作用,并警告我们在社会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高估自然因素的危险。虽然有时他们看起来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了错误,对人类控制自然限制的能力过于自信,但是他们确实承认当这一进程不可实现时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他们概念的优势在于承认了自然、社会和技术的相互关联性,这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因此,尽管马尔萨斯把自然因素变成一个僵硬停滞的绝对真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每个**因素的作用以适当的思考。

---

① 我们甚至希望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例如现存的技术没有为应对该限制提供空间这样的背景,通过讨论一些限制来标明这样的情形的“绝对性”。然而,我们必须记住,那些背景本身会经常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使得该限制只是成为一个“相对的绝对性”。(关于一个相似的技术设计被应用到一个不同的主题,见 Sayers 1991, pp. 16 - 17 关于相对真理的概念。)



这种生态限制的“相对化”概念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综合性理解,需要三种研究途径,以符合生态限制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只关注自然因素会把自然科学的发现视为理所当然的,从而忽视它们的不断发展。通过把自然限制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科学家们投身于在实践上削弱那些限制的社会进程,即通过提供改进我们活动的知识而改变自然及其影响。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不应该分开研究,因为社会因素影响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而反过来技术也影响社会进步。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对其理论的生态影响进行详细的阐述。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方法

64

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认为,马克思所作的形而上学假设,或使用的方法,不足以理解生态问题。作为对马克思方法的一个独立的批评,这种评估具有自身的价值,但更常用于解释马克思更根本的主张的所谓生态麻木。

上一章表明,简单地援引“增长极限”这一概念,不足以作为拒绝接受马克思理论的理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评估需要对自然、社会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个更细微的分析,因为自然、社会与技术共同确定了任何限制的地位和性质。因此应该加以细究马克思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和解释形式,同时也应该考察他的绿色批评者的批评和相反的论断。为了进行这项研究,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 绿色理论家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主张在何种程度上在哲学和生态学上是合理的?

(2) 这些主张(在其合理的范围内)是如何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一章,我将仅限于讨论最适于研究生态问题的解释形式和研究模式;下一章将提出有关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更实质性问题。

## 65 一、形而上学生态学

研究绿色哲学思想的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是安德鲁·布伦南(Andrew Brennan)所给予的考查和批评。布伦南的主要目的是挑战深生态学运动的生态中心伦理,同时将它的一些见解融合在他自己的“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t)替代学说中;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对深生态学的支持者们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立场而诉求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广义上讲,布伦南确定了两个这样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是:“唯心主义(认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精神)”和“各种全球整体主义(认为所有的事物都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依存)”。<sup>①</sup> 布伦南把这些观念解释为思想框架,它们从生态学和20世纪物理学的科学学科转移到了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更广泛的背景。布伦南把精力集中在起源于生态学的框架上,对“科学生态学”和“形而上学生态学”作了有益的区分。科学生态学包括“生物学家对有关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研究……”;相反,形而上学生态学的构想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以及提供适用于远远超越生命系统的形而上学

---

<sup>①</sup> Brennan 1988, p. 7.

的生态学”。<sup>①</sup> 布伦南对形而上学生态学(我将采用的一个标签)的批判既涉及了对哲学中肯主张的挑战,也涉及了对据称源于科学特征的挑战。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寻求建立被认为是生物学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生态学基础,但这并不是他们概括这一科学结果的主要目的。相反,他们的意图是为理解和处理生态问题以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社会所面临的其他问题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实际上可能对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家所采用的至少一些方法和哲学假设一直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即使没有分歧,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利用科学家”的结论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更是一个甚于推导归纳的类比问题。比如,贝尔德·卡利考特以及阿恩·奈斯都承认了这一点。贝尔德·卡利考特清楚地表明,当他谈到“生态的形而上学含意”时,并不是要意指生态前提和形而上学的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演绎关系;而阿恩·奈斯指出,形而上学的结论“不是通过逻辑或归纳的方式源于生态学”而是由它提出或激发出来的。<sup>②</sup> 布伦南还认为,科学生态学的实践对形而上学生态学的主张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其中的一些主张完全取决于哲学思考,而那些由科学生态学阐明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主张,都需要对生态研究状况进行哲学的澄清。把科学生态学与形而上学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视为类比和启发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有助于解释形而上学生态学也可

<sup>①</sup> Brennan 1988, p. 31.

<sup>②</sup> Callicott 1989, p. 101; Naess 1973, 引自同上, p. 108.



以借鉴除生态学以外的科学。例如，卡利考特利用量子力学，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同样也是，而弗雷亚·玛修斯(Freya Mathews)则诉求广义相对论，以支持她对“生态自我”的解释。<sup>①</sup>

虽然布伦南正确的把唯心主义观点视为形而上学生态学家著作中的共同之处，但它们绝不是普遍的。<sup>②</sup>相反，整体主义可能被视为形而上生态学核心的根本论题，并在更流行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绿色文献中被广泛引用。<sup>③</sup>通常认为，生态问题和其他问题产生于一种过时的思维方式，为了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新的、整体的科学范式。在弗里特乔夫·卡普拉的影响广泛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一书的导言中就表明了这一观点：

我们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我们有能源危机，有医疗保健、污染和其他环境灾害的危机，有不断攀升的犯罪率，等等。本书的基本论题为：所有这些危机都是同一个危机的不同层面，这一危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危机。和20世纪20年代的物理学危机一样，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努力把过时的世界观概念——笛卡尔—牛顿科学的机械世界观——应用到再也不能根据这些概

---

① Capra 1983; Callicott 1989; Mathews 1991.

② 例如，卡利考特(Callicott, 1989, pp. 110 - 111)就小心避免这种观点。

③ 例如，见在 Porritt 1985, p. 3 中提到的“相互依存”；在 Irvine and Ponton 1988, pp. 79, 89 中提到的“整体主义”；在 Spretnak and Capra 1986, pp. 3 - 4 and 140 - 141 中讨论的“整体的/有远见的绿色主张”。在 Dobson 1990, p. 37 中评论了这种绿色政治的观点核心。

念来理解的现实世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其中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现象都是相互依存的。为了恰当的描述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笛卡尔的世界观没有提供的一种生态观。<sup>①</sup>

卡普拉在形而上学生态学者中有些不寻常,因为他提出的新的世界观的主要理由是认知性的;其他学者如卡利考特、玛修斯以及奈斯都把整体的形而上学看作是巩固环境伦理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与卡普拉相似的主张,使他们的论点同样与本章的目的相联系。

为了评估绿色整体主义,我们必须设法确定这一词的使用意图。如上所述,布伦南把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整体论解释为一个关于全球事物相互依存的论题。在上述卡普拉的引文中,这一观点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卡普拉后来明确阐述了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对他提出的新范式的核心性,他写道:“现实的新景象是建立在对所有现象——物理、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等现象——本质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意识基础之上的。”<sup>②</sup>

相互依存的观点在形形色色的绿色思想中是十分重要的,是绿党所支持的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以及敌视对环境问题特定的“技术修正”的基础。但若不作进一步的阐述,作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的基础显

---

<sup>①</sup> Capra 1983, p. xviii.

<sup>②</sup> 同上, p. 285.



然是不够的。相互依存采取了多种形式；卡普拉认为牛顿力学体现了旧范式的不恰当性，但事实上，为了解释物体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牛顿力学得到了精确的发展。<sup>①</sup> 不过，方法论的考虑似乎是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所主张的整体主义的中心。卡普拉、卡利考特、玛修斯以及史柯里莫斯基(Skolimowski)等人依据其“分析的”和“还原的”的技术的限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了这种旧范式的所谓的不恰当性。<sup>②</sup> 正如多布森所说的那样：

68 一般攻击的目标是那些思维形式，即“把事物分开”对他们进行孤立研究，而不是“保持它们的原状”研究它们的相互依存。获取最好知识的途径不是通过对一个系统部分的孤立考察，而是通过研究这些部分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综合行动以及它的语言表达，在“整体主义”的术语中往往能够便利地收集到。<sup>③</sup>

---

① 有时有人提出，这种“机械”范式无法解释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果回馈环路。例如，李吉科(Keekok Lee, 1989, p. 53)声称，“在经典物理学中，粒子 C(台球)移动，是因为粒子 B(另一个台球)撞击它，而粒子 B 移动，是因为粒子 A(另一个台球)撞击它等等……反之 C 并不因为 A 而移动。”然而，这是错误的：该回馈与经典物理学完全一致，在诸如控制蒸汽发动机转速机制速度的离心式稳压器这种机械设备中，负反馈模式被用来稳定机械装置。同样，詹姆斯·拉夫洛克在对生物圈(盖亚假说)中负反馈机制稳定效应的研究为李的讨论提供了大量情境，他通过参照机械系统即电炉的恒温控制阐明了这一现象。见 Lovelock 1995, pp. 46 - 48。

② 例如，见 Capra 1983, pp. 31 - 32, 44; Callicott 1989, pp. 102 - 103; Mathews 1991, pp. 1 - 3; Skolimowski 1981, p. 27。

③ Dobson 1990, p. 37。

因此,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整体主义也许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观点,即生态学(和当代物理学等)所揭示的相互联系的程度或类型,削弱了对诸如通过“笛卡尔式”科学的还原技术手段理解生态系统这样的实体的企图。然而,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却很少说明“还原”如何被理解,或者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不适当方法。因此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中继续探索。

## 二、还原主义

“还原主义”一词像“整体主义”一样,它可以指一些尽管有关但不同的学说。通常,指责其为还原主义是对一个理论的严肃的谴责,但在科学的历史上,将一个理论还原为另一个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因此,我将考察一些哲学著作,这些著作设法在不同情境中澄清了还原的意义,并评价了主张或否认其可能性的理由。我将从布伦南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开始,因为它们涉及到环境哲学。

布伦南对**术语还原**(*terminological reduction*)和**本体还原**(*ontological reduction*)作了区分。<sup>①</sup>术语还原(布伦南把其作为该词的核心哲学意义)断定,我们可以消除一组术语,代之以另一组术语而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变化。本体还原要求减少我们承认其存在的那些实体的数量。布伦南认为这两个论断是相互独立的。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在只有一种事物——物理客观——存在的世界上,术语还原也是不可能的;他说,考虑到心灵哲学中的“成分可塑性”(compositional

---

<sup>①</sup> Brennan 1988, p. 72.



plasticity),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支持:这个观点(通常称为“变量实现”[variable realisability])是说,尽管所有心理状态都有身体的表现,但某一特定类型的心理状态在不同的身体系统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另一方面,布伦南认为,术语还原并不蕴含着本体还原,正如以下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种类的实体,即身体和心灵——可以通过“非身体的”来取代“心灵的”来进行术语还原。

然而布伦南的例子并没有讲清楚他声称的本体还原独立于术语的问题。心理状态的类型(根据变量实现的理论)与身体状态的独特类型是无关的,因此心理状态结构的名称形成了我们描述世界的不可消除的一部分。上述事实可能被合理地视为声称心理状态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独立存在的理由,尽管它们依赖于身体结构。这也就是说,这种成分可塑性现象表明了心理状态的各种类型**既不是**术语还原**也不是**本体还原。布伦南可能反对这一点。他详述了关于一物存在的不同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替代的说明,那么这种假设看上去也是合理的:即在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最好描述中,如果一种事物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到,那它就是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有别于术语的考虑,对一物存在这一问题缺乏明确的解释,表明本体还原的概念不可能对方法论争论作出有益的贡献。

如果“本体还原”是一个缺乏明确标准的概念,那么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术语还原”似乎就是空洞的。如布伦南所界定的那样,术语还原不过是包括不同术语组合的逻辑等价陈述。他对笛卡尔二元论进行还原的浅薄,表明还原主义的这种形式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方法论

戒律。因此,无论是本体还原还是术语还原,似乎都表现了绿党对当代科学方法的关注。然而,布伦南还讨论了第三种类型的还原,这种还原似乎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关注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我们可把它称为**理论还原**(*theory reduction*)。一个例证就是热力学还原为统计力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论在联系两个理论术语的附加陈述的帮助下推导出另一个理论。<sup>①</sup> 例如,为了把热力学还原为统计力学,需要的关联陈述就是把关于气体温度和压力的陈述与关于其分子运动的陈述连接起来。 70

布伦南的观点——尽管存有争议——是,这种还原缺乏任何明显的术语或本体含义。这一结论可能为那样一些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提供消除疑虑的信心。这些形而上学生态学家之所以反对还原解释,是因为他们害怕,这种还原将导致生态系统和其他集体或整个实体被视为比它们所包含的单个生物体更不“真实”从而具有较低价值。但是,即使布伦南的结论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可能满足如卡普拉这样主要关注方法论的理论家们的要求。像卡普拉这样的学者的方法论焦点,可被看作是生态学领域内整体论者与还原论者(或有机论者和机械论者)之间争论的一种延伸。这不再是一个像早期活力论者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关于“生命流”或“生命力”的存在的争论,而

---

<sup>①</sup> 内格尔(1979, p. 104)把这些连接陈述称作“搭桥定律”(bridge laws)和“一致规则”(rules of correspondence),而夏弗纳(Schaffner, 1967, pp. 138, 140)则把它们称作“关联语句”(associating sentences)和“还原功能”(reduction functions)。



是关于生物有机体研究的最适合方法的争论。<sup>①</sup>对生物学家而言,问题是,像依据生物体各部分的“机械”行为来研究生物体的分子生物学一样的科学,是否能充分地了解生物体。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他们是在更高的层次提出的:他们不仅依据生物体的器官或细胞对生物体进行还原解释,而且依据组成生态系统的个体生物体和其他实体对生态系统这类事物进行还原解释。<sup>②</sup>由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反还原主义具有这种解释性或方法论的特征,如布伦南所说,即使这种还原缺乏本体论意义,我们或许还是可以期待理论还原分析能使他们的主张较为容易理解。

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解释了许多理论还原讨论(包括布伦南的讨论)的起点。按照内格尔的观点,当满足下列条件时,一个理论就还原为另一个理论:

(1) 被还原理论的基本术语(和实体)要么出现在还原理论中,要么通过附加的“关联句子”与还原理论的基本术语和实体联系在一起。

(2) 鉴于上述基本术语和实体的联系,被还原理论的公理和定律可从还原理论中推导出来。<sup>③</sup>

71 随后的评论家对此提出了多样性的解释。例如,根据这些解释,只有由

① 见 Hull 1974, pp. 127 - 129。

② 卡普拉引用整体医学作为“生态”思维模式的例子,解释了把生物个体和生态系统视为不可还原的整体这一事实(Capra 1983, p. 118)。

③ Nagel 1961, ch. 11; Nagel 1979, ch. 6. 以下解释,借鉴了 Schaffner 1967 对理论还原分析的考察与批评。

一个理论产生的可观测到的预测而不是它所假定的理论实体,才需要由还原理论进行解释。然而,我们关注的是内格尔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并不取决于所争论的观点。<sup>①</sup>

内格尔是把对还原的分析作为科学进步方式的一种解释提出来的。他在实证主义传统内进行著述。在实证主义传统中,科学进步被看作是一个逐渐统一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理论作为特例被吸收到新的更一般性的理论中,并且最终一切理论都被吸收到了物理学中。科学进步的这一图景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反还原主义相冲突,而内格尔本人也反对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提出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归纳,这种归纳源于一种科学理论到另一种科学理论所谓的不可还原性。<sup>②</sup>然而,他的结论的确允许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反还原论的部分适应。

内格尔认为,既然理论还原从根本上是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既然这些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那么关于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的可还原性的主张就必须是特别的针对其特定的发展阶段。例如,当代热力学可还原到 20 世纪的而不是 18 世纪的统计力学;19 世纪的一些(或许是所有的)化学可还原到 1925 年后而不是 100 年以前的物理学。<sup>③</sup>然而,人们可能会误认为,我们会使关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还原性的一般问题变得毫无意义。鉴于这两个理论的发展范围,这些问题可被理解为关于该还原的未来

---

① Kemeny and Oppenheim 1956, p. 13. 另见 Schaffner 1967, p. 138; Hull 1974, pp. 30 - 31。

② 见 Nagel 1961, p. 337。

③ 同上, p. 362。



可能性问题。当内格尔写道鉴于目前的科学状况,关于还原的无限制的主张最仁慈地解释是它们提出了针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时,他逐步地走向了 this 立场。<sup>①</sup>

72 内格尔认为,由于我们无法提前了解这些理论将如何发展以及将来还原是否能够实现,这种预测和建议必定是推测性的。<sup>②</sup> 这样一种关于还原性的非先验特性的观点,明显地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无根据的反还原主义立场不一致。然而,有理由(内格尔承认其中的一些理由)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合理地阻止追求还原主义的解释。例如,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一,在某一特定时间,在次要科学中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上,或对进一步研究的指导上,一种科学到另一种科学的还原会产生一些知识上的收益;其二,因此最好把精力用于寻求次要科学内的这些目标。即使一种还原已得以实现,次要科学可能被证明是在其实际应用领域内更有用的研究和解释工具。例如,如果低级的科学对于待解释的现象过于繁琐的话,那么就需要一些没有提供或没有表明富有成效类比的数据。<sup>③</sup>

由此可知,一个科学到另一个科学的还原,不需要淘汰次要科学,正如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中继续使用牛顿物理学而不是爱因斯坦物理学

---

① 见 Nagel 1961, p. 363.

② 这也是奥本海姆和普特南(Oppenheim and Putnam, 1958)基于凯梅尼/奥本海姆还原定义(Kemeny/Oppenheim definition of reduction)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统一(可以通过连续还原的方式来实现一种单一科学的观点)是一个经验论点。对这个论点来说,在各级成功还原的形式中,有足够的事实支持以证明可以把它接受为一种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

③ Nagel 1961, pp. 362 - 363.

所表明的那样。把这些考虑运用到生态环境问题中,我们就可得出结论:追求还原解释,即使原则上是可能的,也不总是处理生态问题最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虽然还原的科学要比被还原科学可能被看作是更基本的,虽然原则上它能解释被还原科学所解释的现象,但在实践中它不太能解决大型和复杂系统的问题——如果理解这个系统中的这些过程,只能依靠对涉及广泛初始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进行漫长和复杂计算的话,或者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个系统中微小部分的详细运作而不是大规模过程的话。在不同的解释“层面”之间进行选择,也需要有一个与生态关怀相关的民主的维度,即针对大众能够理解的生态问题进行辩论。

因此,如果没有切实、偶然的理由,而不是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性问题的话,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可能正确地抵制了过分强调还原性术语解释生态和其他现象。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论戒律与这一评估是大体一致的,并且如有些绿色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他们不应对过于还原主义的和机械的方法负有责任。

### 三、马克思主义与方法

73

环境保护主义者批评马克思方法的一个要素,就是认为他的方法是一个无视或否认现象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机械的社会模式,正如生态科学所强调的那样。例如,卡普拉认为,虽然马克思“深刻地洞悉了所有现象的相互关联”,但这些洞察却与他的技术决定论相抵触。李吉科(Keekok Lee)同样赋予马克思一个“线性模型”,其中“如果经济基础



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原因的话,则后者就不能反过来对前者有任何影响”<sup>①</sup>

然而,这些批评可以表明的是仍停留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种误解,对此恩格斯本人也明确地试图反驳过。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写下的一些信件中,他把自己和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的思想中分离出来,并坚持认为尽管“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这些现象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因此,恩格斯认为“经济状况并不是唯一主动的原因,而其他一切只是被动的结果”。<sup>②</sup>此外,恩格斯自己也批判被那些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所攻击的“机械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批判者的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sup>③</sup>)假设,并且他们对马克思真正方法的无知——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导致了他正在试图纠正的各种误解: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

<sup>①</sup> Capra 1983, pp. 218 - 19; Lee 1989, pp. 54 - 55.

<sup>②</sup> ‘Engels to W. Borgius in Breslau, London, January 25, 1894’, p. 694.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着重点为引者加。另见 ‘Engels to F. Mehring in Berlin, London, July 14, 1893’, p. 691.

<sup>③</sup> 这里所使用的“形而上学的”在一定意义上起源于黑格尔,大体相当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所使用的“机械论的”。

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sup>①</sup>

当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些段落——在1859年序言<sup>②</sup>中最突出——似乎至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的”解释相一致。然而,恩格斯回应说这些段落仅仅反映了他和马克思在与其对手之间的争论中所强调的要点的优先之处,即经济基础在解释历史中的主要作用。<sup>③</sup>他认为,这种片面性在他们对历史的详细分析中是不存在的;如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对工作日长度的讨论:“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① ‘Engels to C. Schmidt in Berlin, London, October 27, 1890’, p. 68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另见《自然辩证法》pp. 173 - 174,其中恩格斯对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解释的回应中所显示的因果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概括:“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 - 328页。)

② 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

③ ‘Engels to J. Bloch in Königsberg, London, September 21 [- 22], 1890’, p. 683.



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sup>①</sup>此外,承认上层建筑的建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事业基础的政治纲领的有机部分,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他们为“无产阶级政治专政”进行的斗争就将是毫无意义的。<sup>②</sup>

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似乎最接近卡普拉以及李吉科的批评模型也否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单向因果关系的观点。科恩(G. A. Cohen)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建否认了上面所引段落中恩格斯使用的辩证法语言,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生产力发展的“解释至上性”。基于这个原因,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科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重建为“机械的”。<sup>③</sup>然而,科恩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功能关系的概念,不仅可以而且需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根据科恩的观点,上层建筑是根据它们是否**支持或妨碍**构成经济基础的经济形式而“被选择的”,而这些形式本身根据它们是否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生兴衰。<sup>④</sup>由于科恩的选择概念建立在马克思自己的阐释(将在下面的第五章中讨论)方式基础之上,即当上层建筑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和政治上层建筑就会被推翻,所以很难看到将“线

75

---

① ‘Engels to C. Schmidt in Berlin, London, October 27, 1890’, p. 68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② 同上。

③ 例如, Sayers 1984, pp. 10 - 11. 参见 Carling 1991, p. 16.

④ 例如, Cohen 1988, p. 10.

性”或单向因果关系模型归之于马克思有什么根据。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的社会模式转到他们明确的方法论声明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与形而上生态学主张的相似之处。在恩格斯晚期的一些著作中，他寻求把他和马克思对社会的阐释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哲学和方法论背景中；尽管他的大部分讨论就如形而上生态学家一样有着同样的含糊不清（在某些情况下被辩证法语言所加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到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有时更为深刻和清晰。

与形而上学比较的第一点，就是恩格斯的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联性相关的辩证法概念：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相互联系的科学”<sup>①</sup>；并认为与“形而上学”相比，它“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sup>②</sup> 如形而上生态学家一样，恩格斯把这种方法与过分强调把自然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的方法进行了对比：

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

<sup>①</sup> *Dialectics of Nature*, p. 26.

<sup>②</sup> *Anti-Dühring*, p. 2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sup>①</sup>

恩格斯把这种分析方法看作科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做法，但如果强调它排斥了更加综合的思维方式的的话，则是有害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与卡普拉的以下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卡普拉把这种技术描述为有用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当把它看成构成一个完整解释的时候，它又是危险的。<sup>②</sup> 卡普拉也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将这种技术扩展至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大成问题。<sup>③</sup>

恩格斯还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还原的解释，即承认这样的可能性：规律性的联系将建立在由“高级”科学和“低级”科学所解释的现象（或“运动形式”）之间，但如果不假定这一点，将使我们能够完全无需高级科学。他批评自然科学家“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这样就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并继续写道：

这绝不是说，每一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

---

① *Anti-Dühring*.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另见同上，p. 28和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pp. 55-56.

② Capra 1983, p. 288.

③ 同上，p. 55.

械(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①

正如它所示意的那样,这一解释和形而上学生态学家一样对过分夸大的还原主义表示了反感,但却似乎表现出与上面的讨论中内格尔对还原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恩格斯对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突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学说的赞同:

如果我们设想,将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恩格斯指出,这一点也适用于有生命的物体,但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那么开头是不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蒸发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么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可以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质完全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

---

① *Dialectics of Nature*, pp. 174 - 17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1页。)



但是分子和它所归属的物体，在质上也是不相同的……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sup>①</sup>

77 在赞同合成物体能拥有与它们的部分截然不同以及不可预测的性质这一想法时，恩格斯就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站在了一起，但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对生物科学来说，在突现性质中没有什么神秘或独特的东西，而且它们在任何一级组织中的存在都是一个经验决定的问题。<sup>②</sup>

我们已经看到，在恩格斯的方法论声明中有很多方面都预示了在如卡普拉这样的生态学家的观点中有效的东西。如上所述，卡普拉自己也认为在马克思“有机的”或“系统的”观点——大体上与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整体观相符合——与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趋势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卡普拉认为，后者是由马克思有意作出的，以提高他的理论的科学可信性，但同他“在‘科学的’数学公式中表达他的思想”的习惯一起，趋向于破坏更大的“有机”图景。<sup>③</sup>

现在仍不清楚，为什么马克思对数学公式的使用应被视为有疑问的。大概卡普拉认为，它将笛卡尔科学的技术应用超出了其合法的领域。然而卡普拉从运用数值方法的科学生态学和量子力学中抽取出了

---

① *Dialectics of Nature*, pp. 28 - 2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3页。)

② 参见 Nagel 1961, pp. 366 - 374; Brennan 1988, pp. 86 - 88.

③ Capra 1983, pp. 216 - 217, 218 - 219.

他的生态学范式,卡普拉的学说并有表明为什么这种方法不应该应用于社会研究。卡普拉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和他的整体主义之间存在矛盾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他发现不仅是恩格斯把他本人和马克思从中分离出来的那种机械图景有问题,而且任何关于技术支配社会的论述都有问题。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的视角,从这种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和技术是同等重要的。然而,这样一种视角显然违反上文所讨论的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也与马克思格格不入。马克思所概述的对方法论原则的考察以及这些原则在他的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表明他的方法的确有一个大致类似于形而上学生态学特性的整体特性,但马克思所支持的那种整体论并不排除存在这样一个因素,而该因素在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行为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中,马克思提出了研究经济学的两种对立方法:

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sup>①</sup> 78

---

<sup>①</sup> *Grundrisse*, p. 10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由此,马克思表明经济学的最高任务不是把整体分解为简单部分,而是为了重建整体的部分的综合,揭示组成其内部结构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对分析进程的需要;在上文中可以看出,他把“个别要素”的鉴别和牢固确立视为综合阶段的先决条件。<sup>①</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中,马克思着手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商品;他考察了商品的内部结构及商品与其他经济要素的关系,以建立起一个整体的图景。但选择商品作为出发点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马克思的前期著作《经济学手稿》的结尾,在货币章和资本章之后,马克思才在标明为“这一篇应补充进去”的一部分中把商品定义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sup>②</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一般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sup>③</sup>,但这个规定只有在我们以特定方式理解了“抽象的”含义时才是准确的。商品并不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抽象物,经验主义的抽象是指从大量不同的对象中析出其共同之处。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

---

① 埃尔斯特(Elster, 1985, pp. 121 - 122)表明了关于马克思对经济“模式”使用的一种类似看法,其中为了促进了解,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被暂时忽略或从背景中除去。埃尔斯特写道,这种“渐次逼近法”(method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使马克思避免了“从卢卡奇起就一直困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早熟的总体化的困境”。

② *Grundrisse*, p. 88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第一”在这种背景下并不表示历史的优先,而是商品是在塑造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资本主义财富形式。

③ Ilyenkov 1982. 另见 Bakhurst 1991。

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sup>①</sup> 换句话说,部分内在地与整体相连。对马克思来说,整体本身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sup>②</sup>,即由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系统。

因此,马克思所描述的科学过程包括在思维中重建具体,来自于现实中的具体被分解成的部分。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为什么把“抽象决定”<sup>79</sup>作为其出发点关系重大呢? 如果所有的经济范畴在具体的整体中都是相互联系的,那么我们能否不以任何一种范畴为开端,并通过探索其相互关系而达成对整体的理解呢? 这样一种回答与卡普拉的在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中没有任何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一致,但马克思对此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范畴的顺序应该由其在经济结构内的相互关系所决定,在这个结构中,一些范畴支配其他范畴。因此之故,马克思反对排列范畴顺序的历史方法,并拒绝了(如黑格尔学派)这样一种提议,即不同的经济形式的顺序出现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这些经济形式相互关系所规定的顺序是一样的: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

① *Grundrisse*, p. 101; 参见 Ilyenkov 1982, p. 7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 *Grundrisse*, p. 10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是生产的主导形式,它把农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工业的一个单纯部门。因此,资本必然在逻辑上领先于地租:

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在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②

在《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对该论点并未作进一步探讨,但后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种类似的推理形式被用于确定资本本身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商品是资本的“基本形式”,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在这一形式中显现出来。③ 正是商品形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

① *Grundrisse*, p. 10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③ *Capital*, vol. I, p. 125.

产生了可能的剩余价值,反过来又产生了可能的利润。若没有商品就无法理解利润,但若没有利润,商品其自身以及在其简单的交换关系中仍是理解的。

我已经指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推进、应用的方法论原则,可以修正后被吸收到形而上生态学家的主要见解之中(如承认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对还原过分狂热的危险)。由于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方法论观点相一致性的一般性问题太大,所以这里就不作考虑了,但为了总结已经说过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两人都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其中包括许多内部关联部分的复杂的“有机”整体,若没有对整体的完整性以及对那些除了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之外便不能存在于现实中的部分使用激烈手段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从思想上把它分解成这种相关联的部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种分析是克服整体的不透明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整体必须通过了解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方式在思想上加以明晰地重建。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导致了把对象视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观点,该系统的性质和发展不是由单一原因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然而,如果一个因素在决定产生相互作用的条件时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该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就可能占主导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由埃尔斯特所提出的马克思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事例的话,这种论点将是不完整的。表面上看,埃尔斯特的论点似乎距离形而上生态学家的关注很遥远,因为他论述的重点不是整体主义本身,而是关于形而上生态学家很少提及的功能性解释问题。然而,正如埃尔斯特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功能性解释——至少在



他发现的最有可能引起异议的形式上——与拒斥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存在联系。<sup>①</sup>

要给予某事物一种功能性解释，就要通过指出它具有某种特定功能来解释它的存在，此处的“功能”被理解为有利于某实体的一个结果。举一个标准的例子，我们也许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指出凹骨便于飞行，有利于增加生存机会和繁殖能力，来说明鸟有凹骨。这样的解释扭转了因果解释的通常模式，即由原因来解释结果。然而，我们发现在该事例中功能性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有一种学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它以因果条件解释了物种是如何获得赋予生殖与生存优势特征的。根据科恩的观点（第五章将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从功能上解释了给定时间内特定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从一组生产关系到另一组生产关系的转变：在任何时候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都将由它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解释。然而，埃尔斯特却认为，这种功能性解释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合法性。

对于为什么否认功能性解释，埃尔斯特提出了不同的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一文中他写道，功能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没有地位，因为不存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类似的社会理论”。<sup>②</sup> 然而，后一主张受到了挑战。<sup>③</sup> 在《理解马克思》(In Making Sense of Marx)一书中，埃尔斯特的

① Elster 1985, pp. 6 - 7.

② Elster 1989, p. 65(1982年第一版)。

③ 例如，见 Van Parijs 1982, pp. 498 - 501。第五章将讨论在科恩的解释隐藏的因果机制以及对它的替代。

论点似乎不是说,不可能具体说明社会科学中支撑功能性解释的因果机制,而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制来支持他对功能性解释的运用;如果提供出这样一个机制(因为它必须使功能性解释具有充分根据),功能性解释就显得多余了。<sup>①</sup>

不管是哪种说明,支撑埃尔斯特对社会科学中功能性解释批判的原则是,只有当功能性解释与因果机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时才是有效的,该因果机制说明了从有利的结论返回到被解释现象的存在。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包含在以下的进一步规定中,即该机制处于个人的层面中;方法论个人主义被界定为“所有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以只涉及个人的方式——他们的财产、目标、信仰及行为——可解释的学说”。<sup>②</sup>正如埃尔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还原主义者的视角,根据个人行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与根据分子对细胞的解释相类似。<sup>③</sup>因此,埃尔斯特的视角似乎与形而上学生态学的视角根本上是相悖的。此外,埃尔斯特从分析转到了阐述,他把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贡献不是定位在他对功能性解释的使用上(根据埃尔斯特这将招致反对),而是定位在由人类个人行为造成的无意识后果所塑造的82  
历史的解释方式上。按照埃尔斯特的观点,这一解释方式与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致的,并且能通过使用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工具进行

① Elster 1985, pp. 28 - 29. 这也是艾伦·卡林(Alan Carling)(1991, pp. 17 - 24)在其对埃尔斯特与科恩争论(the Elster—Cohen controversy)的有益讨论中所采纳的对埃尔斯特的解释。

② Elster 1985, p. 5; 1989, p. 48.

③ Elster 1985, p. 5.



阐述。<sup>①</sup> 因此,埃尔斯特理论看上去在马克思和上述所描述的形而上生态学之间几乎没有留下和解的余地。然而,关于埃尔斯特抵制这一结论的解释还是有一些理由的。

首先,我们可能会拒斥这一观点,即功能性解释总是要求具体说明根本的因果机制,以使其有效。埃尔斯特正确地认为,从对某些现象的有益后果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的解释的一些情况中,区分出功能性解释的真实情况的证据是有必要的。然而,这不需要涉及因果机制的详细说明,因为我们可能有经验性的理由认为这样的机制必须存在,而无需知道它是什么。正如科恩所论证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支持 B 从功能上解释了 A 的说法,即使他不能表明这一机制是什么,如果改为一个人能够指向不论在任何相称的多样情况下 A 都将从功能上解释 B,那么 A 就出现了”。<sup>②</sup> 因此,要解释复合实体以及它们的功能性行为,而不具体说明在个人或任何其他层面上的根本因果机制或许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种可能性对形而上生态学家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因为它仍然保持着这一情况,即根本因果机制的说明给予了功能性更全面、更可靠的解释。

形而上生态学家可能从对支撑埃尔斯特还原主义论点的批判中获得了更多安慰。埃尔斯特给出了在个人层面上寻求解释性机制的两个基本理由。首先,他声称在这一层面上假设的因果关系比那些在更高的集合体层面上所假设的更不易出错,更不可能把解释性关系与偶

---

<sup>①</sup> Elster 1985, 第一章,尤其是 pp. 3 - 4; Elster 1989, 尤其是 pp. 66 - 67。

<sup>②</sup> Cohen 1989, p. 98. 另见 Cohen 1978, ch. 9; cf. Elster 1985, pp. 28 - 29。

然的相互关系混淆起来。其次,他提出在个人层面上提供机制是解释某物的一部分:“要解释就要提供一种**机制**,以打开黑盒子来展示里面的产生总体结果的具体内容”。<sup>①</sup>但是请注意,这些理由只指向了在个人和更高集合体层面上所假设的解释在程度上的不同,而并没有指向前者的任何绝对特权。降低到还原主义的水平上可能会**减少**混淆因果关系与纯粹相互关联的范围<sup>②</sup>,但并没有消除它;当涉及到类别与其他集体实体的解释时,个体的行为和选择本身可能被视为与神经科学在原则上所提供解释有关的“黑盒子”。<sup>③</sup>

在神经功能水平上发现社会进程甚至个体行为的有益解释,是难以置信的。这或许使我们想到了由内格尔提出的观点,即还原到尽可能最低的水平,可能不会永远是最富有成效的研究途径。埃尔斯特承认,“黑盒子”的解释在各种案例中可能比“不成熟的还原主义”更可取,在这些案例中后者有可能产生“无效的和任意的解释”,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决不能作为一种必需品,而只是一种暂时的必要”。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接受总是使更高级别的解释变得多余的微观基础条款。更接近内格尔观点的另一种观点是由约翰·罗默(John Roemer)提出来的,他与埃尔斯特都认为我们需要为如阶级这样的社会现象找到个人层面上的微观基础,但他写道,“用于分析的最有效镜头可能不是具有最高放大倍数功能的,而且由于总是在个体层面上来

---

① Elster 1985, p. 5.

② 但对于相反观点,见 Roberts 1996, p. 22.

③ 关于相关的论点,见 Carling 1991, p. 22.



解决问题,人们可能会失去这种模式”。<sup>①</sup> 对于约翰·罗默来说,在个体层面上的解释不必取代阶级分析,但是却可以“解释为什么阶级是有价值的分析单位”。<sup>②</sup>

#### 四、结论

在这一章我采用了通货紧缩的办法来对待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提出的主张,认为就他们所持有的正确主张,在主要方面相当于因果互联的直接断言,这一因果互联绝不可能被经典物理学或力学原则排除在外。尽管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复杂的互联性可能破灭了按其组成的“原子”来还原地解释它们的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这种解释作为在大部分形而上生态文献中遇到的原则问题。然而,很明显的是,科学家和其他人往往未能充分地意识到生物圈中各部分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形而上生态学家的观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一种有用的启发式功能作用。

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所关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形式,这既表现在他们对社会现象(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也表现在他们的方法论思考与实践。下一章将探讨这表现在他们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阐释中的程度,但为了能提前预知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下面的段落。恩格斯在此列举的有关生态问题的例子有效地说明了低估生态系统不同组成要素在因果上相

---

<sup>①</sup> Roemer 1982, p. 519; 参见 Nagel.

<sup>②</sup> Roemer 1982, p. 513.

互依赖程度的危险性，而人类正是依赖这样的生态系统。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癧症也传播进来了。<sup>①</sup>

恩格斯的例子在一方面已经过时了：它们反映不出由当代许多环境问题所阐明的全球规模的环境相互依存关系，如会污染食品供应和在遥远大陆上引起癌症的放射性排放物，以及排放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或损坏世界另一边臭氧层的气体。然而，所有这些例子所阐明的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一个方面，就是生态问题跨越了科学之间传统划分的界限。恩格斯的例子表明了农业和林业的知识需要与水文学和医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最近的例子把物理和化学与气象学、气候学、生态

---

<sup>①</sup> ‘The Part Played by Natu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p. 36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3 页。)



学等结合在了一起。许多环境研究的交叉学科性质以及对其作出贡献的学科范围,其中包括所有上述的那些以及生物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许多学科,表明了生态问题跨越科学界限的程度。这一点的趋势不是指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一切科学都还原为物理学的科学的统一,而是认可各个学科主题的连续性和交叉性以及允许在一个学科获得的知识可以反馈到另一学科中。

传统科学中由生态问题所连接的最明显的划分以及设计策略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划分的最重要的划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划分。具有破坏人类社会可持续性潜力的严重生态问题的存在,破灭了任何把社会科学视为独立于自然科学的看法;反之,自然科学不仅要考虑人类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而且也要考虑研究该影响的决定因素的社会科学。<sup>①</sup> 由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承认自然条件在塑造社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本身影响那些条件的方式。根据某些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声称要做到这一点的理论,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它做得是否成功。

---

① 回想一下在第一章开头引用的奥德姆描述的生态学日益增长的跨学科性质——它也吸纳了社会科学在内。也考虑一下上文提到的自然科学:水文学、气候学、气象学。

##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中定位社会 86

在第二章中，我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即把自然看作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绝对的限制，因为自然的影响通常会被社会和技术的因素所调节。然而，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自然会产生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的调节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阐述包括他们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不过，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口头上的好听话；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这样的事实，而且还需要把其理论化并吸收进一个政治规划中。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有这样一种理论化的资源，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将通过指明人类所依赖的自然如何构成马克思社会理论有机的中心部分，来进一步讨论这一观点。

### 一、生态学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让我们通过表述这样一个明显的观点开始这一讨论：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人类受非人类的自然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影响非人类的自然。的确，这个关系中的两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我们理解环境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类不受自然的影响，那



么无论是被人类行为还是自然进程导致的自然系统的破坏,都将不会产生环境问题,至少像这些问题通常被理解的那样以及在第一章中被定义的那样。我们确实把某些环境变化看作问题的**事实**,表明了这些变化施加给我们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涉及到从比较狭窄的起作用的影响——例如,大气层中臭氧的流失对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到对荒漠或栖息地的破坏可能会带来对我们的审美或道德敏感性的更加纯粹的影响。但是被广泛认为构成环境问题的是那些对人类的存在具有最深远负面后果的威胁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人类施加影响于自然,那么我们将没有理由害怕人类造成的环境问题,但是同样地我们也将无法防止自然灾害或者改善我们的环境。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是荒谬的,而一个可行的学说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交互关系;无论哪一方,人类和自然,都互为因果。

考虑到许多环保理论家的整体论倾向,特别是他们对存在于复杂和交互的因果关系模式中的整体论形式的支持,我们将期待承认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这个交互性。的确,当代社会的环保批评理论明确考虑了这个关系的两个方面:其一,人类施加于自然的有害影响被分类并受到谴责;其二,它们的可能的不良后果被强调为一个对我们的行为可能引导我们去往何处的致命的警告。然而,后面的这个目标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人类脆弱性的强调,有时会导致一种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片面表述。当代社会因没有给予它对自然依赖的足够重视而受到合理的批评,但是对这种依赖的肯定有时被等同于对人类对自然施加影响的否定。于是人们假定,那些为使人类更强有力的控制自然而努力奋斗的思想家们,如马克思,肯定低估了人类对自然依赖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看法忽视了这样

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构成了格伦德曼对自然的主导地位辩护的基础,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对此有所讨论),即增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努力或许不仅由于意识到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可能出现的生态不良后果而得到强化,而且可能正是由于希望降低该依赖的不良后果——例如缺乏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或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得到促进。<sup>①</sup>

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暗示了一种对自然影响不足的思想在许多绿色环保著作中也是很明显的,这些环保著作具有某种合理性地质疑着解决生态问题的自然和技术的潜力。这种低估人类调控自然的能力的看法似乎与另一个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信条相矛盾,后者坚持认为人类行为在“整个系统”中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只是这是个明显的悖论。它的解决方法在于与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对自然的有意识的改进与和那些无法预料的或者至少不被想望的人类行为的影响之间的区分。无法预料的或者不被想望的人类行为的后果,在某些地方被证明对人类的利益是有害的,可能构成环境问题。因此,一个有生态意识的学说不应该低估人类影响他们环境的能力,但是必须承认在环境干预后面的意图和这些干预的后果之间的差距。<sup>②</sup>

---

① 这个评论构成了格伦德曼对自然的统治的辩护的正确部分;正如第一章中所概述的那样,他的错误在于他对“统治”(domination)的定义和他认为对自然的工具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关系——统治的比喻倾向于暗含着这一点——能够说明隐含其中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

② 无意识的后果可能是知识匮乏(未预见到的后果)的一个结果,或者它们可能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但不是行动意欲达到的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纯粹的坏处可能是由于一种利益(外部因素)的冲突而造成,也可能是因为决策在其中作出的结构从定量方面排除了某些(例如长期的或者非赢利的)考虑因素而造成。



上述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认识如何成为一个理论框架的必要条件,而生态问题在这个框架中才可以被理解。为了把这种理解应用到对马克思思想(或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的考察中,将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用下面的方式加以归类将是有用的。

(1) **生态依赖**的原则说明,人类为了生存而依赖自然,因此无论他们想要做什么都离不开自然,而且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特征会对他们的生活进程造成重要的因果影响。

(2) **生态影响**的原则说明,人类行为会对自然造成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否有计划)。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用这种方式区分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方面时,我是采用了一种被绿色环保主义者批判的类似“机械论”的方法,这一方法在最后一章得到了有保留的支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陈述这些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更易于对马克思及其批判者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的考察。我并不想表明,这两个原则可以互相独立地被理解。的确,我上面指出这样一个观点是荒谬的;我争取表明,与有时人们所假定的相反,这些原则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中能够并且必须共存。

89 被广泛认为更为重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或许可以通过在上面所给出的两个原则基础上增加另一个原则来表达:

(3) **生态包含**的原则说明,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对第三条原则的陈述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不更进一步地详细说

明这个陈述对于前面两个原则来说增加了什么,它就是不清楚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陈述或许涉及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未必相一致的方面。这可能意味着人类这一物种来源于一个早就存在的自然。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一说法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人与自然的当前关系或这种关系含义的任何信息。或许这是一种哲学一元论的陈述,根据这种一元论,**所有事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此外,这种观点对生态问题几乎没有影响,至少在自然的操作性概念得到充实之前。或者更有益的是,它可能断言了人类与其他实体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因果相互作用。然而,关于这种解释,它并没有明确表明人**包括于**自然这种观点,与人类像其他物种一样是**独立的**并对(其他部分的)自然产生**影响**这一主张相差有多远。正如我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事实似乎表明了对象及描述对象的科学的某种连续性。由于第三个原则的含糊性,我将主要关注前两个原则。不过,既然第三个原则在环境问题的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肯定,所以澄清这一原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多大程度的反映将是有价值的。

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生态依赖和生态影响这两个互补性的原则不是完全类似。就因果影响而言,每一方都影响另一方,但是人类对自然的**生存依赖**是一件单方面的事情。外部自然和人类身体都是由物质演化而来,但无论是作为外部自然还是作为人类身体,物质都必定存在,并且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思想的人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有限范围的结构中存在。反过来说,自然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在未来人类消失的情况下也将肯定存在。因此,生态依赖的原则或许可以再细分为(a)**因果依赖**原则和(b)**生存依赖**原则。



90 正如我所已指出的,马克思因忽视生态依赖原则而受到谴责。在下面的部分中我将考察和批评导致这种指控的某些论点。然而,因为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受某些国家(其政府宣称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已造成环境破坏事件披露的推动,并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所强化——即马克思主义对自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任何东西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可说,所以我将通过提供对马克思有所帮助的初步证据开始考察。本质上,这个证据就是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念中的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核心论点,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态问题的适当框架。

## 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马克思把他的历史的理论描述为唯物主义的,但是术语“唯物主义”可以意味着多种不同的含义。在最强的意义上,唯物主义是这样一个观点,即世间所有的存在都是物质的。不过,马克思并未持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正如基思·格雷厄姆(Keith Graham)所指出的,他的商品分析明确地把一个非物质的或者“超自然的”的特性即价值归之于商品<sup>①</sup>。马克思似乎更钟爱一个较弱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即所有存在是或者依赖于物质。但是,尽管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和生态依赖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断言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是一种单方面的生存依赖,但是它太抽象,以至于没有任何直接的生态含义。它对人类所依赖的物质只字不提,因此这与这样一个世界相一致:在这个世界里,

---

<sup>①</sup> Graham 1992, p. 9; cf. *Capital*, vol. I, pp. 128, 149.

每个人的生存依赖于他或她的身体的生存，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物质实体。甚至当人类生存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它对自然现象对人类产生的因果影响也只字不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生态依赖原则是不相关的，因为马克思把他的历史理论描述为唯物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主要转向一个上述所描述的哲学信条，而是转向了一组“唯物主义的”解释性断言——他是从这个一般哲学视角的内部提出了这种断言，但这种断言非与这个一般哲学视角根本相关。<sup>①</sup>正是在这一组解释性断言中，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对生态依赖原则的贡献。

这里要介绍的一位作者是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他预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在1966年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自然的讨论中，他写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应当被理解为

一种对自然优先于思维的认可，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对物理层面优先于生物层面、生物层面优先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认可；在时间优先的意义上(这个很久远的时间发生在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之前和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之间)和自然仍然对人类施加作用并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施加这种作用的意义上是这样的。<sup>②</sup>

① 参见马克思自己在 *Capital*, vol. I, p. 494n 中所说的他的唯物主义方法。

② Timpanaro 1975, p. 34.



在他自己的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中，廷帕纳罗嘲弄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基础的比喻表现了社会的合法性、政体和意识形态依赖于它的经济形式，但是他们反对这些形式对自然前提的依赖。他写到：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位置有时似乎就像一个居住在一所房屋二楼的人的位置，这个人对三楼的房客说：“你认为你是独立的，自己支撑自己的吗？你错了！你的房间能够挺立只是因为它由我的房间支撑着，如果我的房间倒塌了，你的也将同样倒塌”；另一边他对底层的房客说：“你在说什么？你支撑并制约着我？多么可笑的幻觉啊！底层的存在只是以它是二楼的地板为限。或者，严格的说，真正的一楼是第二层，你的房间只是一种地下室，它自己称不上是真正的存在。”<sup>①</sup>

虽然这些段落看起来暗示着认可生态依赖原则和承认人类的生存依赖非人类自然的不均衡性，但是，廷帕纳罗自己并不特别关注生态问题。首先，他所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危险：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察觉到的“唯心主义”倾向可能会激起一种“庸俗唯物主义”和可能的种族主义反应<sup>②</sup>。其次，他关注的是理解一般的人类条件（人类自然）和个别的人类生活的生态决定因素。对廷帕纳罗而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身体

---

<sup>①</sup> Timpanaro 1975, p. 44.

<sup>②</sup> 同上, pp. 13, 17.

伤害”(physical ill),而且不能单纯地将它归因于坏的社会安排,而是因为有一个自主的和难以改变的现实的区域。<sup>①</sup> 廷帕纳罗在这里所攻击的观点与一些人——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企图之间,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点;因为后者责备生态问题仅仅依赖社会条件,而忽视了在任何社会安排下可能会导致产生生态问题的物质因素。或者更通俗一点说,廷帕纳罗再次断言“一个自主的和难以改变的现实的区域”的存在,在今天面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的不精确的断言,仍然是必要的。<sup>②</sup> 这样廷帕纳罗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 92  
“生态学的”解释方向,同时使新近的评论家用更明确的生态术语去发展这种方向,并把这种思想吸收进一个更宽泛的生态阐述方案。

其中一个这样的作者是泰德·本顿,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天然地被认为可作为一个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的生态学方法建议”。<sup>③</sup> 本顿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论题,他相信这两个论题适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角色:首先,它的“自然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人类社会生活独立于自然—给予的物质条件”的观点;其次,“理解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形成中地理变异和历史变迁的关键,

---

① Timpanaro 1975, p. 20.

② 根据这样的言论,许多绿色环保主义者被划入后现代主义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一种认同后现代主义和环境政治之间的紧张状态和试图调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学说,见 Gare 1995。然而,加雷(Gare)的学说最终是不成功的:为使后现代主义与环境政治的要求相兼容,他终结了对大多数“激进”主张(如相对主义,对“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等等的反对)的抛弃。这些主张通常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具有决定性的观点。

③ Benton 1989, p. 55.



通过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而被发现了”。<sup>①</sup> 这两个论题抓住了我所称之为的人类对自然的生存性依赖和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因果影响的含义。

霍华德·L·帕森斯(Howard L. Parsons)同样攻击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否认非人类自然的独立力量”。为支持他的论点他引用了一系列的引文,他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人们生活、劳动和繁衍后代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自然是一种存在,马克思把它适当地描述为人类共同活动的“前提”。通过劳动、物质、气候和其他特征的作用,自然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反过来又被人类的生产所决定。<sup>②</sup>

彼得·狄更斯(Peter Dickens)也认为尽管有些困难,马克思主义还是提供了通向一个绿色环保社会理论的最佳舞台。他写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发展了一门目前所需的对环境问题进行适

---

① Benton 1989, p. 54. 被引用作为这些论题说明的著作是《经济和哲学手稿》(“尽管尚有残余的唯心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哥达纲领批判》。

② Parsons 1977, p. 121. 为支持这个结论所引用的著作是《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以及1853年6月6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件。帕森斯引用了更多内容去说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其他方面:如辩证的自然,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人与自然通过劳动的相互转化,资本主义的影响等等。

当理解的科学的作者。”<sup>①</sup>狄更斯用类似于第三章末尾所提到的方法论的术语表达了社会现象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认为所需要的是克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脑力劳动的分离。这个分离的结果是,到目前为止的、在原则上适应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态学,几乎没有认识到深刻影响**这种物种与它所处环境关系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性别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没有关注自然环境,并且当它不得不探讨环境问题的影响时,它差不多单独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和“文化的”因由上。<sup>②</sup>由狄更斯指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主题,做为提供一个克服这些片面方法的弱点的出发点,包括了人类与其他物种共有的而又有所区别的需要他们身体的物质性。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依赖自然的基础,但是狄更斯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和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评论——“在改变自然的进程中,人类也改变了自己”——以及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调节这种关系的方式。

由本顿、帕森斯和狄更斯提出的观点,并不简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意识到的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即使考虑到他们研究所处的历史背景,这样的评论也是不值得关注的<sup>③</sup>,并且对评估他们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学说的生态意义也只起到有限的作用。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释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而产生的问题的能力,指明马克思

---

① Dickens 1992, p. xiv.

② 同上, pp. 2-6.

③ 马克思主义之前对社会依赖于自然的断言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第二章中论述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和重农学派的土地是所有价值的源泉的观点——这一观点曾被马克思广泛地加以评论。



有关这种依赖的论述形成了他的更大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必要的。虽然本顿和狄更斯(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连贯性表达了有所保留的见解,但是这三位作者都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看作马克思著作的一个中心原则。这样一个立场似乎是可信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依赖的认可是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相联系的,这种依赖被马克思自己描述为他的研究的一个“指导线索”。<sup>①</sup> 我们将简略地考察一下这两种反对意见,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生态的”解释的反对意见,以及对它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起作用的观点的反对意见。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支持这种解释的其中一些文本性证据。

《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许提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理论中对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重要性的最清晰的描述。在这部著作中,他们从在别处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个原则去寻求发展他们的唯物主义解决方法,并把他们的唯物主义与他们早期所支持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比较。在这本书的开始,他们写到: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

---

<sup>①</sup> 1859 Preface, p. 181.

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sup>①</sup>

关于这段文字或许可以做几点评论。对自然的**其余部分**的提及,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相应地,他们视历史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那些研究人类的身体特性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学科的延伸。这是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变得更加明确的经常出现的一个论题,在后期著作中他曾把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相比较。<sup>②</sup> 虽然自然科学的对象本身并没有成为历史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对象,但是它们是人类历史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承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于合理解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这种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面几页的段落中指出生产(被理解为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对自然的改造)是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和不断发展的条件: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

---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4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② 例如,见“1862年1月16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第525页:“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4页。原注有误,马克思的这封信写于1861年1月16日。——译者)参见 Timpanaro 1975, p. 41。另见 Benton 1979, 本顿认为左派之所以未能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科学的最终统一的论题有关。科学统一的论题也出现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第98页里。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sup>①</sup>

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在所有历史阶段共同的生产过程的一般的物质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程所采用的特别的形式之间作了区分。在《经济学手稿》的引论中,马克思对把历史上具体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作“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sup>②</sup>的看法提出了警告,他警告说“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歷史的生产阶段”。<sup>③</sup> 不过,他把对生产的一般特征的研究做为通向理解生产的特殊历史形式的必要阶段,正如他的工作计划所表明的:“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48.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② *Grundrisse*, p. 8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 p. 88.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参见第85页:“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 [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 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sup>①</sup>

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有对生产过程的“一般决定因素”进行单独的研究,但是他确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简短地讨论了这一论题。在这里,他不仅从它的一般的物质特征的角度把生产过程描述为**劳动过程**,而且从它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方面把它描述为**价格稳定过程**。他坚持认为这两个过程对适当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是必要的。<sup>②</sup> 与以上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段落相呼应,马克思把劳动过程描述为:

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sup>③</sup>

因为劳动过程包括了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对非人类的自然物的占有,所以马克思有关永恒的必然性的断言可以被看作暗示了人类的生存依赖 96

① *Grundrisse*, p. 108。(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②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Capital*, vol. I, p. 293。(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③ 同上,p. 290。(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于非人类的自然(生存依赖原则)。

在这一章的稍后,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何被用来支持由前面的材料所显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不同的解释。然而,在《序言》所来自的那个完整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以下段落: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sup>①</sup>

这里,马克思再次肯定了人类对劳动过程的永恒的依赖以及自然“元素”或“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后面这一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一次被强调,这回应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回复到“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

---

<sup>①</sup>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3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动力的表现”。<sup>①</sup>

到目前为止,所用的引文都是来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以后的著作。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先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年或更早,并不被认为是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不过,它们被一些作者看作是马克思的最具生态意义的著作。下一部分我将考察针对马克思著作分期的各种不同观点,因为马克思著作的分期被应用到了生态问题上;然而,现在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著作中发现的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依赖性部分的概念,已经蕴含在了一个《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被广泛引用的一个段落:“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sup>②</sup>

上面所引用的来自马克思最重要的一些著作中的段落,似乎显示出他对生存依赖原则的明确认同。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以我称之为生态包含原则的术语表达出来。

①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 31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这里马克思再次重申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38页中所提出的论点,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通过同时对所有财富——土地和工人”的最初源泉的消耗才会发展。

②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6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马克思也把自然写作工人的“生活手段”(同上,p. 64,在下面的第六章将会引用,见本书第153页注②),把人写作一个对存在于他之外和独立于他的事物有所需求的肉体的和有条件的自然存在(p. 136)。另见 p. 98 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最终统一。



稍后的段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继续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但是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是表达和强调的问题(或许回应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陈述到一个更加具体的对人和非人的自然之间的特定的互动分析的转移),而不是观点的根本改变,因为人类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观点在所引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段落中再次出现。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存的物质先决条件的知识对理解社会是必要的事实,再次显示出对自然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因果影响的认可,即使在人类生存的条件一旦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因果影响的原则)。不过,批评家们认为马克思对生态依赖原则的贡献,正如引文所显示的,既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保持一致,也不是他著作的中心论题。现在我转向这些反对意见。

### 三、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一个生态学上的断裂?

环境评论家经常感觉到,无论马克思关于人和外部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观点,他都会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以这些观点为中心,而在晚期的著作中却放弃或者忘记了这些观点。

例如,弗里特乔夫·卡普拉赞许地引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然描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段落。他也从相同的著作中(虽然如上面所说明的那样,他同样可以引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之一)加以引用以证明对马克思来说,自然和劳动一样对生产过程是必不可少。<sup>①</sup>卡普拉确实引用了《资本论》的一段文字来证明马克思意识

---

<sup>①</sup> Capra 1983, p. 216.

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影响,但是一般而言,他对马克思的晚期经济学著作中对科学性的追求提出了批评,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观,不论其所理解的“技术决定论是什么,都使马克思的理论更容易被作为一门科学接受”。<sup>①</sup>

同样地,唐纳德·C·李(Donald C. Lee)通过为以马克思1845年以前著作的中心论点为前提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寻求“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向一个这样的位置,这个位置高于他们所陷于的过时的19世纪的世界观”<sup>②</sup>。他写到:“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贪婪的、暴力的和破坏自然的,除非通过该人道主义的观点改造它们。”<sup>③</sup>

正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彼得·狄更斯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接近生态社会理论的,并支持这种分期法的更加细致的一种形式。尽管狄更斯没有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放弃了他认为的在他们早期著作中的生态论题,并且坚持认为这些论题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异化和盲信——继续被沿用到他们以后的著作中,但他认为晚期著作没有能够发展他们早期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sup>④</sup> 鲁道夫·巴罗(Rudolph Bahro)对此采取了一种类似的立场:

对于年轻的马克思来说,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正好促进了自然和文化的和解。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之间

---

① Capra 1983, pp. 218 - 219.

② Lee 1982, p. 341.

③ Lee 1980, p. 4.

④ Dickens 1992, p. xiv.



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还没有严重到让马克思把其置于他的分析中心的位置。后来,这个观点更多地脱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范围,因为他把注意力紧紧放在更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关系的分析上,即分析那时妨碍劳动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sup>①</sup>

一般地来说,马克思思想中的连续和变化的问题太大、太复杂,以至于在这里难以考虑。至于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某些具有生态意义的论题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更为显著。这将在第六章对马克思人类需要概念的讨论中清晰可见。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对生态依赖原则的坚持这一更加具体的问题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依赖部分的概念贯穿于他在成熟期的主要著作中:  
99 从1846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的详尽阐述,经过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直至1875年他的经济学著作。因此,认为马克思放弃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的观点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虽然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个框架中所起的作用仍有待考察。

一些作者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主张只有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才能发现对自然作用的正确认识。例如,廷帕纳罗就写道:“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一种对社会—经济水平具有高于法律、政治和文化现象的至高无上地位的肯定以及一种对经济的历史性的肯定。”<sup>②</sup>换句话说,早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是简单地对历史哲学中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否

---

<sup>①</sup> Bahro 1982, p. 30.

<sup>②</sup> Timpanaro 1975, p. 40;着重符号有所改变。

定,这个传统肯定了“精神高于任何经济结构的至高无上性”。相比较而言,“成熟的马克思——他钦佩达尔文并想把《资本论》的第二卷献给他,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宣称他‘把社会的进化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肯定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候的马克思更唯物主义得多。”<sup>①</sup>

马克思的观点随着早期与黑格尔哲学的一致性渐离渐远而变得更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肯定是可信的。考虑到这个渊源以及上面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他的成熟著作中信奉生态依赖原则的证据,廷帕纳罗式的分期或许看起来比卡普拉和其他人所提议的分期更为可信。如果把我们的兴趣限定在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中,我们就能接受廷帕纳罗的观点,并会认为只有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包含了生态依赖的原则。然而,我并不相信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比是那样刻板。在第六章,我将表明马克思早期著作所发展的人类自然与人类需要理论在评估他的成熟理论的生态影响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不过,目前注意到上面所引用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段落,证明了甚至在所谓的他的思维发展“断裂”之前,马克思对作为他具有创造性地理解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的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认可。他用来表达这种依赖的术语也表明了前期著作与后期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

倘若这种连续性是存在的,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有人会认为马克思在早期或后期著作中忽略了或放弃了生态依赖原则?我相信,<sup>100</sup>答案将在这些著作的其他特征中找到,这些著作被许多马克思环境

<sup>①</sup> Timpanaro 1975, p. 41.



批评家认为与生态依赖原则相反,因此这又使这些批评家忽视或误解了在这些著作中可找到暗示这一原则的论点。在这些所谓的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反生态特征的更为重要的观点是生产力发展观点(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经济形式观点和给予这些形式与生态问题和其他问题相关的解释作用。我们从以上论述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并不必然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相矛盾,并且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改变是社会的一个生态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马克思发展生产力论述的评价必须有所保留,下面的章节我将回到这个话题。同样,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看到那些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现的对人类依赖自然的忽略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对马克思那些著作中所说的关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解释,他们将其解释为与那种依赖不相兼容。

#### 四、发展能动的一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自己的唯物主义与先前类型的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不同。他们认为主要的区别特征在于他们给予人类**改变自然**的关注:

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他没有看到,他

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sup>①</sup>

在批评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能动性时,马克思认为自己赋予了唯物主义迄今为止“被唯心主义发展”的“能动的方面”。<sup>②</sup> 不过,一些作者抓住这个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以建构一个根本上很难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并显然明确地反对生态依赖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sup>101</sup>

廷帕纳罗为唯物主义辩护时直接指向的就是这样的作者。廷帕纳罗称这样的作者为“左翼—唯心主义者”,并指出,虽然他们的唯心主义可能是一种伪装的唯心主义,他们依据“实践”而非“思想”来表达自然的社会建构,但术语的改变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区别;无论用什么术语,他们都否定了独立于人类的自然的存在,廷帕纳罗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他认为,“左翼—唯心主义者”不可能认识到有意识的存在可能依赖于外部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外部世界本身仅仅是他们的思想的内容。<sup>③</sup>

一个清晰地举例说明这个观点的作者是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他否认马克思有任何关于人类自然或者并非社会构成的外部自然的观念,并抱怨马克思“缺乏对人类存在的自然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6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

② *Theses on Feuerbach*, p. 28.

③ Timpanaro 1975, p. 101.



(与经济截然相反)条件的兴趣,他的世界观中也缺乏肉体的人类存在。人类完全被用一种纯粹的社会术语来定义;人的存在的身体限制很少被注意。”<sup>①</sup>

根据以前所引用的一些段落,这个断言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那些段落中,马克思强调了克拉科夫斯基指责马克思忽视的那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正如廷帕纳罗所指出的:克拉科夫斯基把在那些段落中马克思提到的自然或物质世界解释为完全是一种人类意识的产物。这样,克拉科夫斯基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事物的存在“与它们在人类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同时产生的”<sup>②</sup>,并且“马克思的观点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然是人类的一种延伸,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器官”。<sup>③</sup>但是,尽管这些观点在这一节开头所引用段落中明确地找到了根源,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强调了人类能动的变革力量,但是这些段落中没有只字片语暗示对由克拉科夫斯基所断言的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现实的否定。

一个更自然的并且更符合马克思人类依赖自然的断言的解读,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存在着一个人类所依赖的早已存在的物质现实,这个早已存在的物质现实限制了人类的意识并约束了人类的行为。这形成了人类存在的物质“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前提被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所忽视。第二,被该现实所限制和约束的人类活动,深刻地

102

① Kolakowski 1978, pp. 412 - 413.

② Kolakowski 1969, p. 69.

③ Kolakowski 1978, p. 401.

改变了这个现实。所以人类在其中发现自身的条件,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sup>①</sup> 第三,人类的能动作用依然受这种作用运行于其中的环境的限制和约束,并依赖于外部现实;因此马克思认为对外部现实的占用成为所有历史的一个“根本的”或者“普遍的”条件。<sup>②</sup> 确实,马克思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中<sup>③</sup>强调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而不是它的前提或者限制,但是这是对他所看作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弱点的反驳:它倾向于把人看作他们所处环境的消极产物以及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sup>④</sup>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别的地方,马克思选择强调这一关系的另一面。

被廷帕纳罗标明为“左翼-唯心主义者”的另一个评论家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尽管实际上施密特在克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解释和上面提到的更传统的解释之间摇摆。<sup>⑤</sup> 大卫·希勒尔·鲁宾(David-Hillel Ruben)给出了一个施密特的“唯心主

---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6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② 见上面第136页注和第137页注。

③ 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0-64页。

④ *Theses on Feuerbach*, p. 28.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9页中评论道,“正如人改造环境一样,环境也改造着人”,这个评论本质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只是颠倒了重点。马克思的格言也在另一种语境下表达了能动和约束的共同存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p. 9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⑤ Schmidt 1971.



义行话”的详细目录,其中的一些例子足够说明问题。<sup>①</sup> 在这些例子中最明显的是这样一些论点:“物质现实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调节的”,“自然历史是人类历史向后的延伸”以及“物质必须表现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范畴”。<sup>②</sup> 这样的短语的出现保证了廷帕纳罗的标签;然而,廷帕纳罗忽视了施密特著作中表现出的其他方面的不同解释。

施密特的目标之一类似于我所一直追求的目标——追求指明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活动自始至终都依赖于自然。因此,他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的社会调节证实了它的优先性而不是废除它”;  
103 “人类的目标可以通过运用自然进程而得以实现,尽管不是因为自然规律而恰恰是因为自然的物质实体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并且反过来,能够得到实现的这些目标不只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而且还同样受到物质自身所固有的可能性”的制约。<sup>③</sup> 他解释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确实不否认“物质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它自己的运动”,但是认为“物质运动的规律只能被人们借助调节实践的能动性来认识和恰当地应用”。<sup>④</sup>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可以被改变但不能被废除”,因此“在必然性的基础上调和自由与必然”;最后,他“坚持在

---

① Ruben 1979, pp. 83 - 85.

② Schmidt 1971, pp. 35, 46, 32.

③ 同上, pp. 96, 63.

④ 同上, p. 97. 为了支持这一点,施密特引用了马克思的评论(在他 1868 年 7 月 11 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0 页。)这种规律借以实现自身的形式的变化,大体上是指人们应用它们的方式的变化。

《资本论》中不同的地方都指出,劳动永远不能被废除”。<sup>①</sup> 所有这些都与上面提到的所谓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的”段落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相一致,与生态依赖的原则相一致。

但是,如果施密特著作的主要倾向是与生态依赖原则相一致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那么是什么构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语言? 鲁宾指出,像施密特所用的那些短语除了它们的明显的唯心主义意义外,还可以在一种更弱或许更不重要的意义上来解释。例如,施密特的“自然历史是人类历史的向后延伸”观点,就可以被简单的解释为这样一个断言,即:“除非一个人先假设人类历史,否则将不可能谈论自然历史,因为没有人类,一切将无从谈起。”<sup>②</sup>鲁宾也注意到,“在一个宽泛和明显的意义上,任何范畴都是社会的。”如果这就是施密特所说的“物质必须表现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范畴”的含义,那么这是一个“真实但相当枯燥”的观点。<sup>③</sup> 这些稍弱的解释可以被描述为传统唯心主义语言的认识论用法而不是本体论用法,因为其中蕴含的主观上的因素被断言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或交流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然而,尽管至少可以以此方式捍卫施密特的一些“唯心主义的”措辞,但它们显现出的总体风格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正如施密特自己表示愿意接受的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与这里所支持的“生态的”解释不相一致的解读是对他的原文最可信服的理解。

---

① Schmidt 1971, pp. 76, 136. 另见 p. 71。

② Ruben 1979, p. 85.

③ 同上, p. 84。



## 104 五、生产主义与劳动过程：本顿的批判

如克拉科夫斯基和施密特(不是很明确)一样的评论者把马克思描述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与前面所提到的泰德·本顿认为作为人类依赖自然的一种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矛盾。然而,如早些时候我们所注意到的,本顿自己质疑马克思在运用这个唯物主义视角过程中的一致性。根据本顿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所脱节,这种脱节并不在他们的前期和后期的著作之间,而是在他们的“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和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中“有一个从[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重要的后退”)之间的脱节。<sup>①</sup> 本顿批判的核心是关于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范畴无法明确说明经济过程依赖生态因素的完整程度的断言。

这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奇怪的断言,因为这些范畴是在《资本论》的第七章中所阐述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马克思在那里把生产过程的物质方面描述为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然而,本顿认为,描述劳动过程的关键概念“包含一系列相关的更有影响、但不精确并有缺陷的系统,最后的结果是使得理论不能充分地使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与自然互动的生态条件和生态限制概念化”。<sup>②</sup>

---

① Benton 1989, p. 55.

② Benton 1989, p. 63.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描述涉及到包含三个要素的分类：“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①</sup>劳动对象被进一步划分为他所称之为的“原料”——这是先前劳动过程的结果<sup>②</sup>——与“天然存在的”东西。原料被进一步分为构成一件产品“主要实体”的部分与“辅助材料”。后者包括诸如生产工具所使用的燃料和机油一类的物质，诸如颜料和加在铁上的煤之类的材料——这些物质加入原料“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以及用来“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的物质，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sup>③</sup>

和劳动对象一样，**劳动资料**包括人造工具和天然工具。马克思把 105劳动资料定义为：“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sup>④</sup>在最简单的劳动活动中，例如采集果实，人的肢臂可以被当作是劳动资料。石块和其他自然物品在人类早期作为劳动资料发挥着作用。然而，“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在农业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发挥着作用，但是它只被作为先前劳动对它进行改造的一个结果：“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

① *Capital*, vol. I, p. 284.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2 页。)

② 因此，马克思所使用的“原料”(raw materials)的意义要比标准英语的意义狭窄，并且有点与直觉背道而驰。

③ *Capital*, vol. I, p. 288.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6 页。)

④ 同上，p. 285.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3 页。)



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马克思也包括了在“广义上的”作为生产资料的物品，它们并不直接作为人类活动的传导者，而是“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sup>①</sup> 像更狭隘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则可以是天然的或者是人工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sup>②</sup>

本顿对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批判主要由两个鲜明的观点构成。首先，他认为马克思的概念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假设了一个“意向的结构”，这个结构只应用于一种宽泛的、他称之为“生产性的”<sup>③</sup>或者“改造性的”劳动过程。其他劳动过程，即“生态控制”（农业和相似的过程）和“主要的占用”，有着让它们特别依赖环境条件的特点，并且他宣称，这些类型的劳动过程不能被“生产性的”劳动过程所包容。本顿的第二个观点是，即使“生产性的”劳动过程有着具有生态重要性的特点，但是它们被排除在马克思的论述之外。

本顿列出了生态控制的四个特点和主要的占用的两个特点，他宣

---

① *Capital*, vol. I, p. 286.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5 页。)

② 同上，pp. 286 - 287.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5 页。)

③ 因此，本顿比马克思在更狭隘的意义上使用术语“生产性的”，我将这个意义上的“生产性的”用引号来标明。马克思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定义生产劳动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Capital*, vol. I, p. 287)。这个定义包括了“生态控制”和“主要占用”的过程，本顿对生产劳动概念的定义与此相反。

称这些都不被“生产性的”劳动活动所分享并且不能被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所解释。<sup>①</sup> (1) 在生态控制中,劳动是被应用到劳动“条件”上而不是原料上。(本顿用“条件”或“环境条件”来指马克思在更广泛意义上所说的劳动资料——也就是指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但不直接把人的活动“传导”给它的对象)。(2) 这种劳动维持、调节和再生产而不是改变它所操作的材料(如像土地)。(3) 这种劳动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强烈地受它的环境条件以及“有机发展过程节奏”的影响。(4) 最后,自然所给的条件“扮演着劳动过程的条件和劳动[对象]的角色”,由此形成了一个“不易同化于马克思三分法”的范畴。<sup>②</sup>

然而,我的论点是,这些特点并不是生态控制所特有的,并且它们可以被马克思的概念框架所吸收。本顿有关在生态控制中劳动不是主要应用于原料的断言具有误导性,因为在所有种类的劳动过程中劳动不被直接用于原料而是生产资料是很平常的。更具体地说,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劳动应用在本顿所称之为的环境条件和马克思所称之为的广义上的生产资料上是很普遍的:如建筑、基础设施等等。这里,我们也发现劳动直接指向保持或维持而不是改变。(当然工业生产中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可能被认为比在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更少自然性”,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断言并为本顿所承认的,农业系统自身包含

---

<sup>①</sup> Benton 1989, pp. 67 - 68.

<sup>②</sup> 在(4)中,我把本顿的劳动的“主体”更改为劳动的“对象”,以使它与马克思先前的劳动过程概念的阐述中所常用的译文相一致。本顿来自伦敦 1961 版的《资本论》的术语容易具有误导性,主要在有关“主体”的解释上。劳动的主体应当是进行劳动的那个人。参见 Cohen 1978, p. 38。



着自然系统的重大改进,农业系统就是从自然系统中派生出来的。)①

107 相似地,劳动过程的时间安排和地点选择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可能在农业中比在制造业中更为显著,但是在后者中也会有影响。例如,一个工厂的选址,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它可能将取决于原料的远近②;并且如果这些原料是季节性的(正如这样一种情况,农业劳动过程的一种产品为一个“生产性的”劳动过程提供原料),那么生产的安排很有可能受到影响。③ 在某些时段和(或)某些地区,“生产性”劳动过程也可能直接受气候条件影响到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很高的程度。在任何劳动过程都依赖于气候或其他自然条件的程度上,这些条件就成为马克思的分类中广义上的劳动资料。

最后,马克思在他的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中明确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自然给予的条件既可以作为劳动的条件也可以作为劳动的对象。他写道,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因此,“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源,又充当原料”。④

本顿所确认的主要劳动过程中的典型的特征也易于受到相似的批判。首先,本顿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一种天然材料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被完全描述为“天然的材料通过一种形式上的变

---

① *Capital*, vol. I, p. 285 (见本书第 152 页注①); Benton 1989, pp. 66 - 67; Benton 1992, p. 61.

② 这里以及下面内容中,我用的是在日常英语意义上的“原料”,相当于马克思的“劳动对象”。见本书第 153 页注②。

③ 这一点出现在 *Capital*, vol. III, p. 213.

④ *Capital*, vol. I, p. 288.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6 页。)

化而适应于人类的需要”。<sup>①</sup> 这取决于对“形式上的变化”的狭隘解释，并且本顿没有对他的这一假设作出解释，即马克思对这个短语的应用排除了“选择、提取和重置自然环境中的元素”。的确，这些过程以及各种不同的经过挑选和提取的部分的综合是“生产性”劳动过程的全部元素。其次，本顿认为，主要的劳动过程与生态控制一起依赖于自然所给予的外部条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所有的劳动过程都会有的依赖，只是依赖的程度不同而已。

本顿写道，“生态控制和生产性实践之间的差异程度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过程概念不完善的一个尺度”。<sup>②</sup> 然而，上面的论证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本顿所认为的那样严重。本顿所列举的作为生态控制和主要占用的特色是所有劳动过程程度不同地拥有的特征，并且可能已被包括在马克思的描述中。本顿可能会回复到，这忽视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过程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的不同。然而这样一个反对意见对一个概括性的概念未免要求过高。就其本性而言，一个概括性概念不必明确说明它所应用于的各种对象之间的差异，虽然它也没有暗示这样的差异是不重要的。马克思并没有宣称，他的“具有简单和抽象要素”的劳动过程概念，构成了一个对劳动过程的客观特征的详尽描述，或者构成一个满足所有目的的描述；确实，他在《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不仅是从所有的历史时期中抽象出来的，也是从所

108

① Benton 1989, p. 69, 引自《资本论》第一卷, 伦敦, 1961 年版。在企鹅/新左派评论版中, 与这里引用的话语等同的话语出现在第 287 页。

② 同上, p. 67。



有的生产部门中抽象出来的，它提取出了“共同的要素”，但是忽略了表现特殊情况特征差异。<sup>①</sup>

本顿批判的第二个部分是，甚至就“生产性的”劳动过程而言，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描述也是不充分的。他声称需要三点修正：

首先，应当将环境条件从劳动资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看作“初始条件”的一个独立的类。第二，应当包含这些环境条件对生产的可持续性的持续相关性，就和包含生态控制实践一样。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它可能会使终止这些条件的自发满足成为可能，所以需要恢复或保持环境条件的辅助性劳动过程以实现生产的可持续性……。第三，劳动过程的操作所导致的自然调节的无意识后果，可能妨碍到它的环境条件和/或原料的持续存在或者再生。<sup>②</sup>

很明显，从一个环境的视角来看，考察本顿所称之为的“环境条件”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是有必要的。正如本顿所做的，把一个单独的因素应用到劳动过程中的这个要素里，可能会比较合适。但是，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这些“广义上的”劳动资料和狭义上的劳动资料。在强调这些条件“不能被可信地当作劳动者活动的‘传导器’”这一点上，本顿重复了马克思自己对这个区别的描述。<sup>③</sup>

---

① *Grundrisse*, pp. 85–86.

② Benton 1989, p. 73.

③ 同上, p. 72; 参见 *Capital*, vol. I, p. 286.

必须承认这些条件可能不再被满足的这一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对生产的可持续性的影响。但是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的描述中没有什么内容是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地方所做的观察确实表明，他们承认不仅这是个可能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性。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由于它把人口聚集在城市中心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sup>①</sup>

在上面所引的一个段落中，恩格斯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担忧：生产活动可能对它的自然基础造成的无意识影响。他警告，我们不应该“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

---

<sup>①</sup> *Capital*, vol. I, pp. 637 - 638.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 - 553页。)另见 vol. III, pp. 949 - 950。在那里，马克思写到了土地的自然肥力和活力的“滥用”、“开发”、“荒废”、“毁灭”和“枯竭”。



消除了。”<sup>①</sup>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承认了人类生产的环境条件可能不再被满足，而且也承认了这种情况可能通过生产活动自身的无意识后果而引发。因此这个无意识后果的范畴或许可以添加到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论述中，而不违背他或恩格斯的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例子也在两种意义上表明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是无意识的：由于知识的缺乏，它可能不被行为者所预见，或者它可能不在行为者的考虑范围内。无论哪一种方式，它都是在这些（或可能取代）成为行为者进行生产活动的诱因的、可预测后果之外发生的事件。本顿解释这些事件是作为“剩余的”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被超越它们的劳动过程的成分所拥有，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劳动过程的成分得以发挥它们的有意识的功能。<sup>②</sup>这是把某一种类的环境问题概念化的有用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易于被合并到马克思把劳动过程作为一个他的观察的简单推断中，即“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sup>③</sup>

110 总之，本顿并没有表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概念使环境问题变得“不可想象”，或者这个概念标志着对他的人类依赖自然认可的背叛，他只表明为了使不论是在劳动过程自身的论述中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都内含的重要论点得到更加清晰的理解，对劳动过程概述进行细微的修改是必要的。

---

①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pp. 361 - 36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3 页。)

② Benton 1989, p. 73.

③ *Capital*, vol. I, p. 288.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6 页。)

## 六、生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莱克本的批判

和本顿一样,另一个评论者批评马克思太狭隘的关注生产活动并且不能充分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的是理查德·詹姆斯·布莱克本(Richard James Blackburn)。然而,对于布莱克本来说,这些缺点不在于马克思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中,而在于它的基本解释取向。根据布莱克本的看法,马克思只是提供了部分遵从“唯物主义”承诺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作用的强调如同在解释社会变革中一样重要,但同时忽略了对具有同样甚至更大要求的被包念在一个唯物主义解释中的其他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包含了强调物质生产而不是文化生产是历史变化中最终的解释因素。但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种类型的最终的经济解释应该被认为比集中于物质破坏及其避免问题上的军事解释更是唯物主义的,或者为什么经济解释或军事解释应该比一个地理学上的解释甚至人口统计学上的解释更是唯物主义的。<sup>①</sup>

根据布莱克本的观点,马克思的论述中所缺失的因素,基本是那些地缘政治学竞争范式探讨的因素。<sup>②</sup> 然而,地缘政治学集中关注的是社会

---

① Blackburn 1990, p. 13.

② 同上, p. 1. 布莱克本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一门研究历史地理学、地理经济学和历史统计学对政治尤其是一国的外交关系的直接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的学科”。(同上, p. 9.)



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以及它们所处的地理上和历史上变动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塑造社会群体的方式,忽视了财产制度、阶级结构等等的内部动力,而这些因素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的发展。<sup>①</sup> 因此,布莱克本建议,我们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地缘政治学的综合。<sup>②</sup>

布莱克本把马克思的“生产主义”看作表明了他与黑格尔共有一个更普遍的狭隘视角。布莱克本认为,历史包含着一个创造和破坏的辩证法,但是马克思和黑格尔过分强调创造,只把破坏作为一种产生于建设性环节本身的矛盾的次要的现象来认识。<sup>③</sup> 相比之下,一个合理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要关注来自外部的作用于社会的破坏性力量。111 这些破坏性力量包括自然造成的破坏,既包括自然性灾害,如地震、沙漠化的缓慢进程以及类似的灾难、流行性疾病和缓慢但持续不断的熵衰退进程,也包括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的以战争、征服等等形式进行的破坏。因此一个唯物主义理论应该承认,对这些破坏性力量的抵制——通过包括军事力量、药物和生物控制的手段——如马克思强调的物质需求的生产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生存的前提条件。<sup>④</sup>

作为一种生态性批判,布莱克本的思想可能被认为具有误导性,因为人类面对的许多生态问题,作为他们生产活动的无意识后果而不是

---

① Blackburn 1990, p. 12.

② 同上,第三章。

③ 同上,pp. 2, 13.

④ 同上,pp. 2-3.

自然的破坏性的天然后果，确实产生于人类创造性地干预自然。<sup>①</sup> 甚至所谓的“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和飓风，正通过全球变暖的机制而与人类活动日益密切相关。不过，布莱克本对自然的这些破坏性力量的强调可能是受欢迎的，因为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破坏性力量。在这些例子中，自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并没有人类的协助，甚至就人类活动确实导致生态问题而言，这也经常是促进或引发已经存在的力量的问题，而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问题。<sup>②</sup> 不过，问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否如布莱克本所表明的那样对自然的这种破坏力视而不见呢？

在本节的开始所引用的段落中，布莱克本表明，依据生产的历史发展解释，不比关注军事力量的解释更为唯物主义，并且也不比关注人口统计学和地理学的解释更为唯物主义。对布莱克本来说，关于军国主义的观点是，生产不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在面临来自其他社会的威胁时，保卫已有的生产产品也是必要的。不过，马克思有可信服的理由认为生产是更根本的。首先，因为，尽管军国主义可能会对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产生一个影响力，但是它并不和生产一样，是**所有可能**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因为军事行动的后果和意义将取决于卷入其中的社

112

- 
- ① 然而，请回忆在第一章中，我避免了把由人的活动引起的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必要条件。
- ② 地震和火山爆发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破坏力量而人类干预不起引发性作用的事例。另一个近来讨论很多的（潜在的）事例是陨石对地球的影响。飓风和洪水提供了经常对人类造成破坏性影响但是可能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变得更加频繁的自然现象的事例。同样地，传染性疾病是一个自然现象，但它可能是由人口集中、流动性和恶劣的公共卫生设施的激发而发生。



会的生产力性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后者所表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应该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或建设性的事业，还应该被看作一种减少布莱克本所强调的外部破坏性力量的一种手段。

军国主义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其他社会的破坏性影响问题)在这里可能是一个单面问题,但是涉及到自然的破坏性力量,同样的观点也会被提出来。布莱克本批评马克思把注意力放在**短缺**上,因为他太过悲观地设想自然的困境——就它在尽可能慷慨的提供给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方面的失败而言,而不是它的活跃性的破坏性力量方面而言。<sup>①</sup> 不过,布莱克本自己的观察回应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物质需求本身产生于生物有机体面对熵性质的分解性力量时而为维持自身所进行的斗争中。<sup>②</sup> 如果对食物、衣物、住所等等的需求被认为是自然的破坏性的后果,那么对那种破坏性的认可已经隐含在对短缺的描述中;生产,被马克思视为对这种短缺的回应,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避免或者纠正这些破坏性力量的影响的意图。<sup>③</sup> 因此,布莱克本对自然的破坏性的强调不应该被认为与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相矛盾,而是详细叙述了(比马克思更充分)使生产活动成为必要的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这些条件描述为书写历史

---

① Blackburn 1990, pp. 16 - 17.

② 同上, p. 18.

③ 马克思对表现人类生产活动方面的**创造力**的强调,并不是有意要否认这样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关于他们的自然环境现实的一种**反应**;相反,这种强调意在突出人类和其他动物回应自然困境的**方式**上的差别——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差异对于马克思解释,为什么不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有一个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的“自然基础”，虽然这已超出了研究的范围之外。<sup>①</sup>

布莱克本也写到，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比经济生产或者军国主义，对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描述更重要，因为它们“涉及到物质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于任何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无生命的自然以及动物和人口的局部的配置”。<sup>②</sup>“物质的形式”或者“自然的配置”的观点位于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心的观点，或许又将再次被合理地 113 吸纳进马克思有关人类的身体特性和他们的环境构成了历史探究的“自然基础”的观点之中。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马克思认为人口统计学受社会影响，因此不能像马尔萨斯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纯粹的自然决定因素。像环境的其他元素一样，动物数量也会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因此，在唯物主义的歷史解释中，人口或动物统计（比如说，与它们的生物学相反）应该被认为比生产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明确。

这就剩下地理学了。对历史的一个地理学的解释大概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式上。这就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当本顿写到社会的地理变化正像它们的历史变迁一样，可以依据它们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时，本顿认为这样的—个解释是马克思提出的。<sup>③</sup> 相似地，普列汉诺夫在写到“生产力（就其自身而言，生产力最终还是决定着所有社会关系的发展）的发展本身主要取决

---

① 见本书第 135 页注②。

② Blackburn 1990, pp. 13 - 14.

③ 见本书第 132 页注①。



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时<sup>①</sup>，他把地理学的解释吸收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不过，布莱克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这样的解释。他声称，它的错误是把地理学当作一个常量，当作“背景中的噪音”，而实际上它是变化的，“它的影响能以决定性的方式使社会发展的进程脱离常规”。<sup>②</sup>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焦点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依赖于自然（虽然布莱克本对自然的破坏性方面的强调是为了表明，人类在这一方面比许多人包括马克思所承认的更脆弱），而是人类社会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被地理变化所塑造的程度。很难去评估马克思是否低估了这种影响，但是（尽管关于“背景中的噪音”的论点）他肯定地承认这样的影响是存在的，并且可能是重要的。如果生产过程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所暗示的方式依赖于自然条件，那么这个过程的特点将受这些条件变化的影响。生产率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收益率将受原料的获得、适当的“环境条件”的存在等等的影114 响。<sup>③</sup> 这样的因素将不仅影响着特殊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也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群体经历技术进步的习性，而技术进步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进步的条件。马克思注意到，一方面，困难的物质条件会阻碍社会发展，正如在亚洲社会中，对维持大规模灌溉系统的需要导致了一个劳动的僵化的分工

① Plekhanov 1937, p. 36. 另见 p. 32.

② Blackburn 1990, pp. 14 - 15.

③ 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Capital*, vol. I, p. 648）（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1 页。）

和私人所有制的缺乏,这些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另一方面,发展的动力在需求过于容易被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丧失:

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sup>①</sup>

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马克思对地理影响的提及主要是关系到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且他并不乐意承认在后来的阶段中有这样的影响。不过,马克思确实正确地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理变化的重要性无疑将**减弱**<sup>②</sup>;而且正如他所提到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利润的影响所表明

---

① 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p. 649. (*Capital*, vol. I, p. 648)(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洲的”社会的描述,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② 原因包括以下几点:(1)技术和基础设施越发展,越能减轻不利的地理条件的影响——例如在较发达或较落后的社会中自然灾害的不同影响。(2)国际贸易的发展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再只依赖它的当地资源和本地所固有的发展技术。(3)国际贸易和(更突出的是)殖民主义不仅导致这些缺乏自发发展条件地区的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瓦解,而且导致它们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模式中。(例如,见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第306—307页中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性影响的评价。)



的,他继续承认它们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 七、狭义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115 在这一章中我们讨论了许多段落,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环境既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又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上一节中讨论的布莱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的批评,表明了对这些段落的两个回应。第一,最明确的是,他表明,马克思既没有充分认可自然(特别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也没有充分认可它的影响的地理可变性。这些指责在前一节已考察过。然而,第二,布莱克本把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生产主义”的理论<sup>①</sup>表明,对布莱克本来说,马克思对人类依赖自然的肯定和地理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肯定,尽管它本身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它已超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理论的范围。这里认为布莱克本所提出的一般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理论,或者至少是一个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并非主要是一个关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

之所以对于以这种方式把马克思人类依赖自然的断言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犹豫不决,一个原因是他把上面提到的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关系以及支持这种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为书写历史的“自然

---

<sup>①</sup> 这可能与本顿的观点相矛盾。本顿认为:马克思的“生产主义的”偏见存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并且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理论。

基础”。不过，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为它对理解马克思人类依赖自然的断言的密切相关。用上面所描述的狭义层面意义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作者们，并不由此忠实于任何有关马克思所引用的关于自然和人类论述的有代表性的特殊观点。然而，把这些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排除出去，意味着他们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理论或该理论作为其“指导线索”的马克思思想的其他部分，能够说明生态问题的发展。它也让马克思所陈述的关于自然和人类的观点可能与他的历史理论相矛盾的可能性暴露出来。特别是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好像更易遭到这样的攻击，即生产力发展的概念忽视了对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依赖的发展限制。这个指责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考察。下面我将考虑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范围的论点，以及关于在上述狭义层面上理解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广义上的对生态依赖原则的唯物主义承诺之间关系的论点。<sup>116</sup>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的解释得到了来自马克思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强有力的文本支持，科恩把这个序言描述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文本”。他写到：“在留意序言时，我们不是在许多文本中只看其中的一个，而是看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明确论述的文本。”<sup>①</sup>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

<sup>①</sup> Cohen 1988, p. 3.



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①</sup>

科恩引用这个段落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是，他省略了关于社会意识的最后的从句。<sup>②</sup> 这舍弃了马克思所提到的三“重奏”：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科恩看来，对于这些组合的定义和它们之间的解释性关系的精确界定，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sup>③</sup>

虽然科恩绝不是唯一一个把这个序言当做经典的人<sup>④</sup>，但是我们有理由谨慎地对待将这种解释的优先程度给予它。第一，有关于文本的地位和它的发行情况的理由：它毕竟“只是”一个序言，马克思在其中非常简洁系统地总结了大量早先工作的结果；并且，根据一个评论所说，“马克思十分乐意不让它再版，它已经被马克思后来的著作所取代”。<sup>⑤</sup> 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为了使它通过普鲁士的审查，他从这个概要中省略了他的前期工作的一些方面——特别是阶级斗争的观点。<sup>⑥</sup>

---

① 1859 Preface, p. 18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② Cohen 1978, p. 28; Cohen 1988, p. 4.

③ 另见 Shaw 1978, p. 59.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的解释可能与凯斯·格雷厄姆 (Keith Graham, 1992, p. 10) 的观点相矛盾，他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个观念”，而是“许多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尽管它们不是拥有同样的地位”。

④ 参见 Shaw 1978, pp. 8, 55; Shaw 1991, p. 235. 普门纳兹 (Plamenatz, 1963, pp. 18 - 20) 把这个序言描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的陈述”。

⑤ Miller 1984, p. 175.

⑥ 见 Prinz 1969. 另见 Moore 1975, p. 174.

事情或许是这样的,但是,只是因为空间的缺乏,肯定还有很多的内容被省略。第二,文本本身并没有以科恩对它的使用所表明的那样明确地定义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或任何同等含义的词语)的一个概要,而是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果**来引入上述段落的。无论是取决于上下文的观点还是原文的观点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关于前者,有人指出马克思自己很高兴在后期著作包括《资本论》中引用这个序言。<sup>①</sup> 关于后者,人们可能指出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把从这个序言中引用的段落描述为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sup>②</sup>;并且,恩格斯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中,把它的序言所概述的要义描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上的基础”。<sup>③</sup> 要点是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如科恩或其他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所显示的那样,对把他的全部文集划分成互不关联的部分表示肯定。因此,简单地在被狭义定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如科恩所定义的)和一个包括马克思生态依赖原则肯定的广义的定义(如本章第二节所描述的)之间作出区分,而不是企图去规定一个定义,可能是有用的。这样本节中要回答的问题可以从被狭义领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那些关于人类依赖于自然的广义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

科恩反对在他看来是马克思和他的许多追随者的错误想法,即人

---

① Shaw 1991, p. 235; Graham 1992, p. 80n. Cf. *Capital*, vol. I, p. 175n.

② *Capital*, vol. I (Post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p. 10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译者)

③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译者)



类对自然依赖的一个方面,即他们对食物、住所和衣服的需求,足够证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理性。<sup>①</sup> 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呈现的观点。恩格斯说: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sup>②</sup>

根据科恩的观点,恩格斯在这里犯有在两种意义之间含糊其辞的过失,在这两种意义上,食物等等的生产可以被描述为政治、法律等等的“基础”。在第一种意义上,食物的生产是从事政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第二种意义上,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后者的。科恩认为,在第一种意义上,食物生产是政治的基础的说法是由吃的必要性推断(确实,琐细地推断)出来的;但是,在第二种意义上,并没有这样的推断。因此,科恩总结道,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理论要求依照我们生产我们的所需

<sup>①</sup> Cohen 1988, pp. 124 - 131.

<sup>②</sup> ‘Speech at the Graveside of Karl Marx’, p. 42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6 页。)

的方式去解释国家机构、法律等等,但这并不能从这种单纯的事实中推断出我们都是食物、衣服、住所需求的物质存在物。

很明显,科恩是正确的:恩格斯的陈述,如所呈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演绎论证。但是,这是恩格斯所希望的吗?凯斯·格雷厄姆(Keith Graham)表明,“可以说,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比被保证的具有更多确定性)以及促进这个假设的考虑”,或者换句话说,他给出了“初步的理由来考虑物质生产可能有着解释的首要性”。食物等等的生产的必要性被归为这样一个原因,即因为我们投放到其中的时间和努力的程度使它对我们的生活如此重要。<sup>①</sup>安德鲁·科里尔(Andrew Collier)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倾向于夸大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可能得自于生物学上的事实例如吃的需求支持的程度,但仍然没有建立一个演绎的关联。<sup>②</sup>科恩的论证只是指向那些断言从人类对物质需求的占有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逻辑蕴含关系的人。他未必拒绝这样的建议,即在某种稍弱的意义上,前者是后者的“地基”或“基础”,并且在他的论述中确实有因素表明这样的关系。

第一,科恩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能否通过增加进一步的前提条件而使恩格斯的论证具有演绎的有效性?<sup>③</sup>如果情况就是如此,并且所需要的进一步的前提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生产的需要是我们认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一个原因

---

① Graham 1992, pp. 14, 15.

② Collier 1979, esp. pp. 42, 53 - 54.

③ Cohen 1988, p. 128.



或至少是原因的一个部分。第二,在科恩的解释中以及马克思自己看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不适用于这样一个人类不依赖自然并且不需要生产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的世界。<sup>①</sup>换句话说,人类依赖自然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的一个不充分的但是必要的条件。当马克思说到关于人类和非人类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基础”的客观事实时,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一点;并且,他的观点中确实隐含着历史发展将不会在“过于富饶的自然”的情况下发生。<sup>②</sup>在科恩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中,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式依赖于这样一个论点(理由将在第五章第五节论述),即“生产力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中”。撇开其他不说,这一点反过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存在于一个短缺的境况中,在这样的境况中,人类寻求新的技术以改善这样的境况是合理的。<sup>③</sup>在这里,短缺意味着人类依赖着一个不怎么富庶的自然。因此,由此断定,即使马克思对人类依赖自然的断言并不在一个狭义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之中,这样一个依赖的事实仍是这个理论的应用所不可或缺的,并且也是马克思的更宽泛的学说所必不可少的,因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他的这种学说提供了一个“指导线索”。

## 八、结论

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不断肯定一些非常类似于我所

---

① 参见 Collier 1979, p. 44.

② 见前面第 165 页注①②。

③ Cohen 1978, pp. 134, 152.

称之为生态依赖原则的东西。他在不同的文本中这样做，毫无疑问地表明，马克思自己认为这个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将会对他的狭义的历史理论具有意义深远的方法论重要性。随后的几节考察了对这个假设的各种挑战。我认为，这些挑战没能表明马克思放弃了这个原则，或者与坚持这个原则相矛盾，但是他们确实表明有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些问题。

我认为，断言马克思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放弃了生态依赖原则，是与断言这个原则贯穿于他的成熟著作中相矛盾的。我认为，断言这种放弃的理由是，后期著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念——被认为与这个原则不能兼容。然而，我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未必与生态依赖原则相矛盾，并且两者是 <sup>120</sup> 一个理解生态问题的适当的概念框架的必要构成部分。因此，为了确定马克思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特定论述是否与他的人类依赖自然的认可相矛盾，更进一步的研究是需要的。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这个研究，并将考察马克思致力的生产力发展的解释和这种解释的生态意义。

我们也已经看到，人类需要的概念对理解马克思的广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与他的狭义的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是从他们对物质需要的占有方面表达的，并且那些需要的满足是劳动过程的根本目的和发展生产力的动机。<sup>①</sup> 科里尔和格雷厄姆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科里尔把“这些有着确定的变化范

---

<sup>①</sup> 它之所以是根本的目的和动机，因为在商品生产中，直接的目的就是利润的生产。换句话说，正是马克思对维持价格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的论述抓住了控制生产的那些人的直接动机。



围的满足方式的需要的存在”既描述为“人的科学和他们的生态基础之间的联接点”，又描述为（在人的科学内）“最终意义上的‘物质’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基础”。格雷厄姆把普遍的、不断出现的、其满足要消耗大量精力和时间的物质需要描述为连接马克思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和物质生产的解释首要性的因素。<sup>①</sup> 人类需要的概念也是环保著作中的重要论题，但是这里，依照降低物质消费量的目标，趋势是降低人类需要的程度，并把需要与纯粹的欲望区分开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因它所宣称不断扩大人民的需要，发展生产以满足这些需要而受到批判。<sup>②</sup> 这个问题将在最后一章探讨，在最后一章里我将研究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及其生态意义。

---

① Collier 1979, pp. 44 - 45; Graham 1992, pp. 14 - 15.

② Dobson 1990, pp. 18, 29.

## 第五章 生产力的发展

121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坚信人类依赖于他们的自然环境这个观点的,这个观点构成了环保思想的一个基石。在上一章中,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与人类改造他们的环境的特点这一思想相矛盾。在第二章中,我也不认为经济或生产增长本身而进行的努力与对物种所依存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认识相矛盾。然而,明显的是,在所有人们可能改造自然或者增强他们的改造能力的不同方式中,只有一些是与生态问题的避免或减少到最低程度相协调的。因此,抽象地考虑自然的改造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考察马克思给出的对自然改造的特定论述,而这个论述的中心是他的关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论点。因此,在这一章中我的目标是考虑应当如何理解这个论点和它在马克思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并探讨许多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争论的问题,即马克思对这个观点的应用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生态问题的恶化。让我更进一步思考的是,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为何是有益的。

首先要注意的事情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作用。说它之所以起到一个解释性的作用,是因为



生产力的发展为马克思解释了从一种社会结构到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在这个解释中所提到的发展只是被作为对一个实际发生状况的描述而已,因此没有理由去批评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可能具有产生或加剧生态问题的任何倾向性;的确,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产生原因的  
122 论述,可能被理解为是对当代生态问题的一个解释。然而,稍后我们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发生的过程,而是人们选择的行动和结构的产物。这就产生了促进、限制或者改变这个进程的可能性。即便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付出巨大的人类代价,马克思自己仍对生产力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可以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一积极评价,在那里,马克思因资本主义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它大为赞扬。这样的积极评价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付出更少的努力和花费更少的时间生产更多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成为可能,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个潜力只能部分地得以实现。第二个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典型地说明了(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一种曲解的方式)人类创造力的应用和增强,而人类创造力的应用和增强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人类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考察这个原因。第三,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高级水平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向往共产主义,不仅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使生产力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可以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且因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多正义、更少异化的社会,更适合于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创造性和社会性。因此,至于马克思从规范方面看待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他的方案得

以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他的观点就容易受到这样的攻击:与该发展相关的生态问题玷污了——并且可能破坏了——那些方案。所以,有必要既考察马克思坚持的那种规范的生产力发展,又考察那种发展的生态后果。

##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

要回答为什么人们会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产生生态问题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考虑的发展是什么。马克思自己从没有明确地定义过生产力,但是下面似乎可信的并被普遍持有的观点可能都源自我们上一章讨论过的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生产力由**劳动力**和**劳动力**为制造产品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构成。劳动力由**劳动者**的体力、技能、知识和创造力等等组成,而生产资料则由**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组成。<sup>123</sup>① 因为生态问题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交往,所以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生产资料的**自然成分**,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说明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来自于自然并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劳动对象(我将从此称之为**原料**)<sup>②</sup>要么是直接由自然

① 见 Cohen 1978,第二章,特别是 p. 32 和 p. 55。科恩认为,连接属于这两个类别项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全是“生产者**用来**生产产品的因素”(p. 32)。他补充说,有人肯定**认为**这些项目以这种方式对生产作了贡献,但是这个人并不一定要成为直接生产者。在增加**空间**以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科恩背离了马克思。

② 正如在上面章节所提到的,这种用法背离了马克思的用法。尽管马克思为那些经历了先前劳动过程的生产对象而保留了“原料”这一术语,但我是在日常英语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等同于马克思的“劳动对象”——以包括自然材料和先前加工过的材料。



提供,要么是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加工的自然物。劳动资料包括:在原始的劳动过程中所用的例如石头一类的自然对象,从自然材料中制造出来的工具和机器,甚至是在农业中用作劳动资料的土地本身。并且,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被马克思认可为劳动资料的不仅是直接“传导”工人的活动于劳动对象上的东西,而且也包含从一个广义上所定义的“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组成的劳动资料<sup>①</sup>——马克思后面所指的这些劳动资料涵盖着比如厂房、运河和道路这样的类别,而这个类别也将涵盖生产所依赖的天然的自然系统:物质的、生物的和气候的系统。

这些生产过程的自然成分(见图 5.1)说明了使之可能会产生生态问题的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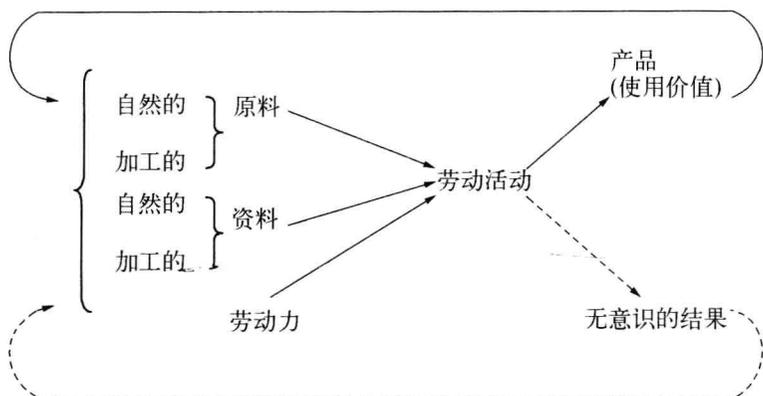
- (1) 它对**自然所给予的原料**的依赖;
- (2) 它对**自然所给予的生产资料**的依赖。

另外,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中,只有一部分最终成为产品,并且这些材料的特性中只有部分被生产者所理解

124 和利用。因此生产过程也易于在以下流程中产生生态问题:

---

<sup>①</sup> Capital, vol. I, pp. 285 - 286(中译文参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5 页。)



实线表示在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的论述中所明确提到的关系；虚线表示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关系。

图 5.1 劳动过程的生态影响

### (3) 它生产污染和其他对环境有害的**无意识后果**。<sup>①</sup>

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这些具有生态问题性因素的扩张——从自然获取更多的强烈愿望导致的对自然施加更大的无意识影响——那么这个观点即这样一种发展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们的生态问题将会得到证实，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论点的前提需要更进一步的审查，同时它还必须证明这些生态问题性因素的扩张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后果，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提出对

① 我在一个广义的意义上使用“无意识后果”，它包括一个可以预见但并非活动目的的后果。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可能被认为不是出自初衷，因为这种影响要么直接施加于人类（例如在自然对人类的健康或审美或休闲娱乐等方面）或其他生物，要么形成一个反馈环，反作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前提条件（对象或资料）并破坏它的可持续性。



建立这样一个紧密关系进行质疑的理由。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呢?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经常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这表明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因素”)等同于技术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特性引起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议;不过,现在我们先不予考虑决定论的问题,我要讨论的将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假定后者得到一个合适的广义的理解的话。然而,我将会反驳也是由某些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问题的恶化。

有些评论者把技术等同于工具和机器,也即生产资料。<sup>①</sup>按这种方式理解,“技术的发展”似乎是一个比马克思的“生产力的发展”更加狭隘的概念,因为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和劳动资料。但是劳动力的发展主要<sup>②</sup>由技能和知识的发展构成,这与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技术”的原始含义相一致:“关于技术的知识”或者“工业技术的知识”。<sup>③</sup>(我假设,技能将被包括在这个对技术的界定之中,属于实践知识或者“知道如何”的类别。)事实上,任何技术的实际发展必然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因为两个因素相互依赖:没有发明它们的知识和使用它们的技

① 例如,见 Grundmann 1991b, p. 107。

② “主要地”,因为劳动力的发展可能也包括劳动者体力的发展。

③ Freeman 1977, p. 225; Layton 1977, p. 199; 参见 Mitcham 1979。

能,工具和机器的发展和应用将是不可能的<sup>①</sup>;相反的,劳动力的发展只能带来有限的进步,除非它利用新的生产资料。因此,技术的发展可能被视为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劳动力的发展。

这个对技术的宽泛的描述似乎仍然没有解释生产力的一个元素——原料。<sup>②</sup> 不过,我认为马克思“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短语能够有意义地被应用到原材料的范围内,因为它必然要涉及到诸如新资源的发现、用来增加稀有矿藏含量的技术发现、原材料的新用途的发现、由于勘测工具和技术(例如工艺)的革新使得提炼和制造技术方面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十分可能的发展等事件。确实,“资源的发展”这一短语有时被用来指从土地中提取矿物质的过程,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的常规部分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的个案,因为这被理解为某种历史的发展,是对生产过程常规的一个**改变**。当应用到原料上时,只是简单地指速率的增长,在这个速率上原料被消耗(尽管一个缺少生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因提取和消耗变得更快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而为之庆祝),这样理解“生产力的发展”也将是违反直觉的。因此,考虑到当应用到原料上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涉及

---

① 科恩(Cohen, 1978, p. 42)认为:知识,而不是物质工具,是技术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只要给予足够的知识,工具可以被再造。但是没有必要的知识,工具将变得毫无用处。这一观点滞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p. 72)中就如何通过国际贸易交往的畅通以保证生产力的持续性的见解;尽管这种交往是局部性的,但是却易受到彻底破坏。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p. 706)中也强调了知识对物质对象的重要性,他把机器等描述为“知识力量的客观化”。

② 在它们保持没有发展的范围内,自然所给予的生产资料也被排除。但是只要它们经过发展而成为人工制品,它们可能就将包括在技术的类别内。



到资料 and 发现、提取和使用原材料的技术(例如工艺)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明确无误地属于上面所给出的对技术发展的描述。

这些考虑所表明的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意味着“技术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技术(或者更明确一点,生产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还包括劳动者的体能、原料和自然给予的生产资料。因为没有生产力的一个总体扩张,生产技术的发展也是可能的;或者当生产力的非技术元素例如原料的贮备有所下降时,尽管技术发展保持不动甚至还有所发展,但是生产力的下降也是有可能的。相反,事实上已经表明的是,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技术元素,人们才能充分地增强他们的生产能力。由此可以得出,如果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生态问题,正如某些批评者所主张的,那么那些问题将同样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关联。因此,在下面的一节中,我将考虑因这个观点即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今后的发展)肯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破坏而提出的一些理由。

## 127 二、技术发展和生态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相互关系?

新技术可能并且经常是耗费更多的原料,燃烧掉更多的燃料,并且比它所替代的技术带来更多的污染。<sup>①</sup>然而,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后果是否可能,而是它们是否是所有形式的技术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伴随物,或者在另一方面,是否存在满足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准则而又能避免这样后果的技术发展形式。

---

<sup>①</sup> 许多 20 世纪的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被编在 Commoner 1971 中。

莱内尔·格伦德曼给出了一个有关技术发展的生态问题性质的论点,他重点突出了作为引起生态问题倾向的证据的现代技术的特殊特征。格伦德曼论点的第一点是:生态破坏的可能范围随着技术“空间”的增长而得以大大扩大:“人类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使用原始的技术,并不能以今天人们影响环境的同样方式对环境造成影响:甚至在最漫不经心地使用的条件下,石斧和火也不能引起与今天源自核技术或者生化技术的危险相比的危险。”<sup>①</sup>正如这里所引用的,不断增加的技术空间看起来好像对任何技术发展的观点都很重要,但是就它本身而言,这只是创造了增加生态问题的可能性。人们可能认为,虽然新技术增加了对生态的潜在破坏,但是它们也可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控制技术,这些控制技术将会减少潜在的生态破坏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总的来说,生态影响的可能水平是更低了而不是高了。这种论点的一个例子是由核能工业所作的一项声明,即核能在应用中比燃煤能量更“清洁”(也就是产生更少的空气污染),并且在统计上比燃煤能量引起更少的死亡。<sup>②</sup> 对此的回应,人们可能会认为**无论**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无论运行什么安全设施,在这些技术被发明之前(例如)核污染和化学污染的可能性仍将大大甚于以前,也就是大于零,并且从长远来看,任何非零

128

---

① Grundmann 1991b, p. 29.

② 技术进步可能会提高控制并因此降低环境破坏的发生率和意外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可能会被认为是特别贴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问题不仅产生于监测和控制环境影响的得到改良的技术手段,而且产生于技术发展所促进的或许能更好的控制它的影响的新的社会结构。这当然是有争议的,虽然我不会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一章的后面和结论中我会更多地谈到它。



可能性都表明了一个统计学上的不可避免性。这可能是拒绝技术例如核能量的一个原因,在使用核能量的情况下,不管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有多低,意外发生的结果都是非常严重的。<sup>①</sup>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回应没有看到这一点,即强有力的并且具有潜在危险的技术已经存在,虽然没有任何一种这样的技术,我们或许也能生存下去,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人口数量水平,我们的生产和基础设施对电力的依赖等等,我们是不能离开所有这样的技术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因此,当前的形势是严重的生态破坏的危险(或者更严重)已经存在——例如从核事故或因火力发电站的常规排放而导致的全球变暖——并且在这个背景下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新技术是否会带来危险(它们会!),而是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危险是否比早已存在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更严重或者较轻微一些。<sup>②</sup>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格伦德曼的第二个论点。他认为,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紧密结合”分别减低了它们运作的透明性并且允许其产生较大影响的小失败,结果是,在正常运作中的环境破坏变得更加可能,并且不管采用何种安全措施,像三哩岛、切尔诺贝利或者博帕尔的事故变得不可避免。<sup>③</sup>或许格伦德曼过于夸大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充分考虑了抵消潜在危险的精密控制和安全系统——精密控制和安全系统也许比人类或者更原始的控制系统更能处理复杂

---

① 参见 Grundmann 1991b, p. 35。

② 也存在这样的生态危险,它们不是由人类对技术的应用引起,而是由自然灾害引起,例如洪水、地震或者流星碰撞。拥有强大的技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危险,而这因此可能被那些技术的危险所抵消。

③ Grundmann 1991b, p. 33.

技术；而且因此我们也不清楚，在给予足够时间的情况下，这个不可避免性不只是任何有限概率事件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即使我们接受了他的观点，即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复杂的和紧密结合的技术，也不意味着这样的后果必然是由技术的发展引起的。这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紧密结合性是偶然发生的特征，并非技术发展所必不可少。技术进步的替代途径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格伦德曼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时已被他所认可，即是不是有可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群体可以控制技术发展的方向，并且引入那些对环境破坏可能更少的技术。<sup>①</sup>

一个确实支持在技术发展和生态问题之间建立一个必要联系的观点是由瓦尔·罗特莉(Val Routley)提出来的，这个观点代表了许多环保思想。她认为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自动化天堂”的蓝图“必定是高度耗能的，因此展现了可预见的、现实的能源情景，即环境破坏”<sup>②</sup>科恩似乎也持有罗特莉对自动化和资源消耗之间关系的一个假设，他认为“资源危机”可能会使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方案看起来很天真，“因为如果自然资源被更节俭地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的依赖肯定会被对人类劳动力的持续依赖所取代，那么这样看起来增加空闲时间的承诺

---

① Grundmann 1991b, pp. 140 - 141; 参见 p. 182。这是格伦德曼论述的中心。他认为，在任何社会结构下都会存在产生生态问题的某些技术形式，这一事实消解了生产关系在解释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将政治焦点转移到技术进步能否被控制以及如何控制的问题上。然而，我们或许想知道的是，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如格伦德曼所假设的那样是分离的，或者社会结构是否真的会影响技术变革的方向(或者具有控制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在我的总结中，我将进一步评论格伦德曼的论述和他低估生产关系的影响的理由。

② Routley 1981, p. 242.



是难以得到满足的。”<sup>①</sup>科恩通过质疑这样一个假设,即对于马克思来说,空闲时间必然是没有收益的,来作为对马克思批判的反驳。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所看到的,科恩对这个假设的质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和罗特莉假设自动化程度的增强必然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长则是错误的。

130 生产的自动化包括两个因素:通过机器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替代。<sup>②</sup>后者确实需要能量的自然来源对先前由人力劳动提供的能量的替代;因此从手工生产到机器工业的转变意味着对自然能量资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但是如果起点是今天已经严重依赖自然能源的高度机械化生产,那么这样的生产将是另一幅画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很大的程度上,自动化必然意味着机器对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在控制或者管理机器生产中所消耗的脑力劳动的替代。在这个能力上,人类劳动对生产过程的总体能量需求贡献很少;并且,很有可能,一个自动系统将比在直接的人工控制下能以一个更加有效利用能量的方式运行,更能补偿替代管理性劳动所需要的相对少量的额外能量。举一个熟悉的例子,给一辆汽车换挡所需要的能量相比于驾驶汽车前进所需要的能量要小;因此一个比人工操作更节能更方便的自动变速器比机械换

<sup>①</sup> Cohen 1978, p. 323.

<sup>②</sup> 在《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中,自动化(Automation)被定义为“通过一系列连续的阶段对产品生产的自动控制;使用自动设备以节省脑力和体力劳动。”这个定义的第一部分所指的**控制**进程表明,脑力劳动的替代比体力劳动的替代对这个概念更重要。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使“机器”和“自动机器”之间的区分有意义的话,这个观点就要求与这个术语的一般用法相一致。然而,因为实际情况总是包含着不同比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替代;并且,因为这两个因素都清楚地出现于马克思用这个术语表达对技术发展的理解时,所以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因素。

挡操作所耗费的附加燃料的总量能节省更多能量。<sup>①</sup>

罗特莉对能量使用的关注是许多生态观点的特点,但是相似的考虑也应用到其他资源方面。正如自动装置的发展可能会导致能量消耗的一个净节省而同样可以提高效率,因此它或许可以导致其他种类资源使用的节省(例如原材料),并且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这表明技术的发展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是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即单是技术的变革就足以解决生态问题,因为提高效率的方式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在理论上存在着限制。如果这种改进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不能保证,解决它们的技术手段会及时发现出来以避免生态问题,即使情况确实如此。<sup>②</sup>

罗特莉(错误地)反对的自动化技术包含着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提高, 131

---

① 这里我的意图并不是要表明这种自动化能消除与当前机动车使用程度相关的生态破坏,而只是简单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所设想的技术自动化并不像罗特莉假设的那样具有生态破坏性,而是可能会有助于降低它的生态影响(即使以有限的方式,正如在下面段落中我所说明的)。

② 这个警觉性的观点构成了环保思想反对“用技术方式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内核。例如,生态问题的技术改善取决于包含在产品中并为原料向产品转换所必需的材料和能量的数量。这些输入物的最小值也决定着产品废弃物的最小值,它们由没有成为产品的燃料和原料的部分构成。然而,技术或许能使产品的废弃物转化成具有较少危害的形式或者可作为资源被用于其他劳动进程。

许多环保主义者即便有些保留却也当然认可技术所作的贡献。由斯普瑞特奈克(Spretnak)和卡普拉对环保者的态度所做的一个有用的调查结果可参见他们的著作(Spretnak and Capra 1986, p. 88)。但是,用以标出具有环境破坏性和无环境污染技术的术语“严重的”和“温和的”的广泛使用,确实表明对传统或“中级”技术的偏爱多于对现代“高级”技术的偏爱。前者在前期确实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后者更有环境高效性。见同上;另见 Irvine and Ponton 1988, p. 48。



也就是产品规模和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总量比率的提高,而这样一个提高是通过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一种技术革新的方式实现的。<sup>①</sup>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一个观点即技术的发展必然地增强它对环境的影响是取决于这样的假设,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通过放松当前由对劳动力的要求而施加的限制以提高产品的数量。<sup>②</sup>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个发展将会导致资源消耗数量的增加和废弃产品的增加。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条件并不总是相同的,因此这些后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被抵消掉,如果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技术也更具有生态高效性;因此有可能用相同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甚至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即使如此,考虑到有限的空间和这种高效性的不确定性,旨在增加产量的技术发展肯定会被认为具有潜在的问题。

我们已经考虑了技术的发展旨在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情况,或者通过增加产品的规模或者通过降低对劳动的要求。然而,它根本不需要增加劳动生产率。因为,即使环保主义者要求停止生产增长的建议被法案通过,并被要求进一步减少劳动时间,那么引进技术创新设计以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废弃产品的处理,从而减少当前生产活动水平的生态影响也是合理的。这样的创新似乎比旨在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创新更值得拥有“技术发展”的称号。

### 三、技术发展的标准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技术发展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并服务

---

<sup>①</sup> 这一设想来自 Cohen 1978, p. 56。

<sup>②</sup> 例如, Porritt 1985, p. 44。

于不同的目的,并产生不同的生态结果。但是这个不同范围的目标真的可以被包含在“技术发展”这个单一的概念里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史柯里莫斯基所给出的描述:

技术发展本身清晰地表明,通过它的能力可以以越来越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越来越具有更多重要特征的更加多样化的产品。

正是技术进步的特性,提供了生产“更好”的同类产品(除了提供新产品以外)的手段。“更好”是指许多不同的特性,例如:(1) 更持久耐用,或者(2) 更可靠,或者(3) 更灵敏(如果物品的灵敏是它的重要特征的话),或者(4) 可以更快地发挥它的功能(如果它的功能与速度有关的话),或者(5) 上面所有这些特性的组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五个标准,技术进步是通过缩短生产一个既定对象所需要的时间来实现的,或者通过降低生产的成本来实现的。因此,生产一种既定种类的物品时的另外两个标准就是降低成本或者缩短时间,或者两者兼具。<sup>①</sup>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能发现史柯里莫斯基所认为的构成技术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

1. 新的种类的物品生产;
2. 现存种类的地物的改善[从(1)到(5)即是例子];
3. 降低生产(时间和金钱)成本。

---

<sup>①</sup> Skolimowski 1983, p. 44.



然而，史柯里莫斯基对技术进步特性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只是集中在(2)。特征(3)降为次要地位，而特征(1)则完全被从这个描述中排除出去。

尽管史柯里莫斯基对构成一个既定种类的一个“更好”的物品所需要的特性给予了多元化的描述，但他认为这些不同的标准——持久性、可靠性、灵敏性等等——可以被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标签之下，因为“有效性”的种类可以适用于技术的不同分支。他说，在测量中，引导地图绘制者选择技术的决定性因素是测量的精确性。在土木工程中，它是建筑物的持久性；而在机械工程中，它是(狭义的技术意义上的)效能。因此，史柯里莫斯基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在生产一种既定种类的物品的过程中对有效性的追求”。<sup>①</sup>

133 然而，史柯里莫斯基的例子掩盖了当我们考虑实际情况下的技术进步时所出现的一些复杂性。首先，外部的考虑如经济或生态而不是生产对象的特性，可能极其重要；第二，物品本身可能根据多样化的标准而不是某一技术分支所特有的单一尺度——有效性加以鉴定。

史柯里莫斯基试图用来协调他的描述中这些复杂性的一个方式，是主张所有其他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都从属于一个典型的标准。这样，在评定最经济的测量方法时，“潜在的假设是这样的，测量保持着或者至少保持着同样的精确度，精确度的降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机械工程中，“或者我们可以试图增加绝对效能并且提升它使之尽可能接近1，或者我们试图去建造一个‘更好的’引擎而保持同样的效能（‘更

---

<sup>①</sup> Skolimowski 1983, p. 45.

好’意味着：更安全，更廉价，更持久，更坚固”。<sup>①</sup>

史柯里莫斯基也试图把对他的论点具有瓦解威胁的这些复杂因素排除到定义之外。与有效测量相背离的活动被该技术分支所排除，并且与有效测量相竞争的标准被归入非技术类别。因此，他认为建筑学只是部分属于技术，它与土木工程是不同的，因为对于建筑学来说美观和效用至少和持久性是一样重要的<sup>②</sup>；并且，一般地说：“在技术中对思维结构的分析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妨碍，即现今桥梁、高速公路、汽车甚至家用小器械的建造和生产都与那些根本上是‘非技术’类别的对美观和舒适的考虑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sup>③</sup>

史柯里莫斯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复杂性的尝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为了对他的术语“非技术”的使用进行辩护，他指出审美的满足和舒适“不能在所有的时代得到客观的评判”。但是虽然这个可能会对技术进步的衡量产生困难(甚至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它本身并没有在任何相关的意义上使这些标准成为“非技术的”。对于许多技术来说，美观和舒适并非必不可少的特征，但却是关键的设计考虑因素。<sup>④</sup>史柯里莫斯基借助有效性的特定标准而对反例的排除，使得他要求从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得出衡量标准的观点成为一种循环论证。因此，<sup>134</sup>

---

① Skolimowski 1983, pp. 47, 48.

② Skolimowski 1983, pp. 46 - 47, 48.

③ 同上, p. 49.

④ 例如，在设计客运悬挂系统时，舒适必须是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在衣服纺织品的技术方面，制造者追求生产出防水、透气的(舒适)但还有着自然纤维的外观(美观)的合成物。



他将有效性的首要标准分派给每种特殊的技术,以及他使其他因素退到一个次要地位的做法,充其量就是对他认为的技术分支的“本质”的规定;这样一个规定,在没有对可能服务于技术分支中的创新的目的范围给予适当重视的情况下,限制了被认为是进步的东西。

一个对技术进步更有前途的描述由贾维(I. C. Jarvie)提出。他拒绝了这个观点,即在每一种情况下技术发展的恰当标准决定于我们正在探讨的技术分支,或者是它的产品的本质;相反,他强调技术问题的社会特点。例如,贾维认为,持久性并不必然是建筑物的目标:“美国人能够建造防火的、防洪水的、抗台风和抗地震的房子,但是他们却因成本而深感气馁。”对于工程师来说,建造一座桥以使一队装甲兵越过一条河,建筑的速度可能远比持久性更重要。在测量中,“精确性只是一个相对的目标,也就是说,相对于勘测者和制图者所确定的问题。地形图可能忽略了土地的用途,路线图和租赁地图可能忽略了地形,伦敦和纽约地铁的地图只注重它们所要描绘的最一般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美国汽车的设计者“肯定没有像关注汽车的外形、驾驶的平稳性等等那样关注汽车的效能。如果制造者准备提升单位成本,美国汽车可以更耐用更有效能(按每英里的成本计算)”。<sup>①</sup> 贾维总结道,最重要的目的和衡量技术进步的适合标准取决于向技术专家提出的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提出:“不论最重要的关注是精确性、持久性、有效性或者别的什么,这些总是由社会所设置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领域所决定。”<sup>②</sup>

---

① Jarvie 1983, p. 52.

② 同上。

贾维坚持技术创新所追求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在一个单一的技术分支中),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创新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所决定,这确实是正确的。技术的进步应该根据那些目标的实现来衡量这一建议看起来也是有前途的;不只是在提升生产成本的可能性方面,广义来说还包括在提升生态成本的可能性方面,在技术进步的评估方面都是有前途的。这个可能性能否实现依赖于生态问题是否属于“社会所设置的问题”。不过,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观点。

困难是,在没有在社会成员之间达成一个共识的情况下,“社会所设置的问题”应该如何被定义是不明确的。拥有不同兴趣和不同偏好的不同的社会成员,很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标准评定技术创新,或者至少对不同的标准赋予不同的重要性。对有些人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将是产品的质量 and 耐用性;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将是生产的货币成本,生产该产品的工人的福利和安全或者生态影响的程度。因此,在一个规范的水准上,被算作进步的东西本质上就是有争议的。不过,对于解释性目的,规定一个非规范的定义可能是有用的——例如通过依据那些实际上控制技术创新的人的目标来定义贾维的“社会所设置的问题”。然而,明确的是,甚至在一个非规范的解释上,相对应于它可能服务的不同的目标,“技术进步”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因此,这样一个定义的选择必须依据需要哪一种定义的解释性任务来证明是合理的。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就其本身而言的技术发展,而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概念所蕴含的技术发展的种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因而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技术发展本身转移到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概念及其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所起的作用上来。



#### 四、马克思的生产发展：革命性效应

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同的因素，它们可能在不同的背景下被当作技术发展的标准，并且被这些标准所定义的技术发展的类型可能会在它们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方面有所不同。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技术发展的众多标准是如何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概念相联系的。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说明技术发展的不同路径的可能性。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似乎认为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他的资本主义（其结构得到他所详细描述的唯一社会系统）政治经济学中，他把这个发展等同于受利益动机的驱使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然而，重要的并不是马克思对他相信是社会进步根源的技术发展特征的**思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明确看法对当代生态问题并不构成一个足够的回应。从一个生态的视角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他的理论要求所支持的、他可能致力于的（或者排除在外的）哪种形式的技术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生产力的发展在该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

136

马克思对生产力作用最有名的讨论是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他早期表达这个学说的格言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①</sup>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用来解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过来解释法律

---

<sup>①</sup> 1859 Preface, p. 181;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 9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同上书第一卷，第 142 页。)

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然而,马克思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解释个别的社会形态,而在于解释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个转变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解释生产关系中的变化,因为它创造了这些变化得以发生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是为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创造了条件。我把这一点称之为生产发展的**革命性效应**(the Revolutionary Effect)。然而,我在其中确定这个作用的术语是那么模糊以至于只能作为一个起点。为了决定何种形式的技术发展是这种作用所预先假定的,我们必须更仔细的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是**如何**产生它的革命性效应的。我们可以立刻辨别出这个效应的两个元素:生产力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思想**,以及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可以**破坏一个旧的社会形式的生存的思想**。我把这些分别称为促动效应(the Enabling Effect)和破坏效应(the Undermining Effect)。不过,在考察它们之前,澄清刚才介绍的涉及科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的概念可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概念将构成下面所要进行的分析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认为,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科恩把这个观点解释为一种功能性解释,因而是一种后果解释。在一个后果解释中,一个现象(或者性能、过程等等)由其产生一定效应的倾向来解释。因此,根据科恩对马克思的解释,“生产关系有这样的特性,因为这个特性,它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sup>①</sup>

---

<sup>①</sup> Cohen 1978, p. 249.



在功能性的解释中,使产生这种效应的现象以这种方式得到解释的效应是该现象的一种功能;因而,根据科恩的观点,马克思的解释是一种功能性的解释,因为它**是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一种功能**。<sup>①</sup>

第一眼看来,这似乎是对我所称之为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也即**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颠倒。因此,可能看起来我们所有的是一个解释的平衡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力由它们对生产关系的效应来解释,生产关系由它们对生产力产生的效应来解释。一个功能性解释是否可以用这个模式是有疑问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生产力由它们对生产关系的效应来解释,生产关系由它们对生产力的效应来解释,这样一个平衡解释模式是与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释即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来说是首要因素的断言不相一致的。<sup>②</sup>

实际上,我所归之于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是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的描述相一致的。这可以通过再次考

---

① 功能性解释和后果解释之间的区别有点模糊,因为在构成一个功能成分的文献资料中有着相互矛盾的描述。例如,埃尔斯特(Elster 1985, p. 27; Elster 1989, p. 50)定义功能为一个对某人或某事有益的后果,或者在社会科学中,为一个对某些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或政治结构有益的后果。另一方面,对于拉里·莱特(Larry Wright)而言,要成为另外某一事物的功能的某事物是使它成为也能解释某一事物的存在的该事物的一个后果(Wright 1973; 另见 Searle 1995, p. 16)。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描述使功能性解释和后果解释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因为在这个描述中,一个后果解释中的任何后果特征都将会是一个功能。不过,科恩把马克思的解释描述为一个功能性的解释,保持了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种解释。

② Cohen 1978 第六章和 Cohen 1988 第一章中,辩护了马克思原文中生产力首要性的解释。

察功能性解释发生作用的方式看出。如果那些产生这种效应的现象有一个普遍的倾向(或者某些更强的东西),一个现象(或者性能、过程等等)有着一个产生某种效应的倾向的事实只能解释它的发生。科恩引用了一个标准的例子:“鸟类有着中空的骨骼,因为中空的骨骼有利于飞翔。”<sup>①</sup>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对鸟类有着中空的骨骼的事实的解释,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认为一般来说物种倾向于获得那些赋予繁殖和生存以有利条件的特征,飞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尽管我们可能只是基于一个单独的观察而断定这样的倾向<sup>②</sup>,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确实有一个因果模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这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倾向存在的原因。 1:38

同样,仅当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产生和存在的情况下,一组特别的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才解释了那些关系的存在。科恩认为,在不知道导致这种倾向的因果机制的情况下,我们本来应当有理由坚持这种倾向<sup>③</sup>,但是,正如在一个生态学实例中,我们实际上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根本机制的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是因为有些人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倾向于选择促进该发展的生产关系。生

---

① Cohen 1978, p. 249.

② 也就是对活着的物种和化石记录观察。

③ 正如在第三章提到的,这里科恩的观点是与乔恩·埃尔斯特的观点相矛盾的。他认为一个功能性解释只有在潜在的因果机制得到明确说明后才有效的,并且在因果机制得到明确说明的地方,功能性解释是多余的。然而,正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观点;因为(1) 我们有经验的理由去相信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一个倾向的存在(也就是不知道潜在的因果机制的情况下),并且(2) 或许存在在一个功能层面上而不是因果层面上解释现象的实用原因,例如,如果这个因果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在其中理性地选择新的生产关系的条件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它的革命性效应),因而是潜在于马克思对社会变化的功能性解释中的因果机制的一部分。在把革命性效应归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上,我并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给出一个功能性的解释,因为我不认为生产力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它发挥了这个功能。<sup>①</sup>然而,革命性效应确实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解释性元素的重要性,并且它还提升了马克思——和那些接受马克思对社会变革的解释和同样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人一起——可能致力于某些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发展**希求**的可能性。对组成革命性效应的两个元素的分析,应该有助于我们去回答发展以何种形式、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 (一) 破坏效应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革命性效应的两个元素及其对马克思理论中构成生产力发展的诸种技术发展的意义上来。这样一个观点即生产力能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破坏现存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理解的历史进程的核心。他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或者**桎梏**的程度时,这个矛盾就产生了。桎梏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被援引过,但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个段落中得到了经典的阐释:

---

<sup>①</sup> 至少不经常。一个不完全的例外可能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它由有着为社会主义提供合适条件并且为向共产主义更高级阶段的过渡提供条件的有目的的统治者所倡导。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sup>①</sup>

尽管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但是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桎梏生产力的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定义，并且他的著作中多种多样的表述导致了相互矛盾的解释。

一个解释是，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时，桎梏就发生了。按照米勒(Miller)和科恩的解释，我们可能会把桎梏这个概念当做“绝对停滞”(Absolute Stagnation)。<sup>②</sup> 这个桎梏的概念被许多评论家<sup>③</sup>心照不宣地采用并隐含在马克思的一些表述中<sup>④</sup>，但是作为一

① 1859 Preface, pp. 181 - 18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33 页。)相似的思想也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87 页，《共产党宣言》第 40 页和《经济学手稿》第 749 页。

② Miller 1981, pp. 96 - 97; Cohen 1988, p. 109. 埃尔斯特(Elster 1985, p. 259)把桎梏这个概念简单的当做“停滞”。科恩也使用术语“绝对发展桎梏”(Absolute Development Fettering)(p. 114);然而，这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比“绝对停滞”更宽泛的术语，因为作为一个生产力发展减慢的桎梏概念，它是在自身的范围之内被考虑，而不是在与其它实际的或者可能的社会比较中被考虑(参阅下面要讨论的相对发展桎梏)。它也将是一种绝对发展桎梏的情况，麦克默特里(McMurtry)就生产力的“绝对丧失”(absolute forfeiture)而言的桎梏概念也是这样的含义(Graham 1992, pp. 68 - 69 也讨论了这一点)。

③ 见 Elster 1985, p. 260。

④ 例如下面所引用的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相关段落，见本书第 207 页注<sup>①</sup>。



个对社会变革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方面,对绝对停滞的关注似乎是武断的:我们为什么应该认为它恰恰是一个**停止**,而不是为了推翻现存生产关系的动机所需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下降或者衰退?再者,桎梏的绝对停滞概念并不是科恩所称之为“可预测性约束”(predictability constraint)的东西。它(和下面要讨论的“革命约束”一起)可以算作一个令人满意的桎梏解释的两个限制中的一个,这两个解释是由科恩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桎梏的阐述中引申出来。<sup>①</sup> 根据可预测性约束,一个令人满意的桎梏概念必须是它在未来的出现能合理地预料到的概念。绝对停滞的概念没能满足这个条件,因为,正如科恩所认为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例如,资本主义要是永远持续下去,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将在某个时候完全停止下来”。<sup>②</sup>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是“相对发展桎梏”(Relative Development Fettering),也被称作“相对劣势”(Relative Inferiority)和“次优性”(Suboptimality)。<sup>③</sup> 根据这种观点,当生产力被置于一种其他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其应有的发展更为缓慢的时候,生产力就被生产关系所桎梏。这个概念比绝对停滞要弱一点,因此可能越过可预测性约束;然而它不能越过科恩所称的“革命约束”(revolution constraint)。革命约束

<sup>①</sup> Cohen 1988, pp. 109 - 110.

<sup>②</sup> 同上, p. 110.

<sup>③</sup> 在第 114 页,科恩介绍了“相对发展桎梏”(Relative Development Fettering)这个术语,虽然他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米勒(1981, pp. 96 - 97)的“相对劣势”(Relative Inferiority)术语来阐释。“次优性”(Suboptimality)这个概念来自 Elster 1985, p. 259。我采用第一个术语是因为其他术语处在发展(Development)和使用桎梏(Use Fettering)之间的模棱两可之中。

表明,为了满足由马克思归之于桎梏的解释性作用,“假定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它们就有理由被彻底变革”。<sup>①</sup> 根据科恩的观点,相对发展桎梏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因为“革命的成本和危险……使得期待一个社会经历革命只因为可能出现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设想是不理智的,尤其是当那些生产关系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形成过并且也没有发现它更加优越的情况下”。<sup>②</sup> 问题在于不只是革命的好处在没有先前的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是不确定的,还在于这些好处即使是真的,可能也并不足以激发革命行动,因为相对革命桎梏并没有暗示任何的人口贫困,并且它确实是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科恩问道:“设想在一个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时期进行革命将是冒险的,冒这样的风险只因为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将会有更快的增长,这是可信的吗? 工人会只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许诺将每代计算机的更新时限变为九个月,而推翻一个已使这个更新时限降低为一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吗?”<sup>③</sup> 141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把“桎梏”解释为不是适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适用于它们的**应用**而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论述中发现对这个观点的支持:桎梏不是对一个社会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其应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能力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为“**已经发展的生产力**”

---

① Cohen 1988, p. 110.

② 同上, p. 111; 另见 Elster 1985, p. 293; Graham 1992, p. 70.

③ Cohen 1988, p. 111.



的桎梏了，资本主义的桎梏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被**克服**。对于马克思来说，后者不为生产力的发展减缓所证实，而是被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所证明，危机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过度发展导致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sup>①</sup>

就像发展桎梏一样，应用桎梏可以被绝对地或者相对地加以定义。然而，由于关于绝对应用桎梏的说法极少是可信的<sup>②</sup>，因此我们可以集中关注相对应用桎梏——一组特殊的比其他可供选择的**生产关系更低效地应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考虑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假设即生产关系在它们可以有效应用的生产力范围内的适用是有限的，这个桎梏的概念貌似可信地满足了科恩的可预测性约束。<sup>③</sup> 它还有着比相对发展桎梏更简单更具体地可以察觉到的优点，并且因此作为一个对革命行动的动因而变得更加可信。正如格雷厄姆所认为的：

---

①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p. 40 - 4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278 页。)另见 Cohen 1988, p. 116, Elster 1985, pp. 264 - 265 和 Graham 1992, p. 69 中引用的段落，特别是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p. 78)的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大量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 页。)

② 例如，科恩定义(但是拒绝它，认为它甚至比绝对发展桎梏更不可信)绝对应用桎梏的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没有可达到的生产潜力是被应用的。取代绝对应用桎梏的一个概念被描述为一种利用任何**新的**生产力的失败。虽然这个概念可以在上述《共产党宣言》中找到支持，但是它也不能通过科恩的可预测性约束。

③ 参见 Graham 1992, p. 76; Cohen 1988, p. 114。

如果生产力的应用将有益于从属的群体已经很明显,那么这样一个假设即它们将经历挫折并试图创造生产力可以被应用获得利益的条件就有一定的可信性。那么假设这将发生在甚至没有得到发展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就没有太多可信性。<sup>①</sup> 142

然而,尽管有这些优点,但相对应用桎梏仍有一个困难。不过,一个效率低下地应用它的生产力的社会,可能比更高效应用生产力的其他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这里的效率指实际应用的可达到的生产力比例)。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就生产力的**净利用率**而言(生产潜力的后果和被应用的生产潜力比例),那么低效应用而生产力发展迅速的社会将会迅速超过高效应用但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社会。有人认为,这样的情况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后者在对现存生产力潜力的应用方面更少浪费,但更有利于发展新的生产力。<sup>②</sup> 如果对生产力的应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群众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桎梏生产力的应用将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作为对这种想法的回应,科恩提出了另一个桎梏概念:“**净桎梏**”(Net Fettering)。根据这一概念,如果由发展水平导致的生产力的利用比率结果低于其他可供选择的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力利用结果,生

---

<sup>①</sup> Graham 1992, p. 150.

<sup>②</sup> Elster 1985, p. 266, 引自熊彼特(Schumpeter)。



产关系就会桎梏生产力的应用。<sup>①</sup> 这个桎梏概念针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高比率的生产力的发展能补偿(或者胜过)一个低比率的应用;然而,它没有考虑到格雷厄姆的观点,即现存生产力的不利用是比尚不存在的生产潜力的发展更为明显、更为可信的革命动因来源。这可能表明,如果在那些具有较低发展轨迹的生产关系下可利用的生产潜力比在一个可替换的生产关系下的利用率更低,人们就有理由去推翻现存的生产关系,但是这只可能成为革命动因的现实源泉,如果这个较低的发展轨迹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是现存的但是不利用生产潜力的一个后果的话。<sup>②</sup>

143 然而,可以说,把发展桎梏和应用桎梏在一个单一的净桎梏的衡量标准内结合起来的尝试是错误的,因为应用桎梏(至少正如资本主义所表明的)最好被当作一个定性的概念。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应用问题并不是应用比例太小的问题,而是被错误应用,或者为错误的目的而被应用。正如格雷厄姆所说,它们被用来增加剩余价值,只把附带的利益留给人类;“资本主义的确比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规定了一个更不合理的应用”。<sup>③</sup> 一旦我们用这种定性的方式阐释应用桎梏,它

---

① Cohen 1988, p. 117. 当然,严格地说,我给出的定义是相对于净桎梏的。另见 Elster 1985, p. 267, 埃尔斯特主张社会产品的净增长是比较社会系统的一个相关标准。

② 实际上,这意味着,就生产力的发展和使用而言,现存的生产关系将不得不次于可替代的生产关系以提供理性的革命动机。被埃尔斯特(Elster 1985, p. 294)所考虑和拒绝的一个相关建议是,应用桎梏可能对第一个国家提供经历一场革命转变的动机,一旦第一个国家证明了它的发展的优越性,在随后的国家里,革命就有可能被发展桎梏所诱发。

③ Graham 1992, p. 152.

的影响可以被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抵消将不再是正确的。(如果你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行驶,在一个速度更快的车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而不是更好。)发展桎梏或许也可被定性地理解,正如马克思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写道,与大规模的工业相联系的生产力“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sup>①</sup> 定性地理解桎梏也增加了应用桎梏和发展桎梏同时发生的可能,因为一个不能为了确定目的而应用现存的生产力的社会不可能以符合这些目标的方式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

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就桎梏而被详细阐述的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使马克思支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发展形式。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看起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宣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它们对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或者对生产力的应用的桎梏破坏时,马克思认为人们(至少是那些对保持现状不是最重要利益的人)对不受桎梏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应用有兴趣,因此有理由去推翻桎梏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明确地认同这个视角,把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桎梏和共产主义之下的生产力不受桎梏的限制,看作是偏爱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因。然而,由于马克思归之于人们的利益驱动是人们自己的福利利益,由于人们自己的规范立场是由其对更普遍的人类福利的关心而体现出来的,所以没有理由把这样一个观点归之于他:共产主义将要从事或者应该从事不加选择的或者具有生

---

<sup>①</sup> *The German Ideology*, p. 78.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 页。)



144 态破坏性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或使用。确实,马克思自己对“片面的”或者“破坏性的”方式的批评,暗示了在增加福利的技术和那些降低福利的技术之间进行区分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发展和应用的。

第二,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使它们达到被资本主义所桎梏的水平,从而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这似乎会引起生态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发展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进行。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发展将被对利益而非人类幸福的考虑所塑造。所以问题在于,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发展,而不顾及它的生态和社会影响,并且不顾环保反对,把它当作推翻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坚持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桎梏的阶段,而避免任何这样的承诺。在描述封建生产关系如何桎梏生产力的发展并被“炸毁”之后,他们断言“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并且“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sup>①</sup> 如果如这一引言所表明的那样,到1848年,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桎梏,那么马克思没有理由(至少就桎梏而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然而,考虑到一个半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它在世界范

<sup>①</sup>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4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

国内的统治地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坚定地支持桎梏仍会发生、并且任何的生产力发展作为通向资本主义将成为一种桎梏并被“炸毁”的时代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不顾及它们的后果这一观点吗?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自己似乎转向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该文中,马克思在一个本来的意图或许是解释1848年革命失败将导致《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社会主义转变的评论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sup>①</sup>

然而,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和它持久的技术创新都得出这一结论:在桎梏发生之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与根据任何关于桎梏的解释(除了绝对停滞之外)所存在的桎梏是一致的;并且虽然在刚才引述的段落中马克思好像赞同这种解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一个没有理论根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而且马克思著作的其他段落支持不同的解释。此外,没有必要假设,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桎梏尚未发生。因为如果生产力被认为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那么它继续存在的后桎梏(*persistence post-fettering*)就可能被包容进马克思的理论中。例如情况可能是这样,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足以发挥它的破坏性作用但是还不足以发挥它的促动效应(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就导致危机和不稳定,但是没有可行的替代选择。这将与马克思的观点

---

<sup>①</sup> 1859 Preface, p. 18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即生产力的桎梏开创了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相一致。

另外,有理由认为,对桎梏的充分阐述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去支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实现桎梏的步骤。由科恩的革命约束所说明的关于桎梏的重要观点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或应用被以这样的方式限制,好比给人们(至少是革命阶级的成员)理由去用那些消除了限制的生产关系取代桎梏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样,桎梏就发生了。那么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们会有这样一个理由?

我们早先的讨论表明,人们可能基于很多理由追求生产领域里的技术创新,人们可能从不同的视角把这些理由看作技术发展的标准。例如,技术创新可能被用来增加一种产品的数量或者提升一种产品的质量,或者降低劳动投入和生产产品的货币投入,或者降低就资源利用而言的产品生产的生态后果以及污染水平。下一步就是去认可人们为追求技术发展而拥有的任何理由可能被当作一个消除对该技术发展限制的一个理由。由此可以断定,在原则上当与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相符的生产力的发展或应用被现存的生产关系所阻碍时,桎梏可能就会出现,虽然实际上每个阶层对技术发展的兴趣可能包含了这些目标中的一些,并且对发展的一种形式的限制可能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所抵消。然而,这样的相互补偿关系是有限制的,特别是关乎到人们的大部分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因此,允许生产技术发展但不是以减轻生态影响所需要的方式发展的生产关系,一旦这种受到限制的发展方式的不利影响给予足够理由废除那些生产关系时,即应被算作是桎梏。破坏效应因此不能要求这样的发展做为带来桎梏的手段而被容忍,因为只有为这种发展提供空间的社会作为一种桎梏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 （二）促动效应

不论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还是对生产力应用的桎梏,都不是推翻现存生产关系的充分理由,除非有一个比现行的生产关系更好并且可行的替代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只有这样的替代生产关系存在时,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才具有革命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任何时候,不论哪种切实可行的可替代生产关系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使得新的生产关系切实可行就是我称之为的促动效应。它可能显示出,如果我们依据相对桎梏阐述破坏效应,那么破坏效应和促动效应将意味着同一个情况,即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然而,虽然有部分重叠,但是马克思对促动效应的描述比这样一个描述所传递的信息更丰富,并且使得一组新的生产关系成为可能的条件并没有被这样一个比较穷尽。

虽然与马克思在《序言》中对他的破坏效应的描述相比,他没有提供任何生产力发展的促动效应的一般总结,但是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仅当达到一个确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最低水平时,每组生产关系才是可行的;这个观点帮助解释了马克思的信念,即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社会必须经历一系列不同的生产关系。<sup>①</sup>每一组新生产关系反过来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可能,这种发展逐渐地增加了 147

---

<sup>①</sup>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不得不解释社会的逐步发展,因为他也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每组生产关系只能从一个特定的前身那里出现,在这个前身中有的阶级有机体和能力使新的生产关系诞生。然而,这可以从下面的内容明显地看出,即由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连续的生产关系的“促动”,至少构成了马克思对它们相继出现的解释的一部分。



所生产商品的数量并超过维持生产者生活所要求的数量。正如科恩所总结的：

在第一个阶段，生产力太落后以至于还不能使一个非生产者阶层脱离生产者的劳动而生存。**物质地位**是没有盈余的一种地位，并且相应的**社会**（或者**经济**）形态主要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在物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一个规模足以支持一个剥削阶级的剩余出现了，但还不足以维持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因此，相应的社会形态是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

在第三阶段，剩余变得足够的充足，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sup>①</sup>

类似的条件可应用于阶级社会的消失。马克思明确地支持这样的主张，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由技术的进步而使之成为可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被用于降低劳动力的负担<sup>②</sup>，他还同样明确地认为必须达到一种产量的增长水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为了共产主义的成功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

---

① Cohen 1988, pp. 155 - 6.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考察了剥削社会的出现依赖于生产的增加(pp. 568 - 569)。《资本论》第一卷第七部分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积累特点。

② 例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特别是关于“工作日的界限”的第一部分以及第十五章中关于“工作日的延长”(b)的第三部分；另见《经济学手稿》第 701、708 页；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第 959 页，关于作为创造真正的自由国度的基本前提条件的缩短工作日时间的讨论。

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①</sup>

同样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按需分配为特征。<sup>②</sup> 因为旨在增加商品产量的技术发展有可能具有生态破坏性，所以有必要更准确地看待这些前提条件。然而，在上面所引用的段落中并没有内容表明马克思支持产出的一个无限增长，而且他对降低劳动力的负担的承诺，提供了一个一旦产出足以满足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就应稳定产出的理由。这不仅限制发展的生态后果，而且允许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这些后果被在生产技术中的生态效能的提高所抵消。的确，如果共产主义要求生产力发展的理由是为了使人类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那么生产技术中生态效能的提高或许被视为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在其他方面所接踵发生的生态后果将对那些需求构成一个威胁。 148

最后一点表明，生产力发展的促动效应可能既有一个定性的维度，也有一个量化的维度。这里的观点是，为了使共产主义成为可能，所需要的不只是技术能力的一个普遍增长，而是特殊种类技术的发展。这看起来似乎是对马克思用以阐述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一

---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56. 另见 p. 10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②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 32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6 页。)



个前提条件的方式的一个背离,但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描述有着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被理解为把这样一种定性的作用归因于交通技术,当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或者其他地方描述航海和船运方面的改善如何便利了商业资本的增加和对殖民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掠夺的增加时,容许工业资本成为生产的主导形式: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sup>①</sup>

我引用这段文字的目的只是想简单地表明这个观点,即生产力发展的促动效应的一个定性维度并不与马克思自己的描述相异。上面的观点是,另一种定性发展——在生产技术的“生态效能”方面的增加——可能被假设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这可能看起来与早期的对有益的发展的**桎梏**观点有所对立,生产力发展和应用的错误方向朝向破坏的目的,这可能会助长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破坏效应。然而,关键是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取决于提供实现人类需求的合理满足的技术**潜力**,

---

<sup>①</sup>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3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另见‘*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 1023,关于商业资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成长的土壤”的作用的论述;《资本论》第一卷第915页,关于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的发现和被剥削的论述。

同时还要避免可能破坏这个目标的生态问题。不过,这个潜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可能无法实现,既因为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也因为限制了技术得以发展的方式。

从本质上说,生态效能方面可能性的增强被包括在实现共产主义所必要的技术先决条件里,表明这些先决条件可能不具有生态破坏性。然而,当我们把这个与可能被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所假设的生产技术的其他定性发展一起考虑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例如,有人认为,一个这样的先决条件是这样的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与现行的生产技术条件相比使生产活动更少异化的经验。<sup>①</sup> 因此,问题是,满足所有这些先决条件的发展是否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可能想知道,消除异化的技术条件是否与那些减少生态影响的条件是相容的。到现在为止,我将只把这标识为稍后将要返回的一个问题。

## 五、解释生产发展:一个自主的趋势?

我认为(依照刚刚提到的附加条件),马克思归之于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可能在原则上由该发展的良性生态形式所产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坚定地认为具有生态破坏性的技术发展是引起一个社会

---

<sup>①</sup> 格伦德曼(Grundmann 1991b)提出了这一点。另见纳利托夫的观点(Naletov 1984, pp. 370 - 373):作为“人和技术手段之间的最理想的交流”的科学,人机工程学的发展是克服由当代生产技术所施加的劳动的异化和僵硬分化所必需的。另一种可能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成功实施所必需的技术进步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它可能被认为是克服过去计划经济的笨拙和协调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150 发生革命性变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在另一个方面,这个论点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宣称提供一个对现存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如何发生的解释理论。因此,这并不足以说明,一个假设的具有良性生态的技术发展能够破坏已经不能有效地实施和进一步发展这种技术潜力的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并且能够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技术上的先决条件。为了证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可能性的信仰,也有必要指出,这个生产力发展的概念是一个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将发生并将继续发展到未来(如果资本主义的桎梏在一个恰当的阶段被消除的话),直到创造出该社会在其中发展和成熟的条件。<sup>①</sup> 因此,解释这样一个未来发展的预设机制是否与上面所假设的与良性生态形式的发展相一致的问题就出现了。

一个最初看起来在这方面没有前途、并因此以刻板的方式提出在这个部分要解决的问题的是科恩对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自主趋势”的有影响的论述。科恩论述的问题是把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描述为“自主的”,这可能使生产力的发展看起来不受类似生态问题的出现这样情况的影响,并且规定了一个与此前的论点相比更具历史一致性的或直线性的发展的阐释。<sup>②</sup>

---

① 这个要求与科恩施加在对桎梏的解释上的“可预测性约束”相似。

② 不过,我下面的论点所要说明的是:(1) 科恩的论述给予了生产关系比他的批判者有时所意识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科恩对列文[Levine]和赖特的回复所显示的);(2) 当受科恩所导致的被建议修正的论点被包含时,就产生了一个有关生产发展的论述,这种论述认为生产力有可能受比科恩所意识到的更大范围的物质环境的影响,包括生态问题的出现和发展。

科恩把这种趋势的自主性定义为“它独立于社会结构，根植于人类环境和人类本性的基本物质事实”。<sup>①</sup> 科恩相信，马克思坚信这样的自主性，因为他的核心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解释的。”<sup>②</sup>根据科恩的看法，马克思的观点即生产力的发展解释生产关系的发展断定了前者解释的首要性。这个观点是，“一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被由它所包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解释的（比相反情况达到了一个更大的程度）”<sup>③</sup>。这种不对称要求生产力的发展至少部分地由生产关系之外的事物所解释。另外，如果不同时期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性不被看作是某种历史的偶然，那么对于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所有的各种社会结构中都有发展的趋势就必须给出一个解释。 151

对于科恩来说，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产生于三个（反社会的）事实的结合，一个有关人类环境，两个有关人类本性。第一，人类生活在一个物质短缺的环境下；第二，他们有能力发展更为强大的生产力；第三，他们有足够的理性把握由这种能力所提供的以改善他们的劳动之下的短缺环境的机会。考虑到这些事实，科恩认为：“生产力如果不总是持续的，至少也是偶发性地将倾向于扩张。”<sup>④</sup>

随之而来的困难是，基于关于人类本性和人类环境的不变事实之上的一个发展趋势，似乎不太可能经历以下这一必要的转变：从具有增

---

① Cohen 1988, p. 84.

② Cohen 1988, p. 84; Cohen 1978, p. 134.

③ Cohen 1978, p. 134; 着重点为引者加。

④ Cohen 1988, p. 86.



加生产产出达到现有水平但是付出了巨大生态代价的技术进步形式，转变到能够在减少那些代价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技术形式。然而，科恩并没有说，尽管这些不变的事实十分重要，但它们只是部分地描述了物质条件，人类在这些物质条件下运用他们的创造才能做出关于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决定。对于科恩来说，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不得不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据科恩的见解，人类的创造力使他们能够提出以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并且，他们的理性可以确保最好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和保持。然而，正如在对贾维的讨论中所表明的，人类也面临着源自人类自身所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一系列问题。承认这些问题也可能推动我们对我们的创造力和理性能力的应用，允许我们去解释和推测新的不同技术发展形式的出现。这些技术形式包括，（例如）旨在降低为满足我们需求而必须耗费的短缺原材料的数量的技术发展，或者旨在降低我们满足需求的活动的有害的无意识后果。并且，考虑到生态问题影响人类的方式取决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个描述也使这样一种假设变得貌似可行，即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技术发展特征的生态定位形式达到的程度将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中的利益结构。

最后这一点反映了马克思大部分关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特殊性的著作中所强调的内容，并提供了这样一个前景，即生产关系的变化可能促进一个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更加良性的生产力发展。然而，这表明，因为我们现在在生产力发展的动机中不仅包括了人类生存的不变事实，而且也包括人类可能经历物质短缺影响的更具体的形式，所

以正如科恩所宣称的,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再是社会结构的自主。为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科恩对另一个由列文(Levine)和赖特提出的反对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论点的回应。<sup>①</sup>

列文和赖特认为,因为人们和生产力的关系并且因此他们对生产力发展的兴趣取决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所以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能是社会结构的自主,而必须被一系列与连续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特定阶级的合理性”(class-specific rationalities)所解释。<sup>②</sup> 例如,他们认为封建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被解释为寻求降低他们的工作负荷的直接生产者的理性行为,因为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并没有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受益;相反,列文和赖特认为,封建主义之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被封建领主的利益所解释,这是由他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同样,我们或许可以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被对重视降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工人解释,因为(1) 通常工人并没有能力改变他们所应用的生产力,并且(2) 他们很少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受益;他们的工作时间甚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否则,他们就会被解雇。相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明的,资本

153

---

① Levine and Wright 1980.

② 术语“特定阶级的合理性”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实际上不是特定阶级的合理性,而是在其下它被运用的条件。列文和赖特的模型实际上认为,所有阶级的理性都遵守一个作为有效的手段一目的推理的工具理性的标准概念。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和为了达到任何特殊目的所必须做的事情的不同。



主义制度之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将被资本家的利益所解释，他们的利益不在降低工作负荷上，而在提高人均生产率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根据列文和赖特的观点，面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短缺时，不是人类普遍的理性和创造力，而是阶级利益例如封建领主或者资本家的利益——不同利益为不同的社会形态所特有——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

科恩回应列文和赖特说，他们错置了他的模型中的合理性行为。根据科恩的模型，确实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发挥作用的特定阶级的合理性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这个过程的自主性，即它对社会结构的独立性，被一个更高水平的普遍人类理性的发挥所保证。因为他们的合理性，并且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短缺的环境下，所以人们只选择那些促进并且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构。由此可以断定，一个发展趋势的存在是独立于**那个结构和那个正在发挥作用的特定阶级的合理性的**。<sup>①</sup>

因此，在科恩的论述中，社会结构的选择构成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基础，并且给这个趋势以自主性。科恩的假设是，对社会结构进行选择的动机总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追求。然而，我在上面对破坏效应的讨

---

① 科恩(1988, pp. 89 - 90)通过以下说法表达了这一观点: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自主的趋势**(因为这个趋势独立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结构而存在),但是没有一个是**自主发展的趋势**(因为生产力只有在合适的生产关系下发展)。表达这个观点的另一个可选择的方式可以这样说:存在着一种生产力发展的**超越趋势**。这个术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虽然社会结构在因果上被包含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但是就它是产生这样一种趋势的任何结构得以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而言,这个趋势是普遍的。

论中认为,结构的选择可能被技术发展的众多标准——包括生态上的考虑——所推动;而且这个动机的一些元素——对生产的生态后果的忧虑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并不是从普遍的而是特殊的环境中产生。<sup>①</sup>因为,对于科恩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选择给予生产力以发展的趋势,<sup>154</sup>由此可以断定,这个趋势可能包括社会结构的选择中发展特征的任何形式。因此,与开始的情形相反,由科恩提供的生产力发展的解释,当以我所建议的方式被拓展时,并没有使马克思承诺一个生产力发展不受生态影响的概念。我将先搁置这个术语问题,即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正如我们现在所描述的,是否可适当地称之为一个**自主**的趋势。只要说它满足了上面所阐述的非对称要求就足够了,并且如果它是一个自主的趋势,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到生产力发展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可采取不同的形式的一种自主性。

然而,对科恩的自主性论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这是他对列文和赖特的回应所不能解答的。罗伯特·布伦那(Robert Brenner)驳斥说,个人基于他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倾向**选择**社会结构这一观点是难以置信的。布伦那写到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时说:

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令人信服地认为,个别的前资本主义经

---

<sup>①</sup> 人们可能认为,在物质短缺的普遍条件下,生态问题和要花费大量时间工作的需要有着共同的来源,但是就社会结构的选择而言,问题是尽管(如果相信科恩的观点的话)这个短缺总是用后者的方式表明自身,但是当生产力足够强大并且足够庞大而耗尽资源、引起严重污染等等时,它只会以生态问题的方式表明自身。



济行为者会寻求把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与他们的生活资料隔离开来,并且打破领主与生产者之间的制度化的关系,这种制度化的生产关系使他们可以通过额外的经济强制榨取剩余价值以建立一个作为他们的再生产的规则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别的前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者会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当这样一个系统先前从没有存在过。<sup>①</sup>

在驳斥社会结构因它们的社会动力机制而被选择这一观点时,布伦那挑战了科恩的建立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自主的、超越历史的趋势的论点;他认为,因为“只有当我们设想经济行为者做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行动时,我们才能接受在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是首位的这一理论”。<sup>②</sup>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伦那的关注点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且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批判中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次要考虑。例如,它可能是封建经济行为者被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所特有的因素所阻碍,例如他们教育的缺乏,交流手段的贫乏以及预测不同社会结构影响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缺乏等等,受这些因素阻碍而不能做出由科恩归属于他们的那种选择。不过,这样的因素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或其他人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在生态考虑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能力无关。因为,从生态角度来看,正是这个

① Brenner 1986, pp. 46 - 48, 注⑬。

② 同上。

未来的转变和这个转变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最让人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把布伦那的论点即封建主义具有技术上的停滞性放在一边,<sup>①</sup>而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技术发展的存在是没有争议的。不过,有必要去解决选择生产关系的问题,为此,我们甚至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历史性的适用性论点以及科恩的观点——即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自主趋势上的,我们仍需要解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预期的转变,这个转变特别体现在非桎梏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桎梏的生产关系的选择方面。

先把针对封建主义的考虑放置一边,布伦那对这个观点——即新的生产关系是个人基于他们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倾向而有意识地选择的——进行驳斥的主要原因看起来是:(1) 这暗示了一个就革命阶级的部分成员而言,他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的不可置信的复杂理解,并且(2) 即使这样一个理解是存在的,在根据科恩的超越历史的考虑什么是合理的与根据拥有选择的主体的实际的定位和受社会限制的利益什么是合理的之间,或许是有一个差距的。

---

① 布伦那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经济行为者才确实有一个将会导致生产力的系统化发展的动机(市场竞争)。(同上,p. 34)不过,他承认甚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或许也被不同程度的期待着(同上,p. 41;参见 Carling 1991, p. 67 注④)。这个妥协对于科恩可能已经足够了,考虑到他的自主论点只坚持一个生产力的零星发展和一个发展对于衰退的优势(Cohen 1988, pp. 86, 99)。



回应这个批判的一个方式是否认这个理论要求有意识地选择新的生产关系。功能性的解释要求一个偏爱产生确定效果的结构的选择机制,但是并不要求那些效果是人为的。(请考虑一下上面所提到的鸟类的中空骨骼的解释)。艾伦·卡琳(Alan Carling)和克里斯·贝塔姆(Chris Bertram)都提供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国际竞争充当了一个新的、更具生产能力的生产关系的选择机制。<sup>①</sup>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但是那些导致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的原因,由于它们所给予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有利条件将倾向于持续存在下去。具有较低生产能力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要么可能有施加给它们的新的生产关系出现,要么可能遭受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内部危机。然而,不管这个描述的一般优点是什么,作为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描述,它面临着两个异议。第一,新的生产关系可能是由经济的或者军事的统治强加的,甚至可能是由于为了更好地抵制这样的统治而在国内采用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自己坚持自我解放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的观点相冲突。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我解放是必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过旨在推翻现存社会的集体活动,人们才能获得达到未来社会所必要的条件,并且形成一个他们所共同希望的社会蓝图。<sup>②</sup>这可能被认为特别恰当,如果这个新的社会是一个考虑生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提高的社会——生态考虑不仅是制

① Carling 1991, pp. 54 - 55; Bertram 1990. 科恩(1988, pp. 27 - 29)尝试性地概括了一个相似的论点。对科恩和贝塔姆(Bertram)的论点的批判见 Casal 1994。

② Graham 1992, pp. 135 - 138.

度化的,而且被内化到人们自己的利益概念里。第二,相应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竞争手段对社会结构的选择极可能偏爱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不可能产生一个趋向于生产发展的更易受生态影响的形式的转变。军事力量不被认为是依赖于生态的敏感性,并且,经济竞争,正如当前所构成的,倾向于瓦解个别国家维持生态标准的努力。<sup>①</sup> 新的结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它们自身隔绝于市场压力,但是很可能会面对内部压力,例如,如果它们为全体居民提供比其他社会更少的消费物品。<sup>②</sup> 这一观点所显示的是,第一,马克思表明这样的根本的变革只能在一些大的国家同时发生(为了避免可能由跨境比较所引起的消费欲望的膨胀)可能是正确的<sup>③</sup>;第二,如果社会间的竞争在刺激新的更具生态敏感性的社会结构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该竞争的根本方面必然受到质疑。换句话说,新的结构必须从一个支持生态保护而不是无限制的增长的有意识的**选择**中产生,所以难以避开布伦那关于这种选择的可能性的怀疑论。 157

对布伦那的怀疑论的一个部分的回复已经隐含在上面对桎梏的讨论之中。布伦那怀疑人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预先相信一个新的结构将增强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人们将受益于这种发展。然而,前面已经指出,

---

① 贝塔姆(1990, p. 124)自己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论点。

② 这里与在前东方集团国家里由消费物资的短缺所引起的不满有一个明显的类似点。

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51页断言了在大的工业国家同时发生革命的必要性。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第83页中注意到,与其他国家比较,通货膨胀或许会影响人们的欲望。另见下面第六章第二节对错误需要的讨论。



一个结构变革的动机可能更加可信地被建立在定性应用桎梏的模型上。这消除了在这样的动机方式中的认识困难,因为已经存在但并没有被适当应用的受益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可能比受益于例如还未实现的发展的可能性更易于被感觉到。考虑到上面所提出的假设,即一个为了某个目的而应用生产力的社会,更可能以适合那个目的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的选择将产生一个生产力以“适合的”方式发展的趋势。<sup>①</sup> 布伦那的第二个异议——关于根据超历史的人类的利益作什么是合理的与对于真实的社会中的行为者作什么是合理的之间的分歧——主要应用于早期的转变(包括构成布伦那的关注点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早期的转变中,将要建立的新的生产关系是剥削性质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少数人的阶级的利益将以大多数人的受害为代价。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除剥削并且生产力的发展将因普遍的人类利益而被追求的社会。因此,从目的上来说,这个社会是为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存在的。

这并不意味着,激发选择新的生产关系所必要的意识将会自动或不可避免地产生。马克思自己对这种意识的意识形态的障碍相当清

---

<sup>①</sup> 如果这个关于变革的解释被限制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以其他解释来辩护科恩的如下观点:在社会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趋势。例如,格雷厄姆(1992, p. 76)认为,在连续的向上发展的、包括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里,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被超历史的合理性原则所解释,而是,正如科恩所断言的,由剥削阶级的成员在强迫“被剥削阶级使用有效地技术努力工作”的一般利益来解释的。

楚,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通过暴露资本主义社会被掩盖的现实而力图克服这些障碍的实际干预。并且,这样一个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给予所许诺的益处的未来社会的可信性以及个别群体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之间存在分歧的可能性考虑,例如,考虑到短期成本降低了长期的生态问题。基于这些原因,支持变革(或革命的宣传)的论点可能需要比马克思在阐述未来社会的情况时所承认的观点更具体,比他所设想的更具价值导向,例如,倡导这样一个马克思自己所赞许的观点即个别群体的福利依赖于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关系。这种干预的成功不能被假设,但是他们的可能性使新结构的选择比布伦那所建议的更具可能性。

## 六、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所主张的观点是:技术发展可以采取带来不同生态后果的不同形式;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我们理由去假设该理论的拥护者坚信技术发展的破坏性形式;并且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所依赖的那种发展以一种允许其形式变化的方式出现是可能的,因此根据不同情况,它可能包括将降低生产活动的负面生态后果的发展形式。连接这些技术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众多形式的,是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增进人们满足他们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化的发生是因为根据人类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状况,人类的问题和需求是不同的,并且正是因为这些状况包括了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生态问题的发生,避免或者改善这些问题的技术潜力可以形成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式概念标准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产生生态问题的一个技术创新从不



被认为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在评估一个特殊的创新能否被算做一种发展时,任何生态不利条件都需要被它的益处所抵消。<sup>①</sup>

169 这里所呈现的论述有益于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既允许把生态问题的避免或者改善包括在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之中,同时也表明将生产力的发展导向一个有利于生态的方向可能不能任意实现,而必须依赖于合适的社会结构选择,而且实际上一个社会可得到的技术上可能的解决方法的范围因此可能被社会结构的选择所限制。然而,不同社会结构之下不同种类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变化,把我们带回到论点中的一个早期保留意见。在讨论促动效应时,人们承认,虽然存在谨慎地解释马克思设想的为社会主义发展所必要的生产产量的扩张,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对那种扩张进行谨慎解释的理由与需要的满足有关,马克思将后者视之为前者的目的。如果我们的需要包括例如增加了的闲暇时间和一个健康美观的环境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有理由去限制产出的增加,并改变技术发展达到这些目的的

---

① 其他的效果可以弥补生态的效果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比较不相类似的效果问题。然而,这个困难并不限于生态问题,甚至发生在作为传统的生产发展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上。劳动生产率是产品的数量和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之间的比率。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方法的比较是简单的,但是当产品的种类改变了,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或许能够考虑满足同一需求的产品,但是所满足的需求可能是可改变的。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当生态效果可以就生产的损失或者修复生态问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时,一种技术的生态效果和其他效果的比较将是简单的。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包含了审美考虑或者“生活的质量”的情况,比较可能会更困难,但是不难于任何那些包含了需求种类的比较。关于一个对劳动生产率的量化问题的讨论,见 Cohen 1978, pp. 56 - 59。

方向。不过,在马克思关于需要的讨论中,至少有一个挑战以下论点的持久要素——马克思坚信需要的**增长**,他似乎把它看作既是可欲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得出确定的结论之前,对这个观点的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上面也提到了由这样一个观点即生产力特殊的定性发展可能被隐含在促动效应中作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而引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生产力是否有可能以一种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方式被发展,例如能够降低生态影响的技术是否也能比现在的技术更少异化。因为这些定性的先决条件立足在共产主义是一个在其中人们的需要被满足的社会的观点,所以我们可能期待这个问题也将在下一章中对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的考察所阐明。



## 161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需要的满足

在上一章我考察了马克思致力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以确定他的理论是否表明他坚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或者另一方面,他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效应可通过技术发展的生态良性形式得以实现。两个这样的效应已被确定: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对现有社会形态生存能力的潜在破坏效应,二是生产的发展使新的社会形态有可能建立的促动效应。我认为,潜在的破坏效应让我们没有理由把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发展的形式归之于马克思。但促动效应的含义却不大明显。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一个有更多闲暇时间的社会,从而为那些认为生产发展的形式是为了减少劳动时间而不是要求增加生产资料的人们提供了理由,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在这里值得我们充分引述源自后者的有关的一段话,这是本章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

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①</sup>

这里应该指出三点。首先,富足的生产仅仅是马克思确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还有工作性质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它的态度;其次,所谓的富足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马克思说集体财富之源要流动得更充分。它们的流动必须富足到什么程度是这里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三点(这表明我们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把更加充足作为建立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理由:它是按需分配原则实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所要求的富足程度将取决于在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下需要的满足程度。这就是我在本章将要讨论的问题。<sup>②</sup>

①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p. 320 - 32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② 与这里所遵循的方法相反,菲利普·范帕里耶斯(Philippe Van Parijs, 1993, pp. 211 - 32)声称共产主义需要**绝对的**富足(范帕里耶斯将其定义为同时满足其成员对消费和休闲欲望的经济能力,他把它作为无望的乌托邦而抛弃了)。然而,这一声称来自范帕里耶斯对共产主义口号充满争议的解释。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口号蕴含着,“由于免费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所有商品,所以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就自发的不计报酬地提供其劳动”(p. 214)。这种(转下页)



有人可能反对说,按需分配原则没有使马克思致力于任何特定需要的满足,而只是认为需要应作为对任何有用商品分配份额的配给标准使用。然而,马克思的观点是:如果每个人的需要至少在某种最低限度上都可以得到满足,才能坚持这种分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若没有这一前提,共产主义只会导致普遍贫困,导致重新争夺稀缺资源。所以,为了减少竞争强度,作为实施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一个条件,一定水平的富足是必要的。然而,不仅如此,马克思并不把“按需分配”这一原则只是作为一个配给份额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他蔑视仅仅主张对稀少商品公平地进行重新分配的“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希望看到的社会是: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应符合人类生存的真实需求。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明确得知,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增长是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可以指责他的构想具有生态不可持续性的充足理由。一方面,马克思预期的增长是相对于19世纪的生产水平,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的进

---

(接上页)解释违背了马克思关于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无条件提供所有需求的社会构想。此外,尽管范帕里耶斯承认共产主义将为其成员提供“指导”——例如,指导他们做他们不介意义务做的大量工作——但他认为这种指导只能涉及个体在其间漠不关心的选择;“共产主义社会的男人或女人不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p. 218),因为这与包括休闲欲望在内的需求的无条件满足相冲突。然而,如果对所渴望的休闲的一些奉献被解释为只是像承诺所需要的休闲一样,那么这些奉献也符合共产主义口号;的确,尽管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但一个人被要求去工作多于渴望去工作的可能性似乎隐含在共产主义口号的第一部分中:“各尽所能。”

一步增长是否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还是有待商榷的。再者,即使马克思的理论确实使他致力于进一步扩大物质生产的生产,但这也不一定会导致环境破坏。正如在上一章所展示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产生效率的提高,随之产生的可能是比以前不是更差而是更好的生态影响。因此,如果马克思致力于产量的增加,那么他所设想的生态可持续性将取决于这种增加的程度,这反过来又将取决于产量增长所需要提供的资源消耗程度。但应当指出的是,需要满意度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未满足需要的存在似乎要求有可能加剧环境破坏的物质生产的增长。但另一方面,正如先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健康环境的保护或恢复也将被看作是人类需要的满足。因此,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作时间也许将会减少,以及上文所引述的劳动性质也将会改变。为了评估马克思理论对生态的影响及可行性,必须考虑需要在其质量以及数量方面的作用。

我将以概述需要的概念结构开始本章的讨论。这将作为随后研究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首先包括了马克思有关对人类需要最明确和最详尽的阐释所进行的最为广泛的分析和生态评估,这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可以找到相关论述;其次还包括对这一概念的几个方面的简短考察,正如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出现的

## 一、需要的概念

这几乎已经成为讨论需要时的普遍现象,既研究需要遵守“A 为了



164 Y 需要 X”的三元结构。<sup>①</sup> 这意味着,所需要的一个事物(满足因素, X)始终需要作为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的条件。可以说,“A 需要 X”的表述形式是“A 为了 Y 需要 X”的省略。这种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别需要的方式:需要可按照它们服务的目的的类别来划分。例如:有些我们为了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如空气、水和食物。有些我们为了健康所需要的东西: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有营养**的食物等等。有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中行使职责或发展壮大:如家庭、交通工具、教育、工作或其他别的什么。还有一些事物是实现我们个人的追求和愿望所必需的。可能也有些我们需要的事物是为了满足普遍目的,这是我们作为人类所共享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三元结构本身所给予的需要**概念**、不同理论家所支持的需要的各种**观念**和任何特定概念包括的需要的不同**种类**之间作出区分。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理论家承认的需要的种类(和相应的目的范围),描述他们的需要概念(包括马克思的需要概念)。

对需要概念进行三元理解的更深的含义,涉及到需要(needs)和欲求(wants)之间的关系。这些通常被视为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但根据三元结构的解释,它们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类别。虽然所有的需要都有“A 为了 Y 需要 X”的形式,但只有某些欲求才有“A 为了 Y 欲求 X”的对应形式,因为欲求可被分为以下事物:作为实现其他目标手段而被欲望的事物(如工具性的事物)和作为目的自身而被欲望的事物(如内在的

---

<sup>①</sup> 例如,见 Doyal and Gough 1991, p. 39; Barry 1965, pp. 48 - 49; Plant *et al.* 1980, p. 26。

事物),而“A为了Y欲求X”的结构只适用于前者。作为目的自身而被欲望的事物的结构就是简单地(非省略地)“A欲求X”。此外,即使拥有三元结构的工具性欲求也能根据该结构适用于两种关系的方式明确地和需要区分开来。欲求某物就是处在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它促使人们试图得到该物;而需要某物就是为了它处于这样的客观的情形:为了获得某种目的或物品,该物是必需的。因此,A为了Y欲求X取决于A对X的信念,特别是她相信X是实现Y的一种手段的信念。另一方面,A需要X不依赖于有关A对X的任何信念,但依赖于这个事实:X是实现Y的必要条件。这一区别的后果是,尽管需要陈述和欲求陈述<sup>165</sup>拥有共同的三元结构,但它们却在指涉不透明(referential opacity)方面明显不同。在需要陈述中,我们可以为X替换任何外延对应词而不改变陈述的真值,但在欲望陈述中,我们就不可以。正如大卫·威金斯(David Wiggins)所说:“如果我想有x和 $x = y$ ,则我不一定想有y。如果我想吃牡蛎,而且这个牡蛎会让我健忘,但这并不表示我要吃将让我健忘的牡蛎。但对需要来说,就不同了。如果有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是和x相同的,那我也只需要x。”<sup>①</sup>

因此,需要是一个指涉透明的语境,而欲求则是指涉不透明的。

在当前语境下,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欲求和需要是具有不同真值条件的不同概念。即使这里所谈到的欲求和需要都是指向同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的东西并不想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并不需要。例如,假设我有一个想让自己变得时尚的愿望(无论是内在的还

---

<sup>①</sup> Wiggins 1987, p. 6. 另见 Doyal and Gough 1991, pp. 41 - 42.



是工具性的愿望),可能的情况是,我**想要**一个贝雷帽以变得时尚,但我**所需要**的得以变时尚的是一个我不想要的棒球帽。因此,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赞同将某种需要满足的观念作为一个规范原则,并基于三元结构概念对该概念着手进行研究,而没有假设——像他的一些绿色批评家所假设的那样<sup>①</sup>——他因此坚持应该按照人们的欲求进行分配这样一种观点。

但三元解释并不能正当地排除这种可能性。三元解释不仅支持我们的需要和欲求往往相吻合的这一明显事实,而且通过涵盖相关目的(Y)中欲望满足的方式,还使我们能够具体阐明需要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讲,需要包括了我们的欲求的所有或部分东西。因此,我们可以采用需要的三元概念作为研究马克思对该概念使用的一个框架,而无须预先断定马克思以该种方式使用它是为了在我们的需要中包含欲求的满足。

因此,需要的三元解释似乎为研究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但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发现两种意见,它们通过表明三元结构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需要而挑战了这一目的的有效性。首先,一种意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是指“驱动”或“动力”<sup>②</sup>,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作为一个动机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由五类“基本需要”构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

<sup>①</sup> 例如,欧文和庞顿(Irvine and Ponton 1988, p. 80)认为“按需分配”原则是一种“空白支票”。

<sup>②</sup> Doyal and Gough 1991, pp. 35 - 39.

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并声称这些需要“被组织进一个相对优势的层次中”，即第一类需要主导着个体行为，直到他们获得满足之后第二类需要才出现，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此类推。<sup>①</sup> 马斯洛的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批评<sup>②</sup>，但我在这里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确定该理论是否正确，而是要确定马斯洛对“需要”一词的使用是否破坏了我对马克思需要概念的研究建立在三元结构之上的提议。其实我认为用于解释作为驱动力的需要观念的两种方式并没有破坏我的这一提议。

首先，我们可以把作为驱动力的需要观念理解为这样的主张：“需要”一词有时是指最终的、非工具性的动机。例如，保罗·泰勒(Paul Taylor)就认为，“需要”被用于“描述在欲求、动力、欲望等意义层面上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sup>③</sup> 作为非工具性动机来理解的需要/驱动力确实无法纳入三元结构，因为这种结构特别把需要表达为工具性关系。但似乎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确实以这种方式使用“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于上面所讨论的意义上使用了它，即在和“欲求”而不是和我们正常使用的“需要”有着更多共同之处的意义上使用。我们可以在以下事实中看到这一点：正如一个人可以欲求一个他不需要的东西或需要一个他不欲求的东西一样，因此一个人可以是受某种“驱使”来消费他并不需要的东西(如大量的酒精)，也可以需要一些并没有

---

① Maslow 1970, 尤其是第四章。动机理论: pp. xi, 35; “相对优势”: p. 38。

② 对于马斯洛(Maslow)的批判, 见 Doyal and Gough 1991, p. 36。

③ 引自 Springborg 1981, p. 254。



受驱使的东西(如运动或健康的饮食习惯)。<sup>①</sup> 这一提法的直觉性表明,该“需要”的意义(即使完全在字面意义上)并不重要。然而,重要的是泰勒归之于“需要”的意义和上面所讨论的意义不同,并且它似乎也不能合理纳入马克思使用共产主义口号的意义之中。我们将更加清楚的是(在下一节中):不管马克思是否指望他的“按需分配”理论能够被人们所理解,但他确实没有指望它会认可一个人恰巧拥有的任何要求或“欲求”。

167 把需要观念理解为驱动的第二种方法是由马斯洛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提出来的,其中他对需要和需要的目标进行了区分(尽管不是很清楚)。<sup>②</sup> 这并不是说“需要”是指一个人的最终动机或目标,而是说我们需要某些事物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或满足我们的驱动。和前面的解释一样,这一解释作为对马克思的一种阐释被证明是不可置信的,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一解释都可纳入到三元结构中去,因此不会对我们所提议的研究方法表现出任何的威胁。基于这样的解释,需要与“A为了Y需要X”的形式相关,在该形式中,Y是某种如马斯洛的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驱动的满足。

对运用三元框架研究马克思的需要概念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反对意见产生于马克思加之于这个概念的规范用法。有人认为,只是作为工具性关系的三元需要缺乏规范性的力量。这种观点已被用来反驳这样

---

<sup>①</sup> 参见 Doyal and Gough 1991, p. 36 中引用的汤普森(G. Thompson)的话。

<sup>②</sup> Maslow 1970, p. 38. 马斯洛显然在其他时候没有做出这种区分,例如,第 35 页:“通常作为动机理论起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生理内驱力。”

的主张,即需要概念可以作为一个能弥合“事实—价值分裂”的规范性话语基础。反对这种主张的人认为,需要陈述的任何规范性力量所拥有的驱动似乎不是来源于需要陈述本身,而是来源于一个进一步的断言——即一个隐含的评价性前提,它涉及到需要指向的目的的可欲性。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同意,“A 为了 Y 需要 X”,但这是否为 A 得到 X 提供了一个理由,将完全取决于对 Y 的评价。<sup>①</sup> 马克思的确认为需要为他的构想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但没有试图进一步证明由这些需要所服务的任何目的的正确性。这一事实致使人们怀疑,马克思所使用的“需要”的含义,是否事实上与三元分析所描述的含义是一样的。当然,马克思确实使用了三元分析所给予的含义中的“需要”,但他并没有明确其规范性地位,或者他认为隐含在其需要主张中的目的是自明的,因此也就无需为其辩护。然而,一个似乎更加合理的解释可能源于由大卫·威金斯提出的对需要主张的分析。

威金斯同意存在着一类语句,它们具有“A 为了 Y 需要 X”这种工具性结构;另一类语句则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但可用“A 需要 X”形式省略地表达。例如:

可能有人会说,“我现在需要 200 英镑来买套西服”,或者省略 169  
地说,“我需要 200 英镑”。如果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不到 200 英

<sup>①</sup> 例如,见 Barry 1965, pp. 48 - 49。斯普林伯格(Springborg 1981, pp. 252 - 274)调查了许多关于需要的性质和规范地位的近期观点。



镑的西服，那么对他的要求进行工具性的解读就是他需要 200 英镑。<sup>①</sup>

然而，威金斯认为，还有另一类需要语句，它们具有“A 需要 X”，但不是“A 为了 Y 需要 X”的省略形式。该词的这种用法体现在对要求 200 英镑买西装的那个人的可能答复中：

我们可以适当地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要求做出回应：“你需要 200 英镑买那套西服，但你并不需要 200 英镑——因为你不需要买那套西服”。<sup>②</sup>

威金斯提出，我们这里并不否认可能存在着某些进一步的目的，而该西服是为实现该目的所必需的（如果该男子通过确定某种此类目的来回应我们，这就可能表明他误解了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要否认的是，“若没有那套西服他就无法生活，若没有那套西服他的生活就将因此而毁灭，或诸如此类的事情”。<sup>③</sup> 这就是威金斯所称的需要的**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含义，并且他认为当“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它就具有了和该词相联系的实际权威。

现在看起来，威金斯挽救了“需要”一词的规范性力量，但其代价就

---

① Wiggins 1987, p. 7.

② 同上, p. 8.

③ 同上, p. 9.

是要迫使我们放弃三元结构作为研究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的工具。然而,这将对威金斯的观点引起误解,该观点并不是说绝对意义上的“需要”就和目的或意图没有关系,而是说当“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目的就和该词的含义有内在联系并由其所确定。说某物是绝对需要的言下之意,就是为避免危害必须要拥有它;因此,正如威金斯所说的那样:

我需要(绝对地)拥有 x

就等于说

如果我要避免遭受伤害,我就需要(工具性地)拥有 x

因此,“A 为了 Y 需要(工具性地拥有)X”的三元公式用于表达绝对需要概念的内部结构,其中,(凭借绝对需要的含义)Y 是用来避免危害的。我们也要牢记住这种结构,即使它也曾一度决定:在特定情况下,“需要”正被用于其绝对意义的层面上。因为危害的想法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并且需要进一步加以阐明。我们或许会说,“需要”的绝对含义把 Y 的功能固定为对危害的避免,但这还不足以绝对地来这样固定它:对危害的解释,因而对[绝对]需要的解释,将取决于人们对一个人的蓬勃发展或生活毁灭的观念。<sup>①</sup> 因此,不论对“需要”的特定使用是工具性的还是绝对性的,我们可能会希望通过考虑和需要有关的目的(Y)的方式来阐明其内容。 169

<sup>①</sup> 参见 Wiggins 1987, p. 11.



将更加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对“需要”的主要用法的确涉及到粗略定义的人类繁荣的目的和威金斯把该词的绝对意义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对危害的避免。但是，既然它是我们所关注的马克思的需要陈述的内容——他所认为的人们需要的事物的范围——而不是该词的含义，那么至于马克思是在工具性意义上还是绝对意义上使用该词的问题，将次于确定相关目的的更具体的方面。

## 二、马克思论真假需要

在前一节我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马克思使用“按需分配”的口号，并没打算赞同一个人恰巧拥有的任何推动或“驱动”。我们从马克思的几部主要著作的部分段落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观点的支持，其中，他似乎对“真”“假”需要进行了区分<sup>①</sup>——即人们确实需要的事物与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所需要的事物之间的区分——并对可能导致虚假需要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似乎与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所总结的当代绿色理论家的意见一致：“他们对需要和欲求作出了(非原创的)区分，这意味着我们的许多消费项目以及我们认为需要的物品其实是欲求的对象，这些欲求的对象在强大的说服力的支配下‘转化为了’需要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提出通过占有较少的物品使损失降至最小。”<sup>②</sup>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坚持满足人们自认的任何需要，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些需要明显地要

---

<sup>①</sup> 我们将会看到，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说法。

<sup>②</sup> Dobson 1990, p. 18.

求无限扩张。因此,如果需要的满足是一个生态上可持续性的目标,那么实际需要与认知需要之间的区分看来就是必要的了。因此,似乎在区分真假需要中,马克思朝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口号的生态可持续性解释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在探讨这一观点时,我们需要证实这样一种主张,即马克思对该口号的使用仅限于“真”需要的范围内,因为这一解释既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面会提到更多这样的理论家)的拒斥,也遭到了那些把共产主义口号作为提供无限消费的“空白支票”的绿色批评家的抵制。<sup>①</sup>

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全面阐述,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在该著作的一系列段落中,马克思不仅承认而且坚持了接近于由绿色批评家所提出的区分。例如,他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sup>②</sup>当然,马克思在该文中的确使用了“需要”一词来指如此创造的欲望,但显然这些欲望区别于他在共产主义口号的用法中所主张满足的需要。此外,在下面的段落中这种欲望被描述为“臆想”、“幻想、奇想、怪想”以及“最下流的意念”等,从而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些欲望作为真正的需要,或者至少

<sup>①</sup> Irvine and Ponton 1988, p. 80.

<sup>②</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10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在他主要使用该词的意义层面上没有这样做：

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象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sup>①</sup>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10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133页。)从这段话中以及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其他地方所说的关于除了工人最基本需要之外的所有压制中，他似乎承认了只在非工人阶级中的虚假需要的发展：一个资本家寻求“敲诈”另一个资本家、其信仰基督的朋友和邻居，以引诱放弃其赖以生存的金钱并促使他经济崩溃。下面一段话似乎也支持这一解释：“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转下页）”

虽然马克思的《手稿》包含了对人类需求的最广泛解释,但马克思 171 不只是在这部著作中区分了真假需要。例如,《资本论》的中心主题就是对旨在创造使用价值生产和旨在创造价值或(结果相同的)资本扩张的生产进行区分。马克思声称,后者具有独立于人类需要进行扩张的趋势。<sup>②</sup>事实上,马克思把这种趋势刻画为一种人类需要所从属的资本的“需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

---

(接上页)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  
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  
熏人毒气污染。”(同上, pp. 102 - 103)(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3 页。)

基于这一解释,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并接受  
这个传统中最近的一些学者如马尔库塞(Marcuse)以及资本主义绿色批评家的  
建议,即认为虚假需要的现象触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层。然而,马克  
思的进一步评论暗示了与当代看法相一致的上文中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工人  
的需要并不仅仅由私有财产制度所压制,因为他们也体验虚假需要,但他们所  
体验的**粗陋**的虚假需要与其雇主所体验的**复杂的**或**考究**的虚假需要相反:“正  
象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粗陋**的需要,而且是人为地  
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自我麻醉**,这种  
**表面**的对需要的满足,这种在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明显**的象征。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  
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  
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同上, p. 107)(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8 页。)

- ② 马克思把他对使用价值的合理性与交换价值的合理性之间的区分和亚里士多  
德的作为“谋生术”**经济(economics)**与作为“赚钱术”(把赚钱作为目的本身)的  
**货殖(chrematistics)**之间的区分进行了比较。马克思希望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  
取的中心点是,经济(使用价值生产)是有界限的,而“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  
限的。”(*Capital*, vol. I, p. 253n)(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174 页注<sup>⑥</sup>。)科利尔(Collier 1994)的著作讨论了与亚里士  
多德的这种比较。



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sup>①</sup>但是,资本的扩张“需要”不仅独立于人的需要,它还塑造了人类主体自认为拥有的需要。在竞争压力下,资本所有者如果不想从其资本所有者阶  
172 级中被驱逐出来,他们就需要扩大生产;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们转而寻求在他人身上创造假需要。<sup>②</sup>马克思在下面对其基本要素——商品进行定义时,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真正的人类需要的漠视:“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sup>③</sup>同样,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的解释来假设,产生于幻想的需要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而是幻想的或虚假的需要。

---

① *Capital*, vol. I, p. 772;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② 资本直接诱导其所有者的“需要”与它们反过来诱导其他人的那些“需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真正的工具性需要,即使不是为了人类的繁荣,它对于维持资本家的经济地位是必需的。相比之下,后者则是纯粹的幻觉。

③ *Capital*, vol. I, p. 125;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斯普林伯格(Springborg 1981, p. 106)把该段中的第二句话理解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关注需要和欲求之间区分的证据,这种理解似乎符合马克思引用巴尔本(Barbon)的话补充他的定义:“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然而,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于真假需要之间区分的说法更切合的另一种看法是,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他发现的隐含在资本主义运作中的观点,因此反映在像巴尔本这类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所表达的观点与真假需要之间区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无关,因为无论一种商品所提供的需要是否是真实的,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的决定因素都没有什么差别。此外,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由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冷漠性,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确实认为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

在把对真假需要的区分归之于马克思时,我并不否认“需要”一词对马克思确定的虚假需要这样一种现象具有合法的以及字面上的应用。如果我居住在一个生产商总是想着诱使我享受新模式的社会中,那么拥有最新产品可能真的是满足我欲望或避免情感挫折和物质匮乏、或维持我的社会地位(不落后于他人)的必要手段。而同样的是,生产商也的确需要扩大其资本作为保持资本家的一个条件。根据上述三元分析,这些都是对“需要”一词的合法使用;正是这些工具性需要主张中所隐含的目的既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构成人类繁荣的目的,也没有规定作为共产主义口号中包含的规范性原则的那种需要的意义(或者更好是概念)。

艾格尼丝·海勒(Agnes Heller)不同意这里所提出的解释——马克思正是依据这种解释区分了真假需要。她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当时)现存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这一区分都是专政的基础:

把“真正的”需要与“幻想的”需要区分开来这一起码姿态,迫使理论家站到了一个评判社会需要制度的神的立场上。只有假定人们知道哪些是“真正的”、“真实的”需要,他们才能把真正的需要与幻想的需要区分开来。当操纵理论解释了需要的非现实性时,理论家下判断的知识就只能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他的意识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正确的意识。但是,理论家又是如何知道其意识是正确的呢?①

① Heller 1985, pp. 285 - 286.



“对需要进行独裁”的危险不容忽视，但海勒的论点有两点必须要说明的地方。首先，在反对真/假需要的区别时，她至少一下子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在理论上我们是否能够区分出真假需要（换句话说，人们是否会对他们的需要产生误解）；作为与认识到的需要相反的真正需要是否应当用作商品分配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评价这样的需要，由谁来进行评价。例如，很可能会做出这种决定，即尽管个人可能会不了解自身的真正需要，但为他们确定真正需要的困难以及专政的危险是禁止把真正需要作为分配原则来使用的充分理由。然而，海勒却超越了这一点，以致到了荒谬地否认人们会有错误需要的程度。例如，她写道：“人们意识到的那些他们的需要，其实就是他们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真实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它，满足它。”<sup>①</sup>

第二点是，即使真假需要之间的区别真的有利于独裁，那这也不是拒绝承认马克思对此所做区分的充足理由。为了把马克思视作反对这种区分的同路人，需要某种文本上的证据；根据上文引用的段落，前景不容乐观。然而，海勒通过声称在这些段落中所描绘的不是**虚假的需要**而是**操纵的需要**的方式对这些段落作出了说明。<sup>②</sup>看来操纵的需要只不过是另一种名义下的虚假需要，但海勒解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拒绝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知需要中的任何评价区别都归之于马克思。她所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感受到的操纵和异化的需要与（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感受到的非操纵和非异化的需要之间的区别。拒绝承

---

① Heller 1985, p. 291.

② Heller 1976, pp. 50 - 51.

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真假需要的区别可能会消除对需要进行独裁的危险,但它也使马克思丧失了通过限制欲望满足的范围对生态稀缺(或资源稀缺的任何形式)作出回应的权利。海勒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马克思没有必要施加这样一种限制,因为一旦消除了资本主义操纵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们的已知需要就将更加适中。然而,这是不会发生的:首先因为这一发展的出现和程度本身是很不确定的(海勒自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需要将继续增加,尽管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缓慢);其次因为不论这种减少的幅度如何,在生态稀缺的不确定程度的范围内,是否充分地满足剩余欲望仍然不是确定的事情。

因此,海勒对真假需要区别的拒绝在生态上是有问题的。但它作为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也是难以置信的。海勒似乎是拒绝了一种评价性的区别(在真假需要之间)而赞同历史性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制度下感受到的需要之间)。但是,这一区别必须有评价性的方面,因为显然在上文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把海勒描述为操纵的需要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作为批评资本主义的理由之一。<sup>①</sup> 因此,我们可能会问,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操纵的需要”的特征是什么? 什么原因使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发展的已知需要不能拥有马克思所反对的特征?

答复不会是说“操纵的需要”是**异化的**,然后根据资本主义劳资关

<sup>①</sup> 下文评价海勒的观点时用引号标明“操纵的需要”(manipulated needs)这个术语,以表明我对于该术语作为描述马克思在上文引用的段落中讨论的现象的适当性有所保留。关于我有所保留的性质以及我倾向于保留“虚假需要”一词的理由将出现在下面对海勒的批评中。



系或私有财产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来定义异化；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说异化的问题是什么，直至其被确定之前我们都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某些需要将共享那些使异化需要不合乎需要的特征。它不仅仅是马克思所反对的“操纵的需要”的人为性，因为人类的许多需要，包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预计发展的那些需要，都是由人类活动中中介的。事实上，正如海勒自己意识到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需要（从而是人为的）作为自动指责的对象，而是“强调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当资本主义使人变得贫困并让其成为一个‘无需要’的工人时，它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sup>175</sup> 从而欢迎前者而反对后者。<sup>①</sup>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口号中不值得满足的需要不是因为“操纵的需要”的人为性。这样一种假定（正如海勒后期著作中的看法）也不是合理的，即马克思对“操纵的需要”的反对是建立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为，人们拥有的需要被操纵时，他们被仅仅当作满足他人目的的手段。因为虽然马克思无疑会反对有意把他人作为利用的工具，但马克思的观点是：操纵并从中受益的资本家通常这样做，不是企图使别人的利益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诱导了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即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对“操纵的需要”的反对不是单独地反对这些意图；他必然也反对这种不管是否有意制造的现实的从属关系。

事实上，海勒指出了马克思所反对的“操纵的需要”是什么，但这样

---

<sup>①</sup> Heller 1976, p. 47.

做的同时也就破坏了她从马克思理论中消除真假需要概念的声明。她是通过提出这样一种主张来引进她的“操纵的需要”想法的,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需要的发展变成扩大资本和促进其所有者利益的手段时,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可能性:人们会被操纵而感到需要一些与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丰富和多方面的”人类需要的发展相排斥的东西。<sup>①</sup>但是,我们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认知需要,但只有其中一种可以实现而不能同时实现;如果我们假设马克思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值得发展的话,根据前者的发展会阻碍后者的发展,拒绝一套认知需要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合乎情理的了。更具体地说,他反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操纵的需要”的存在对“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发展的抑制取决于这一信念,即未能发展以及满足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将是有关个人的一种损失,然而,未能发展和满足那些与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不相容的“操纵的需要”将不会这样。我们曾经说过,对于马克思而言,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是**真实的**需要,而不管它们是否被视为此类,而其他的都只是**被视为**需要,它们没有这种客观地位。

虽然海勒未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消除真假需要的区别,但她也揭示出了马克思的区别观与由多布森所考察的绿色理论家的区别观之间的重要差别。马克思与绿色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真正的需要应该不同 176于主体相信或感觉自己所需要的那些事物,但(正如马克思提及到的“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所表明的那样)他更倾向于认为真正的需要是不断完善和扩大的,而他们则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需要是适中并不断变

---

<sup>①</sup> Heller 1976, pp. 50 - 51.



化的。这种差别不应该被夸大；事实很可能是这样的，即真正的需要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认知的需要更狭隘，而在其他方面则比我们认知的需要更广泛，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事实。<sup>①</sup>此外，尽管事实上马克思通常更强调后一方面而绿色理论家则更重视前者，但我们应当记住，（正如在这一章的引言中所概述的）即使需要的增加意味着物质生产需要的增加，但它并不具有生态破坏性。然而，马克思与绿色理论家之间所强调的重点的不同，表明了对可能构成马克思真正需要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论述。这项任务将在以下各节中继续加以探求。

###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动物需要、工人需要以及人类的需要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马克思准备对人们感觉自己所拥有的“需要”与他们实际拥有的需要之间进行区分。马克思相信人们感觉的某些“需要”并不是真正的需要，因此缺乏真正需要的规范性力量。由资本主义所诱发的某些“需要”实际上抑制了一系列“丰富和多方面的”真正人类需要的发展和满足。

除了“丰富和多方面的”这一词汇之外，马克思有关真正人类需要概念与虚假需要概念的对比，迄今一直以消极性为特点。在本节和下一节中，基于（如上所述）包含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最广泛思考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将建立一种对人类需要的积极解释。我会暂时搁置起关于《手稿》中对需要的解释与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所暗含的解释

---

<sup>①</sup> 例如，见 Porritt 1985, pp. 197 - 198。

之间的连贯性问题,我这里的意图是表明:我们可以获得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与前面章节中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诠释具有兼容性。不论这一解释与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更多不完整地涉及到的人类需要是否具有兼容性,也不论这些著作是否要求对 177 这里所建立起来的解释进行修改或重新考虑,这些都将是随后考虑的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其所包含的异化理论而闻名于世。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对人性和人的需要进行阐释,它们强调了人的本性和需要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性和需要的方式。但自从《手稿》在1932年首次出版以来,评论家们就一直对“人道主义的”观点的意义争论不休,最近《手稿》在重视生态问题的评论家之间又引起了相反观点的回应。有些人利用《手稿》作为“生态马克思”的一个证据,该“生态马克思”对产生“自然的异化”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然而,其他人都反对马克思强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并反对他的关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或“人化”的解释。<sup>①</sup>

本书一再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这样的观念:例如,如果对自然的“控制”或“改造”(连同生产力发展的“控制”或“改造”)被解释为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相关的东西,并且如果我们承认它们包括了对居住于一个繁荣环境中的需要和利益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是生态上成问题的。

---

<sup>①</sup> 例如,见李(D. C. Lee)、罗特勒(Val Routley)与查尔斯·托尔曼(Charles Tolman)之间在《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 1980-1982)上的交流。



我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出出现于《手稿》中的人类需要概念是否对它们的生态组成部分给予了足够关注。但是,首先我会试图预先对产生于动物/人的对比提出反对意见,马克思就是使用该对比来建构这一需要概念的。

178 泰德·本顿承认了《手稿》中关于生态立场的正反双方的论点。一方面,本顿指出,他赞成马克思把非人类自然不仅视为满足身体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精神和审美营养之源”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交往关系的尺度能够兴盛发展的一个社会。<sup>①</sup> 另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对论述这一问题的一些著述看作具有“深刻矛盾并往往是对立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本顿对这种状况的一些担忧,但其中是马克思前面提到的人类需要独特性的观点,本顿将其作为“物种歧视”的一种形式而加以拒斥。在反对这一观点时,本顿建议,该当把人类的特性“从那些我们最初承认的我们与其他生物共有的‘自然存在’的共同内核中”分离开来,并加以详细阐释;而且,为了不恢复到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一般被理解为植根于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到的人类特定地做事方式中”。<sup>②</sup>

在对“植根于”的表达中,在我看来这一提法有含糊之处。如果是打算作为关于人类借此来发展其独特需要和力量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因果陈述的话,那么这似乎就是无懈可击的,并符合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观

---

<sup>①</sup> Benton 1992, p. 68; 参见 Benton 1989, pp. 53 - 55 和 Benton 1993, p. 24。

<sup>②</sup> Benton 1993, pp. 47, 48.

点,即由于作为有意识、有理智和社会存在的人类以特殊方式忙于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因而他们要经历一个历史进程。然而,本顿的意思似乎并不是说人类需要作为以一种特殊的人类方式而得到满足的动物需要的结果而产生的,而是说他们只是以一种人类方式而得到满足的动物需要。<sup>①</sup>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们必须指出,本顿对这一点的关注,与其说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生态意义,不如说是我们在对待动物的道德责任方面的意义,因此他使用了“物种歧视”一词。然而,虽然他当然有权认为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道德上相关的相似之处通常被低估了,但它似乎是一种矫饰和无用的语言用法,以此来(先验地?)强调每一种人类需要都被归并进动物需要的某些类别之下。在任何情况下,在评估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的生态可持续性时,最重要的并非是对马克思而言人类需要不同于动物需要的这一事实,甚至也不是它们相异的程度,而是产生于这种比较中的人类需要的**内容**。这里需要区分描述和决定两者。通过和动物需要相比较的方式,马克思描述了人类需要的内容,但这种关系是外在的和不确定的;人类需要不是由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动物需要所决定的(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因果关系上)。因此,要改变马克思对动物需要的解释,即更明确地确认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共同之处,可能需要改变描述人类需要的方式,但这就留下了那些需要的内容及其生 179

---

① 本顿对他所认为的属于马克思的观点的质疑表明了这一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即人类的需要“构成一个单独的、独特的需要的类别,超越了我们‘动物’的需要并为作为人类的我们所特有”(Benton 1993, p. 48)。



态后果未加改变。<sup>①</sup>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解释的核心是，主张真正的人类需要超过对身体生存所必需的需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否认了这一点。为了澄清这种说法，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公认的需要”一词来指那些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被公认或认可的需要。因此，马克思的主张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社会公认的需要只延伸到能使他们的肉体生存下去的事物上，以便使他们可以行使工人的职责。马克思认为，在以这种方式限制他们的需要时，工人是被资本主义作为不完全地人类来对待的。马克思认为，工人的需要被限制的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而且也记录于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著作中：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

---

① 劳伦斯·王尔德(Lawrence Wilde 1998, pp. 134 - 135)对本顿的“物种歧视”指责作出了一个不太具有让步性但仍似合理的回应。他认为马克思对动物需要的解释实际上比本顿的解释更接近事实，部分原因是本顿高估了由诸如灵长类动物使用基本工具所暗示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似度，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对动物需要的解释比本顿的解释更丰富，它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包括对狩猎、漫步和交谊的需要。

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sup>①</sup>

在《手稿》中的其他地方,马克思指出,由于“产业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正如马克思后来所称的失业工人大军)的存在,甚至工人的生存需要只能得到岌岌可危的承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sup>②</sup>

针对这一情况,可以指出的是:特别是在现代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中,为了有效行使作为一个工人的职责,所需要的事物可能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需要的事物。马克思本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以工资形式必须提供的工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生存手段、身体补给和繁衍条件,而且还包括生产“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与教育和培训相关的组成部分<sup>③</sup>,进一步说,工人的“所谓必要的要求”包含着一种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

180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22; 第二处着重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虽然马克思把他在这里一般概述的观点归之于“国民经济学家”,但他指出他心目中特指亚当·斯密的著作。

② 同上, p. 76。(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三节中使用了“产业后备军”和“相对过剩人口”的术语。

③ *Capital*, vol. 1, p. 276。(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有关的历史和道德因素。<sup>①</sup>对马克思观点的这一修正相当于他对资本主义指责口气的一种轻微(虽然只是轻微的)软化:他承认资本主义有时会——或者因为其对特定质量劳工的要求,或由于影响工人和雇主之间力量平衡的文化条件——支付工资,以涵盖单纯生存和繁衍之外的需要。然而,这并不影响此处所强调的要点:对马克思而言,只要社会承认的工人需要接近于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就远远达不到为实现全面的人的存在的需要。这一点在下面所引述的马克思论述中得到了证实,其中马克思用他惯有的讽刺手法列出了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由国民经济学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以他的那些工人的需要为代价来增加自己需要的满意度所使用的手段:

(1) 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

(2) 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象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

---

<sup>①</sup> *Capital*, vol. 1, p. 275.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4 页。)

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sup>①</sup>

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一要旨是，马克思为人类需要比身体生存所必需的需要设置了更高的水平。<sup>②</sup>对马克思来说，人类需要不仅仅是为人类继续生存所需要的条件，而且是**作为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是公认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条件。 181

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以便来观察马克思关于动物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对比是如何适合他对人类需要的其他描述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压制的需要就是最不同于人类的那些需要。因此，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存在不仅作为人类未得到全面发展的存在，而且作为类似于一种动物的存在。这种比较对于马克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104.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135页。)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生存所需的初步构想可能会从该段的续文中获得，其中马克思继续谴责了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人类需要的观点：“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

②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提出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甚至不能满足他与全人类的共同需要……他的地位甚至不允许他来满足直接产生于其人性的需要”(MECW, vol. v, p. 289)。



思有宣传价值,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喜欢被像动物般对待的想法。这种比较也可有益于那些共享或至少理解了马克思的关于动物和人类各自需要的信念的人。对这类人来说,这种比较可以作为沟通他的关于工人作为人实际拥有的需要范围与由资本主义归之于他们的需要范围之间差异的信念的简短表达方式。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虽然马克思对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对比可能会有助于解释和传播他对人类需要的阐释,以及这种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扭曲,但他的理论并不取决于准确的比较。

例如,考虑一下下面的这些段落: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sup>①</sup>

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sup>②</sup>

---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24; 第二处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6 页。)

② 同上, p. 25。(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7 页。)

这里所确定的社会承认的工人需要(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归之于它们的那些需要)的特征就是那些我们已经遇到的特征:它们仅相当于作为一种工作条件的所需或(相当于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与此同样多的东西)作为生存条件的所需,并不是全面发展的人类生存的需要。很快我们就将看到,与动物需要的比较也贯穿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阐释中;但在那里马克思借助比较所说的一切,并不都是依赖他关于动物需要的观点。因此,对动物需要的再评价(也许是认识到动物的需要,像那些工人的需要一样,比它们通常被认为的要贫乏得多),既不必影响到马克思对他比喻为动物需要的社会承认的工人需要阐释的本质,也不必影响到他把这两个种类进行对比的人类需要阐释的本质。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一个工人作为工人的需要和作为人的需要之间的对比中得出初步结论,认为他坚信需要的扩张,至少在以下意义层面上是这样的。他坚信满足工人更为广泛的需要的愿望,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承认拥有的那些需要。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目的的阐释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他拒绝由妒忌和“平均化欲望”所激发起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认为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sup>①</sup> 由于共产主义的这种形式与资本主义共享着其对人类需要的狭隘观点,因此马克思认为它并没有对工人的人性异化提供解决的方法。相反,

---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8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马克思主张一种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形式，这是由拥有“富有的人的需要”的“富有的人”居住的社会。<sup>①</sup> 根据需要的三元分析，A 为了 Y 需要 X，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只把那些 Y 的范围包括生存以及作为一个蓝领工人行使其职责的能力的需要归之于工人们，但同时马克思又说虽然这样一种需要概念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动物，但人类拥有更加广泛的目的，我们应当把这些目的看作相应的更广泛的人类需要的基础。

183 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坚信某种需要增长的观念。此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所必需的需要增长似乎并不只是从需要满足的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离散步骤，而是一种持续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即马克思批判粗陋的、低水平的共产主义，不仅因其低水平的期望，而且还因其固定性——为其自身设置“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sup>②</sup> 为了判断这一增长的意义——无论它是否需要物质生产的永久性扩张（如海勒和马克思的许多绿色批评家所表明的那样），也不管其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是什么——现在我将进一步研究扩大的以及不断扩大的需要的性质，其中马克思对这些需要的满足进行了辩护。

#### 四、异化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常常提到有关人类需要观点的两件事：第

---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p. 101, 9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2、129 页。)

② 同上，p. 8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8 页。)

一件事是,他把这些需要理解为人本质力量的发挥;第二件事是,他把这些需要理解为友谊、合作等的社会需要。其实这两个观点都可以在《手稿》中找到,并且它们也都源于马克思所(正确或错误地)认为的人类本性的那些独特特征。马克思认为,从事自由选择的、有意识地追求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而且,他通过这种活动把人与他人、人与物种连接为一个整体。<sup>①</sup> 在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力并进入到社会关系中时,人类因而可以说是实现了他们的本性,我们因而也可以把相应的需要作为**自我实现的需要**。<sup>②</sup>

挑战这种人性观的一种方式论证,由马克思所确定的作为独特的人类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动物所共享。然而,我已经指明,可以对这一点做出让步,而不另外改变马克思对人性的解释。更进一步和更有力的一种挑战,将是对马克思把生产活动置于这一解释的核心位置的原因提出质疑。正如他的绿色批评家可能认为的那样,这难道不是一种从19世纪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实践,或一种过时的启蒙的普罗米修斯精神而来的毫无根据的推断吗?

事实上,马克思的确给出了把生产活动作为超越历史的人类繁荣核心的原因。他起初认为,人的本质力量与人的感官和其他生物学上 184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68.

<sup>②</sup> 本质力量的发挥和参与社会活动可能仍被视为人性的实现,即使有其他在一定程度上共有这些特性的物种存在。正如盖拉斯(Geras 1995, p. 48)指出的那样,人性的概念可以既包括由人类和其他物种共享的特性,也包括把人类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特性。关于马克思本人对自我实现的语言的使用,例如可见本书第267页注<sup>①</sup>。



形成的(因此超越历史的)人的能力——“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无异。<sup>①</sup>但这些能力,或者“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它们不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最终形式。而是

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sup>②</sup>

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仅需要使用这些自然能力,而且需要**发展**这些能力。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存在是这一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存在之所以是这一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因为这些需要发展的能力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例如,爱);其次(即使是在这些能力可单独行使的情况下)因为像语言或艺术这类社会现象在其发展中所起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94.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② 同上, p. 9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马克思还写道,“**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同上, p. 95)(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他又写道:“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同上, p. 96)(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的作用。<sup>①</sup> 但马克思认为,真正推动了人的力量发展的以及教给我们充分使用我们的感官并提供给我们用来行使它们所使用的新材料的那些东西,就是在生产活动中探索和控制自然。这就是当他写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时所表达的意思。<sup>②</sup>

马克思立即提出的附带条件是,尽管人的本质力量通过生产活动的历史已得到了发展,但这些力量以实际上抑制了达成自我实现的异化方式而被行使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sup>③</sup> 因此,对自我实现来说,所需要的就是**自由或非异化**的生产活动。我们也许想知道,生产活动或劳动是否是可达到自我实现的**唯一**领域。这是马克思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到的,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转变它的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解放时所提出的问题。但在《手稿》中,马克思假设了自我实现要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暂时我还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185

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阐释主要是通过和异化或疏离劳动的对比方式提出来的,其中人性**没有**得以实现而是被抑制或扭曲了。<sup>④</sup> 按照马

① 上面引文引用了艺术,而同上书第 92 页则提到了语言的这种作用。

② 同上, p. 99。(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7 页。)

③ 同上, p. 98。(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8 页。)

④ 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 1986, p. 13)认为,在《手稿》中“劳动”一词是供私有制下生产活动之用的,而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它则是被用于生产活动本身。我将忽略这个区别,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克思的观点,异化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这种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sup>①</sup>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是指异化劳动的物质特征,例如,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结果。但是,关键的一点关系到其意向结构。马克思继续说道,异化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sup>②</sup>马克思在这里所主张的是,只有当它至少完成了该意图的一部分,即作为目的本身时,劳动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以发挥他的本质力量。<sup>③</sup>被别人所管制的并勉强执行的雇佣劳动,只是作为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不能满足这一标准,从而使工人从其人性中异化出来。这并不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在非异化的生产活动动机上不起作用;事实上,马克思把生产活动确认为人类在其中进行自我实现的“生命活动”,似乎

---

①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p. 65 - 66.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p. 66;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另见 p. 68:“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③ 即使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见下面第269页注①。

特别地允许(甚至要求)这样一种目标。因此,马克思似乎是说,这个目标不能是**唯一的**动机;为了通过发挥其本质力量来获得自我实现,工人必须希望并打算**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而不仅仅是**拥有**它们。

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同一时间的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On James Mill)中,马克思概述了雇佣劳动形式如何改变劳动过程的物质特征和意向结构,以降低其所导致的工人自我实现的能力:

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sup>①</sup>

然而,在暗示自我实现是在为自我的生产中完成时,这段话并不具有典型性。在接下来的一页,马克思指出,不仅雇佣劳动所促进的对一个人自身活动的工具性态度抑制了自我实现,而且它的自私自利的动

---

① ‘On James Mill’, p. 118.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机也同样抑制了自我实现：“人——这就是私有制的基本前提——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有。生产的目的是占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占有；他生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物化。”<sup>①</sup>当然，马克思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人不仅为直接的需要而生产，而且还为了交换而生产；实际上，正如倒数第二句引文所表明的那样，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生产者的直接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而为了交换所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开始占统治地位。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并没有超出自私自利的需要。相反，它只是用以满足这样的需要的中介手段，这种需要不是直接物化在本人的产品中，而是物化在另一个人的产品中……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sup>②</sup>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性不仅是创造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不仅要求能够行使自己的创造性力量，而且这样做是为了人类同胞的利益，从而表达出马克思视作人类一部分的物种团结和认知需要：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

187

① ‘On James Mill’, p. 11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4页。)

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①

在《手稿》中,我们还发现了认为人类需要包括需要适当形式的社会互动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隐含在对异化的讨论中,马克思在其中解释了工人与其产品或劳动的异化或外化是如何导致“人同人相异化”的。② 在马克思讨论不同社会形态下扩大了的需要对比意义时也可发现这一主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认为扩大了的需要满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但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从这里面找到他自

① ‘On James Mill’, p. 122.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6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sup>①</sup> 上文所讨论的这段话的主要意义是它提到了虚假或“操纵的”需要，但它还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正像当人类需要成为满足一个人生理需要的一种单纯手段时，表达一个人创造性力量的人类需要就被异化了，因而当它成为满足个人需要的一种单纯手段时，对社会交往的需要也被颠倒了。马克思认为，作为目的本身的社会交往需要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充分发展，但其在共产主义工人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预示：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sup>②</sup>

188

在此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进行拓展研究的目的已经表明，自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101.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sup>②</sup> 同上，pp. 109 - 110.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我实现的需要是马克思理解人类需要的核心,就像它在《手稿》中阐发的一样。<sup>①</sup> 我们应当根据这种事实来解释马克思坚持需要的增长必须超越那些肉体生存所必需的需要;就此而论,他坚持认为,真正的人类生存要求满足的需要,是那些在国民经济学所认可的“基本”需要之上的需要。这似乎与其说是一个应该生产什么的问题,不如说是生产活动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对过分强调基本需要的满足的反对,与其说是产生于增加物质消费的愿望,不如说是产生于对人性扭曲的关注。当人类活动成为满足这些“动物”需要的单纯手段时,人性就发生了扭曲。

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在《手稿》中不关心生理需要。在第四章我论证道,至少从《手稿》发表以后,马克思赞同我所谓的生态依赖原则。这一原则以他的关于人类作为具有生理需要的存在物的唯物主义

---

① 我们可以按照需要的三元分析表达这一点。这种分析陈述如下,即所有需要都具有“A为了Y需要X”的形式,并且马克思的要点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Y涉及到肉体生存或作为一个工人行使职责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狭隘,因为重要的规范性力量也归之于通过“自我实现”或“繁荣”来替代Y所指定的需要。这一简明陈述本身并不是非常充实,但马克思通过把创造性活动和社会互动的特定形式看成是我们为了繁荣或“实现自我”而需要做的事情(Xs)的方式使它更充实。在这里通过生存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之间的差异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生存需要中,X与Y之间的手段一目的关系是纯粹因果性的,那么就没有必要确定适当的手段以便掌握什么是生存需要。然而,如果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中,手段——力量等的行使——似乎部分地由繁荣或自我实现构成,那么“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概念意义只有在确定这些手段之后才能充分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手段部分地是由目的构成的这一事实,既解释了如何有可能行使作为一种目的本身的一个人的本质力量,也解释了如何有可能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来行使。参见上面第264页注③。



观点为前提:如果他们要生存,他们就必须满足这些需要,而且满足这些需要也是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一个条件。“劳动的实现”,即人类力量的行使,是一个物质过程。劳动在其中通过创造既对工人生存所必需又对作为进一步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所必需的对象,“实现”或者“对象化”了自身。这一观点清楚地体现在以下评论中,马克思在这一评论中指出了工人被自己的产品所异化而可能产生的后果:“劳动的实现竟如此表现为失去现实性,以致工人从现实中被排除,直至饿死。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sup>①</sup>

物质的东西不仅作为生活条件对人类力量的行使是必需的。在第四章第六节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对劳动过程进行分析时,把物质对象所起的作用确定为**劳动对象**(原料)和**劳动资料**(工具)。下面一段话承认行使人的力量需要物质东西作为对象: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

---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63.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sup>①</sup>

因此，人类需要物质资源，以维持(1)他们的生活和(2)自我实现的活动。马克思从《手稿》的以下段落中明确指出并区别了这两个原因。首先，他指出，“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第二，与他著名的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论题相联系，马克思写道，“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sup>②</sup>

物质对象作为行使人类力量的手段而被需要的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性，因为它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些力量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对物质需要的**扩大**。请考虑一下人们寻求行使其力量的某些方式。只要主体的技能和抱负得到增长，并且技术带来新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是那些在他们的要求中看起来适度的需要，也可能变得不那么适度了。园丁开始可能只是耕耘一小块土地，但如果他的野心随着其技能增长了(其他人也这样做)，那么在城市郊区的蔓延下，农村将很快消失。小提琴演奏家如果达到了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的水平，那么他可能觉得进一步提高他技能的唯一方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136; 最后的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sup>②</sup> 同上，pp. 64, 67。(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95页。)



式就是要通过获得在录音棚或音乐厅演奏的机会；自行车手可能会发现，如果不使用材料为钛（超轻型但产生加强能量的）的自行车进行锻炼的话，她的技术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样地，摄影者的自我实现将被盒式布朗尼相机（Box Brownie）所限制，而网球运动员的自我实现将被木制的球拍所限制等等。而如果我觉得我的能力只有通过汽车比赛或飞行器中才能得到最好的锻炼，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假定（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做的那样）自我实现要至少部分地在生产过程中才能达到，那么马克思把工业的历史描述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sup>①</sup>则可能意味着：通过将他们的才智和技能运用到工业生产的扩张中，工人将达到最大程度的人的实现，他们不仅发挥了他们的创造力，同时也表达出了他们作为人的团结。

这里已提出过的是，鉴于（1）马克思坚信人类需要自我实现的发展，（2）物质对象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活动的条件的必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可能也坚信，（3）这些物质需要的增长。然而，并非必定如此。因为虽然人的本质力量的行使涉及到使用和消费物质对象，但这些力量的发展不需要消费更多的对象，以作为实现更多的活动目标的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力量的发展也体现在人类智慧的应用上：在资源消耗的现有水平上，以用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实现或者增加可以实现物品。这让我们回忆起产生于早先的那种观点，即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用于增加产量，而且可以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至于

---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97.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在一定限度内)以较低的环境影响实现了生产的现有水平或增长水平。下面的这一说法的确是客观事实,即把人的智慧运用于这一目标——只要它在适当的非异化的条件下实施,例如主体的目的内在于活动之中等等——具有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发展的资格。<sup>①</sup> 同样地,就上一段落考虑的“非生产”活动而言,人的力量可能尽可能地在特定的限制内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例如,在以下情况下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体育规则限制了要使用的设备的规格——这些规则通常并不被认为是妨碍了人的力量的发展,而被认为是引导着人的力量向某一特定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发展。只要这些规则具有参与者可以接受的理由,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规则的存在破坏了他们在这一活动中自我实现的能力。 191

上述论点所展现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赞同的人类需要的扩大部分)可以以生态良性的方式得以满足,也可以以

---

① 这一主张非常符合科恩归之于马克思的人性观(如在上一章所概述的那样)。根据这种观点,人性的智慧足以设计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人性的理性足以保留起作用的那些部分。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由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提出的)是人类智慧在控制或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方面的应用不能满足在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解释中所固有的可称为“生产主义”的东西——即马克思认为,通过使用他的力量来创造将满足人类需要的新对象,自我实现包括主体人格的**对象化**(例如,见上文引用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第122页)。然而,我并不是说这种人类智慧的应用**替代了**物质对象的生产,当然这对人类生存也至关重要。而是说,源自这种生产的满足不必仅仅依赖于生产对象的数量,甚至也不依赖于其内在质量,而是可能由诸如在其生产或使用中环境破坏的副作用的相对缺乏这类外在或相关属性造成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假设,马克思的自我实现**要求**这种影响最小化,因为否则它们就会破坏对马克思而言是自我实现活动的目的的人类需要的满足。



生态破坏的方式得以满足。因此看来这种需要的结构是分离性的——人们需要**或者**以良性的方式行使其权力，**或者**以破坏性的方式发挥其力量，以达到自我实现——而为了发挥人的力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供了实现手段的社会，将是人的需要可以在其中得到满足的一种社会。<sup>①</sup>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坚信人类需要的满足似乎并没有使他相信一种(潜在地)生态破坏性的物质生产的扩张。在我看来，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的需要概念而言，这是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有一种我们需要加以考虑的异议。

## 192 五、自由选择 的 异议

对刚才概述的结论，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只以生态良性的方式使人的力量得以发挥的社会将无法**满足**自由选择自我实现的活动要求，并且因此这也将不是一个人类需要在其中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社会。<sup>②</sup>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就面对一个两难局面：要么他主张不受限制的选择人的力量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选择一些方式发挥其力量，这种方式通过带有生态问题的生产而影响别人满

---

① 另外，正如先前的脚注所提出的，自我实现可能只有通过以生态良性的方式发挥人的力量的途径来达到。不过，接下来我将只假定更加温和的、分离性的主张。

② 这种异议的前提——即自我实现的活动必须是在一种强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似乎被埃尔斯特所支持(Elster 1985, p. 524)。埃尔斯特并未明确探讨生态问题，而是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一些个体选择在其中进行自我实现的高代价活动的结果，并导致自我实现总体水平的下降。另见 Archard 1987, pp. 21, 25。

足他们需要的能力；要么他限制人可发挥其力量的方式，否定自由选择并从而破坏了那些受制于满足他们的自我实现需要限制的人的能力。不过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取决于对自我实现活动的自由选择性质的误解。这种反对意见认为，为了满足她的自我实现需要，主体必须要有绝对的选择其各种活动形式的自由，包括选择干涉他人需要满足的形式的自由。马克思所说的关于自我实现的活动的自由性质并没有支持这种解释，所以在缺乏文本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该解释合理地归咎于马克思。

对马克思而言，自由的人类活动首先可以与动物活动对比，其次可以与他认为类似于动物活动的那种异化活动对比。这里突出的一点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的活动不涉及选择的因素；它完全由以下方面所决定：

(1) 它的直接的生理需要：它“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

(2) 它的物种的本能：它“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另一方面，人类确实进行选择：

(1') 他们有能力生产足以满足其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的东西，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如何消耗其剩余的生产时间：“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sup>193</sup>

(2') 使他们能够生产出超过他们直接需要的东西的才智也把他们



从其本能中解放了出来，并且使他们能够找到满足他们需要的替代方法：“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sup>①</sup>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把真正的人类生产与类似于动物的异化生产区分开来的东西，并不是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绝对的自由，而是对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目标和方法进行控制的能力。马克思认为，这种控制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生产的目标和方法在异化劳动中不是由工人而是由他的雇主所确定。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阐释还表明了自我实现的人类活动的自由的另一个元素。他指出，异化劳动是强制性的，因为它是在肉体需要的压力下获取工资的一种手段。然而，他建议的并非是人们应该能够选择不工作——这种选择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因为生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而是劳动应该成为目的本身，所以劳动不再是强迫性的。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的”生产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即生产者在其中可以对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且在其中他们可以以活动本身及其内在目标为动机，而不是仅仅以外部因素为动机。这种自由并不需要一个人能够参加他所喜欢的任何形式的活动的的能力，也不会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破坏，即一个社会只以生态良性的方式为人的人力的发挥提供所需。

这种解释得到了以下更一般性的考虑因素的支持。诺曼·盖拉斯

---

<sup>①</sup>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p. 68 - 69.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6、97 页。)

(Norman Geras)在他的富足(abundance)的概念中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以此来反驳所谓乌托邦的指责。他认为,在缺乏决定性的文本证据的情况下,把显然荒谬的信念归咎于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有他们可能觉得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这一提法就是这样一种谬论,因为显然(即使撇开那些马克思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生态因素),不同人的认知需要可能会发生冲突。正如盖拉斯认为的那样,对于那些觉得自己需要小提琴和自行车的人来说,这两样东西可能是合适的,但对在其中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漫步的大片土地(如澳大利亚的大片土地)的认知需要,即使只被一小部分人共享,显然是不适合的。<sup>①</sup> 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在一个人追求他的自由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其行为必定有所限制。而且,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定马克思承认了这一事实。 194

有人会反驳说,盖拉斯的例子所暗示的这类限制远远超越了这样一种限制,即鉴于我们现在知道了生态稀缺,它肯定被认为是一种必需;并且鉴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技术乐观主义,现在被认为是生态不可持续的那类为了自我实现活动的资源(例如私人飞机,上一节提到的录音室等等)似乎对马克思是合理的。但是,即使认可这一反对意见,还有另一些马克思肯定承认的对个人自我实现活动更为直接的限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实现需要至少部分地通过参与合作、社会活动来达到,因此这种自我实现将受制于包含在任何合作形式中的个人限制。

---

<sup>①</sup> Geras 1989, p. 80.



这对马克思来说已经很清楚，因此，我们应该避免把摆脱了所有限制的自我实现活动的概念归咎于马克思，除非有文本证据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既然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自我实现的活动所做的描述并不要求它摆脱所有限制，我们必须摒弃自由选择异议所据以建立的这一前提。

上述论点所表明的是，建立在人的力量可发挥的方式之上的制约因素的存在，并不足以破坏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能还注意到，在它们的一般结构中，对旨在控制其生态后果的自我实现活动的制约，与生产中社会合作所要求的制约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是建立在这种方式之上的制约，即个人在其中可能从事于满足其由人类需要满足的更一般性考虑因素所激发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一种情况下将由合作劳动的产品满足的需要，另一种情况下作为生态问题的结果将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因此，如果合作的制约与自由的自我实现活动能互相兼容的话，正如我们必须假定马克思已经认定的那样，那么就有一切理由来假定生态制约也是兼容的——正如对马克思的“自由的”自我实现活动学说进行考察所表明的那样。

## 195 六、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需要

我已试图表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提供了一个人类需要的概念，其中人类需要的满足并非必然会产生有害的生态后果。这对于我的这样一种目的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即存在着人类需要的一个似乎合理的概念。这一人类需要概念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我们可以把它纳入上一章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虽然我已表

明(在行文和脚注中),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有一些段落倾向于支持《手稿》中所阐发的关于对人类需要的学说,但我仍然怀疑这些后期著作中所包含的对需要的评论,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地对马克思是不是继续坚持了《手稿》中的人类需要概念下一一定论。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是**能够**这样做的,并且由此使得生态可持续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可能。

尽管我并不是要证明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理解的连续性,但对他后期关于需要的评论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它们可能表明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使他信奉一种不同于上面描述的需要观,其次是因为它们可能有助于澄清和改进他的学说。因此,我会简要地考虑其中的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中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可能被认为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手稿》中所包括的需要概念。

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可能表明这种差异的一个方面,是他对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需要增长的热情。我们应当记得,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就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影响,但他强调说由此所引起的“需要”实际上可能是虚假需要,不符合人类发展所要求的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然而,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感知到的)需要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联系在一起,他以类似于《共产党宣言》据以闻名的方式对它大力赞赏: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



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①</sup>

196 像这样的陈述看起来似乎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其早期关于真假需要的区别,以及不顾及其所包含的内容而欣然接受了新的欲望的发展。但这种解释并不可靠。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何比较使用价值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前者旨在满足人类需要,而后者旨在生产交换价值而不管它所满足的欲望是否是真正的人类需要。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做出了类似的举动,他把“古代的观点……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与“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进行了比较。<sup>②</sup> 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确引起了“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发展,但它是扭曲和异化的形式做到这一切的:“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这些段落清楚地表明,尽管在一般看法上马克思欢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对需要的扩大感知,但他仍然批评它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马克思欢迎这一进程的原因,尽管其令人不满意的形式与他认为在《手稿》中具有重要性的人性的相同特征有关。马克思主

---

① 这段话引自 *KMSW*, p. 364 的翻译;着重点为引者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3 页。)

② *Grundrisse*, pp. 487 - 488.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6 页。)

要为了它所包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而重视人类欲望的膨胀,并且他不是仅仅将其作为增加消费的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作为人类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重视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sup>①</sup>

这个解释与马克思早期的把人类需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的解释密切对应,特别是与他的把工业历史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的解释相一致。<sup>②</sup>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的力量的增加只是内在价值;为了它创造减少工作时间的机会和消除单调的、不必要的工作,他也十分重视它的工具性。他写道,资本主义将达到其历史性的命运,当

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

① *Grundrisse*, p. 32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②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 99.



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sup>①</sup>

这段话涉及到了前面所提到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方面。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似乎在某些方面放弃了他先前的观点,即自我实现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的;现在他转而期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自我实现能在劳动过程之外达到的一种手段。但必须指出,马克思这样做的理由是不清楚的。例如,在《资本论》中,他表示了他仍希望看到以更适合人类本性的方式所进行的必要劳动,但现在却预计到了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程度的限制: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②</sup>

---

① *Grundrisse*, p. 325.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② *Capital*, vol. III, p. 959. (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

因为只看到自我实现的成就在生产过程中的有限的潜力,马克思此处的理由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不能是绝对自由的,而是被它满足的需要所限制。不过,我已经证明(在讨论“自由选择异议”时),这里所指的那种绝对自由并不是发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所必需的。另外,马克思含蓄地甚至有时明确地承认了自我实现的活动将涉及到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通过这一论点表明,马克思并未证明在生产过程中自我实现将无法完成。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理由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力量的发挥只能实现到有限的程度<sup>①</sup>,但是这实在是毫无意义的理由。正如我已经 198 指出的那样,关键是,马克思坚信需要的增长主要是指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之中或之外,这种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以资源消耗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的恶化为条件。相反,自我实现的完成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最小化,甚至可能是通过旨在带来那种最小化的活动来完成。这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会提倡利用资源,如果可以得到的话,来增加物质消耗。他所首选的理想情况是这样的,即物质消耗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减少都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还能使剩余的必要劳动时间更加充实。既然马克思认为像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那么把他描绘成一个超乎其时代的绿色理论家就是不准确的了。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已经或将要对这一情况做出回应的,其中资源稀缺(这里采取包括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能力的广泛的意义)使他的理想情况无法实现,并需要在其不同要素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这

---

<sup>①</sup> 例如,见格伦德曼(Grundmann 1991b)对技术异化的讨论。



一章我的论点是,首先,在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阐释中,隐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即他将优先考虑那些与人类的繁荣发展最密切的因素;其次,鉴于他对人类繁荣的阐释并强调它的创造性和社会自我实现的活动,他可以选择这样一种优先次序,使渴望更多消费的愿望下降到生态稀缺所要求的程度,而无须为了全人类的生存而放弃自我实现的合理水平的目标。

## 七、结论

在这一章我已试图表明,马克思坚信人类需要的满足以及扩大了的人类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导致增加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这一理解不是把马克思对“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口号的使用解释为坚信所有需要的满足或需要满足的任何特定水平,而是解释为正当的物品分配的一个标准——那些需要最多的也应该得到的最多。然而,这种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使用需要概念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一部分时,很显然他反对的不单是物品分配的不公,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特有的需要满足的绝对不足;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更公平地分享利益和义务,而是实现完美的和未异化的生活。这解释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拒绝在没有实现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的情况下实施共产主义口号的看法:因为在人类需要远未得到确保实现的情况下,这只会导致形成一般的**欲望**。<sup>①</sup> 马克思还有一个工具性的理由,要求在共产主义口号实施之前

---

<sup>①</sup> *The German Ideology*, p. 56(见本书第五章第 211 页注①②)。

某种最低限度的需要满足水平。贫困的大众化将不仅不能满足马克思使用这个口号时想要表达的价值,而且会使这个口号甚至作为一个相对分配模式也站不住脚,因为该模式将在随后的“为必需品而斗争”的过程中遭致崩溃。<sup>①</sup>

因此,既作为自己目标的一部分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马克思坚信实现某种最低限度的需要满足,而这一点反过来又成为他所提及的“更加丰富”的必要条件。但他并没有坚持**所有**需要的满足。事实上,很难看到这种信念可能是什么,因为即使我们只考虑“真正的”需要,也很容易看到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物品,而其中的每一个都将真正地有助于一个人的福祉,但却不能共同得到同样的福祉。因此,本章的任务就是要考虑在马克思使用共产主义口号以及提及人类需要时,隐含了哪种需要满足的水平。但是,当谈论“水平”时,如果它被用于暗示这是一个纯粹的数量而非质量问题,那么就可能引起误解。我认为,马克思是根据人类繁荣所需要的条件来理解需要的,但既然有很多可能会实现马克思的关于一种繁荣的人类生活概念的方式,那么就不可能提供一份作为理解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所需要的简单列表。相反,我关注的是最终目标——马克思关于人类繁荣或自我实现的概念——并认为它可能得以实现的方式应该是那些不依赖于大量的消耗或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数量的方式。

我不是说实现马克思有关人的需要满足概念可以没有**任何**物质消费的增加,因为尽管他对自我实现的阐释在物质内容及资源需求方面 200

---

① *The German Ideology*, p. 56(见本书第五章第 211 页注①②)。



是灵活的,但自我实现确实预设了更多“基本”需要如食品、住房、教育等的合理满足。由于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这些物品持续不足,所以就不能认为已经实现了马克思设想的富足。马克思的关于人类普遍繁荣的理想,需要在世界有关各地至少扩充**这些**物品的供应。为了避免由此加剧生态问题并破坏这些或其他需要,基本物品供应量的增加要通过再分配与(假设这是不够的)技术创新的某种结合来实现。<sup>①</sup>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技术创新作为避免或减轻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手段来排除掉。许多绿党们谴责这是个以“技术修复”方法解决生态问题的例子。然而,这种指责太过分了。不像绿色批评的一些其他目标那样,同时也和绿党们所维护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信奉对生态问题的无限的技术改进。当然他们的人类繁荣概念将导致他们寻求能尽可能地提高“生态效率”生产的技术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创造人类繁荣的可能性,并同时把对生态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但是,他们从技术发展中**严格要求**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限的,因此,为了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人类自我实现的基本前提,更加切实可行的改进将是必需的。

---

<sup>①</sup> 关于为了满足全球范围的基本需要增加生产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见第二章第四节提到的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著作。

## 结 语

201

与许多环境评论家的论点相反,我在本书中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主要信念,可以通过与认识环境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相兼容的方式加以合理地解释。此外,我还指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环境并且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解释方式,既在宏观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微观层面上(劳动过程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有益框架。

我的上述论点的核心,可称之为关于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观念的定性解释。根据这一解释,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线或一维的过程。既不存在它必须遵循的单一路径,也不存在能够衡量所有这些发展的单一的实质性标准。所有生产力的发展共有并符合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以某种方式对人类生存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作出了贡献并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和问题会因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这将让人想起我对科恩的批判,即虽然他正确地把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视为生产力发展背后的(最终)动力,但他错误地假定只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激



发了这种能力的发挥。由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了日益增多的生态问题,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或缓和可列入生产力的发展标准。我认为,202 这一解释与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个作用包括使他视为建立共产主义前提条件的需要满足成为可能。

在莱内尔·格伦德曼对马克思的阐释中也可发现生产力的发展应加以定性解释的想法,然而,这种阐释在其他方面与我的解释大相径庭。因此,我希望对这些分歧进行的一些简单考察将有助于澄清我个人解释的主旨和含义。

其实格伦德曼是把“生产力的增长”一词解释为对马克思具有“双重含义的”词汇:

它可以指(1)增加了对自然的掌控和(2)用日益减少的努力或在增长的富足中进行(物质资料)财富的生产。第一重含义是个人发展为普遍的人类意义上的: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征服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发展为普遍的人类,他们扩大对其周围世界的控制权,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塑造出一个世界……第二重含义主要是经济上的: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可以用经济效率的标准来衡量。<sup>①</sup>

第一重含义大致和我所提出的生产力发展的定性解释相一致,特别是其强调人类对他们周围的环境行使控制权利的需要,而第二重含义则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4.

与科恩的把发展作为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定量解释相吻合。格伦德曼正确地评论道,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两重含义是相关联的,因为“人类的尊严需要免于饥饿的程度差不多就像它需要免于来自外部的敌对性质的力量强加于他们的程度”。<sup>①</sup> 但是,我认为涉及一种双重含义的解释可能会被误导。正如我在第六章所表达的那样,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是必要的,虽然它不是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包括允许这些基本需要满足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构成一种双重含义;相反,狭义的生产发展应作为更广义的生产发展的一个要素(或组成部分或尺度)。马克思的失误并不在于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之间摇摆不定,而是在于有时他的论述似乎将这一概念仅限于更狭义的生产发展的经济形式。但总体上,格伦德曼和我都<sup>203</sup> 同意把生产力发展的广义的定性解释放置在马克思论述的核心位置上。

格伦德曼把生产发展的这种广义的定性解释与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的解释进行了对比。他写道:

我在广义上——刚才我把这一意义解释为展现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解释马克思的这一陈述,即生产力的发展贯穿历史进程的始终,并且必须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根据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一种狭义的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4.



经济意义解释这一陈述。<sup>①</sup>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格伦德曼和我的解释开始出现了分歧。虽然我很高兴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括(至少为了这个论证的目的),但在我看来,格伦德曼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反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自己立场的核心原则的反对,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对定性解释的采用。格伦德曼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自己的观点的首要问题,在于对生产关系重要性的偏离。格伦德曼承认,马克思倾向于(例如在他对土壤肥力的评论中)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引发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但他认为这一观点是一个错误<sup>②</sup>,并声称,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结构上并不(比资本主义)处于一个避免生态问题的更好的位置上”。<sup>③</sup>

是什么导致格伦德曼提出这种主张呢?他有几个理由涉及到苏联模式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特点,但正如格伦德曼认识到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模式可能在实施时并不具有这些特点。<sup>④</sup>格伦德曼还认为,集体所有制容易使社会主义社会遭受“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共物品和外在费用等问题的攻击。但这种说法太依赖于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54. 另见 pp. 235 - 236 论桎梏。

<sup>②</sup> 同上, p. 74: “我请求在这方面对马克思加以重新解释,即坦率地承认马克思自己的主要方法(即指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但不接受其作为分析当代生态问题的主要工具。”

<sup>③</sup> 同上, p. 43。

<sup>④</sup> 同上, pp. 41 - 43。

所主张的特定结构了,而且为了使格伦德曼的论据产生效用,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详细阐述和分析。格伦德曼声称,不可预见的现象和因而意想不到的后果破坏了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主体的利益结构影响到一系列可预见的后果程度而言,他的这一声称很容易遭到同样的反对。就存在着完全不能预见的后果而言,这个因素在不同的结构之间<sup>204</sup>是中立的,但不排除对那些可以预见的生态问题做出区分的社会结构。这两个论点合起来就使一些简单化的观点不可置信了,比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已足以确保更好地处理生态问题,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完全消除生态问题等等,但它们并不否认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较为适中的影响的断言。

然而,这些并不是格伦德曼否定马克思重视社会关系的主要理由。格伦德曼的主要理由源于他的这一看法(前面第五章第二节讨论过),即现代技术由于其复杂性与紧密结合,具有独立于它在其中使用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生态问题的内在倾向。格伦德曼与此类似的主张还有,复杂的现代技术本质上是异化的,因为它剥夺了工人的技能并阻碍了其对生产过程的理解。<sup>①</sup> 所以格伦德曼得出结论,认为生态问题和异化问题的解决与否不是取决于社会结构,而是取决于对科技发展实施掌控的可能性。<sup>②</sup>

我在第五章指出,格伦德曼可能夸大了现代生产技术产生生态问

---

① 格伦德曼也把这个观点归之于《经济学手稿》以及其他为《资本论》做准备的马克思的著作。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放弃了这个观点,因为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观点与其资本主义是造成异化原因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② Grundmann 1991b, pp. 140 - 141.



题的必然性,同样也可能会质疑其与异化的连接。<sup>①</sup>在任何情况下,格伦德曼的论点都不支持他的这一看法,即社会主义对生态问题的处理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有所谓产生生态问题的特征。但是,为了这一论点起见,我们假设承认格伦德曼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影响到现有技术的生态后果的说法。这仍然留下了我在第五章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释时所表明的可能性,即社会结构可能影响技术发展的轨迹,使得多少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等的技术将被开发并投入使用。果真如此,那么,社会结构仍然是——作为生态和异化的原因——一个比格伦德曼所意识到的还要重要得多的政治问题。

205 格伦德曼承认**制度变革**是必要的,以便“以对自然环境和人口减少造成不利影响的方式来形成生产力”,但他拒绝把这种制度变革主要看作是财产关系中的改革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写道,“这个解决方案对于生态问题来说具有致命的缺陷。”<sup>②</sup>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科恩解释的误解。根据格伦德曼的看法,科恩的解释

只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阶级斗争可能以斗争方式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直到有利于生产力的新的社会关系确立起来。但似乎就生态问题而言,造成严重生态破坏是某些生

<sup>①</sup> 关于这一说法的概述,见 Hughes 1993, p. 38.

<sup>②</sup> Grundmann 1991b, p. 222.

产力的根本性质。因此,如果我们依靠它们的“自主”发展的话,我们就将会目睹更多的灾难。<sup>①</sup>

就像这一段落所假定的那样,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把生产关系的变革仅仅看作按照自己不可改变的路径、并在“不动的第一推动者”意义上促进“自主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sup>②</sup>,那么格伦德曼将有权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前景。然而,格伦德曼在这里犯了与列文和赖特相同的错误<sup>③</sup>;他把上述解释的意义上的生产力的**自主发展**混同于生产力发展的**自主趋势**。在这里生产力本身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但这些关系的选择确保了生产力的最终发展。<sup>④</sup> 后者的观点是科恩的看法。虽然科恩自己是在狭隘的经济意义上考虑这种生产发展的——格伦德曼正确地认为这种狭隘的经济意义是有问题的,但我已指出,因为根据科恩的模式,正是人类利益和人类需要解释了生产关系的选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产力发展,而且因为这些利益和需要包括对一个适当环境的利益和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促使技术发展重新定向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结构选择。

格伦德曼的错误是,他没有看到以科恩的方式进行的功能解释与对技术发展有影响的社会结构和人类需要是相适应的。这使他过于严<sup>206</sup>格地区分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维度与批判维度。他认为前者是技

① Grundmann 1991b, pp. 222 - 223.

② 参见同上, p. 162。

③ 见上文第五章第五节中列文和赖特对科恩错位批判的讨论。

④ 参见上文第五章第 218 页注①。



术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而后者体现在作为人类控制其环境和满足其需要的日益增长的能力的生产发展的理想中。格伦德曼在拒绝前者(原因已如前所述)的同时欣然接受了后者。<sup>①</sup>但是,在以这种方式分离解释维度和批判维度时,格伦德曼忽略了马克思对乌托邦批判的中心点:批判性和规范性的话语必须始终与对社会进程的了解相结合。鉴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人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他思想的这两个方面是否可以这么容易地被割裂开来,事实上格伦德曼这样做的尝试歪曲了这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忽视人类利益和需要在塑造生产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是如何歪曲了马克思的解释性理论。反之,在放弃马克思的解释性理论时,格伦德曼使自己处于一种无力解读马克思的规范性理论的状态之中——这种解读把握到马克思关于人类需要理论的重要性,但忽略了他对由社会结构所中介的影响(并将继续下去)方式的敏锐洞察。

格伦德曼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对这种洞察质疑的理由。根据这种洞察,政治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设计满足两个条件的结构:第一,在这一结构中,真正的人类需要(包括生态需要)可以对技术的使用方式和新技术发展的方向施加影响;第二,在这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主体既有动机又有力量来建立新的结构。在本书中,我没有说过任何关于这些结

---

<sup>①</sup> Grundmann 1991b, p. 223. 另见 p. 234。格伦德曼的以下主张也表达了马克思理论的解释维度和批判维度之间的区分:马克思“在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之间摇摆不定”;“当他试图解释历史发展时(‘向后’型),他是技术决定论者,但当他试图评价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时(‘向前’型),他就成了一个社会决定论者”(p. 200; 参见 p. 166)。

构将会是什么样子,或甚至它们是否会成为可辨识的社会主义的结构。不过,我的确认为有理由假定这些结构将涉及到对私有财产权利的限制。我并不相信这样一种提议,即生态问题可以通过私有化自然资源来解决,以便为所有者创造一种可持续利用的利益和通过使他人承担使用或破坏资源的责任来把这种利益强加给他人的权利。在我看来,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性质以及确立主体和行动为环境损害的特别事件负有责任的因果关系的困难,致使这一战略根本无法施行。

207

当然,马克思因其没有详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并且认为这一结构的主要轮廓是简单的,其余的仅仅是稍后填补的细节,而遭到诟病。这一点在今天已被广泛并正确地视为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和存在的问题表明了探讨未来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如果要重新创建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的话,必须探讨这些问题。设计合适的结构的任务并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简单明了。生态问题使第一个标准难以满足,因为它再也不可能依赖一个未经考察的物质充裕的概念来确保需要的满足了。而第二个标准也难以满足,因为缺乏具有建立新结构的动机和能力的单一同质阶级。虽然这种变化的潜在主体的阶级被绿色理论家所强调的以下事实扩大了,即消除或减少生态问题是每个人的客观利益,但动员这个潜在主体的机会却相当渺茫,既因为这个群体内的分歧,也因为它的大部分成员在尝试这一改变时无所损失的断言不再是正确的(即使它曾经是正确的)。<sup>①</sup> 我认为,这些困难表明了在新结构时夸大了道德争论的作

---

<sup>①</sup> 参见 Cohen 1995, pp. 154 - 158。



用；而预期地朝着有利于新结构的阶段性进展的必要性，也类似于马克思关于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通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观念，尽管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然而，这些问题需要在别处探讨。我在这里试图做的就是表明，这些问题的讨论如何能够置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中，马克思对社会及其生产活动以及由该活动服务的人类需要所进行的分析如何包含着这些问题的讨论。

## 参考文献

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的作者的文献列出了作者和出版日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列出了相关篇目的标题。这样以便于快速核对引文，避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出版的诸多选集和版本而产生的混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按照标题的字母顺序列出，完成日期标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姓名之后的括弧内。

### 简称

- KMSW*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ECW*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 ).
- MESW*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

Marx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Engels [1878], *Anti-Dühring*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undated revision of 1934 edition).

Marx [1867],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Penguin/New Left Review, 1976).

[1894], *Capital*, vol. II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1844], ‘Critical Marginal Notes on the Article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by a Prussian’, in *MECW*, vol. III.

[187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MESW*.

Engels [1883], *Dialectics of Natur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41).

Marx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Engels [1890], ‘Engels to C. Schmidt in Berlin, London, October 27, 1890’, in *MESW*.

[1893], ‘Engels to F. Mehring in Berlin, London, July 14, 1893’, in *MESW*.

[1890], ‘Engels to J. Bloch in Königsberg, London, September 21[-22], 1890’, in *MESW*.

[1894], ‘Engels to W. Borgius in Breslau, London, January 25, 1894’, in *MESW*.

Marx [1858],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New Left Review, 1973).

Engels [1859],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I, in *MECW*, vol. XVI.

[1886],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MESW*.

Marx and Engels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ESW*.

Marx [1859],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MECW*, vol. XVI.

[1851], ‘Marx to Engels in Manchester. London, 7 January 1851’, *MECW*, vol. XXXVIII.

[1851], ‘Marx to Engels in Manchester. London, 14 August 1851’, *MECW*, vol. XXXVIII.

[1862], ‘Marx to Lassalle, 16 Jan 1862’, in *KMSW*.

[1844], ‘On James Mill’, in *KMSW*.

Engels [1844],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 III.

Marx [1859],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SW*.

[1866],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 Capital*, vol. I .
- Engels [1880],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 *MESW*.
- [1883], ‘Speech at the Graveside of Karl Marx’, in *MESW*.
- Marx [1853],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Surveys from Exile* (Political Writings, vol. II), ed. 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 Engels [184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MECW*, vol. IV.
- Marx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MESW*.
- Marx and Engels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J. Arthu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4).
- Engels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ESW*.
- [1876],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n *MESW*.
- Marx [1849],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no date).
- [1853], ‘The War Question.—British Population and Trade Returns.—Doings of Parliament’, *MECW*, vol. XIII.
- [1861—3],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9); part I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9); part II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2).

[1845],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ESW*.

[1847],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in *MESW*.

[1865], *Wages, Price and Profit*, in *MESW*.

### 其他引用的文献

Archard, D. (1987), 'The Marxist Ethic of Self-Realization: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Evans (ed.).

Arthur, C. J. (1986), *Dialectics of Labour* (Oxford: Blackwell).

Attfield, R. (1991),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2nd edn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5), *Value, Obligation and Meta-Ethics* (Amsterdam: Rodopi).

Attfield, R. and Belsey, A., eds. (1994), *Philosoph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hro, R. (1982), *Socialism and Survival* (London: Heretic Books).

Bakhurst, D. (1991),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y, B. (1965), *Political Argument*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arry, J. (1994), 'The Limits of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 Gree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Praxi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
- Benton, T. (1979), 'Natural Sciences and Cultural Struggle: Engels and Philosoph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Mephram and Ruben (eds.).
-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New Left Review* 178.
- (1991), 'The Malthusian Challenge: Ecology, Natural Limits and Human Emancipation', in Osborne (ed.).
- (1992),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A Reply to Reiner Grundmann', *New Left Review* 194.
- (1993), *Natural Relations: Ecology, Animal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Verso).
- Bertram, C. (199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182.
- Bertram, C. and Chitty, A., eds. (1994), *Has History Ended? Fukuyama, Marx and Modernity* (Aldershot: Avebury).
- Blackburn, R. J. (1990), *The Vampire of Reason* (London: Verso).
- Bottomore, T., ed. (1991),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 Brennan, A. (1988), *Thinking About Nature: an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Value and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 Brenner, R. (1986),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

- ment', in Roemer (ed.).
- Bugliarello, G. and Donner, D. B., eds. (1979),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ures, R. (1991), 'Ethical Dimensions of Human Attitudes to Nature', *Radical Philosophy* 57.
- Callicott, J. B. (1989),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allinicos, A., ed. (1989), *Marxist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pra, F. (1983), *The Turning Point* (London: Fontana).
- Carling, A. (1991), *Social Division* (London: Verso).
- Casal, P. (1994), 'On Societal and Glob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Bertram and Chitty (eds.).
-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9), 'Reply to Elster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in Callinicos (ed.).
- (1995),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H. S. D., Freeman, C., Jahoda, M. and Pavitt, K. L.



- R. , eds. (1973),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Collier, A. (1979), 'Materialism and Explanation in the Human Sciences', in Mepham and Ruben (eds.).
- (1994), 'Value, Rationa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Radical Philosophy* 66.
- Commoner, B. (1971), *The Closing Circle* (London: Jonathan Cape).
- Daly, H. E. , ed. (1980), *Economics, Ecology, Ethic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Devall, B. and Sessions, G. (1985), *Deep Ecology*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 Dickens, P. (1992), *Society and Nature :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Dobson, A. (1990),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win Hyman).
- Dower, N. , ed. (1989),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ldershot: Avebury).
- Doyal, L. and Gough, I . (1991), *A Theory of Human Need*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 Eckersley, R. (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UCL Press).
- (1998), 'Beyond Human Racism', *Environmental Values* 7.

- Ehrlich, P. R. (1968),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 Ehrlich, P. R. and Harriman, R. L. (1971), *How to be a Survivor: A Plan to Save Spaceship Earth* (London: Pan/Ballantine).
- Ekins, P. (1991), 'Growth Without End...?', *Guardian*, 18 July, p.29.
- Elliot, R., ed. (1995), *Environmental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iot, R. and Gare, A., eds. (1983),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The Case fo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Callinicos (ed.).
- Enzensberger, H. M. (1974),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New Left Review* 84.
- Evans, J. D. G., ed. (1987), *Moral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lecture series, 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igl, H., Scriven, M. and Maxwell, G., eds. (1958),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I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ox, W. (1990), *Towards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London: Shambhala).
- Freeman, C. (1977), 'Economic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piegel-Rösing and Solla Price (eds.).
- Gare, A. E. (1995),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eorge, S. (1977), *How the Other Half D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eorgescu-Roegen, N. (1980),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 in Daly (ed.).
- Geras, N. (1989),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Callinicos (ed.).
- (1995), *Solidarit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Humankind* (London: Verso).
- Goldsmith, E., Allen, R., Allaby, M., Davoll, J. and Lawrence, S. (1972),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London: Tom Stacey).
- Goodin, R. E.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rz, 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 Graham, K. (1992), *Karl Marx: Our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for a Post-Leninist Worl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Green, K. (1996), 'Two Distinctions in Environmental Goodness', *Environmental Values* 5.
- Grundmann, R. (1991a),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87.
- (1991b),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ll, G. (1972a), *Ecology: Can We Survive Under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2b), 'Class Aspec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World Marxist Review* 8.
- (1974), *The Energy Rip-Of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rdin, G. (1977), 'Living on a Lifeboat', in Hardin and Baden (eds.).
- (1980),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Daly (ed.).
- Hardin, G. and Baden, J., eds. (1977), *Managing the Common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Hayward, T. (1997), 'Anthropocentrism: A Misunderstood Problem', *Environmental Values* 6.
- Hegel, G. W. F. (1975), *Log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ler, A. (1976),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 (1985), *The Power of Shame. A R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ughes, J. (1993), 'The Red and the Green' (review of Grundmann 1991b), *Radical Philosophy* 63.
- Hull, D. L. (1974),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 Ilyenkov, E. V. (1982), *The Dialectics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 (Moscow: Progress).
- Irvine, S. and Ponton, A. (1988), *A Green Manifesto* (London: McDonald).
- Jacobs, M. (1997), *Greening the Millennium?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 Jamieson, D. (1998), 'Animal Liberation is an Environmental Ethic', *Environmental Values* 7.
- Jarvie, I. C. (1983),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mments on Skolimowski's Paper', in Mitcham and Mackey (eds.).
- Johnson, L. E. (1993), *AMorally Deep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meny, J. G. and Oppenheim, P. (1956), 'On Reduc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7.
- Kolakowski, L. (1969), *Marxism and Beyond* (London: Pall Mall).
-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orsgaard, C. (1983), 'Two Distinctions in Goodn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92.
- Layton, E. (1977), 'Condition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piegel-Rösing and Solla Price (eds.).
- Lee, D. C. (1980), 'On the Marxia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2.
- (1982), 'Towards a Marxian Ecological Ethic: A Response to Two Crit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4.
- Lee, K. (1989), *Soci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Scarcity* (London: Routledge).
- Levine, A. and Wright, E. O. (1980), 'Ration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 123.
- Lovelock, J. (1995),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w, N. and Gleeson, B. (1998), *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 Luká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 Lukes, S. (1985),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Kibben, W. (1990), *The Death of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cLellan, D. and Sayers, S., eds. (1990), *Socialism and Mo-*



- rality (London: Macmillan).
- Malthus, T. R. (1986a), *Works*, ed. E. A. Wrigley and D. Souden, 8 vols.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 (1986b),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st edn, in Malthus (1986a), vol. I.
- (1986c),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6th edn, in Malthus (1986a), vols. II—III.
- (1986d), 'Population', in Malthus (1986a), vol. IV.
-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Mathews, F. (1991), *The Ecological Self* (London: Routledge).
- (1995), 'Value in Nature and Meaning in Life', in Elliot (ed.).
- Matthews, W. H., ed. (1976a), *Outer Limits and Human Need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 (1976b), 'The Concept of Outer Limits', in Matthews (ed.).
- Meadows, D. H., Meadows, D. L., Randers, J. and Behrens, W. W. (1974),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Pan).
- Mephram, J. and Ruben, D. H., eds. (1979),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vol. II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Mesarovic, M. and Pestel, E. (1975), *Mankind at the Turning*

- Point (London: Hutchinson).
- Miller, R. (1981),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review of Cohen 1978), *Philosophical Review* 90.
- (1984), *Analyzing Marx*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tcham, C.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Bugliarello and Donner (eds.).
- Mitcham, C. and Mackey, R., eds. (1983),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oore, S. (1975), 'Marx and Lenin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t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4.
- Naess, A. (1973),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6.
- Naess, A. and Rothenberg, D.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gel, E. (1961),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9), *Teleology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aletov, I. (1984), *Alternatives to Positivism* (Moscow: Progress).
- Norman, R. (1996), 'Interfering with Natur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



- Odum, E. P. (1975), *Ecology*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O'Neill, J. (1993), *Ecology, Policy and Politics: Human Well-being and the Natur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O'Neill, O. (1986), *Faces of Hunger: An Essay on Poverty,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Oppenheim, P. and Putnam, H. (1958), 'Unity of Science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in Feigl, Scriven and Maxwell (eds.).
- O'Riordan, T. (1976),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Pion).
- Osborne, P., ed. (1991), *Socialism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London: Verso).
- Parsons, H. L., ed. (1977),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Passmore, J. (1974),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 (London: Duckworth).
- Pearce, D., Markandya, A. and Barbier, E. B. (1990),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 Pepper, D. (1993), 'Anthropocentrism, Humanism and Eco-Socialism: A Blueprint for the Survival of Green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
- Plamenatz, J. (1963),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Longman).
- Plant, R., Lesser, H. and Taylor-Gooby, P. (1980), *Political*

- Philosophy and Social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Plekhanov, G. (1937),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Porritt, J. (1985),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lackwell).
- (1991), 'Global Warning',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0 May, p.15.
- Prinz, A. M. (1969), 'Background and Ulterior Motive of Marx's "Preface" of 185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0.
- Raz, J. (1984), 'Right-Based Moralities', in Waldron (ed.).
- (1986),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dclift, M. (1989), 'Turning Nightmares into Dreams: The Green Movement in Eastern Europe', *The Ecologist* 19.
- Regan, T. (1988),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 Rifkin, J. and Howard, T. (1980),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 Viking Press).
- Roberts, M. (1996), *Analytical Marxism: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 Roemer, J. E. (1982),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Deductive Marx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
- Roemer, J. E., ed. (1986),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 Rolston, H. (1994), 'Value in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 in Attfield and Belsey (eds.).
- Routley, V. (1981), 'On Karl Marx as an Environmental Hero', *Environmental Ethics* 3.
- Ruben, D. H. (1979),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Sayers, S. (1984),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A Critique of G. A. Cohen', in Sayers and Osborne (eds.).
- (1991), 'F. H. Bradley and the Concept of Relative Truth', *Radical Philosophy* 59.
- Sayers, S. and Osborne, P., eds. (1990), *Socialism,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A Radical Philosoph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Schaffner, K. F. (1967), 'Approaches to Reduc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34.
- Schmidt, A.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 Searle, J.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 Sen, A. (1982), *Poverty and Fami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haw, W. H. (1978),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Bottomore (ed.).
- Singer, P. (1993), *Practical Ethics*, 2nd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limowski, H. (1981), *Eco-Philosophy: Designing New Tactics for Living* (Boston: Marion Boyars).
- (1983), 'The Structure of Thinking in Technology', in Mitcham and Mackey (eds.).
- Sober, E. (1995), 'Philosophical Problems for Environmentalism', in Elliot (ed.).
- Spiegel-Rösing, I. and Solla Price, D. de, eds. (1977),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 Spretnak, C. and Capra, F. (1986). *Green Politics* (London: Paladin).
- Springborg, P. (1981), *The Problem of Human Needs and the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Sylvan, R. and Bennett, D. (1994), *The Greening of Ethics*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 Taylor, P. W. (1986),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mpanaro, S. (1975), *On Mat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Tolman, C. (1981), 'Karl Marx, Alienation and the Mastery



-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3.
- Van Parijs, P. (1982), 'Functionalist Marxism Rehabilitated: A Comment on Elster', *Theory and Society* 11.
- (1993),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dron, J. (1984),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K. J. (1979), 'Ecological Limits and Marxist Thought', *Politics* 14.
- Watson, R. (1983), 'A Critique of Non-Anthropocentric Biocentr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5.
- Wiggins, D. (1987), *Needs, Values, Truth* (Oxford: Blackwell).
- Wilde, L. (1998), *Ethical Marxism and its Radical Cr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L. (1973), 'Functions', *Philosophical Review* 82.

## 索 引

(条目后数字指英文本页码,即本书边码)

- abundance, 富足、丰裕, 147, 161 - 162, 197, 199, 200
- acid rain, 酸雨, 35
- aesthetic value, 审美价值, 33 - 34
- agriculture, see also ecoregulation, 农业, 56, 105, 109, 123; 另见  
生态调节
- alienation, 异化, 174, 177, 182, 183 - 191, 192, 193, 196, 204
- animal liberation, 动物解放, 19
-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主义 16
- broad, 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27, 32 - 33, 34
- extended, 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19 - 20, 34
- 另见自然中的价值
- Archard, D., 阿查德, 192 注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271 注
- Arthur, C. J., 阿瑟, 185 注



- Attfield, R., 阿特菲尔德, 9 注, 15, 19 注, 21 - 23, 24
- automation, 自动化, 129 - 131
- autonomy, 自主
-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自主和生产力的发展, 149 - 155, 205
  - and domination, 自主和控制, 31
- Bahro, R., 巴罗, 98
- Barry, B., 巴里, 164 注, 167n
- Barry, J., 巴里, 1
-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基础和上层建筑, 73 - 75, 91, 115 - 116;  
另见功能解释
- Bennett, D., 贝内特, 28n, 29n
- Benton, T., 本顿, 48, 49n, 52 - 3, 92, 93, 94 注, 104 - 110,  
113, 177 - 178
- Bertram, C., 贝塔姆, 155 - 156
- biocentrism, 生物中心主义, 16, 21, 24, 28
- Blackburn, R. J., 布莱克本, 110 - 114
- Bookchin, M., 布克金, 22 注
- Brennan, A., 布伦南, 28 注, 65 - 70
- Brenner, R., 布伦那, 154 - 155, 157 - 158
- Bures, R., 布莱斯, 16 注

- Callicott, J. B., 卡利考特, 19 注, 21, 22 注, 65 - 67
- capital, 资本, 55, 79, 171 - 172, 175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制度), 36, 95, 108 - 109, 113 - 114, 150, 152 - 153, 177 - 183, 187, 195 - 197, 199, 203
- and false needs, 资本主义和虚假需要, 169 - 175
- as a fetter, 作为一种桎梏的资本主义, 140, 143 - 145
- capitalists, 资本家, 153, 171 - 172, 175
- Capra, F., 卡普拉, 66 - 67, 70, 73 - 7, 79, 97 - 98, 131 注
- Carling, A., 卡琳, 74 注, 81 注, 83 注, 155 - 156
- Casal, P., 凯塞尔, 156 注
- Cohen, G. A., 科恩, 4, 74, 81, 82, 116 - 119, 123 注, 125 注, 129, 131 注, 136 - 138, 139 - 142, 145, 147, 150 - 155, 157 注, 159 注, 201, 202, 205
- Collier, A., 科里尔, 118, 120, 171 注
- Commodity, 商品, 78 - 79, 90, 172
- commodity production, 商品生产, 171 - 172, 186, 196
- Commoner, B., 康芒纳, 127 注
- Communism, 共产主义(制度), 36, 122, 138 注, 143, 147 - 149, 150, 156, 161 - 163, 177, 182 - 183, 202
- crude, 粗陋的共产主义, 162, 182 - 183
- communist slogan, 共产主义口号, 18, 161 - 163, 170, 172, 198 - 199
- consciousness, 意识
- moral, 道德意识, 17



- revolutionary, 革命的意识, 157
- consumption, 消费、消耗、消耗量, 44, 48, 52, 56, 60, 120, 188, 190, 196, 199 - 200
- Darwin, C., 达尔文, 94, 99, 138
- Deep Ecology, 深生态学, 1 - 2, 8 注, 28 - 30, 65
- demography, 人口统计学, 51, 111 - 113
- determinism, 决定论, 73, 77, 90, 115, 124, 206
- Devall, B., 德瓦尔, 28 注
- dialectics, 辩证法, 73, 74, 75
- Dickens, P., 狄更斯, 92 - 93, 98
- Dobson, A., 多布森, 8 注, 10 注, 47 注, 66 注, 67 - 68, 169, 176
- Dower, N., 道尔, 21 注
- Doyal, L., 多亚尔, 166 注
- Eckersley, R., 埃克斯利, 16 注, 19 注, 22 注
- ecocentrism, 生态中心主义, 16, 20, 21, 28, 65
- ecological limits, 生态限制(极限), 见自然限制(极限)
- ecological problems, definition of, 生态问题的定义, 7 - 15, 19
- ecology, 生态学
- metaphysical, 形而上学的生态学, 65 - 68, 72, 73, 75 - 83
  - scientific, 科学的生态学, 8 - 9, 11, 65, 73, 93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44, 45 - 46, 52, 56 - 57

- eco-regulation, 生态控制(生态调节), 105 - 108
- Ehrlich, P. R., 埃尔利希, 40 - 42, 47, 54n
- Ekins, P., 伊金斯, 46 注
- Elliot, R., 埃利奥特, 17 注
- Elster, J., 埃尔斯特, 4, 78 注, 80 - 83, 137 注, 138 注, 139 注, 140 注, 141 注, 142 注, 192 注
- emergent properties, 突现性质, 76
- entropy, 熵(热力学函数), 见热力学
- environmental ethics, 环境伦理学, 16, 20, 26 - 27; 见自然中的价值
- environmental problems, 环境问题(环保问题), 见生态问题
- Enzensberger, H. M., 恩岑斯贝格, 10 - 11
- explanatory primacy, 解释的首要性, 74, 137, 150
- fettering, 桎梏, 62, 75, 139 - 146
- Absolute, 绝对桎梏, 139 - 140
- Net, 净桎梏, 142 - 143
- Qualitative, 定性桎梏, 143, 157
- Relative, 相对桎梏, 140 - 141
- Use, 应用桎梏, 141 - 142
- feudalism, 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152, 154 - 155
- Feuerbach, L., 费尔巴哈, 96, 100, 102
- flourishing, 繁荣



- of humans, 人类的繁荣, 27, 122, 169, 183, 195, 196, 198, 199 - 200
- of non-humans, 非人的繁荣, 20 - 22
- Fox, W., 福克斯, 29 注, 30
- freedom, 自由
- realm of, 自由的领域, 197
- and self-realisation, 自由和自我实现, 183, 184 - 185, 192 - 194
- Freeman, C., 弗里曼, 125 注
- functional explanation, 功能(性)解释, 74, 80 - 83, 136 - 139, 155
- Gare, A., 盖尔, 17 注, 92 注
- geography, 地理(学), 111 - 114
-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 110
- George, S., 乔治, 57 注, 200 注
- Georgescu-Roegen, N., 乔治-罗根, 61 注
- Geras, N., 盖拉斯, 17 注, 183 注, 194
-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15, 19, 35, 111
- Goldsmith, E., 戈德史密斯, 14 注, 15 注, 43 注
- Goodin, R. E., 古丁, 34 注
- Gorz, A., 高兹, 60 注
- Gough, I., 戈夫, 166 注
- Graham, K., 格雷厄姆, 90, 116 注, 118, 120, 140 注, 141 - 142, 143, 156 注, 157 注

-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15, 58
- Grundmann, R., 格伦德曼, 9 注, 13 - 15, 20, 22, 30 - 33, 53, 54 注, 87, 125 注, 127 - 129, 149 注, 198 注, 202 - 206
- Hall, G., 霍尔, 3 注, 10, 58, 76 注
- Hardin, G., 哈丁, 40 - 42, 47
- Harriman, R. L., 哈里曼, 42 注
- Hayward, T., 海沃德, 16 注
- Hegel, G. W. F., 黑格尔, 7, 73, 110
- Hegelianism, 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 79, 94, 99
- Heller, A., 海勒, 172 - 176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 and human dependence upon nature,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依赖于自然, 86 - 120
  - narrow and broad, 狭义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114 - 119
- holism, 整体主义(论), 87
- ethical, 伦理整体主义, 22, 28
  - and Marx's method, 整体主义和马克思的方法, 75 - 80
  - metaphysical, 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 29, 65, 66 - 68
- Howard, T., 霍华德, 61 注
- Hull, D. L., 赫尔, 70 注, 71 注
- human nature, 人性, 92, 101, 151, 177, 183, 192 - 193



- idealism, 唯心主义, 65, 94, 100 - 103
- ideology, 意识形态, 49 - 50, 157 - 158
- industry, 工业、产业, 184, 190, 196
- instruments of labour, 劳动资料, 104 - 108, 122 - 126, 189
-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国际竞争, 155 - 157
- Irvine, S., 欧文, 47, 66 注, 131 注, 165 注, 170 注
- 
- Jacobs, M., 雅各布, 46 注
- Jamieson, D., 贾米森, 19 注
- Jarvie, I. C., 贾维, 134 - 135, 151
- Johnson, L., 约翰逊, 21, 22 注
- 
- Kemeny, J. G., 凯梅尼, 71 注
- Kolakowski, L., 克拉科夫斯基, 101
- 
- labour, 劳动, 185 注
- as life's prime want, 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161, 163
  - reduction or abolition of, 劳动的减少或废除, 147 - 148, 161, 163, 185, 196 - 198
  - 另见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 labour process, 劳动过程, 95 - 96, 104 - 110, 122 - 123, 186, 201
- 'last person' arguments, “最后的人”的论证, 25 - 26
- Layton, E., 莱顿, 125 注

- Lee, D. C. ,李,98, 177 注
- Lee, K. ,李,67 注, 73, 74
- Leopold, A. ,利奥波德,22 注
- Levine, A. ,列文,152 - 153, 205
- Lovelock, J. ,拉夫洛克, 21 注, 67 注
- Lukács, G. ,卢卡奇,78 注
- Lukes, S. ,卢克斯,17 注
- 
- McKibben, W. ,麦吉本,12
- McLellan, D. ,麦克莱兰,17 注
- McMurtry, J. ,麦克默特里,139 注
- Malthus, T. R. ,马尔萨斯,36 - 63
- Marxism, analytical,分析的马克思主义,4
- Maslow, A. H. ,马斯洛,166 - 167
- materialism,唯物主义,90 - 97, 99, 100 - 101, 110 - 113, 120;另  
见费尔巴哈,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 Mathews, F. ,马修斯,29 注, 66, 67
- Matthews, W. H. ,马修斯,59 - 60, 62 注
- Meadows, D. H. ,梅多,14 注, 43 注, 54 注
- Mesarovic, M. ,梅萨罗维奇,45 注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方法论的个人主义,80 - 83
- militarism,军国主义,110 - 112, 156
- Miller, R. ,米勒,116 注, 139, 140 注



Mitcham, C., 米切姆, 125 注

Moore, S., 摩尔, 116 注

morality, Marx and, 马克思和道德, 17 - 19

Naess, A., 奈斯, 1, 28 - 30, 66, 67

Nagel, E., 内格尔, 69 注, 70 - 72, 76, 83

Naletov, I., 纳利托夫, 149 注

natural limits, 自然限制, 36 - 37, 48 - 49, 50, 52, 61 - 63

Marx's critique of Malthus,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自然限制观的批判, 52 - 57

relativity of, 自然限制的相对性, 57 - 61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43 - 44, 52, 130, 199, 206

depletion of, 自然资源的损耗, 13 - 15, 46

另见原料

nature, 自然

in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界定生态问题中的自然, 9, 11 - 12

as a destructive force, 自然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110 - 115

domination of, 自然统治, 30 - 34

human dependence upon, 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86 - 120

man's inorganic body, 人的无机身体, 96, 189

otherness of, 自然的他性, 33 - 34

social construction of, 自然的社会建构, 90 - 92, 100 - 103

另见自然资源、原料

- needs, 需要, 87, 93, 94, 95, 112, 114, 118, 120, 159 - 160, 201 - 202
- absolute or categorical, 绝对的或无条件的需要, 168 - 169
- basic (or physical), 基本的(或生理的)需要, 185, 188, 200, 202
- of capital, 资本的需要, 171
- contrasted with wants, 与欲求相比较的需要, 164 - 165
-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按需分配, 147, 162 - 163, 198 - 199
- as drives, 作为驱动(力量)的需要, 166 - 167
-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的需要, 176 - 183
- exercise of essential human powers, 发挥人的力量的需要, 183, 185
- expansion of, 需要的扩大、扩展, 159, 169, 176, 182 - 183, 188, 190 - 191, 195 - 196
- fully human, 人的全面需要, 179, 180 - 181
- greens' perception of, 绿党的需要观念, 169, 176
- of humans and animals contrasted, 人类需要和动物需要, 177 - 179, 181 - 182
- instrumental, 工具性的需要, 167 - 169
- 'manipulated', 操纵的需要, 173 - 175
- in Marx's later works, 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的需要, 195 - 198
- Maslow's hierarchy,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66
- material, 物质的需要, 111, 112, 188 - 190



- normative force, 需要的规范力量, 167 - 168
- 'rich and many-sided', 丰富和多方面的需要, 174 - 176, 182, 195
- and self-realisation, 需要与自我实现, 183 - 191
- social, 社会的需要, 183
- triadic conception of, 三元需要概念的, 163 - 169, 172, 182, 188 注
- true and false, 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 169 - 176, 196
- of workers, socially acknowledged, 社会公认的工人的需要, 179 - 182
- non-anthropocentrism, 非人类中心主义(论), 16 - 17
- 另见自然中的价值
- Norman, R., 诺曼, 34 注
- O'Neill, J., 奥尼尔, 21 注, 24, 26 - 27, 32
- O'Riordan, T., 赖尔登, 43 注
- objects of labour, 劳动对象, 104 - 107, 123 - 128
- Odum, E. P., 奥德姆, 9 注, 11
- Oppenheim, P., 奥本海姆, 71 注
- O'Neill, O., 奥尼尔, 42 注, 57 注
- Parsons, H. L., 帕森斯, 92 - 93
- Passmore, J., 帕斯莫尔, 8, 9, 11 - 12, 13
- Pearce, D., 皮尔斯, 46 注

- Pepper, D. ,佩珀,10 注
- Pestel, E. ,佩斯特尔,45 注
- Plamenatz, J. ,普拉梅纳茨,116 注
- Plant, R. ,普兰特,164 注
- Plekhanov, G. ,普列汉诺夫,113 注
- pollution, 污染,13 - 15, 35, 43 - 44, 46, 49 注
- Ponton, A. ,庞顿,47, 66 注, 131 注, 165 注, 170 注
-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 demographic transition, 人口转变,51 - 52
  - as an ecological problem, 人口增长作为一个生态问题,13 - 15
  - environmentalists' views, 环境保护论者的人口增长观点, 40 - 44, 47, 48
  - Malthus's theory, 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37 - 40
  - Marx's critique of Malthus,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的批判,50 - 52
  - regulation of, 人口增长法则,47, 50 - 51, 55
- Porritt, J. ,波里特,3 注, 36, 45 - 47, 52, 66 注, 131 注, 176 注
- primary appropriation, 主要的占用,105, 107
- Prinz, A. M. ,普林茨,116 注
- productive activity, 生产活动,105 - 110, 184, 185
- productive forces, 生产力,115, 205
- defined, 生产力的定义,122 - 123
  - development of, 生产力的发展,45, 52, 74, 81, 119, 120,



- 121 - 160, 201 - 203
- Enabling Effect, 生产力的促动效应, 136, 146 - 149, 159, 161
- Revolutionary Effect, 生产力的革命性效应, 135 - 149
- Undermining Effect, 生产力的破坏效应, 136, 139 - 146, 161
- 另见自主, 技术
- productivism, 生产主义, 104 - 114, 191 注; 另见普罗米修斯精神
- profit, 利润、利益, 79, 114, 120 注, 135, 144
- Prometheanism, 普罗米修斯精神, 53 注, 183; 另见生产主义
- Putnam, H., 普特南, 71 注
- 
- raw materials, 原料, 59, 123 - 126, 189
- Raz, J., 拉兹, 27 注, 33 注
- Redclift, M., 雷德克利夫特, 53 注
-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200
- reductionism, 还原主义(还原论), 68 - 72, 81 - 83
- Engels on, 恩格斯论还原, 76
- ontological reduction, 本体还原, 68 - 69
- terminological reduction, 术语还原, 68 - 69
- theory reduction, 理论还原, 69 - 72
- Regan, T., 里根, 19, 22
-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生产关系, 81, 115, 116, 119, 135 - 146, 150 - 158
-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生产关系的生态意义, 148 - 149, 151 -

152, 203 - 205

Rifkin, J. ,里夫金,61 注

Roberts, M. ,罗伯茨,83 注

Roemer, J. E. ,罗默,4, 83

Rolston, H. ,罗尔斯顿,21, 22 注

Rothenberg, D. ,罗滕伯格,28 注

Routley, R. ,劳特利,25 注

Routley, V. ,罗特莉,129 - 131, 177 注

Ruben, D. H. ,鲁宾,102, 103

Sayers, S. ,塞耶斯,17 注, 63 注, 74 注

scarcity, 短缺、稀缺,112, 162, 173 - 174, 194, 198

Malthusian, 马尔萨斯主义者、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  
37 - 48, 50 - 56

motive for development of producti forces, 生产力的发展动力  
(动机),119, 151, 153

Schaffner, K. F. ,沙夫纳,71 注

Schmidt, A. ,施密特,102 - 103

Schumpeter, J. ,熊彼特,142 注

science, 科学

Cartesian, 笛卡尔科学,66 - 68, 77

natural, 自然科学,63, 65 - 66, 87, 184

optimistic projections, 科学的乐观预测,53 - 55



- progress of, 科学的进步, 53, 71
- social, 社会科学, 81, 154
- unification, 科学统一, 71, 84 - 85, 93, 94, 97 注
- 另见生态学、还原论、热力学
- Searle, J., 塞尔, 137 注
- self-realisation, 自我实现, 30, 183 - 191, 200
- Sen, A., 森, 57 注, 200 注
- Sessions, G., 塞欣斯, 28
- Shaw, W., 肖, 117 注
- Singer, P., 辛格, 19, 24, 25, 28 注
- Skolimowski, H., 史柯里莫斯基, 67, 132 - 134
- Smith, A., 史密斯, 179 注
- Sober, E., 索伯, 33n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38 注, 147, 156, 173, 174, 182, 187, 204, 207
- formerly existing, 从前存在的社会主义, 3, 156 注, 172, 203, 207
- 另见空想社会主义
- Soviet Union, 苏联, 138 注
- Spretnak, C., 斯普瑞特奈克, 66 注, 130 注
- Springborg, P., 斯普林伯格, 166 注, 167 注, 172 注
-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79, 143, 153
- Sylvan, R., 西尔万, 28 注, 29 注

Taylor, P., 泰勒, 166

Taylor, P. W., 泰勒, 21 - 22, 23 注, 24 - 25, 28

Technology, 技术, 53 - 54, 63, 77, 87

caus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生态问题的技术原因, 127 - 131, 204

development of, 技术的发展, 131 - 135, 205

ecological efficiency, 技术的生态效应, 44, 58, 130 - 131, 148 - 149, 163, 190, 200

technological fix, 技术困境, 44, 67, 130 注, 200

thermodynamics, 热力学

reduction to statistical mechanics, 热力学还原到统计力学,  
69 - 70, 71

Second Law, 热力学第二定律, 60 - 61

Thompson, G., 汤普森, 166 注

Timpanaro, S., 廷帕纳罗, 90 - 92, 94 注, 99, 101 - 102

Tolman, C., 托尔曼, 177 注

Transpersonal Ecology, 超个人的生态学, 见深生态学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意外后果, 54, 81 - 82, 88, 108 - 109,  
111, 124, 203

use-value, 使用价值, 95 - 96, 107, 171, 196

Utopian Socialism, 空想社会主义; 乌托邦社会主义, 3 注, 17



- Value, 价值、价值观, 90, 171, 196
- values in nature, 自然中的价值, 16 - 35
- constitutive, 构成的价值, 27
- instrumental, 工具性的价值, 27, 32 - 33
- intrinsic, 内在的价值, 21, 26 - 27, 28
- non-instrumental, 非工具性的价值, 27, 33, 35
- 另见审美价值
- Van Parijs, 范帕里耶斯, 81 注, 162 注
- Walker, K. J., 沃克, 48, 53, 57
- Watson, R., 沃森, 12 注
- Wiggins, D., 威金斯, 167 - 169
- Wilde, L., 王尔德, 179
- Workers, 工人、劳工, 125n, 126, 135, 152 - 153, 190, 199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 13, 46 注
- Wright, E. O., 赖特, 4, 152 - 153, 205
- Wright, L., 莱特, 137 注

## 译后记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翻译,在经过三易其稿之后终于尘埃落定,在交出全书译稿的同时,自着手翻译时就悬着的一颗心不仅没有放下,而且悬的更厉害了,开始进入时的不知深浅为结束时即将面对读者时的惴惴不安所取代。毕竟,面对这样一部涉及到当代环境问题、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等诸多重要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著,译者的已有知识结构和学识水平确实难以达到全面、准确地驾驭全书翻译的程度,所以虽经三易其稿、有的段落甚至数易其稿但当不得不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心中仍免不了上下忐忑,不敢安坐。

然而,明知自己学识水平不够知识结构有限但仍贸然接手这部著作的翻译,乃是为书中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所吸引,对作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能有助于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所赞同,并对作者在“那些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运动崩溃之后,马克思在未来已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虔诚地加以解读”(本书导言)的当今世界,仍公开宣称马克思的思想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继续研究,该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捍卫形成马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些核心论题,反对环保主义者对其进行的公开指责的勇气所敬佩。正是基于这三条理由,译者不揣浅陋,鼓足勇气翻译了这部著作,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作者所表明“得到恰当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针对威胁和危害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发展对策提供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本书导言)愿望能够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并通过介绍这项更多定位于理论范围内、解决的是哲学问题的价值和解释形式,以及人类本性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普遍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使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上的全新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并不是对环境限制的违背,而是把避免或改善生态问题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项标准,而且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这一理想可作为现存社会生态评判和变革的动力基础。作者最后的结论,是认为马克思建立在“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原则之上的理想社会,必需基于生态上可行的、适度的生产发展。这一结论也是译者非常希望介绍给中国读者了解的内容,同时也是译者认为在中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今天,该书对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全面认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为此,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为我们提供以上思想的原作者、英国基尔大学的乔纳森·休斯博士。

译者的上述愿望促成了现有译稿的成型。而铁省林博士以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厚积累与翻译功力对现有译稿所进行的校订,才使译稿有可能保持原著的旨意而呈现于读者面前。尤其是他对原著中大量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所作的中文权威翻译的逐条核实,

使译稿不仅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点,同时也使原著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得到较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全面理解原著旨意奠定了基础。为此,对铁省林博士为本书翻译所付出的心血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

此外,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政治学专业 2008 级研究生李岩和许丽娜同学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李岩初译第一、三、六章及结语,许丽娜初译第二、四、五章)。尽管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她们的翻译显得较为稚嫩,但她们的参与为本书的最后成型做好了基础工作,在此也要对李岩和许丽娜为本书的翻译所付出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基金的资助;江苏人民出版社花蕾先生和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张春坦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对上述组织、机构及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尽管译者为本书的翻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由于知识结构和学养水平所限,错误、疵漏甚至误读在所难免,切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1 年 1 月

###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反击了马克思主义不能恰当地解决环境问题这一广泛持有的观点。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定导致有害的生态后果，本书回应了环保理论家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批评，解释和重建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指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与生态上可行的生产发展并不冲突。

ISBN 978-7-214-06627-5



9 787214 066275 >

定价：35.00元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 = (英) 休斯著 ; 张晓琼 , 侯晓滨译

页数 = 337

SS号 = 12804243

出版日期 = 2011.0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生态问题：定义和评价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方法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然中定位社会
第五章	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需要的满足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封底	